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中国工人：一个新的历史

(1998)

Routledge

著者：雅基·希恩 (Sheehan Jackie)

译者 Coward





#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 中国工人：一个新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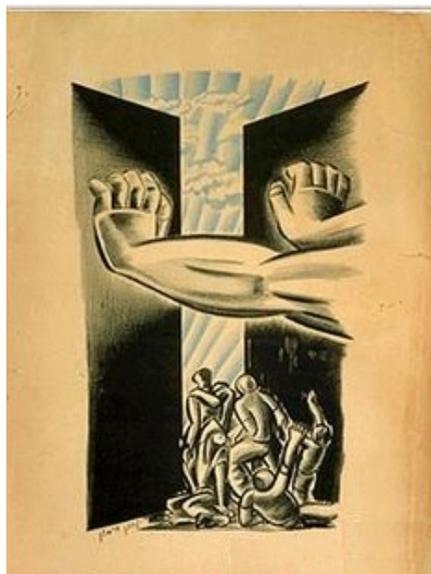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原著 雅基·希恩 (Sheehan Jackie)

(1998)

**Routledge**

译者 Coward



• 制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2021年)



介绍.....	1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时期（1949-1955）的中国工人.....	14
解放后：“最后困难年”（last difficult year）的管理民主化与新工会。 .....	20
劳资协商会议（LCCC）。.....	21
国有企业的民主化：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大会。.....	23
解放之后的工会.....	26
1950年工人对工会和干部的批评.....	31
1951年的工会“危机”和民主改革.....	40
民主改革运动.....	44
三反和五反运动.....	49
50年代中期的管理层、工会和工人.....	53
第二章 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	56
民主管理.....	58
私营企业国有化.....	61
工人的不满：福利，工资和特权.....	65
工会危机.....	75
党的反应.....	85
职工代表大会.....	87
工人与干部的对抗：民主改革的失败.....	90
反右运动：“大鸣大放”的结束.....	93
“镇压、劝说或让步”.....	97
结论.....	98

第三章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1958-1965 年 .....	103
大跃进 .....	103
工业七十条下的企业（1961-1965） .....	113
第四章 “造反有理”：1966-1969 年文革中的工人 .....	126
工厂里的文化大革命 1966 年 5 月-12 月 .....	127
只是另一场运动（1966 年 5 月-9 月） .....	129
1966 年 8 月：炮打司令部 .....	133
工人之间的派系分裂 .....	135
群众运动的兴起 .....	140
经济主义和对合同工体系的攻击 .....	143
政治议程 .....	151
1967 年 1 月：夺权和反经济主义 .....	154
二月逆流和三月黑风：造反派的军事镇压 .....	159
“我们现在是工厂真正的主人” .....	162
1968 年：造反派的衰落和“工人专政”的兴起 .....	164
抵制复职与“极左思潮” .....	166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1969 年 4 月） .....	169
第五章 “人民万岁”：1969-1976 年的抗议与不满 .....	172
1969-1973 年企业旧干部的复职、 .....	172
1974-1975 年重新出现的派别和工业动荡 .....	177
1976 年四五运动中的工人 .....	183
从四五运动被镇压到四人帮倒台 .....	189
第六章 “别人才是你们的主人”：1976-1984 年的不满、民主和改革 .....	194
民主墙 .....	195
工人在民主墙中所关注的事情：生活标准，工资，干部特权 .....	197
工人在民主墙中所关注的事情：参与和控制 .....	201

1979年1月-1980年8月处于压力下的民主墙 .....	207
截至1980年8月,工人对改革的反应 .....	211
企业改革和团结工会的影响 .....	212
企业选举 .....	222
工会 .....	228
团结工会对民主墙和工人的影响 .....	231
1980年地方选举中的工人和其他活动家 .....	235
对民主墙的最终镇压 .....	240
<b>第七章 “让整个国家知道,工人们组织起来了”: 1984年-1994年</b>	<b>243</b>
1984-1989年产业改革的影响 .....	244
打破铁饭碗 .....	245
“科学管理”和改革中工厂经理的权威 .....	248
工人在自治企业中的声音: 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 .....	251
1986-1989年城市改革的失败: 不安全、腐败和通货膨胀。 .....	254
1989年抗议中的工人 .....	261
工人运动的开始: 参与者和议程 .....	263
工人组织的性质及其与学生的关系 .....	268
六四前后的工人运动以及中共的反应 .....	272
1989年之后,处于改革中的工人 .....	278
<b>第八章 结论</b> .....	<b>284</b>
<b>参考文献</b> .....	<b>291</b>



## 介绍

在中国民主运动被镇压六年后，大多数观察家最初的看法——工人自治团体参与这一运动只是一种偶发现象——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实际参与者的记述和对他们进行的采访，有助于揭示 1989 年春夏之际工人活动和工人组织的真正意义。但是，中国领导层从一开始就严肃地看待工人所构成的威胁，因此或许我们应该更多注意到工人活动的重要性。正如 Anita Chan 所指出的那样，领导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忧：

大多数中国人，首先是年轻一代，普遍认为 1989 年是中国工人第一次进行反党抗议，而党的精英们却痛苦地意识到，这其实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有时是以官方工会为首）第五次在政治上表态。

鉴于这种说法，即工人与党之间的政治性对抗事实上以前也曾发生过，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 1989 年工人的活动是否真如人们经常所说的那样是前所未有的。

鉴于最近对工人民主运动活动意义的重新评估，现在似乎应该重新审视一下以前的工人抗议事件，看看它们是否为 1989 年的事件提供了某种先例。特别是，本研究要寻找 1989 年以前成立独立工人组织的先例。当然，1989 年工人政治活动的情况有可能是独特的，因为当时的经济改革已经创造了一个在某些方面与 1978 年之前完全不同的中国。但是，由于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工人自治联合会的

政治意义，尽管官方说法仍然是工人在 1989 年总体上保持冷漠，而且更多的时候是维护党而不是攻击党，但也有可能过去外界观察家太容易相信中国当局的说法，即绝大多数工人是忠诚的，在政治上是可靠的。只有少数人与反党抗议活动有关系，即使工人参与了抗议活动，他们的动机和不满也是来自自私而狭隘的经济利益，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要求，而不是对政权的政策或路线有任何深刻的异议。

在权衡有关工人与党的关系的争论时，部分问题在于不同工人群体之间的分化并不总是得到承认（文化大革命的部分例外，在文化大革命中，研究表明社会经济背景和地位，决定了对派别的忠诚）。然而，中国工人基本上支持党，甚至代表党对参与反党抗议的其他群体进行干预，是一种谎言，因为如果我们看一下全国各类企业的全体工人时，就会发现这根本没有说服力。只有受雇于最大的国营企业的长期工人是这样，他们是工人群体中享有特殊待遇的少数，甚至在这个群体里也不是完全如此。在这方面，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和弗朗索瓦-吉普鲁（François Gipouloux）关于双百运动的研究非常受欢迎，因为它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劳动力中的弱势群体上，这些人已经准备好与党对抗，并走到街上进行抗议活动。

本研究报告并不是说所有工人，或者说大多数工人，经常与政府对抗，并且这些对抗具有政治性。我的论点是，冲突往往源于经济上的不满，但由于党在企业内部的主导地位，很快就发展成为政治上的纠纷，这在中国工业生活中是一个普遍的特征，只是大部分人没有认识到。这种企业内部的冲突和不满的背景，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工人为什么参与双百运动、文革、四五、民主墙等运动。如果工人在这些时期的活动仅仅是出于经济动机的机会主义，很难理解政府为什么要对这些活动给予极大的关注。但事实上，在镇压这类抗议运动的过程中，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对工人的镇压一直更加严厉，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一旦工人参与，共产党就会认为需

要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来结束抗议。特别是自 1980 年“团结工会”运动出现以来，情况更是如此，但甚至在工人阶级推翻共产党执政的这一幽灵开始困扰社会主义世界之前，中共就多次表明，工人的抗议活动比学生或知识分子的活动更令它不安，构成的问题更严重。

中国工人阶级与自称工人先锋队的中共的关系一直很紧张，本书将研究其中的一系列危机。这些危机发生在解放后初期（1949-1952 年）；双百运动期间（1956-1957 年）；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 年）；以及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从 1976 年的四五运动（天安门事件）开始，一直到后来的民主墙运动（1978-1981 年）。我们将考察工人在每一次与当局对抗中的态度和活动，并以此为基础重新审视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

与本研究有关的二手资料可以分为三大类：与上述运动有关的资料；关注 1949 年以来中国工人阶级的资料；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地位的资料。从第一类开始，我们发现，大多数关于双百运动、文化大革命和民主墙运动的描述，都把这些运动描绘成主要是知识分子和/或学生运动，工人的参与是次要的。当然，这也是许多人在八九民运之后所采取的态度，因此现在有必要对这种评价进行批判性的重新审视。

工人在这些运动中的参与不仅很少受到关注，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只有在党和官方工会已经开始反击，动员工人起来批判和攻击原来的抗议者时，工人才大量出现在这些记载中；在讨论双百运动和文革早期阶段的著作中，情况尤其如此。如上所述，弗朗索瓦-吉普鲁的《工厂里的双百齐放》（《Les Cent Fleurs AL'Usine》（1986））是一个例外，这本书研究了一五计划末期发展起来的工人与党的对抗。这项研究的结论与我自己的发现是一致的，即工业动乱和工人的抗议远不是双百运动中的一个插曲，事实恰恰相反。

但总的来说，工人参与这些运动的意义被忽视了。工人一开始

不愿意积极参与这些运动，可能被认为是对现状的满足，而不是面对严重风险时的谨慎，中国领导层认为抗议工人是出于自私和狭隘的经济动机，这种说法往往在表面上被接受。中国领导层要“淡化甚至抹杀”任何与工人对抗相关的集体记忆，这并不难理解：尽管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支持可能是重要的，但中共政权之所以有合法性，正是因为它自称是最先进阶级——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太明显的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外部观察者在这方面的关注相对较少，因为涉及工人的资料大多不比其他群体的资料少。然而，我们希望这项研究将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这种失衡，并且由于专门关注工人的作用，将对有关运动有一些新的认识。

第二组资料包括对中国官方工会各方面的研究(李来士(Lee Lai To)、保罗-哈珀(Paul Harper)，以及关于产业组织、企业管理和产业民主的工作(安德鲁-华德德(Andrew Walder)、史蒂文-安多尔斯(Steven Andors)、比尔-布鲁格(Bill Brugger)、夏尔·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马丁-洛克特(Martin Lockett))。后一个话题对我们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缺少民主和参与管理的机会，是中国工人长期抱怨的原因，同时也是企业层面纠纷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政治原因。工人抱怨的合法性得到了党的承认，党正是在工人不满情绪达到高峰的时刻(1950年、1956-1957年、1967年、1980年)，为建立满意的工人代表机构做出了最艰苦的努力。德博拉-Kaple(Deborah Kaple)指出，1949年后中国人采用了斯大林式的集权工业组织和管理制度，这与中共早期比较民主的管理经验之间形成了矛盾，他还指出由于中共照搬了苏联僵化的一长制，所以它在工厂内部建立的民主机构永远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一点将在第一章中详细讨论(Kaple 1994)。尽管如此，中共继续在口头上强调民主在工厂中的重要性，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行为，可能也激起了工人的不满。

尽管安多尔斯、布鲁格、贝特兰和洛克特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

论述了工人参与管理的发展，但他们很少说明工人自身的要求和来自下层的压力，在推动当局走向这些更民主的管理形式方面所起的作用。同样，在描述所有这些结构或机构的局限性和最终的失败时，也很少注意到工人的反应，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当他们的愿望受挫时，工人往往只是接受这种情况，而事实上，至少从 1957 年开始，中国官方工会的领导人就已经意识到，在某些情况下，工人如果有不满，而又没有合法的官方渠道来解决，就会采取不合法的方法，如独立组织起来或采取非官方的工业行动。所以，总体上看，工人是自上而下改革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民主变革的积极支持者。

安德鲁·华尔德的《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所描述的中国工业企业关系图景，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这本书强调党“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利用施恩-回报的关系网络和有组织的依附关系网络，成功地控制企业工人，特别是防止他们在官方形式之外，采取任何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但是这本书倾向于遵循官方的说法，即这种行动在中国工人中极为罕见，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中看到的那样，情况并非如此。在比较这些方法与更公开的镇压形式时，华德认为：

使用大量武力镇压新出现的或正在进行的集体行动，与能够防止有组织的群体行动，二者相比之下，前者的有效性较低。最残暴的政权不一定是政治控制最有效的政权；残暴和暴力往往意味着这个政府没能制止集体行动。

人们普遍认为，在 1989 年民主抗议活动之后，工人受到了最严厉和最暴力的镇压，事实上，中共对此前的工人抗议运动也是如此。这除了证明中共认为工人的独立行动对其统治构成最严重的威胁外，似乎也表明党在控制工人方面并没有那么成功，反过来说，工

人的积极性要比华尔德所认为的高得多。

正如其他地方所指出的那样，华尔德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大型国企的长期工人，这意味着他的结论对其他群体可能并不适用。不同的观察者在谈论工人阶级内部的不同群体时，指出他们的政治意识和态度存在分歧。因此很显然，确定一下我们讨论的是哪些工人是重要的。另一方面，华尔德注意到，党的控制权在企业内部直接渗透到车间一级，这与本书有关，因为它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由于官方工会和企业管理层最终也服从于党的权威，即使是低级别的纠纷也往往很快发展为工人与党的对抗。

至于官方工会，虽然参与工会实际上并不是强制性的，但是中国工人加入工会是常态，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官方工会与党之间的冲突，将会涉及工人与党之间的所有冲突。但只要最粗略地阅读一下，例如 1956-1957 年期间中国报刊上的工人来信，就会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就工人而言，官方工会绝对是问题的一部分。事实上，正如第 1 章和第 2 章所显示的那样，当发生纠纷时，企业工会站在资方一边反对工人，这一点也不稀奇，即使工会倾向于支持自己的会员，他们通常也没有权力这样做。关于工会的确切作用，以后会有更多的论述；现在只需指出，只要有可能，就必须区分工人本身与工人的官方代表，因为他们的态度和利益决不总是一致的。因此，虽然官方工会和党之间的对抗可能对我们很有意义，特别是在工会站在工人一边的那些时刻，例如 1951 年，但相关资料往往把工人本身降为次要角色。与关于管理改革和产业组织变革的讨论一样，工人的积极作用，在许多资料中基本被排除在外。

通过借鉴上述两组资料，可以拼凑出 1949 年以来中国工人在企业和更广泛的社会中的地位。然而，这往往是一种扭曲的描述，其中工人的独立活动——没有得到官方工会支持的产业行动，或者成立不同程度形式的独立组织，包括独立工会——始终被淡化，甚至

被忽视。过分强调官方工会组织与高层领导的体制性冲突，集中于工会定期试图从党那里获得更大的自主权，而工会成员自身的愿望和要求，以及这些愿望和要求对上级工会领导的影响，则很少得到关注。

此外，工人抗议的政治内容不如经济纠纷突出，工人在官方动员下的行动（如 1957 年反右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的有组织的批判，或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人纠察队进入大学和学校恢复秩序），往往被认为是体现了工人阶级的意见（和对党的支持），而不是工人自发地、往往冒着相当大的个人风险独立采取的行动。因此，工人成为社会中相当被动的一部分，他们基本上支持党，只有在相对安全的机会出现时，才会偶尔为捍卫它的经济特权而提出抗议；这种抗议可能是知识分子或学生领导的抗议运动，或者党或官方工会对工人态度的转变。

这样的描述所缺少的，首先是工人作为积极参与者的政治意识，他们不只是根据自己狭隘的经济利益，而是根据自己的政治信仰和愿望，对企业和社会的发展作出反应。工人们接受了许多教育，内容是他们在国家和工厂中的领导作用，这些教育强调他们在政治上与管理层平等，因此他们准备捍卫自己的权利，抗议管理层的专制主义和干部特权，首先是通过官方认可的渠道，如工会或职工代表大会，但后来，当工人们发现这些渠道没有用的时候，则通过独立的组织和罢工行动等方法，这些方法即使实际上不是非法的，但没有缺乏官方的批准。

既然在现有的大多数描述中，几乎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这种对中国工人的描述，那么是否可以认为，他们在当代中国重大政治运动中的作用确实是微不足道的，而那些引人注目的工人是没有代表性的少数人呢？这里不妨参考第三组相关的二手资料，即对东欧和苏联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工人的研究。当然，中国与这些国家之

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但如果因此而将这些资料完全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是不合理的。我们毕竟是在研究工人在社会主义统治和社会主义管理下的经历，不能因为各种政权在不同的环境下上台，在不同的方向上发展，而掩盖了工人处境的基本相似性。中国领导层始终敏锐地意识到东欧事件和中国事件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似之处，这一点将在第二章中显示出来，我们将看到 1956 年波兰和匈牙利起义，影响了中国双百运动时期的政策，特别是对工人的态度。近年来，波兰团结工会的例子似乎得到了中国当局的关注，并形成了他们对工人的独立活动，特别是组建独立工会的态度，我们将在第六章中看到这一点。

从对东欧和前苏联工人的研究中，涉及到我们所关心的中国问题（官方工会的运作；参与、民主和工人委员会；工人参与民众抗议运动；纠纷的原因和发展；独立工会的问题），似乎形成了一种共识，即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人的地位迟早会出现某些固有的基本问题。一般来说，在一个公开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面临的困境如下。一个执政的共产党通常把自己定义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该阶级最先进分子的精英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党代表的是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不是社会其他群体的利益；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它必须以国家整体的最大利益行事。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与党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是一个信条，但党也承认在短期内可能会有出入，无论如何，工人需要有自己的组织来保护自己的具体权益，以防止企业管理层做出违反政策或法律的行为。所以正式的工会是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

所有这样的工会都是按照苏联的“双重职能”模式组织起来的，即它们在动员工人进行生产方面对管理层和党负有责任，同时也负责保护会员的权益，而不是像在社会主义世界之外比较常见的那样，仅仅是工人的代表和（通常）管理层的对手。他们通常被描述为“传

动带”，把党的政策和指示传递给工人，也把工人的意见和问题传达给党。工会还要充当“共产主义学校”，负责对工人进行思想、技术和文化教育。社会主义企业区别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们的民主管理制度，工人通过在管理机构中的代表，或选举具有特定权利和权力的工人委员会（或代表大会）来参与管理。虽然现代大规模工业所要求的分工意味着工人主要从事体力劳动，而管理部门主要从事脑力劳动，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或政治地位的任何不平等；工人在社会主义企业中的地位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者的地位有根本的不同，因为生产资料不是由个人私有，而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所有。

这就是官方的理论。但在实践中，冲突很快就开始出现。研究东欧和苏联的资料，并没有发现任何官方工会能够在任何时间内令人满意地履行其双重职能；50年代中期中国的许多工会活动家抱怨说，他们的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他们很可能是正确的。一般的情况是，工会必须站在党和管理层一边，或者站在工人一边。如果他们支持工人，他们就会被党指责为经济主义或工团主义；如果他们站在管理层和党的一边，他们就有可能失去工人的信任，因为工人会认为他们不过是管理层的工具或国家的工具。在任何情况下，它们的力量都比企业党组织或管理层要小得多，因此无法向工人提供多少有效的支持。工人委员会（中国的职工代表大会）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它们往往需要高级管理层，特别是厂长的善意和积极配合，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事实上，管理者非但不欢迎和支持，还普遍认为工人参与管理是一种费时和不必要的负担，而普通工人似乎特别难以利用这种组织来影响工作场所的决策。鉴于官方工会和工人代表机构的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似乎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很明显，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工人实际上会发现他们连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人都不如。他们被催促或被迫放弃罢工等维护自身

利益的传统方法，而且他们被告知，这种行动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们是社会的领导阶级，这样做只会对自己造成打击。

中共宣传说，社会主义民主管理制度会使罢工等行动变得没有必要，而且它还是工人当家作主的重要基础，但它似乎存在着致命的缺陷。而且，正如我们在更详细地考察时将会看到的那样，在 1949 年以前，工人与资本主义雇主的关系至少是毫不含糊地对立的，而向国家所有制的转变则可能使工人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当工人与企业管理层发生合法分歧时，管理层可能把这说成是对他们所代表的国家组织的权威的攻击，等于企图“推翻领导”。

因此，社会主义企业中的工人所面临的核心矛盾是，虽然政府坚持认为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并强调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是决定性因素，但在现实中，工人们常常发现，他们几乎无力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进行任何控制，也无力对本应和他们平起平坐的官员施加任何影响。一位作家这样描述了这种言辞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可能造成的结果：

无论人们在政治上怎样冷漠或犬儒，政府的官方价值观念都在长期地制造麻烦。一个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工人阶级的权力上（如果不是专政的话）的政权，一个通过教育和宣传工作传播马列主义经典的政权，必然会面临现实与既定准则的尖锐、持久和自发的考验……官方意识形态代表产业工人提出的主张，与日常现实相矛盾。

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工人与当局之间的冲突往往成为工业生活的一个经常性特征，因为旨在避免工人与企业领导层公开对抗的机制，并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有一点使研究社会主义劳资纠纷问题的作家们大伤脑筋，那就是这种纠纷在多

大程度上具有政治内容和意义。在关于东欧工人的著作中，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工人阶级——“共产主义政体中公认的政治秩序的主力”——与其“昔日的先锋队”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如前所述，哪怕是一部分工人阶级反对一个执政的共产党，也会对该党的合法性造成特殊的损害。

乍一看，具体的争端似乎常常是基于纯粹的经济不满：例如，1970年的波兰罢工是由肉类涨价引发的，而之后的团结工会也是由于涨价而成立的。但是，如果对其进行更仔细的研究，会发现在争端发展的过程中，工人关注着一些更深刻的东西，这些关注集中在社会和政治不平等的问题上。回到波兰的例子，1970年什切青造船厂工人的第一个要求并不是取消肉价的上涨，而是要求取消官方的工会，转而成立由工人自己组织的独立工会，并要求清理臃肿的管理部门和国家工业官僚机构（他们决定肉价、工资水平和其他对工人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相对于工人来说，他们的工资太高，并获得了不相称的物质利益和其他特权。

换句话说，问题在于，一方面工人与管理者和官员之间存在着社会不平等，另一方面，由于官方工会和产业民主是无效的，工人缺乏政治权力来补救这些不平等。这就是为什么这类纠纷演变到后期，工人要求成立独立工会以保护工人的利益成为共同特征，也是为什么一些工人最终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党和管理官员构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这个阶级不代表也不可能代表工人的利益，因为它主要关心的是如何使自己的强势和特权地位永久化。因此，我们看到了由具体的经济不满所引发的纠纷，迅速升级为严重的政治冲突；在中国，这种进展的例子可以在双百运动时期的工业动乱报道中找到。

关于工人在社会主义政府和管理下的表现，我们现在有两种相当不同的描述。一种是来自对中国的研究，在这些著作中，中国工

人基本上是党的忠实支持者，他们在政治上是被动的，他们对民众抗议运动的参与是微不足道的；另一种是基于对东欧和前苏联的研究，它强烈地表明，以工人阶级为一方与以管理层和党为另一方之间冲突，尖锐、持久并且不断升级，这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必然产物，工人将一再被驱使采取独立的集体行动，包括成立自己的组织。上文引用的 Anita Chan 的言论，以及其他对 1989 年成立的工人自治联合会和工人参与双百运动的意义的重新评估，都表明前一种描述现在开始被修正，而倾向于后一种描述。

但在我看来，仍有必要对 1949 年以来中国城市工人的经历进行重新评估，这正是本研究的目的，本研究的重点是工人本身，而不是官方的工会，并参考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工人的研究结果，研究工人对党的政策的反应。他们对官方工会和为在企业中代表他们而设立的各种机构的满意程度，他们与政治和管理层的关系，以及任何可能出现的冲突或纠纷的根本原因、性质和可能的政治意义。追溯 1989 年以前工人与中共政权关系的重大危机的发展，也有助于重新评估工人参与更广泛的运动的意义，如与这些危机同时发生的双百运动或文化大革命。希望更详细地了解工人的态度和关切，特别是在每个对抗时期的早期阶段，将有助于深入了解这些对抗的根本原因，并对它们的发展作出更充分、更明白的说明。

本书将提供一个迄今为止所缺失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下，工人与中共之间的一系列重大对抗，不能被理解为异常情况，而是二者之间基本矛盾的最严重表现。孤立地看，如果不详细了解工人的态度、生活和工作条件以及他们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等方面的背景，就可以看出为什么普遍认为工人在每一个案例中的都处于边缘。然而，如果我们既了解中国工人的生活，又了解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工人的经验，再把这些“异常”放在一起考虑，那么就会对中国工人对中共统治的经验和反应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描述。只有把所有危机

都考虑进去，我们才能既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也能看到它们每一次重现都会逐渐变得更加尖锐和难以解决。我们也可以看到工人是如何进步的，他们在这些周期性对抗中获得了经验，从而在组织和政治上获得了信心。

例如，多年来，正式的工会先是被工人批评，然后被拒绝，工人们转而支持独立的、非正式的、小规模的组织，然后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随着工人们把自己组织成红卫兵和其他团体，工会就完全不存在了。这种较大规模的集体政治活动的经验意味着，在文革之后，工人们在民主墙运动中迅速组织起独立的工会，有些人通过借用“团结工会”的名称，明确地参考了东欧的类似运动。我们还将看到，解放后对干部的官僚主义和不民主态度的批评，在双百运动期间和之后，使人们开始认为，官僚系统对工人的政治权力可能导致它发展成一个新的阶级。工人与其领导人之间的这种严重的政治分化，意味着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随着工人的经历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对政府的态度，工人与党的对抗表现为阶级冲突，即工人与新的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

#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时期（1949-1955）的

## 中国工人

1949年共产党胜利之后，中共与中国工人之间的第一次重大对抗立即开始发展。新组织起来的官方工会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试图争取更大的党内自主权，这场斗争最终导致中共老领导李立三在1952年初被解除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职务，因此关于这一时期的描述往往只关注工会。这种对工会高层的关注往往掩盖了工人本身在基层的活动，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该事件在大众记忆中仅仅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Chan 1993:33）。事实上，这场对抗的根源在于工人对解放后的期望与党对工业接管的较为温和的政策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在华南等较晚解放的地区。

在我们考察后来的危机时，50年代初工人与政府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中的许多因素，将继续出现。它们包括基层工会在履行其双重职能时面临的困难，它们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么服从党和企业管理层而疏远自己的会员，要么支持工人，但是要冒着被指责为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和企图篡夺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权的危险。我们将看到，从1949年底开始，新的官方工会在这两种立场之间摇摆不定，被工人和党夹在中间，显然找不到任何可行的中间道路，最终在1953年5月召开的第七次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大会上，屈服于党的绝对主导地位，从而招致许多工人的失望甚至厌恶，他们在大会后抱怨工会“失去了胆量”（《工人日报》1957年5月21日）。

在这一时期首次出现的另一个将会频繁出现的特征是，为了回

应工人增加企业管理发言权的要求，政府开始推动管理民主化。在这个早期阶段，以及 1956-1957 年和 80 年代初，各种工人代表机构的建立和运作中遇到的问题有明显的相似性，这表明这种组织存在根本性的缺陷，而这种缺陷最终破坏了所有的组织。德博拉·卡普尔（Deborah Kaple）的研究表明，在解放后初期，中国试图实施一种理想化的（相应地也是严酷的）斯大林式工业组织和管理实践，而试图在此基础上嫁接民主管理是注定要失败的（Kapte 1994: 58-69）。这是一种有说服力的观点，因为人们常常有这样的印象：这一时期的工人和基层干部都在与根本无法运作的制度作斗争。

工人对干部的批评，无论是工会、管理部门还是党的干部，以及这些官员的自我批评，也总是一成不变，都是领导干部的态度和工作作风中似乎长期存在的问题上：官僚主义，脱离基层，喜欢采取强制或命令式的方法，不信任工人，傲慢和高压，形式主义，以及企业内部和工会中缺乏民主。如果不是后来的党和工人的对抗中一再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解放后的问题可能会被归结为经济形势困难，大量干部缺乏经验，或者工人对新政权的“期望值过高”（Harper 1969:91）。正是这一点，使它们在本章所研究的时代中具有更多的意义。

为了理解为什么许多工人，特别是后解放地区的工人，认为党在接管工业方面的温和政策难以接受，我们必须先看看工人们早先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如何形成他们对共产党统治的态度和期望。解放后，中共的宣传立即大肆渲染工人阶级对党的胜利的贡献，尽管这往往意味着要回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工人运动的全盛时期（威尔士 1945 年；切斯诺 1968 年）去寻找庆祝的事件。例如，《工人日报》在报道南方城市广州解放两天后，提醒读者注意该城市在民国时期工运的“光荣传统”。这篇文章将广州称作“1925-1927 年革命的温床”，并回顾了工人在广州起义中的作用，

以及 1927 年 12 月短暂的广州公社——“中国第一个工农兵革命政权”（《工人日报》1949 年 10 月 16 日。Dirlik1997。）

中国共产党在 1927 年后被赶到农村，只有相对较少的组织者留在国民党和后来被日本人控制的城市里，所以这种对工人革命作用的介绍，可以被简单地看作一个共产党在二十多年的农村斗争和游击战后，急于证明自己代表工人的一厢情愿。但是，这就会忽略“在工人中……这并不只是口头上的漂亮话，而是确实存在的传统”（Epstein 1949: vi）。即使在文革期间，一些工人团体的命名仍然会回溯到军阀时代的斗争（裴宜理和李逊 1997:73）。工人们自己对对中国工人传统的认识，似乎确实包含了早期，特别是 1919-27 年，当时的工人运动首先是高度政治化的，工人获得物质条件的改善是次要目标。

经济斗争确实在 1930 年代占主导地位，但政治化程度较高的工会精神，却在活动的激增中周期性地重新出现，在这些活动中，他们“反复地把纯经济的、甚至是政府控制的‘黄色’工会的全部成员纳入其中”（Epstein 1949: v）。在整个 30 年代和抗日战争期间，“一个‘无组织的’工人运动……在地表之下不断地沸腾，并在零星和自发的罢工和纠纷中爆发，中国工人（表现出）非凡的机智、顽强和勇气”（Wales 1945: 67）。不管有没有地下共产党的领导，日本投降后，城市中的工人运动仍在继续，并上升到新的高度，仅 1947 年就有 300 多万工人参加了罢工。在内战时期和之后的工人运动大会上，工人在国民党控制区的斗争将经济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得到了中共的赞扬和鼓励。在 1948 年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一位发言者赞许地指出，工人的政治意识有所提高，并认识到“生计和饥饿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同样，1953 年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回顾说，在国民党统治区：

工会必须领导工人在一切可能的和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合法的和非法的经济斗争，并把这些斗争同政治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解放前〕工会所进行的一切经济斗争都具有政治意义。

因此，在中共看来，解放前工人运动的政治方面被不仅是接受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这与新的共产党政府为工会规划的角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工会和工人的过渡并不容易。

考虑到国民党控制下的城市工人运动的激进和政治化的历史，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工人对他们的地位抱有很高的期望。国民党工人政策和立法的重点始终是控制工人（Epstein 1949: viii），不用说，在日本占领东部沿海城市后，对工人的限制并没有放松。也许更令人惊讶的是，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在回到南部和东部城市地区时，对工人的控制程度不减反增（Epstein 1949: 75-6）。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显然会期望他们在国民党和日本或“傀儡”统治下的待遇，与在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下的生活形成明显的对比。1948年下半年有人指出，工人们听到已经解放的地区进行农村土地改革的消息，“受到很大的鼓舞”，他们期待着城市解放后也能有类似的进程。

但大约从1948年年中开始，工人期望显然不会得到满足，或者至少不会立即得到满足，因为中共关于接管工业的政策发生了转变，“农民社会主义”时期土地改革的极端平均主义应该适用于工业领域”（Brugger 1976:64）的思想被取代了，变成了“劳资两利”这样更为温和的政策。在这个新政策下，中共鼓励上海、广州等城市的资本家和私营企业经理留下来，继续经营任何对国民经济和全体人民有利的企业。扩大就业和缓解短缺是当务之急，而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压倒性需要，是推行这种政策的主要动机，党的最高

领导人承认这种政策基本上是“改良主义”（李立三 1949:84）而不是革命的。

由于工人倾向于对工商业进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式的接管，因此许多工人对针对私营企业的“劳资两利”政策持高度怀疑的态度，他们认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不是没有理由的），这只是让他们继续受资本家剥削的一种借口。李立三在 1949 年 5 月谈到了工人的期望与党的实际政策之间的冲突问题，他对农村与城市情况的差异作了如下论述。

有人说，共产党解放农民的方法很好，很简单，他们把地主的财产拿去平分给农民，为什么不能把资本家的财产分给工人，而要进行生产的发展，才能改善工人的生活呢？——李立三

他解释说，在农村，农民一旦从地主的剥削中解放出来，就会更加努力地工作和生产，“因此，平均分配土地的结果是，我们能够增加农业生产”，从而增加农民的购买力，这又扩大了市场，推动了工业生产。但是，把农村政策应用于工业，就意味着“社会将倒退，生活将下降”，因为资本家的财产——工厂和机器——的分割（字面意思）将使工厂无法继续生产。他坚持认为，工人“当然不能瓜分资本家的工厂，相反，必须尽力保护工厂，增加生产，因为只有这样才对工人有利”（李立三 1949：73-4）。

在李立三的分析中，过去造成工人困苦的三个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民族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中国工业的不发达。其中第一条已经被消灭，第二条被新的人民政府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大大限制，只剩下第三条需要工人与资本家雇主结成“生产同盟”自己努力解决。他们的资本对

改造中国落后的经济是至关重要的，工人辛勤劳动带来的产量增加将不可避免地使资本家受益，他们从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中增加的利润具有剥削性质，但这种情况是历史的必然，“过分的剥削”（李立三 1949:74）是可以而且也会被防止的。判断私营企业的唯一标准是是否对国民经济有利（新华社 1948 年 9 月 21 日）。

李立三认为应该劝说民族资产阶级留下来继续投资的观点是合理的，但他对把资本家的财产分给工人的要求作了过于字面的解释，也许是有意为之，未能解决工人的真正政治诉求。他小心翼翼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把工厂实际拆开并“分配”给工人，并指出这不切实际，却从未提到工人控制他们的（完整的）企业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一点从北方和东北这些最早被解放的工业化地区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在那里，许多私营企业被前业主和管理人员抛弃，实际上是由工人经营的。

北方和东北地区对工业的接管更为激进，也往往更为暴力，这说明了一个普遍的原则，即“某个城市越早解放，对其工业的接管就可能越激进”（Brugger 1976:67）。在解放较晚的城市，大量的私营企业在解放后长达 7 年的时间里仍然掌握在私人手中，与解放较早的地区相比，这些城市对私营工业的政策是非常温和的；而这些城市的工人，由于他们的工运历史和对共产党统治下的新时代的高度期望，也相应地难以接受这些政策。中共新一届市政府从未考虑过让工人接管和经营自己的企业，但这并没有阻止工人朝这个方向推进；也没有阻止一些“过分热心的工会组织者，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解释得过于字面化”，在 1950 年初春“把权力强行集中到工人手中”（Vogel 1969:76）。因此，中共一上台就为中共与工人之间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 解放后：“最后困难年”（last difficult year）的管理民主化 与新工会。

1950年初，也就是“最后的困难年”，工人和中共新政府面临的经济问题十分严重。（《人民日报》1950年2月6日）。抗日战争中日本人的轰炸、内战中败退的国民党的破坏，使得主要的工业化地区遭受了相当大的破坏。以广州为例，据1949年12月的报道，全市企业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企业在满负荷运转，而全部劳动力近三分之一是失业的（广州工运 1950:85）。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强调了工人作为新社会领导阶级的责任，并警告他们必须做出妥协。为了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叶剑英通知广州工人。

我们要善于团结自己的阶级，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分清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分清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必  
须使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服从于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  
所以，在某些情况下，有时必须对其他阶级作出一些让步。  
——《广州工运》

但是，对工业采取温和的政策，强调为了生产、经济复苏和保持企业经营而作出妥协，并不意味着完全忽视工人的利益和愿望。不能这样做，因为人们认识到，工人们的情绪是这样的：如果要使这一政策取得成功，就迫切需要在国营企业中实行管理民主化，在私营企业中改善劳资关系，并迅速将工人组织成新的正式工会。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初几个月里，对民主化和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要求也是明确存在的，不过，正如后来的民主化运动一样，民主化对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重要性是被强调得最强烈的一点：《人民日报》

坚持认为，工人参与企业民主管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往往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因”（《人民日报》1950年2月6日）。

但企业管理民主化除了有促进生产的作用外，也是解放后工人地位变化的主要标志。虽然在新政权下，工人使用罢工等传统武器的权利并没有被收回，但工人被告知‘（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使用（这些）损害生产的斗争方法’（Peng Qing zhao 1951: 29-30）。无论与国营企业管理者发生纠纷，还是与私营企业中的资本家发生纠纷，都可以通过工人“自己的工会和自己的政府”来协商和谈判解决；这些方法是充分的，因为“由工人阶级自己领导的政府，肯定不会不保护工人阶级利益”（《关于工运的问题》 1950: 56）。

政府要求工人用他们在解放前珍视的斗争武器来交换民主管理的新结构，使他们成为管理者的伙伴而不是对手，因此这一机构非常重要，承担着很大的压力，需要让工人在企业管理中发挥某种真正的作用，满足他们的期望。我们现在来详细研究一下私营和国营企业所进行的管理改革的性质，以及这些改革在多大程度上使工人在企业中具有真正的影响力，然后再看一下新的官方工会、工人和政府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改革进展的影响。

### 劳资协商会议（LCCC）。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为改善劳资关系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强调妥协，工人的工资和条件只能在企业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得到改善，而资本家则可以获得合理的利润水平。劳资协商会议的本意是让劳资双方的代表在平等的基础上，以兼顾双方根本利益的方式，讨论企业（有时是一个行业或产业）的工资、条件、利润、生产等一切问

题。

作为这一时期工人参与私营企业管理的机构，劳资协议会是否起到了作用，一直众说纷纭。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当1956年下半年管理民主化和工人参与问题重新被提上日程时，国营企业和国营私营联合企业被批评为“忽视了允许私营企业工人参与管理的民主传统”（Lai Ruo yu 1956a）。这似乎意味着，至少与国营企业相比，这个方向的管理改革在私营企业已经相当成功。

从表面上看，劳资协商协议会似乎是偏向劳方的：无法解决的纠纷要提交给地方劳动局，而地方劳动局的工作人员很可能是具有工会背景的官员，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站在劳方一边。“资本家仍然是资本家，机器对他不利”（Harper 1971a: 121）。除此之外，会议是由双方轮流主持，企业党委书记是劳方代表，这两点都有利于防止机构被厂长或经理所支配（这是国营企业中工厂管理委员会的一个主要问题，关于这一点，后面会再讲）。

但是应该记住，劳资协商委员会主要是“党或工会用来反对资本家的有力工具”（Harper 1971a: 119）。工人本身是否能真正发挥任何影响力，取决于他们的工会代表的态度，但是他们不一定会同意或支持工人的观点。资本家在新制度下的地位也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受到限制：一位作家发现，劳资协商会议“即使有，也没有很好地运作”，因为管理阶层害怕工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和“侵犯他们的管理权力”（Lee Lai To 1986:90），因此他们的合作并不积极，阻碍会议的运作。在工会维护工人权益不力的情况下，资本家甚至可以通过劳资协议会“达到只对资方有利”的目的'（广州工运1950: 56）。

在与私人雇主的谈判过程中，代表工人利益的干部往往缺乏经验。资方一般看来要比劳方干部和工人代表准备得好得多，也更有效，例如，劳方干部和工人代表发现自己无法反驳资本家关于财务

和合理利润水平的说法，因为他们事先没有计算出自己的数字。这就导致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困难”（广州工运 1950：66）。从这一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家有时在律师的陪同下参加谈判，并将劳资协商会议和集体协议这样的机构变成对自己有利的。

### 国有企业的民主化：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大会。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统治后的最初几个月，国营企业管理民主化的进展也遇到了困难。政府规定在每个国营企业都要成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大会（WRC）（华北人民政府，1949年）<sup>1</sup>，还鼓励私营企业的工人劝说管理层采取这些形式，尽管根据劳资合作和平等的政策，如果没有资方的同意，单靠工人是做不到的。

工厂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厂委会）包括厂长（任主席）、副厂长、总工程师、工会主席成员，加上其他“负责生产的人员，以及相应数量的工人和职工代表”组成。这样一来，共有5至17名成员，负责生产人员的参加由厂长决定，工人代表则由“全体工人的大会或工会召集的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厂委会要成为“统一领导工厂或企业的行政组织”，其职责如下。“根据上级企业管理机关制定的生产计划和各种指示，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讨论和决定一切有关生产和管理的重要问题”。其中包括生产计划、管理制度、生产组织、人事任免、工资、福利等。

委员会的所有决定都由厂长下令执行，作为主席，厂长有权单独作出紧急决定，只需寻求委员会的追认，对于多数人认为“与企业利益相冲突，或不符合上级指示”的决定，厂长有权否决，但必

---

<sup>1</sup>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本文件是之后所有关于厂委会和职代会结构和职能的资料来源。

须立即向上级机关请示。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的多数派也可以向上级机关报告自己的不同意见，但在等待进一步的指导时，必须执行厂长的决定。在大企业，可以成立由厂长、工会主席和一名民选代表组成的常委会，负责日常事务，监督委员会决定的执行。在新解放的城市，驻厂的军代表也自动成为厂委会的成员。

职工代表会议（以下简称职代会）是职工代表会议的前身，从1956年开始，职代会得到官方的提倡，它被当作苏联“一长制”的解毒剂，也是解决工人与管理层和官方工会疏远的办法。它由工人和员工从自己的生产小组或班组中直接选出的代表组成。这些代表“直接对选举他们的职工负责”，如果发现他们的表现不令人满意，选民可以在任何时候罢免代表。除非罢免，否则代表每年都要重新选举。职代会每月举行一次或两次会议，一般在工作时间以外举行，会期不超过半天。在工人少于200人的企业，每月或每两个月要召开一次全体员工会议，充当职代会。在由一个以上工厂或生产基地组成的大型企业中，每个组成部分都要选出自己的基层职代会，然后由职代会委派代表参加整个企业的总职代会，但要大力强调基层职代会全体职工直接选举的原则。

职代会的主要目的是充当管理部门（以厂委会的名义）与职工之间进行协商和沟通的论坛，其权力仅限于听取和讨论厂委会的报告，检查委员会的行政管理和领导工作方式，并提出建议或提出批评。它的权力仅限于听取和讨论厂委会的报告，检查厂委的行政管理和领导工作方式，并提出建议或批评。职代会的决定要经厂委会批准，并由厂长下令执行后才能生效。工代会同时也是厂工会组织的代表大会，工会委员会有义务执行其关于工会事务的所有决定。

从上述对厂委会结构和运作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对“（厂长）否决权的潜在不民主性”（Brugger 1976:220），以及对厂长或经理总体上的主导地位担忧并非毫无根据。如果厂长和其他“负责

人员”积极配合，工人自己的意见，由他们的工会代表在委员会中表达，有可能具有一定的分量。哈珀认为，由于工会干部可以从政治活动家和工人队伍中的优秀生产者中抽调，工会在委员会中的存在“确实提供了一些实际的工人代表”，特别是在解放后的几个月里，当“企业被国家接管时，最初的激增将是为了发挥一些重要的工人作用”（哈珀 1971a: 117），但他承认，厂委会和职代会同样很容易被忽视，特别是当企业领导层忙于应付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很可能经理和总工程师一起，总是可以淡化工会和工人代表的意见”（Harper 1971a: 117）。

职代会倾向于成为“橡皮图章机构”（Harper 1971a:115），只是执行厂长和厂委会的决定；由于它自己的决定对厂委会没有约束力，所以它的实际影响力很小。关于解放后最初几个月的职代会的报告很少，特别是与劳资协商会议相比。然而，有迹象表明，工人们最初试图将职代会变成一个比条例中所设想的更有影响力的机构。由于某些原因，职代会的会议不是像条例规定的那样只占用半天时间，而是至少要开三四天，而且经常要开十天或更多，占用了生产时间（《工人日报》1950年3月9日）。会议时间过长的原因被归咎于准备工作不充分和没有集中讨论关键问题，但很可能是工人们急于在这个唯一表达工人意见的官方论坛上参与讨论企业各方面的工作，才使讨论时间延长。会议时间过长，也可以看作是工人和工会与管理层和党之间可能发生冲突的证据。

国有企业管理民主化进展缓慢，似乎是1950年初的全国性现象。《人民日报》1950年2月的一篇社论提到了中国东北地区的进展，但以“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们仍然没有把所有的企业都管理好，事实上，有些企业管理得非常糟糕”（《人民日报》1950年2月6日）来加以限定。次月的《工人日报》也注意到一些国营企业中并没有成立厂委会（《工人日报》1950年3月5日），即使在建立了

民主管理的机构的地方，工人也难以实际利用这些机构对企业的经营施加影响。为了了解这一时期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情况，找到工人在管理民主化方面出现问题的根源，有必要考察一下官方工会的发展情况。工人能否利用他们可以利用的正式参与结构，让工会干部代表工人参加劳资协商会议和厂委会，并全面负责职代会工作，取决于工会对工人意见和要求的支持程度。这是决定工人能否真正参与本企业管理的决定性因素。官方工会有责任保护工人的民主权利，正如我们在下一节中所看到的，只要他们不能或不愿履行这一职责，工人就失去了通过民主管理的正式渠道施加影响的机会。

## 解放之后的工会

中国采用了苏联的工会双重职能模式，这种模式一方面要求官方工会代表会员的利益，另一方面还要代表企业管理层和国家的利益。由于这些利益经常发生冲突，在实践中，中国工会在工人和企业之间左右横跳，这些变化取决于中国更广泛的政治气候和各方给工会带来的压力。在中共新政权成立的头两年，新成立的官方工会还在摸索中，工会的重点转变非常之快，从以工人为主体的相对自治到完全屈从于党，比后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快，由于这种模式的存在，也就不足为奇了。工会早期有时支持工人的激进主义（尽管一些工会组织者也非常不信任那些属于国民党“黄色”工会或秘密结社的工人，关于这一点，后面会有更多的说明）和推动管理民主化，从1950年3月左右开始，工会转变为站在管理层一边，采取行动抑制工人的要求，只专注于生产。这种态度完全不符合许多工人对中共胜利的预期，工人的批评迫使工会重新考虑，并从1950年下半年左右开始，强调自己首先是工人利益的维护者。这又引发了党内对

工会高层过度自治和工团主义的反动，最终导致中华全国总工会最高领导人李立三被清洗，工会作为有效的工人代言人被驯服，直到50年代中期。

工会在社会主义政府下的应有作用，与解放前中国城市中工会和工人的活动方式，与当时存在的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激进工人运动，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工人们对于工会重要性的信念就是这样，尽管中共的宣传把国民党的“假”工会描绘成负面的东西（必须记住，这有相当的事实依据），但当要解散这些组织时，工人们有一种感觉，即“他们知道假工会不好，但到头来还是比没有工会好，如果发生劳资纠纷，那怎么办呢？”（广州工运 1950:30；弗 Friedman 1949:128。）这种对传统的、对抗性的工会类型的强烈支持，给工会向合作性角色的过渡带来了困难，在这种角色中，工会将对管理和国家以及对自己的成员负责。事实证明，工会组织者并不总是能够或愿意立即进行这种过渡。

1949年10月后的头几个月被官方描述为“工人随意罢工，吓坏了资本家，使他们关闭工厂”（Harper 1969:91），考虑到解放前许多工人的情绪和他们对新时代的期望，这是一个可信的描述。中华全国总工会1950年5月发表的年度报告证实了这一印象，承认“长期受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工人报复性很强，表现出极左的倾向”（《中国工人》1950年5月15日）是“不可避免的”。似乎特别引起人们关注的是一些工会倾向于支持这些“左派”工人，企图利用为支持“劳资两利”政策而成立的劳资协商会议等机构，以牺牲私人管理为代价为工人谋取利益（《中国工人》1950年7月15日）。一些国营企业的管理干部和厂长也遭到了工会领导的工人的反对。

工会干部在解放后继续视企业干部为敌人，这受到了报刊的批评，据来自天津的报道，那里的工会干部甚至不愿意在企业干部的办公室里与他们进行讨论和协商，因为害怕工人把他们打成“干部

的走狗”（《工人日报》1949年10月13日）。这种来自工人的压力和批评并不是工会干部采取这一立场的唯一动机，尽管这一定是一个强大的动机，因为新工会急于将自己与国民党的“假”工会区分开来，他们认为国民党除了代表管理部门和国家控制工人外，根本没有为被迫加入的工人做任何事情（广州工运 1950：86）。但除此之外，一些工会干部似乎也认为，企业民主化的政策为他们的态度提供了理由。

1950年3月初，《工人日报》编辑陈用文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论述了有关企业民主化的各种问题，特别是试图澄清以提高工人工作绩效和增加产量为目的的民主化与所谓“极端民主化”之间的区别，这个“极端民主化”就是工人要求掌握自己企业（《工人日报》1950年3月3日和8日）。他说道，一些工会官员忘记了民主化的生产目标，而专注于群众动员和发动“民主运动”。

结果，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发动群众”，挑起与领导  
对立和纠纷；有意或无意地引导群众提出了许多纯经济利益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又不容易全部直接解决。这样一来，问题无法解决，反而成为领导与群众之间的障碍。——《工人日报》1950年3月3日

他继续说道，这种“极端民主化对生产非常有害”，“甚至比完全没有民主更糟糕”（《工人日报》1950年3月3日）。后来同一系列的一篇文章透露，一些工会官员认为厂长否决厂委会多数人决定的权利与管理民主化不相容，因此反对这种否决权，但这种观点也被谴责为有可能破坏国家对企业的领导权，导致“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极端民主化”（《工人日报》1950年3月8日）。

但工会对“极端民主化”的支持是短暂的。1950年3月至6月，

中国城市的工商业陷入危机时期，党进行了干预，以遏制劳资纠纷的数量，并执行优先恢复和稳定经济的政策。对工会施加了压力，要求它们集中精力进行生产，支持它们的企业（无论是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的领导，其结果是：

在 1950 年春天的几个月里，工会强调妥协，忽视了阶级斗争，经常站在工厂管理部门一边。在私营企业中，工会批准了资本家关于降低工资和福利的建议。在国营企业中，同样出现了保守倾向，工会和管理层“说着同样的话语”，工会的行为不过是管理部门的一个分支。  
(Harper1969:92)

然而，党的压力并不是中国各地工会在 1950 年春夏之交采取这一路线的唯一原因。除了那些“过分热心的工会组织者……强行将权力集中在工人手中”（Vogel 1969:76），官方工会以及企业管理部门和党组织中的许多干部对城市工人的态度也不那么积极。必须记住，并不是所有的工会组织者都有工运的背景或者在城市里呆过，许多人在 1949 年中共胜利前只在农村或军队里，那些来自早期解放区、长期当过党员或参加过红军的人，往往不信任那些“为敌人制造步枪”的工人（Brugger 1976:71）。

有两个主要因素影响了工会干部对工人的态度。其一是过分强调某工会杂志委婉指出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复杂性质”，“旧社会创造和留下的黑暗面”（《中国工人》1950 年 12 月 20 日）的倾向。工会干部没有看到党的宣传中所描绘的清一色的无产阶级英雄，而是看到了支配工人队伍的黑帮老大和秘密社会成员等 1949 年以前工业劳动的特征（Brugger 1976:42-7；Chesneaux1968:54-64）。他们非常担心让这些不良分子进入新的工会，例如在广州，黑帮老大和秘

密结社对工人的影响一直非常大，但是工会的招募工作却以蜗牛的速度进行，到1950年3月，一些新的工会还没有招募到一个会员（广州工运 1950：11）。就国统会的“黄色”工会而言，必须做出一些努力，将积极的参与者和领导者与不愿意或无动于衷的被征召者区分开来，加入这些义务组织，但在工会招募的最初几个月，组织者在评估工人加入工会时又是极其谨慎的。最后，党的指示是先组织起来，以后再淘汰“黑暗面”，要相信大多数工人有能力发现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广州工运 1950：40）。那些确实漏网的、继续在工作场所发挥影响的前黑帮老大，在后来的运动中，如下面讨论的民主改革运动中，就成了目标。

除了这些对工人中社会堕落分子的怀疑之外，我们还可以从许多工会干部身上发现，他们对工人管理工会和企业的普遍缺乏信心。这种缺乏信心的现象在企业管理者中更为普遍，而工会干部的工作当然是与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作斗争，坚持让工人能够行使参与管理的权利，因此，如果工会领导人自己都不相信车间工人队伍拥有才能和智慧，那么普通工人就会感到困难。鉴于后来解放区存在着“留用人员”，一些对工人智力能力的明显忽视，或许可以追溯到民国时代典型的雇主与工人的关系，正如朱利安·弗里德曼所描述的那样。

在这种情况下，非体力劳动者的管理者和雇员对体力劳动者的蔑视可以少得多……。雇主们甚至在战后还以一种专制的方式对工人进行统治。他们对体力劳动者不屑一顾，经常支付的工资与其说是产出价值，不如说是与他们的感情一致。一些雇主傲慢地施加惩罚和羞辱，而工人们没有农民惯常的缄默和忍耐，他们用谩骂还以颜色。

（Friedman1949:111-12）

党的人员，包括工会高层的人员，当然可以有更好的期望，但在这里，工人实际上也没有享有特别崇高的地位。相反，1949年的革命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党和军队的成就，他们把解放赋予了一个感激但相对被动的无产阶级和农民（Rosen 1982:78）。这种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并没有使工人处于强有力的地位，无法使他们成为社会领导阶级的成员，在工作场所决策中发挥作用的权利，甚至在1957年，一些地方的管理层和工会仍然把不服从指挥的工人当作顽皮的小学生，而不是“企业的主人”（Sheehan 1995:191）。

### 1950年工人对工会和干部的批评

尽管大家都在谈论企业民主化的重要性，尤其是政治上的重要性，但1950年上半年的实际情况是，留下的私人雇主在他们的企业中保留了相当大的行动自由，包括降低工资和解雇多余工人的自由，而国营企业中的厂长们同样在管理上很少考虑工人的意见或喜好。此外，这两种管理者都得到了官方工会的帮助，他们自己也表现出对工人缺乏信任，没有让工人参与组织和管理“自己的”组织。这与一些工人对中共接管工业的期望大相径庭，批评随之而来。

特别是在1950年下半年，工人对“自己的”工会的不满程度，以及工会的态度给企业民主化带来的后果，都变得很明显。在这一时期的工运和其他报刊文章中，提醒工会干部注意内部民主和信任、依靠工人重要性的文章比比皆是，但这些文章的出现频率（以及多年来不断重复出现的情况）证明，官方工会在成为真正民主、有代表性组织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工人也不把它当作自己的组织。早期的一些问题大概可以归咎为磨合期的麻烦，不过干部的

繁重工作并不值得同情，因为这往往是由于他们自己不愿意把工作委托给积极分子或普通工会会员造成的。1950年工会工作进展情况的年终报告证实，在这一年里，全国各地的工人都在对工会提出同一类的抱怨。

在上海，工会干部只重视生产任务，而忽视了福利、安全卫生工作，忽视了对工人利益的保护，这意味着工人完全受制于企业干部。这些干部被描述为：

缺乏依靠工人阶级的观念……工人管理委员会被当作无关紧要的东西，很少关注工人的积极建议，工人的安全、必须解决和可以解决的问题往往被置之不理。当干部对工人的安全和卫生不闻不问，不尊重工人的意见时，工会也不关心，这就使工人认为工会只是干部的工会，而不是自己的工会。——《中国工人》1951年1月20日

从这一评论中可以看出，工人们正确地认识到，新工会在这一时期只是管理部门的一个分支。工会起到的这种作用，表明了其任务中固有的困难，即既要为工人的利益，又要为管理部门的利益服务，特别是在这一早期阶段，工会受到党的强大压力，要求强制维护企业的稳定和秩序，同时又缺乏必要的与工人的结合，而这种结合本可以在不惜一切代价强调工业和平的同时，更深入地了解工人的意见和基本利益。

工会内部缺乏民主是1950年批评的一个共同主题。当时出现了企业工会主席候选人“只需提出自己的名字，而不让工人投票选举的情况”（《广州工运》1950：58）。在工会选举中也出现了问题，有时干部不相信工人会把票投给那些参加过训练班、因而最适合担任职务的积极分子，他们就会以大压小（Liu Zijiu 1951），以确保选

出“正确”的候选人。这种行为绝对不符合民主应该是“工会的灵魂”的指令（《工人日报》1951年1月1日）。

工会干部也被说成“对工人提出的建议不重视，或置之不理”（《中国工人报》1951年1月20日）。当干部确实采取了行动时，例如在福利方面，据说“他们事前不征求工人的意见，事后也不作任何解释。但更严重的是，他们……对职工没有丝毫的阶级感情和亲情”（《中国工人》1951年1月20日）。上级工会机关不顾工厂车间的实际情况而作出决定，导致工人指责试图执行这些决定的工会干部，并认为工会是“上级工会的工会，不是我们工人的工会”（《中国工人》1951年1月20日）。

工会干部对待在各种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许多工会积极分子的态度也受到批评，他们认为干部“只强调利用他们，不训练他们；只要求他们积极，不考虑他们的实际水平和困难；批评多，鼓励少”（《中国工人》1951年1月20日），造成普遍的士气低落。官方工会的基本问题是有责无权，而这个问题对于工会积极分子来说是最严重的，他们是最底层的，直接面对工人的不满，同时又最没有能力去满足工人的要求。我们会发现，这些士气低落的工会积极分子的评论，在1956年期间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着，这表明问题一直存在。

与上面所引的报告差不多同时发表的《工人日报》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些提到新工会在1950年期间的成就，但也有一连串类似的抱怨和批评。工会的组织，特别是基层工会的组织被描述为“不太健全”，并指出工会干部中和许多工会中长期存在着“脱离群众的严重现象”。

一些工会干部还不善于考虑广大职工群众利益。例如，  
在国有企业中，工会和干部的共同任务当然是保证国家生

产计划的完成，但正因为如此，一些工会干部在日常生活中忘记了考虑职工群众的利益，对他们最迫切的要求视而不见。——《工人日报》1951年1月1日

文章重复了这样的指控：可以而且应该解决的问题被忽视了，工会没有行使其代表工人利益的法定权利，也没有向管理部门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它还发现工会在私营企业中的表现有如下缺陷：

在私营企业中，有少数工会干部不仅不善于考虑职工群众的利益，甚至代替资本家“开除工人、降低工资”，公开为资本家说话。正因为如此，在一些工会中出现了群众不信任工会，工会脱离群众的现象。——《工人日报》1951年1月1日

这些意见证实了工会只为国家或私人的管理部门的利益、生产和稳定的利益行事的倾向，从而忽视了工人的利益。

这篇文章还指出了工会内部民主的问题，有报道说，一些上级和基层的工会干部仍然是任命而不是选举产生的，对工人积极分子提拔为干部表现出一些不情愿的态度，因为这些“真正受广大群众拥护的群众领袖”缺乏资格或资历。这种态度被说成是“根本性的错误……。一切工会组织都必须从下而上，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有些工会“还缺乏各种民主生活制度”，如定期召开会议，与会员协商并汇报决定和进展情况，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机会。文章报道说，强迫、命令主义和自己垄断一切工作的工作作风仍然存在，并举了另一个例子，一个工厂的工会干部干预工会选举的进行，坚持让工人投票给从工会训练班回来的候选人，“招致群众的普遍不满”（《工人日报》1951年1月1日）。最后，工会的财务似乎也存在问

题，有些工会组织收了会费却不为会员办事，不公布账目，甚至出现了浪费和腐败的情况。考虑到国民党对“假”工会的主要批评，即工会领导人腐败，只是把会员的会费装进口袋，而无意把资金用于工人的利益，这种行为对工人对新工会的态度的影响可想而知。

这些对工会的批评表明，最初一些工会人员站在工人一边，力图继续发挥他们的传统作用，充当工人利益第一代表，但不久之后所有的工会官员很快就被压向了另一个极端，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管理层和党的一边，反对工人。这种变化不仅是党的政策变化的结果，现在党的政策严重倾向于压制工人的要求，使其服从于经济复苏和稳定。它还源于工会干部与工人会员的分离：工会干部已经陷入旧式官僚的不民主工作方式，由于他们不与工人协商，也很少征求工人的意见，所以他们不可能受到工人的有效压力，支持他们对企业管理“极端”民主化的偏好。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 1950 年上半年私营企业“劳资两利”政策，特别是工会干部的态度对劳资协商会议的影响，就可以看出工会转移阵营带来的影响。解放后初期，工人中支持工会的左派主义激增，肯定证实了许多资本家对新政权的担心。据报道，在一些地方，他们对他们的工人（现在正式成为主人）将如何对待以前的压迫者感到紧张，这是可以理解的：在郑州，据报道，资本家中出现了“恐慌”，其中一些人“甚至不敢露面，不敢经营自己的生意”（广州工运 1950:70）。但我们已经看到，在劳资协商会议，资方有以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来促进自身利益的空间，而一旦 1950 年 3 月党对工会的压力开始生效，抑制工人在私营企业中的“报复”倾向，这就变得更加容易。

对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后的劳资关系的评论（下文将讨论）认为，在这些运动之前，资本家利用劳资协商会议来维护他们的管理权威，坚持不经协商就有权解雇工人或降低工资，这已经是司空见

惯的事（《工人日报》1952年4月7日）。一份关于华北私营企业工会的报告承认：

在“五反”运动前，由于工会工作中的缺陷，群众没有被动员起来，所以在非常多的工厂和商店里，工人和资本双方都受益的政策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在相当多的工厂和商店里，〔政策〕是“只让资方受益”。——《工人日报》1952年9月20日

由于资本家在五反运动期间受到了持续的攻击，特别是工运报刊大力煽动对资本家的反感，因此，这些报道很可能对劳资协商会议和“劳资两利”政策采取特别负面的、很可能是夸大的看法。然而，早期来自中国一些地区的证据证实了这一趋势（Sheehan1995:46-7）。因此，在1950年期间，对工人施加压力，要求他们缓和自己的要求，甚至接受减薪或解雇，以帮助企业维持生存，这似乎很可能被一些资本家所利用，他们

缺乏诚意，总是想“利用”工会，控制工人，或以克服困难、渡过〔企业〕难关为借口，强迫工人降低工资和生活水平，以达到‘只有利于资方’的目的。——《中国工人》1950年7月15日

从1950年年中开始，资本家受到广泛的批评，许多人指责他们在春季经济危机中以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为自己谋取利益，“完全违反了团结和‘大家同舟共济’的精神”（《上海劳动报》1950年5月24日）。解放较早的地区的干部遭到了警告，指出存在“片面强调资方的利益，纵容资本家违法违纪，对侵占工人合法权利的行为不

加干涉，使我们牺牲了工人的根本利益”（《新华社》1948年9月21日）的倾向。但是，尽管意识到了可能出现的问题，但这种倾向很快在后来的解放区也凸显出来，并且在中共的政策下得到了更多的推动，因为私营企业的工会被劝告要集中精力抓生产和纪律，采用与国营企业相同的方法，如劳动模拟竞赛，努力说服资本家继续经营（《工人日报》1950年6月23日）。

1950年，在国营企业中，企业民主化和工人参与的情况好不了多少。据报道，行政干部普遍认为像厂委会这样的机构“不是……有效的工具，而是额外的负担，结果开会纯粹是为了搞形式主义”（《中国工人报》1950年7月15日）。在某些情况下，行政干部同意成立厂委会，“只是为了‘完成上级决定的成立厂委会的‘任务’，而不是因为他们真正想实行民主管理”。这种委员会可能是干部成员占多数，也可能根本不理会工人代表的意见，不屑于帮助工人代表进行解释和教育，让他们真正参与进来，“所以到了厂委会开会的时候，工人代表觉得没有任何意义……。有的工人会员说“我们是来听会的”（《人民日报》1950年5月3日）。

报纸上报道的干部典型观点有：“开个干部会也一样能解决问题，为什么要开厂委会呢……工人只知道一个车间的情况，怎么能参加全厂的民主管理呢？”（《人民日报》1950年5月3日）。“厂委会成员很多，开会很麻烦，拖了好久，什么问题都决定不了”。“工人不了解大局，不能发言”。厂长的否决权似乎破坏了行政干部对厂委会的尊重，因为他们倾向于“把厂长的最终决定权与厂委会对立起来”，他们这样描述各自的职能：“你们讨论，最后我做决定”（《东北日报》1950年6月9日）。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民主的双关语比比皆是，如“工人是民，厂长是主”（《中国工人》1950年7月15日）。在这一时期，干部们经常被劝告要执行职代会通过的决议，似乎也表明该机构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一些报纸对这些态度以及干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作风提出了强烈批评，并提醒干部们，管理民主化'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思想问题'（《中国工人》1950年7月15日）。厂委会和职代会的良好运作，是把旧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新民主主义企业的“关键环节”，强调干部必须掌握“依靠工人群众协助管理好企业的基本思想”（《人民日报》1950年2月6日），才能使工人感到自己真正是企业的主人，并据此开展工作。虽然人们承认，厂委会中的工人代表，其中许多人只受过最低限度的教育，并不总是有能力发挥突出的作用，但它又提醒工会，作为“共产主义学校”，它们的任务是教育和帮助工人，使他们能够有效地参与；如果因为工人缺乏教育而使他们处于从属地位，那是最不公正的，而这是他们在旧社会中地位低下的结果。

关于干部态度和民主化失败的负面报道层出不穷，促使人们开始反思解放后初期对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处理方式。早先有人认为，“劳资两利”的政策本身并没有错，而是“一些私营工商业者……扭曲了政府政策的含义，故意做出侵犯工人正当权利的违法行为”（新华社1948年9月21日）。不过，后来有人认识到，政策在有利于资方的方向上犯了过错。大部分的过错都被甩给了工会，政府指责工会未能保护工人不受剥削，这是相当不公平的，因为他们的路线是“经济危机期间，工会领导人对中共指令的正确解释”（Harper1969:92）。但是，无论错在党制定的政策本身，还是错在工会对政策的执行，人们都清楚地认识到，工人对政策的不满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

在重新评估党对私营企业的政策的同时，也重新考虑对国营企业的温和政策是否完全合适。从1950年就开始有人提出，虽然“不要把旧的结构打得粉碎”和“保留原有的职位、工资和制度”等口号在解放时是正确的，但维持现状的政策有一个缺点，即“我们不

能不暂时继承许多不利于团结、不合理、无政府主义和无组织的破坏性现象，以及一些腐败的制度”（《人民日报》1950年2月6日；Brugger 1976:231）。同年5月的一份工会报告更进一步，承认“维持各国有企业的现状，使之保持不变……的决定适合于接管阶段，但不适合于企业已被控制的阶段”，“一些管理部门和工会的干部把接管阶段的政策误用到控制阶段”（中华全国总工会 1950：4）。现在人们承认，许多国营企业不愿意进行工人所喜欢的激进变革，这阻碍了管理民主化的进展。工会又一次因未能充分代表和保护工人利益而犯了错误：行政干部认为工人不能有效参与，对于此事十分冷漠，甚至抱有敌意，因此工会很难维护工人参与管理的权利，而这些干部只是口头上说相信和依靠工人应该是包括企业管理在内的一切工作的核心。

在1950年上半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工会从属于国营企业管理，这使得工人没有办法行使他们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利，因为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仅仅是存在着诸如厂委会和职代会这样的民主机构，还不足以保证工人的参与能够成为现实。尽管官方坚持认为民主化对发展生产是必不可少的，但许多干部仍然认为民主化是可有可无的额外工作，考虑到他们的其他紧迫任务，他们不应该在上面浪费太多时间，除非工会官员有效地坚持工人在企业中的民主权利，否则厂长在国企管理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会让管理层将工人的意见置之不理。

工会转向管理层的后果变得日益明显，工人对工会的批评日益严厉，要求改变政策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鉴于这些批评在工会官方报道和主要报纸上的突出位置，似乎毫无疑问，主要是工人的批评和不满的数量和严重性促使了这一变化。1950年8月，一场工会整风运动开始了，工会干部对之前表现出来的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态度进行了自我批评。并没有突然转为全力支持工人的意见和要求，

要做到这一点，工会干部首先要知道这些意见和要求究竟是什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正是他们对工人的疏远和对工人意见的无知，首先带来了危机。

但是，各级工会高层似乎都一致认为，他们以前对工人福利和利益的忽视，使私人资本家和国营企业中的行政干部都可以肆意践踏这些利益，如果工人要当“企业主人”，那么这种状况就必须立即得到纠正。因此，虽然没有立即恢复支持工人的“极端民主化”要求，但从1951年开始，工会确实更加强调自己作为工人代表和工人具体利益代言人的作用。这很快就使党对基层工会的经济主义指责落井下石，而在更高的、全国性的层面上，与之相对应的是，党对工会自主权的增加也同样不能接受。在这两种情况下，工会在与中国共产党的持续对抗中更倾向于站在工人一边，这是党所不能容忍的。

## 1951年的工会“危机”和民主改革

当评论家们讨论解放后初期官方工会与中共关系的危机时，他们通常只是指1951年的事件，尽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会在1949年中共胜利后立即支持工人的左派倾向也是摩擦的根源。虽然党在1951年底采取行动，遏制工会内部和中华总工会高层的经济主义和工团主义的相关倾向，用赖若愚取代李立三担任中华总工会负责人，但直到1953年初，才公开了对这些问题的任何或分析。在同年5月向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中，对经济主义和工团主义攻击姗姗来迟，占据了显著位置，但这些批评大多是专门针对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最高领导层的。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这种高层冲突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层面的事件，以及解放后工人与党之

间围绕工业管理政策为中心的对抗，在这种情况下是如何发展的。

工会在 1950 年下半年面对工人的大量批评并接受了其中的大部分批评之后，1951 年的工会更加重视自己作为工人在企业中具体利益的代言人的作用。正是这种态度，特别是他们对工人眼前物质利益的关注，在 1953 年被谴责为经济主义：企业级工会被批评为只看到了工人福利的改善与生产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没有认识到前者实际上取决于后者，被指责为不负责任，没有劝说工人不要提出在目前情况下无法满足的过高要求（赖若愚 1953:52, 66）。由于这些倾向与李立三试图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争取更大的党内独立性的努力相吻合，党对这些倾向的关注更加强烈；因此，在中共领导层看来，工团主义已经从最低层渗透到最高层的工会中。如果说工会以前作为管理部门的臂膀是工人完全不能接受的，那么它对工人利益的强调则同样为党所反对。私营企业中的问题并不那么严重，主要是实际问题而不是意识形态问题。也就是说，尽管工会有义务动员工人完成生产计划，但当工人的利益受到私人管理部门的行动威胁时，工会采取独立的路线来维护工人的利益，这在意识形态上没有任何障碍。反对剩余资本家对工人的“过度”剥削，同时继续和发展生产，一直是工会在私营企业中的应有作用，也是对其 1949 年以前职能的一个较小的转变。实际问题涉及到基层工会组织履行这一职能的能力，在反复进行的整顿和改革运动中，包括民主改革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工会组织的能力受到质疑。关于这些运动，以后还要讲。

但在国营企业中，工会的适当作用就不那么明确了，这也是 1951 年期间工人运动内部辩论的主题（Harper1969: 92-6）。这场辩论的中心是，工会在国营企业中的立场是否应该与干部的立场有任何不同。党的官方观点是不应该：因为工人阶级的长期集体利益与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和党在国企中的代表——干部的利益是

一致的，所以他们之间不可能有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工会有责任说服工人阶级中不太先进的那部分人认同这种长期的、整体的利益，同时也要让党了解工人自己的切身利益；工会绝对不能成为工人短期利益或纯物质利益的代言人，因为这无异于是对党的至高无上地位的挑战，是工团主义。

一些工会官员所持的反对立场是，在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一样，管理层和工人的分工依然存在，如果工会真正成为工人自己的组织，维护工人的利益，就必须在立场上有所区别。因此，如果干部的行为侵犯了工人的利益，工会就有理由反对干部，尽管这最终意味着反对任命和控制干部的党。正是这种观点在 1953 年被批评为“工会中存在着背离党的领导的倾向”（赖若愚 1953：52）。

李立三领导下的总工会高层，试图从党的控制中赢得更大的独立性，这并非巧合，此时基层工会正采取更加独立的路线，与工人站在一起维护他们在企业中的利益。然而，虽然李立三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人的行动可能有助于营造一种氛围，使基层工会能够朝着更有力、更一致地维护工人利益的方向发展，但这种转变并不一定代表着对上级指示的回应，甚至也不一定代表着来自上级的直接影响；事实上，此时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对基层工会垂直控制很薄弱，因此排除了这种可能性（Harper1969:96）。

根据工会在 1950 年大部分时间内的运作情况以及工人对工会缺陷的反应，更有可能的是，各级工会，包括最高级工会，都在对同样的压力作出反应，因为他们意识到，除非他们作出真正的努力，代表企业中的工人，维护他们的要求，否则他们的地位将无法维持，因为他们将被工人拒绝。在 1956-1957 年的双百运动和 80 年代初，工会再次试图赢回工人的信任和效忠，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这一点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因此，通常所说的发生在 1951 年的工会“危机”，是工人与党之间持续对抗的第三阶段，官方工会现在再次

倾向于站在工人一边。从这一背景下的“立场”争论来看，那些坚持国企工会应该更加独立的工会干部，显然是在回应工人先前对他们“是干部的工会，而不是（工人）自己的工会”的指责（《中国工人》1951年1月20日）。与此相对应的是，党对工会在国营企业中的正确立场和作用的上述表述，将意味着工会将继续作为干部的左膀右臂（尽管是“工人自己的”干部）。

从当时报刊的报道中，很难衡量1951年期间基层工会的经济主义和工团主义倾向的实际程度，因为对它们的所有批评似乎都被推迟到了1953年初（《南方日报》1953年5月19日）。工会可能只是在1951年期间似乎过分强调了工人的利益，与他们一贯支持和执行企业干部的决定而不管对会员的影响如何的立场相反。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对工会干部的指责是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的，因为我们知道，1950年底的工会整风运动正是为了使工会从无条件地支持企业干部，转向更有力地支持工人的意见和利益。工人在经历了“干部的”工会之后，也很可能尽量把工会推向相反的方向，所以工会有时会越过界限，从工人的合理意见变成工团主义。然而，工会组织中的缺陷仍然存在，这就使人怀疑即使是当时的工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地推行工人的要求，并代表工人取得“经济主义”的利益。

假设工人现在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得到了工会的支持，维护了他们在企业中的利益和民主权利，那么可以认为，企业管理的民主化会取得迅速的进展，工人对自己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新地位的满意程度也会相应提高，工人与党之间的矛盾也会有所缓和。但事实上，工会组织内部的问题不断，似乎已经削弱了他们支持工人民主化要求的倾向。在1951年夏天，我们发现，中国中南部地区的企业民主化仍然被判断为进展甚微，导致工人抱怨“他们〔是〕主人，但〔没有〕发言权”（Liu Zijiu 1951）。人们承认，大多数企业“没

有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有的企业没有经过根本的变革，只有少数企业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这意味着，南方“民主改革中被忽视的教训（必须）补上”（《南方日报》1951年7月10日）。民主改革运动以及后来的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管理中，而且也存在于工会内部，这些问题继续引起工人的不满情绪。这三次运动在南方开展的时期（1951年中至1953年初），构成了工人与党的这种第一次对抗的最后阶段，因为党力图推动企业民主化，净化和加强官方工会，但却没有释放工人中积压的要求，即所谓的“极端民主化”。这些运动是由前两年工人的抗议和要求，以及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宗旨所引起的，但即使党暗中承认许多抗议和批评是有道理的，但它仍然表现出对工人的不信任，不愿意充分动员工人实现民主化，而且每当它担心工人可能将这些运动推向极端时，就会迅速进行干预。

## 民主改革运动

1951年5月，在中共中央中南局管辖的地区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在中国东北解放后就已经开始了，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但“在1951年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是中南部地区”（Brugger 1976:105）。改革被描述为“工人从被统治者的地位上升到主人地位过程中必须经过的一个历史阶段”（新华社1951年8月20日），其目的是完成企业的改造，把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变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把旧民主（私营）企业变为新民主企业。因此，它似乎答应了许多工人在解放后立即要求的那种对工业企业旧秩序的彻底改革。

这个运动主要是针对残存的所谓封建或反动势力，更具体地说，

是针对黑帮老板制度和秘密结社：

民主改革的目的和宗旨是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彻底改革它们在工厂和矿山中为统治广大工人而特意建立和培养的帮工制度。

但是，与以前的工作场所民主化措施一样，这次也强调了该运动对生产的有利影响。关于在南方启动民主改革运动的官方指令解释说：

就是要依靠工人阶级，使企业摆脱一切封建的、反动的因素、反动的制度和不良的作风，彻底消灭生产中的障碍，建立起全面的民主管理制度，把工人的积极性引导到生产工作中去，从而建立起新的劳动态度和纪律，使工人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组织阶级。——《新华日报》1951年8月20日

这个运动将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民主斗争，包括召开群众大会，让工人在会上指认和控告黑帮老大和其他“封建残余”。强调斗争是“反封建的，不是反资本的”（《南方日报》1951年10月9日），至少在私营企业中是这样。第二阶段，民主团结的目的是‘解决……有关工人和〔白领〕职员之间的关系，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关系，老工人和新工人之间的关系，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工人群体之间的关系’（新华社1951年8月20日）。主要采用的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意思的是，不仅在工人和干部之间，而且在企业内部不同阶层的职工之间也发现了问题。如果我们看看双百运动期间的工业动乱和工人抗议，也会看到老与少、

熟练与不熟练等之间的分野，当时工业劳动力中的“无产者”，包括年轻人、低技能者、学徒等在党的批评者中尤为突出（裴宜理 1994）。

民主改革运动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是民主建设，包括提高企业的政治意识，树立新的劳动态度，改革和加强包括企业工会在内的群众组织，建立民主管理制度（新华社 1951 年 8 月 20 日）。这一阶段包括“规定工会委员会定期改选”（Brugger 1976:111），如果工会要由会员民主管理，这是一项重要措施。这一措施的列入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信号，即对那些在前一年未能定期举行选举的基层组织的批评，并没有使情况有任何明显的改善。除了在那些工会本身被认为是“不纯洁的”（Brugger 1976:250），即受到不良的“封建”因素污染的企业中，官方工会将在执行民主改革运动中起主要作用。这条规定进一步证明了许多新成立的工会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在黑帮势力最强的地区。厂委会的改选也要在民主改革运动期间进行（《工人日报》1951 年 10 月 22 日），这说明这些机构的民主运作也没有按计划进行。实际上，运动的三个阶段的进展往往是缓慢的，第一阶段有的直到 1951 年 12 月才完成。第二阶段直到 1953 年初才在许多企业中进行，而第三阶段，即最后打算在各类企业中建立民主管理的阶段，则被整个推迟到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结束之后（《工人日报》1951 年 10 月 22 日）。

早在 1950 年 3 月，《工人日报》就坚持认为，与许多工人和工会干部的看法相反，在企业中不需要为民主化开展任何群众运动（《工人日报》1950 年 3 月 3 日）。但是，随着民主改革运动的开展，人们承认，事实上，要想对许多自 1949 年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的企业进行真正的改造，就必须开展群众运动：“仅仅依靠政府的命令来废除这些〔封建残余和〕制度是无效的，必须动员劳动群众来铲除这些制度和残余的罪恶”（《南方日报》1951 年 8 月 20 日）。但是，在解放以来改革成效如此有限的企业中开展群众运动，本身就会产

生问题，在许多早期关于开展运动的文件中，都可以看出对可能存在的危险的担忧。

许多直接负责运动的干部担心的是，运动最终会给工人提供一个算旧账的机会，不仅仅是与指定的“封建”对象算账，而是与经理、白领员工，甚至是工程技术人员算账，所有的旧企业精英都算账，而这些精英在许多情况下，自 1949 年以来一直没有改变。不仅帮派老板的影响还在，而且一般的政策是尽可能地保留制度，保留人员，这实际上使一些地方的企业管理回到了解放前的状态。工人们对此种情况的态度，在为运动的必要性辩护的发言中显露无遗。例如，有人声称，广州私营工厂的工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仍受黑帮老板和秘密结社的“控制”，他们觉得自己还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这从他们的评论中可以反映出来，“我们处在一个阳光照不到的地方”，“街道已经解放了，但我们的工厂还没有解放”（《南方日报》1951 年 12 月 1 日）。显然，那些在革命两年后还在为同一个私人老板工作的工人，可能也会觉得‘解放’对他们工作场所的权力结构没有什么改变。

因此，在那些即将发起民主改革运动中的人中，有人担心这场推迟了很久的确立工人为“主人”的运动，终于满足了他们 1949 年对中共接管的期望，可能会太受工人欢迎，会很快失去控制。事实上，这些担心在民主改革运动期间并没有实现，因为群众动员普遍不成功，但在反资本主义五反运动的高峰期确实发生了非常类似的事情。干部们非常谨慎地进行民主改革运动，并试图预先阻止工人的极端主义。当局虽然承认工人对企业精英、技术精英和管理精英的感情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强调技术人员是“是工厂不可缺少的一支重要的力量”（新华社 1951 年 8 月 20 日），凡是没有被认定为政治反革命分子的，都必须争取和改造，“尽管工人群众不满意”（《南方日报》1951 年 7 月 10 日）。工人与工作人员和技术人员的纠纷被列为

“内部”（《南方日报》1951年7月10日）事务，“应该公开讨论和解决”，但与消灭少数“在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和欺骗”的封建分子的运动无关（新华社1951年8月20日）工人。

反对这些分子的统一战线不仅要包括那些'在旧政权下可能冒犯工人并引起他们不满的工作人员和技术人员'（我们记得弗里德曼曾评论说，在民国，即使是最低级的办公室职员也会对体力劳动者表现出轻蔑的态度（Friedman 1949:111），而且还要包括私营企业中的资本家，他们“曾利用封建反动的影响来维持“秩序””，在工人中招致类似的敌意。资本家被认为也受到了封建势力的恶劣影响，因此他们对运动的支持“（可以）而且（必须）得到保证”（《南方日报》1951年7月10日）。

在这些文件中，对于动员工人开展全面的群众运动是否可取，明显地持保留态度，这给人的印象是，企业干部不可能对运动给予全心全意的支持，事实上，干部对改革缺乏承诺，很快就被认为是阻碍南方民主改革运动发展的一个因素。为了使运动重新走上正轨，发出了一个指示，要求政府、党、共青团和工会干部“从思想上唤起对民主改革运动的重视”（《南方日报》1951年9月20日）。告诫干部们不要“以避免混乱为借口，对发动群众犹豫不决，对工人的正义要求不予支持，（这样就会）脱离群众，是“极其错误的态度”（《南方日报》1951年7月10日）。”“避免混乱”通常是指限制斗争的范围和时间，防止工人走得太远，同时也要保证生产的维持。对不服气的企业领导反复强调，民主改革运动不会破坏生产。

相反，它将为生产服务。即使它对生产产生暂时的不利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它也是有益的。如果以维持生产为借口而抵制或放弃民主改革，那是错误的。——《南方日报》1951年7月10日

关于 1951 年南方地区开展罢工运动的所有现有证据都表明，在大多数企业中，干部对运动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都没有作出完全的承诺，主要原因是担心如果让工人自由地开展运动，他们会很快地把运动扩大到几乎所有企业中有权有势的人，同时也担心运动对生产可能产生的影响。鉴于这种态度的普遍存在，工人们自己对运动的热情也趋于蒸发（《南方日报》1951 年 10 月 9 日）。民主改革运动的不成功，从有关 1952 年底在广州大部分工业部门重新发起运动的报道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据说只有码头和国营企业成功地完成了改革，而私营企业的工人仍被“封建残余和反动势力”公开或暗中控制着（《南方日报》1951 年 12 月 1 日），建筑业仍在实行黑帮老板的劳动合同制。中国共产党含蓄地承认民主改革运动的失败，在 1951 年底和 1952 年初发起了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以弥补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管理以及工会中的一些缺陷，这些缺陷至今阻碍着民主改革。

### 三反和五反运动

三反运动是在 1951 年底发起的，目的是打击国家官僚机构中的浪费、腐败和官僚主义问题，包括国营企业和官方工会的管理。这个运动后来以“五反”运动的形式扩展到私人部门，针对一些资本家实行的所谓“五毒”：贿赂、逃税、盗窃国家财产、骗取政府合同、盗窃国家秘密经济数据。这些运动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兴趣，是因为它们的目的之一是要解决企业管理和工会中的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已经暴露出来，因为民主改革运动未能实现其在各类企业中实行管理民主化和确立工人为“企业主人”

的目标。这两个运动在完成时都被誉为巨大的成功，但后来官方的分析却暴露出严重的缺陷，使人们对整个工业界一系列改革运动的成效产生怀疑。然而，当人们对 1953 年初各种改革运动的成功性产生怀疑时，党的重点已经从民主化和管理人员与工人的关系上转移了，相反，产量和劳动纪律才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因此没有再开展进一步的运动。

三反运动暴露了基层工会干部中令人担忧的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的情况，导致党发出警告：工会必须改革自己的组织，使工人对其廉洁性感到满意，才能在五反运动中可信地领导工人反对“无法无天的资本家”（《工人日报》1951 年 12 月 16 日、1952 年 2 月 20 日和 4 月 9 日）。工会应该在企业中“在行动层面”领导五反运动（Harper 1969:99），这场运动被普遍认为是工人和工会在私营工业中影响力的高潮，在后来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中确立了他们对私企管理层的权利。然而，五反运动也有另一面：对犯了‘五毒’的资本家的攻击，也揭露了这些资本家在全国范围内贿赂工会干部的大量案件（《工人日报》2 月 29 日、1952 年 4 月 5 日和 16 日、1955 年 3 月 11 日）。因此，虽然这场运动被正确地认为是工会和工人对剩余资本家的全面胜利，但它也揭示了解放后初期一些工会组织问题的严重程度。

甚至在 1952 年 6 月发表的赞扬五反运动的成就和期待其最后胜利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对五反运动的进行和结果的不确定性。虽然并不是所有的评论家都会说这场运动对生产和就业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Ong Shao-erh 1953:37），但人们普遍认为，在运动的高峰期（Brugger 1976:116），尽管提出了“既要斗争，又要进行生产”的口号，但由于工人和工会干部的时间被运动所占用，它确实造成了一些企业的停产，并干扰了许多其他企业的生产（《南方日报》1952 年 6 月 15 日）。在五反之后，所使用的术语强烈地使人联想到解放

后不久，工商工人被敦促与“经过教育和改造”的资本家联合起来，恢复和发展生产，搞活经济，同时向资本家提供贷款和税收优惠，帮助有困难的人（新华社 1952 年 6 月 18 日）。还让资本家放心，‘五反’的目的不是消灭资本家阶级，而是清除不法资本家中的“五毒”（《南方日报》1952 年 6 月 15 日）。显然，这场运动在剩余的私有制企业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提醒工人必须尊重资本家的财产权、管理权和在法律范围内雇佣和解雇的权利（《南方日报》1952 年 6 月 15 日），加强了这样的印象：政府急于制止一场已经失控的运动。如果我们记住，在企业中，特别是在仍有大量私营企业存在的地区，给予工人在企业经营中真正的发言权的成功改革是多么的少，那么就可以理解这第一次真正成功的反对私营雇主的群众动员，在工人中释放出多么强烈的感情。这恰恰是在发起民主改革运动时，干部们所担心的工人的那种反应，但由于运动停滞不前，普通工人很少积极参与，所以这种反应没有实现。在五反运动期间，工人中的反资本主义情绪似乎造成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企业中几乎没有人愿意充当私企管理层的代理人，“因为害怕被认为是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政府不得不提醒工人，只要资本家合法地经营企业，并以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方式经营企业，“为这些资本家服务与（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愿望就不会发生冲突”（《南方日报》1952 年 6 月 15 日）。

到了 1953 年初，三安、五安和工业界的民主改革运动被相当严厉地重新评价，并判断其效果有限。私营企业雇主贿赂工会干部的案件仍不时见诸报端，这说明即使是 1951 年以来开展的三反运动中最有效的五反运动，也没有结束这些现象。1955 年在广州一个训练班对工会干部的调查发现，几乎 90% 的工会干部承认曾协助资本主义雇主以各种方式欺骗国家，或对这种行为视而不见（《工人日报》1955 年 3 月 11 日）。

原先对三反运动成功的定论也作了很大的修改。有的干部自己把三反运动称为“只有‘二反半’或‘二反’，甚至‘一反’——只反对腐败”（《南方日报》1953年2月13日）。但是，尽管现在人们对“三反”和“五反”运动的成功产生了怀疑，但致力于提高工人在企业中地位的改革运动的时机已经过去。工人参与管理的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遗留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很快就会在双百运动的下一次工人不满情绪中重新出现，这将在下一章中看到。1953年上半年的反官僚主义运动，实际上是三反运动的延伸，然而这一时期的重点并不是管理民主化和促进工人参与管理，与两个运动的初衷不同；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对象是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而不是企业的基层干部（《南方日报》1953年2月11日）。在企业内部，大力强调纪律，工人的积极性明显地从政治转向生产。工人们经常被提醒他们在生产中的责任，并被警告说，违反纪律与他们作为“企业主人”的地位是不相容的（《南方日报》1953年8月28日）。

1953年5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影响加强了这一趋势，在这次大会上，工会受到了批评，认为他们过去过于重视福利和支持工人的“过分”要求，而忽视了他们在生产中的职责。现在所有的工会都被提醒，生产是他们的中心任务，即使在私营企业中，生产也不是只为资本家及其利润服务，而是对国民经济和工人自身的长远利益至关重要（《南方日报》1953年5月31日）。虽然仅仅在几个月前，工会中官僚主义的持续存在似乎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特别提到了工会内部没有民主生活，没有举行选举和向工管会汇报工作，但后来，工人对工会的持续不满似乎被放到了一边，因为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生产上。

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对工会的批评当然是针对其中一些工会在1951年期间所表现出来的经济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倾向。但是，从那时起，工会的时间并没有停滞，我们还必须根据其他事件，如工会

在五反运动期间的活动，来考虑这些批评意图产生什么影响。看来，淡化工会的政治活动而支持其生产的中心任务，也很可能是为了决定性地结束工人和工会在私营企业中与资本家的斗争，这种斗争有时有可能升级为失控，在某些情况下对生产产生不利影响。现在，人们坚决否认私营企业的工人“只是半个主人”（《南方日报》1953年8月28日），并阻止他们进一步扩大在企业内部的权力的企图。

尽管“五反运动”确实是“为了增加工人在管理中的权力和参与度”（Andors1977a: 52），但这种参与度的增加并不纯粹是为了促进其自身的发展。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们就会预期，一旦企业在1955-1956年被收归国有，参与度会进一步扩大，而事实上，一旦私有制结束，工人和工会在管理中的作用就会受到限制。关于这一点，下一章会有更多的论述。工人的参与和工会在企业中对五反运动的领导，应该放在党对工业的总政策中来看。虽然工人和工会所发挥的影响力肯定会因为这场运动而增加，但“工会动员工人进入私营企业管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最终实现经济的国有化”（Lee Lai To 1986: 99）。国有化后，生产将是他们的中心任务，并将像国营企业中已经存在的那样，十分强调纪律性和服从党与干部的领导。

## 50年代中期的管理层、工会和工人

1954年，《人民日报》一篇关于劳动纪律的文章提出了新的路线，主张以可执行的规章制度作为企业秩序和纪律的保证（而不是依靠教育和群体压力），这在以前一直被认为是“军阀的工作作风”。现在人们声称，“威胁生产的正常进展和影响群众的劳动积极性的，不是纪律太严，而是纪律太松”（引自 Brugger 1976:117-18）。伴随着这种重新强调服从而非积极性，“计划体制的发展限制了（工人）

的参与，使之只限于细节问题”，同时，管理层“把增加产量作为唯一成功指标”（Brugger 1976:137-8）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使民主和参与问题从属于完成国家生产计划的目标。

从 1953 年，也就是中国一五计划的第一年开始，一直到 1956 年年中左右，在工业领域都非常强调国家集中计划，强调苏联的一长制，即以企业厂长为顶点的严格等级管理制度。虽然这种制度从来没有在全国所有部门或所有地区推行过（PNLee1987:29-32），而且在 1956 年正式被企业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所否定和取代，但它此时在中国的出现是与企业管理重心的变化相适应的。这一时期，“管理层与工人，在控制制度和决策上的分裂越来越大”（Andors1977a: 57）。

新的氛围也影响了官方工会的工作。Brugger 注意到，在工会工作和管理中，“把一切都与生产问题联系起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Brugger 1976: 247）。工会的作用被降为单向传输带，将生产计划和管理部门的指令传递给工人，但没有向相反的方向进行任何反馈。工人参与的结构，如厂委会和职代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即使在最初引入时也是效果有限的，在新制度下的作用也进一步下降，利用职代会“指示工人”（Lee Lai To1984:30）的倾向被一长制所强化，厂委会的作用也大大降低。Brugger 发现，在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结束后，很少有人提到厂委会的存在，并得出结论说，“厂委会的存在与一长制的组织形式无法调和”（Brugger 1976:249-50）。这种对劳动纪律和生产的新强调，似乎成功地使解放以来展开的工人与党之间的冲突暂时中止。

在这个早期阶段，工人自己办企业的愿望受挫，但他们的反应似乎并没有扩大到组织起来反对管理层或党，但从报刊的记载和官方的报道来看，确实包括了对领导干部的经常性的严厉批评，这些批评是不能被安全地忽视的。工人经常提及企业领导层的疏远，也

有罢工的说法，虽然这些都被归咎于“封建残余分子”的煽动。但是，工人与党的第一次对抗，留下了工人不满的后遗症，以及在实行民主管理方面尚未解决的问题，这也是 1956-1957 年第二次大对抗的基础。

可以说，在解放后的几年里，随着工人、工会、企业管理部门和党探索各自在新政权下的作用限度，并在企业中达成某种临时办法，某种程度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官方工会角色的模糊性，意味着不能指望它们能顺利、迅速地过渡到一种对它们、对它们的会员和对它们的党的上级都同样能接受的运作方式。但是，一旦党所发动的各种民主化运动得以进行，即使这些运动没有达到某些工人所希望的程度，也可以把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使各方的注意力转向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任务。

但是，工人与党的冲突不仅在几年后，即第一个五年计划接近尾声时再次爆发，而且爆发的方式与这一早期对抗时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次工人并没有停留在批评工会、行政和党的干部的态度上，而是绕过官方工会，自发组织起来，迫使企业当局让步；甚至有人说要组织完全独立的工会。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工人与党的关系中的这种更严重的危机。

## 第二章 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 年

一般认为，1956-1957 年的双百运动是知识分子与党之间的对抗，它的起因是非党人士试图帮助党组织纠正自己，避免发生波匈事件那样群众攻击执政党的斯大林主义错误。但是，这一阶段产业工人和党之间的对抗较少有人注意，这种对抗到 1957 年春天至少对党的权威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就像不满的知识分子和学生所说或所写的东西一样。1956-1957 年工人和学生抗议者之间缺乏接触，实际上是敌对的（裴宜理 1994:23, n. 106），这可能是学者对这一阶段工人活动相对忽视的原因。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人在挑战现状方面走在了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前面。虽然 1956 年 5 月毛泽东第一次发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时，但是响应毛泽东邀请畅所欲言的人不多，第二年春天，毛泽东于 2 月 27 日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矛盾的问题》讲话后，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批评才真正开始出现，但工人中的批评和工潮在 1956 年底就变得很突出，一直持续到 1957 年春天。

在“双百运动”中，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尖锐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现在矛盾的主要根源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而这些非对立的矛盾要通过辩论、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和平方式来解决。1957 年 3 月开展公开的整党运动后，特别重视基层对上级的批评。干群关系现在被提上日程，鉴于 50 年代初工人不满的性质，这显然为工人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再次宣泄对自己这个名义上的“主人”在工作岗位上的不满。人们通常不会强调，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1956 年和 1957 年初的工业动乱以及农

民中知识分子骚动和不满至少是原因之一。不过，弗朗索瓦·吉普鲁指出，毛泽东的报告中经常提到“各种工会报告”，并引用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内部报告中所载的工人对行政干部的愤怒批评。毛泽东引用了一句总工会报告中提到的话，给中国领导层中敲响了警钟：据报道，一些工人曾表示，在他们与企业干部的纠纷中，“如果我们不向匈牙利学习，我们就什么也得不到”（Gipouloux 1986: 191）。上海的抗议工人也使用了“让我们再制造一次匈牙利事件！”的口号。（裴宜理 1994:11）。

1956年在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那种民众抗议和反抗可能会在中国重演，中国领导层对此极为重视，特别是考虑到1956年在企业层面发展起来的工业动乱浪潮。对东欧事件的了解，无疑推动了56年和57年上半年的（有限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政策，也增加了对党的批评空间，特别是工人。中国报刊上关于匈牙利事变的文章，尤其显示出中国人意识到它的原因与中国一五计划所创造出的条件相似。有人指出，在匈牙利：

党的一些领导在工作中没有认真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对群众关心不够……在改善民生方面，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很少……。这些错误极大地破坏了党和群众的联系，限制了人民的民主权利，阻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Yi Han 1956年）

这与中国关于企业民主管理的体制多年来如何堕落为形式主义的描述非常相似，因为领导层变得自满，“不关心群众，不尊重群众的意见，不解决本来可以解决的困难”，导致工人们“怀疑、消极、失望，甚至不满”（Li-Chun 1957）。因此，它反映了工人与领导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也是中国解放后第一次对抗的原因。

50年代中期爆发的动乱发生时，工人没有有效的机制或组织来维护自己在工作中的利益，同时他们又受到一五计划强调积累和重工业发展所带来的严重经济和社会压力。一些工人团体，如原私营企业的员工、学徒和年轻工人，在动乱中表现地比其他群体更为突出（裴宜理 1994），但到 1956-1957 年，引起抗议的许多原因是所有企业共同的不满，许多抗议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因为缺乏有效的中介机构，使不满的工人直接与政府对立。作为抗议者地工人经常被从双百运动中抹去，在反右运动中只是作为党的卫士出现（《人民日报》1957年6月10日；《中国青年报》1957年6月17日），党在重新实施控制时，也不愿意承认工人阶级的这种政治挑战，否认工人当中“右派分子”的政治地位，而把他们作为罪犯来惩罚（Chan 1993:33）。

## 民主管理

大约从 1956 年中期开始，中国的工会报刊上开始出现了专制或不民主的管理，特别是对一长制的某种反弹。前面已经指出，这种管理制度从来没有在中国的所有地区或所有工业部门推行，事实上，早期的迹象表明，最高层对这种制度的支持并不是全心全意的（Andors 1977a: 59）。但是，即使在没有实行这种具体制度的地方，上一章提到的强调严格劳动纪律和把生产作为判断企业业绩唯一标准的倾向，到 1956 年也非常明显，而且似乎在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工业企业中造成了一种非常专制的管理风格。

在 1957 年的一份关于解放后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出了什么问题的分析报告中，作者指出了几个问题，一是苏联管理制度在中国的传播，二是厂务委员会组织上的缺陷，特别是厂长作为委员会的当

然主席，对委员会的决定有否决权，权力过大。该报告的作者认为：

从条例的某些条款来看，厂委会似乎拥有很大的权力，但实际上，在执行时，权力完全集中在厂长手中。而且，在会议上，它多是讨论上级和行政部门提出的问题，很少讨论群众提出的问题。正因为如此，群众对厂委会的兴趣下降，而行政领导干部也觉得它的存在已经没有意义，只能沦为形式主义。（Su Ke 1957 年）

这种对中国企业民主管理弱点的描述，与我们在上一章的发现相吻合。职代会似乎也遭遇同样的命运，比如 1957 年广州的工人反映，他们多次在职代会上提出住房问题，却没有得到企业领导的任何回应（《广州日报》1957 年 5 月 19 日）。

这种国营企业缺乏民主、没有真正参与的情况，在私营企业转为公私合营企业时，也蔓延到了私营企业。从 1952 年五反运动结束到 1956 年初国有化，民营企业的民主参与空间有多大，难以估量。在 1956-1957 年鼓吹扩大企业民主的文章中，多处提到工会在旧私营企业中的强大作用，以及由工人和职工组成的增产节约委员会（在同名运动中成立）对私营企业管理所享有的监督权（《人民日报》1956 年 11 月 30 日）。陈云在 1956 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工业改造时说，五反运动后，工会对企业管理有了“高度的权力”（新华社 1956 年 9 月 21 日）。

但据 1956 年武汉的一份记载，在 1953 年期间，受一长制的影响，五反运动后工会几乎不再参与私营企业管理，引起了工人的极大不满，他们没有感到自己是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工人日报》1956 年 12 月 4 日）。如此看来，民营企业的民主管理可能在五反运动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达到了一个高峰，然后才走向衰落。不管这几

年私营企业管理民主化的实际程度如何，但很明显，工人自己也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他们曾经享有的在企业中的权力和影响，在企业国有化后已经丧失了：据说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工人们就在问“为什么公私合营以后，工人和职工的权力实际上是下降了？为什么以前的资本家今天在企业里还有权力和地位？”。新华社 1956 年 9 月 21 日）。

不管工人和工会对 1956 年以前的私营企业有多大影响，至少在与私企管理部门发生对抗时，工人和工会所处的地位比 1956 年以后的任何纠纷都要模糊得多，因为企业的最终权力已经转到了国家代表手中：

以国家代表为首的行政干部，把企业的全部管理工作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工会干部和群众发现无法查询企业的管理情况，就有了相当多的抱怨理由。

在这个时期，工人们似乎确实很难对干部提出任何批评。厂长和其他高级干部对自己权威的态度就是这样，他们往往把所有批评都当作是一种反叛行为，不是针对他们个人的行为或工作作风，而是对他们所代表的国家组织的严重攻击。因此，提出完全合理的批评的工人发现自己被指责，并经常因为“无纪律和无组织的行为”（《中国工人》1956 年 8 月，16:4）或“反对管理”（《中国工人》1956 年 10 月，19:11）而受到惩罚。据报道，“有的企业甚至制定了许多‘禁令’来限制工人和职员”，例如禁止下级即生产工人在生产会议和其他会议上批评上级（《中国工人》1956 年 8 月，16: 5）。

厂长对批评者进行报复的现象，从各方面看都是普遍的，在许多企业中，实行任意的、“非法的惩罚”是普遍现象，有的企业还“非常严重”（《工人日报》1956 年 5 月 18 日和 7 月 14 日；《中国工人》

1956年8月，16:5)。在极端的情况下，主管可以安排将工人调到不合适的工作岗位，也许迫使工人走更远的路去工作（《中国工人报》1956年10月，19:11），但警告批评者的首选方法似乎是进行“一对一的谈话”，或者更准确来讲，“一对一的威胁”（《中国工人报》1956年8月，16:4）。厂长的这种态度很容易将命令式和强制式的方法推广到企业的各个层面，正如工人所说的“上级指挥下级，工人指挥机器”。在这种管理方式迅速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很快就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这很明显就是封建秩序，这些企业的‘管理者’已经成为小国的封建君主。怎么能允许这种现象在社会主义企业中继续存在呢？”（《中国工人报》1956年8月，16:5）。

所以我们发现，在国营企业中，之前的担心已经成真，厂长凌驾于工人参与之上，受苏联影响的高度集中管理的作风在中国工业中蔓延，由国家任命的干部开始表现得好像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得到了毛主席本人的亲自批准。1956年，随着中国经济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剩余的私营企业转为公私合营，这些企业也产生了这种管理风格和企业氛围。但这与私企中许多工人的期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似乎真心期待着获得国家职工的身份，而随着1956年的发展，他们的工作生活现实使他们非常失望。

## 私营企业国有化

中国工商业的国有化，即社会主义改造，比原来预计的要早，在1956年初就已经开始了。1955年9月，将剩余的众多私营企业改造成公司合营企业，预计需要5年时间才能完成。11月，在毛泽东10月29日发表讲话要求加快改造进程之后，这个时间被修改为两年，事实上，所有的工商企业至少在1956年初就在纸面上完成了

改造 (Vogel 1969:156-73)。“公私合营”这个词稍有误导性，因为虽然原资本家在企业被接管后，在规定的期限内（原为 7 年）继续领取固定利息，并在许多情况下成为企业的普通职工，担任管理职务，但企业实际上是由国家任命的代表来管理的。这些新的公私合营企业在 1956 年和 1957 年春天特别容易发生罢工，这使得 1949 年后私企剩余较多的城市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工业动荡。例如，在广州，私营企业的国有化涉及 4,727 个工业单位，雇用了 6 万名工人；这些单位被改组为 700 个公私合营企业（《文汇报》（香港）1957 年 2 月 4 日）。同样，1950 年秋，上海 75% 的工业劳动力仍在私企就业，到 1957 年底，这一比例转化为 72% 的工业劳动力在新的公私合营企业就业（裴宜理 1994：7-8）。

工人们似乎确实对国有化后的企业抱有很高的期望，特别是在改善福利待遇和生活条件方面，就像一些老国企的工人所享受的那种福利待遇和生活条件一样；这正是官方宣传给他们的印象（《广州日报》1957 年 4 月 19 日）。不过，除了预期的物质利益之外，国有化还有其他的地方受到欢迎，因为一些私营企业工人认为它结束了他们在政治上的二等地位。例如，在“五反”运动中的一些工人极端主义似乎是出于工人的愿望，他们希望证明自己没有被“资本家”的工作所玷污，并表明他们与报刊上所描述的国企工人一样具有进步性和爱国性。然而，他们没有预料到，私营企业的改造会导致他们参与管理的机会急剧减少，并将剩余的民主机构如职代会的影响几乎减少到零。这不应该是完全令人惊讶的，因为从上一章可以回顾到，在五反运动的高峰期，允许工人及其工会代表在私营企业中采取行动，并不是为了其本身，而是为了扩大国家对私营企业的控制，为国有化做准备（Lee Lai To 1986：99）。一旦国有化完成，工业界的工人和国家代表之间就不可能有任何对立的问题，因为工人的长期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勤奋和服从国家的指示是最有利

的，这是一个信条。这意味着，工人本身不再迫切需要直接参与管理，因为国家代表已经代表他们管理企业。

国有化后私营企业民主和参与度的下降，显然让许多工人感到非常失望，尽管他们对自己在私企的实际权力大小有所怀疑；不可避免的印象是，无论工人和工会的影响力在五反高峰期过去后有多么有限，在向国有制过渡后，情况就更加恶化了。1956年底，工人的失望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因为新的公私合营企业“忽视了私营企业中允许工人参与管理的民主传统”（赖若愚 1956a）。同年 11 月，《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痛斥说：

大部分公私合营企业未能将群众的管理经验作为优良传统发扬光大……。民主管理的机制被取消了……。一些国家代表不与群众协商……。〔而且〕许多工人对自己作为“企业主人”的地位产生了怀疑。（《人民日报》1956年11月30日）

文章称，民主传统“不仅要继承，而且要扩大。应该恢复工会（对干部）进行监督的权力”。这是管理民主化背后的思想，特别是建立以企业工会委员会为常设机关的职工代表大会，在 1956 年下半年得到了广泛的接受。

在 1956 年期间，工人们期望从公私合营中得到实质性的好处，但是在这方面结果也令人失望，因为许多人发现，在住房、福利供给方面，有时甚至在实际工资方面，尽管生产取得了迅速的进步，但他们的处境的改善却微乎其微。“经济活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但这并不总是以具体的方式体现在工人的日常生活中”（Gipouloux 1986: 165）。在这种情况下，1956-1957 年公私合营企业如此动荡就不足为奇了（裴宜理 1994:8），因为正是在这里，许

多人感到自己被骗了，而他们现在可以用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并在企业中施加一些影响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资源更少了。国家任命了新的经理，他们习惯于让工人没有控制权，这本来已经够糟糕的了，但留用人员——原资本家和私人经理人——在某些情况下天衣无缝地担任起了同一企业的厂长（《南方日报》1957年1月9日），一挥笔就成了国家任命的官员，对职工拥有无懈可击的政治权力，这就加剧了工人的不满。由于留用人员可以保留原来的权力职位，而实际上逃避了五反运动以来工人在私营企业中对他们的监督，一些工人认为：

公私合营前，资本家要接受工人的监督；公私合营后，国家派一些资本家担任厂长或经理，工人反而要听从资本家的指示……自从公私合营后，资本家对工人更加横行霸道，工人的权力实际上比联合管理前还小。（《中国工人》1958年3月，5：21）

官方给工人的解释是，这些人员是“在工人阶级和国家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能）丝毫轻视工人阶级在公私合营企业中的领导地位”，工人不需要他们原来的监督权，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从监督生产转为与国家代表一起直接管理生产”。这种说法很难说服工人，因为职工代表大会等直接参与的机构在权力上受到严重的限制，干部如果想，可以很容易地忽视或逃避。在实践中，国家代表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而不征求工人的意见，也不允许工人参与管理。所以工人们就有这样的想法：“自从实行公私合营后，资本家有了地位，也有了固定的利息（款）和高额的工资，他们照样过着轻松的生活，而工人们却还在埋头苦干”。“有些工人甚至（认为）党的政策（是）右派”（《中国工人》1958年3月，5：22），也就不足为奇

了。在联合所有制下，管理层人数的大量增加（例如，在上海的公私合营企业中，通常增加到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进一步激起了被压迫的生产工人对那些没有实际生产的人的不满（裴宜理 1994：15）。

### 工人的不满：福利，工资和特权

在 1957 年上半年双百运动的高峰期，中国罢工频率很高，这一点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记录（裴宜理 1994；Gipouloux 1986），但 1956 年期间已经显现出的相对较高的不满和动荡程度并没有得到如此广泛的认识。中华全国总工会 1956 年的一份内部报告指出，这一年发生了 29 次罢工和 56 次请愿，这还不包括工会统计处登记的事件。这份报告中提到的口头描述给出了更高的数字：例如，据说仅西安就发生了四十多起罢工和请愿事件，而上海总共发生了八十六起，全年从第一季度的六起增加到最后一个季度的四十一起（Gipouloux 1986:189）。这种明显的升级与关于工资改革纠纷导致工业行动的记载相吻合，1956 年 11 月在天津、武汉、广州等城市似乎达到了高峰（《工人日报》1957 年 4 月 25 日和 30 日；《南方日报》1957 年 4 月 25 日；《广州日报》1957 年 5 月 10 日）。在 1956 年期间，除了新收归国有的企业减少民主和参与外，企业生活的一些新特点也是这次不满情绪提前爆发的背后原因，我们需要更详细地研究这些，然后再去研究为什么官方工会未能帮助工人解决与管理层和上级部门的分歧。

从 1957 年的纠纷来看，我们发现“工资、专制的分配、工作和生活条件是所有要求的中心”（Gipouloux 1986:189），工人和干部之间的不平等尤其容易引起冲突，1956 年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已经

注意到 1956 年期间，随着实现一五计划最后期限的临近，工人承受的压力增大，这种压力的结果之一就是工伤事故的发生。在 1956 年 1 月剩余的私营企业国有化后，提出了生产“高潮”的号召，鼓励工人在企业“照常营业”的半年时间里集中精力增加生产（《南方日报》1956 年 2 月 3 日；《人民日报》1956 年 2 月 12 日）。有人否认在此期间保留旧的管理制度会挫伤工人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情（《人民日报》1956 年 2 月 12 日），反而警告干部落后于工人的危险，据说工人本身就支持这一政策，并要求提高规范和生产指标（《南方日报》1956 年 3 月 23 日）。虽然一些工人最初对公私合营新时代表现出毋庸置疑的热情，但很可能在这一时期以牺牲基本安全为代价的压力下，这种热情都迅速消散了。一位工人在回忆他的工厂刚开始实行公私管理时的心情时，表示工人随后感到失望：

记得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当我们大张旗鼓地庆祝我们的企业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我们都非常高兴，以为现在实行了公私合营，我们就会像现在的国营企业一样，成为企业的主人，上下班坐公共汽车，有国家的房子住……可是现在实行了公私管理，工厂的产量提高了，但我们的生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比以前更糟了（《广州日报》1957 年 4 月 13 日）。

中国共产党激发了对国有化的热情，大力强调国有化将在工资和福利方面给工人带来的物质利益，提高了人们的期望，而这些期望后来在增加生产的过程中被忽视了。在一些苏联的中国专家看来，1956 年，即一五计划的倒数第二年，工业化的强行步伐“突出地表现为……不利于工人利益的政策”（Rozman 1985:113），因为“对效率和生产力的要求，倾向于加强工业工作……给产业工人带来额外

的压力”（P N Lee 1987:40）。鉴于这些优先事项，工人的福利甚至安全往往被忽视。再加上私营企业接管后，企业民主进一步削弱，这在工人中造成了一种苦闷和失望的情绪，从而加剧了越来越频繁的工业动乱。

1956年初，过分强调降低企业成本和增加生产带来的后果开始浮出水面（《人民日报》1956年1月21日），1956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劳动保护、福利和住房问题会议后，工运和地方报刊上的文章明显地再次强调了工人的安全、生活和福利问题。6月12日至18日，《南方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揭露广州各工业局的企业干部、工会干部和工作人员，对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抱有一种官僚主义的冷漠态度。在1953年揭露市内民主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失败后，当地记者曾被指责为没有勇气揭露干部的不法行为（《南方日报》1953年2月13日），但这次没有人可以指责该记者的懦弱。他们以久经经验的调查报道风格，首先详细报道了公然侵犯工人基本权利的行为，然后向有关部门提出证据，为读者详细记录了干部们无动于衷、回避或彻头彻尾的敌对反应。这些文章以及社论，提供了许多有关工人福利、安全、过度加班等方面的信息，随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刘宁一（刘宁一，1956年）和中共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南方日报1956年7月2日）也承认，这些方面的进展远远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不仅仅是在国有化后的半年内，而是要追溯到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

这场新闻运动所揭露的工人的不满，从严重的健康和安全问题到明显的小事，尽管在后一种情况下，往往是企业管理层的行为非常小气，最令工人愤怒。例如，在一家工厂，禁止工人在高温玻璃车间下班时使用企业的自来水洗漱，这样一来，工厂每月就减少了10元左右的水费，但却引起了车间的不满，这种愤怒远远超出了企业节省的10元（《南方日报》1956年6月18日）。在南方日报记者

走访的一家企业——广州郊区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工会副主席讲述了给工人提供的茶叶费用如何从福利转到建筑预算中，然后又被收回，以达到“节省”建筑费用的目的。工会多次提出这个问题和工地上的其他问题，但正如工会干部所说，“上级领导总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南方日报》1956年6月12日）。

诸如此类的“小问题”在其他地方也存在，但原因并不是因为资金不足。相反，数万元的医疗补贴和企业奖励基金却堆积闲置，以第三建筑公司为例，劳保基金每月盈余2000元，从1955年开始还剩2.2万元未用。公司和市建筑工程局的多名“负责人员”否认有权决定这些钱如何使用，对积累的数额显然毫不关心；公司财务部的一名官员“在反复追问下”终于反驳道：“你肯定不认为我们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鼓励使用这笔钱吧？”（南方日报1956年6月12日）。财务部门没有公布他们积累的资金明细，“所以建筑工地上的人和工会组织都不知道公司或局里有多少钱可以用来改善工人的生活 and 福利”。工会的高级干部无论如何都声称忙于其他运动，无暇顾及这些问题，使记者得出结论：有这些“官僚主义”和“什么都不懂的领导干部”当家作主，官僚主义的盛行和对工人福利的漠视就不足为奇了（《南方日报》1956年6月12日）。

其余两篇文章涉及到过度加班的问题，从各方面看，这时的加班加点现象很普遍（《工人日报》1957年7月5日）。企业领导不仅以此作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定额的主要方法，在有些情况下，经常超过一个月内加班三十二小时的法定上限，而且他们还想方设法避免向工人支付加班费（《南方日报》1956年6月14日）。在有些情况下，上级机关批准了他们的加班或加班要求，但随后又拒绝提供任何额外的钱作为工资，这样，企业不得不削减奖金和其他支付给工人的款项，以弥补这一数额，使工人的收入往往不增反降。

另一家工厂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在企业繁忙时期向工人

“借用”加班时间，然后工人可以在生产任务不那么紧迫的时候申请休假，以代替他们放弃的自由时间（《南方日报》1956年6月15日）。但是，由于工人需要得到管理部门的批准才能重新获得“借用”的休假时间，因此，他们往往要耽误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真正休假，有的“拖欠”时间长达一年多，之后，许多人就放弃了获得休假时间的希望。这位副经理声称，加班在工厂不是问题，完全是自愿的，工人们断然告诉记者，这“不是真的”。当他把调查结果拿给经理本人时，记者被告知：“同志，我要向你指出，我们这里有落后的工人！”（1956年6月15日《南方日报》）。这个企业的工会也帮助执行新制度，并把抗议新制度的工人当作‘落后’工人进行批判。除了对工人的健康和士气有明显的影响外，据说在一些企业中，过度的加班还造成了“不良的政治后果”（《南方日报》1956年6月15日）。

1956年夏天，各报刊部门也揭露了工人收入的压力。其中提到公用事业的暴利，收取高额的费用（刘宁一 1956年），还挑出公共交通的票价和租金太高，许多工人无法承受（《工人日报》1956年5月31日和7月7日；《南方日报》1956年9月4日）。企业强调节约，导致了食堂和其他设施的“商业化”政策，即提高价格，使这些设施获得利润（《人民日报》1956年3月5日；《工人日报》1956年3月11日和5月31日）。企业不放过任何向工人收回服务费的机会；当外地工厂发生事故需要到市内医院就诊时，甚至可以向生病的工人收取汽油费和工厂自备车辆的折旧费（《人民日报》1956年3月5日）。据报道，新的公私合营企业的福利和医疗经费有一些被挪用的现象（《南方日报》1956年6月18日），许多企业的医疗卫生经费（占工资总额的5%至7%）积压不用，而工人及其家属却拖欠住院费。在有些情况下，已经康复的病人被“扣留”在医院里，直到亲属借钱还清账单为止（《南方日报》1956年6月19日）。工人住房的资金也被不适当地挪作他用，计划中的住房建设也被作为节

约措施取消了（《工人日报》1956年6月6日、24日；《南方日报》1956年6月25日）。

忽视工人福利的严重性和管理层、工会干部对工人真正困难的无知，一经发现，就掀起了一场反对官僚主义对工人问题漠不关心、干部脱离群众的运动。干部代表团，特别是工会的代表团，到工人家里去了解工人的真实生活情况，对有困难的工人进行紧急救济，报纸上也登载文章，详细介绍了现在用于福利和住房的大量资金（《南方日报》1956年7月16日和19日、8月8日和9月2日）。事实上，来自上海的一篇关于干部“无原则地迁就”所有工人的福利要求的报道，指责干部从上级指示中挑出一些孤立的点来支持自己的“偏差”，结果上半年甚至第一季度就把全年的企业福利经费用完了（《南方日报》1956年10月12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干预来自上海，上海第一党委书记柯庆施在工人工资和条件问题上一直采取强硬立场，“坚持异常严厉地执行工资政策”，试图获得全国党的领导人的青睐（裴宜理和李逊 1997:99）。《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批评部分报刊对一些工人的问题过于渲染，提高了对福利和生活水平的期望值（《人民日报》1956年11月27日），工人阶级“艰苦奋斗、朴素节俭”的传统再次得到弘扬，成为片面强调反对官僚主义、改善工人生活的一剂良药（《工人日报》1956年12月23日）。

然而，尽管对工人的福利和生活条件的过分关心出现了这种小反弹，但1956年夏天的“福利风”显然没有什么效果。事实上，住房问题，工会干部拒绝从福利基金中给予工人紧急援助的问题，在次年春夏仍在困扰工人：工人给《广州日报》的许多投稿中都提到了这些问题，一位工人报告说，工会干部家访的结果被管理部门忽视，后来工会也没有按工人的要求去做（《广州日报》1957年5月29日）。工人们还说，这期间他们要求改善工作条件，遭到了批评，他们的申诉也遭到了压制（《广州日报》1957年5月17日）。

从工人们此时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认为国有化后的福利是“进一步退两步”（《广州日报》1957年4月17日），旧的、“不合理”的、“平均主义”的福利，如年终双薪和吃饭、理发、洗衣等补贴被取消了，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来替代这些福利。

有一个问题显然没有得到成功的解决，那就是扣留工人的福利资金，在第二年又重新成为矛盾的根源。我们在前面看到，在福利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未用完的资金不断积累，主要是因为工人甚至下级工会干部不知道有这笔钱存在。但是，当人们意识到钱是有的，但没有用于工人福利时，这就引起了工人的极大不满，并产生了干部腐败的怀疑。据1957年10月《广西日报》报道，4个月前，桂林建筑工程公司的一位工人“收集了公司零碎的财务报表，并加以歪曲，说干部们‘把福利资金分给自己’，‘工人们一分也得不到’”。据称，有一批工人将这一信息传递给其他人，他们暴力破坏了一次讨论工人冤情的群众大会，并殴打了一名他们认为对贪污瓜分福利基金负有主要责任的工会干部，随后，他们召开了持续三天的罢工（《广西日报》1957年10月16日）。

我们无从知晓这些对干部的指责是否属实，但从早先有关广州建筑业和其他行业的报道中可以看出，大量的福利基金被无端地积累起来，贪污腐败的案例并不鲜见。桂林事件表明，在1956年的“福利风”中首次出现的这种性质的问题，如果不采取措施来消除干部以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来谋取自己利益的怀疑，最终会造成严重的动乱。即使在没有腐败嫌疑的情况下，工人们仍然对工会积累的福利资金感到不满，他们认为工会的福利资金在保护会员利益方面十分糟糕，比没有工会还要糟糕，要求工会资金在工人之间分配的要求，是1956-1957年上海罢工和抗议活动的一个共同特点（裴宜理1994:17）。

1956年下半年，经常有人说，当年4月至10月在所有企业进

行的工资改革方案,可以解决工人遇到的许多困难(《南方日报》1956年6月25日)。但工资改革不仅没有解决其中的许多问题,实际上还制造了一些问题,成为工人不满和抗议的主要根源。该方案旨在消除遗留下来的工资制度中所有不合理和不一致的地方。由此形成的综合制度将反映党在一五计划对“决定性的”重工业部门的优先考虑(《中国工人》1956年6月,11:6)。改革的一个总原则是,如果按照新制度对工人进行考核,发现他们的级别比以前低或工资比以前低,他们将保留原来的级别和工资,因此,改革似乎实际上是普遍增加工资,没有工人因为新的考核制度而减少工资(《中国工人》1956年5月,10:4;1956年7月,13:6),大多数工人的工资是增加的。但官方也承认,工资改革并不能解决所有工人的生活困难,鼓励工人通过提高技术水平进行自救,困难严重的工人可依靠工会紧急补助或互助基金(《中国工人》1956年5月,10:4)。鉴于有证据表明工人难以从这些渠道获得援助,这表明改革的局限性,一些工人及其家庭有可能继续陷入困境。

倾向于更平等的分配形式,并对等级内和等级间的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之间的差距扩大感到焦虑的工人得到了保证,即: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资标准的差距是完全必要的,这种差距是合理的,是实现社会主义“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指导思想和物质激励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工人》1956年6月,11:7)

每个企业都要建立定期的评估、测试和晋升制度,评估标准包括工人的技术能力、工作速度、文化水平和劳动态度。不应该考虑工人的年龄或工龄,因为人们认为这将反映在较高的技术能力和专业经验上,而这两个因素在评定工人等级时理所当然地可以被考虑

在内（《中国工人》1956年7月，13：4）。事实上，许多受教育程度不高甚至是文盲的老工人发现他们的工资很快就被1956-1957年新招收的年轻工人的工资超过了，其中许多人至少是初中毕业生，尽管后者缺乏工作经验，这在一些企业中引起了相当大的不满和摩擦（《中国工人》1957年6月，11：3-4；裴宜理1994：19）。

如果说新的工资结构在理论上听起来足够合理，那么在实际应用中却可能带来相当大的随意性和不公正。一直以来，人们都宣称改革将杜绝工人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但事实上，这种现象仍然经常发生。这也是广州某无名工厂车工王才的主要不满之一，1957年4月10日，王才给《广州日报》写信，抱怨企业领导官僚主义，不关心工人福利，在该报版面上展开了长达两个月的讨论。在工资改革中，王建国曾被评定为四级工，但他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他能胜任五级工的工作，而事实上，许多与他有类似记录的工人都被提升为五级工。他自己对自己能力的评价显然得到了印证，因为工厂的工作压力，干部让他做五级工的工作。愤怒的他拒绝了，采取了“按酬劳动”的原则（“按酬劳动”是马克思“按劳取酬”的双关语，即1956年工资改革的主要口号），这在当时的工人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许多参加辩论的工人都支持他的决定，不做任何没有报酬的工作：他们反问道，“按劳取酬”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广州日报》1957年4月12日和25日）？工人们抗议说，新的工资条例没有考虑工厂车间的实际情况，执行起来不一致，造成了许多错误。在一些企业中，管理不民主的问题影响了改革，在决定工资等级之前，很少进行民主讨论和协商。这些工厂的干部反而违反国家的方针，采取“闭门造车”的改革方式，只是贴出一张名单和等级表让工人看（《南方日报》1956年10月4日；《南方日报》1957年4月25日、5月5日；《广州日报》1957年5月14日、30日）。在以这种方式实施改

革的地方，也有偏袒和腐败的情况：在一个企业中，负责工资改革的整个部门都在改革过程中得到了提升，这与其他部门提升的比例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还有一些党员和青年团员在没有得到工人必要的批准的情况下，获得了不应有的提升，从而受到了优待（《南方日报》1957年5月4日；《广州日报》1957年5月17日）。1957年6月，在为“王才之争”画上句号的文章中，承认上述对工资改革过程的批评都是正确的，是有道理的（《广州日报》1957年6月8日）。

工资改革的另一个引起不满和抗议的地方是推广计件工作。1956年，中国实行计件工资的劳动力比例上升到42%的新高（Richman 1969: 314）。在这种工资形式下工作的工人发现，工资改革完成后，经常上调标准成为普遍做法。“系统地侵蚀了（他们的）收入”，工资收益“被（工作）速度和生产力的提高所吞噬”（Gipouloux 1986: 169）。在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工人们曾得到保证，新的计件工作制将包括基本工资和计件要素，这将保护他们在无法控制的停工情况下免受严重甚至完全丧失收入的老问题，但实际上，这一措施似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王才事件”的辩论中，广州市纺织局的一位官员承认，在新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计件工人在不可避免的停工情况下，所得到的津贴“还不够生活”（《广州日报》1957年5月11日）。

国有化后企业的改组和合并也影响到计件工人的收入，一些工厂的规范与同行业所有其他企业的规范一致，而不考虑机械化程度不同或其他工作条件差异等因素。受这种规范调整影响的工人，其工资改革前的工资可能会减少40%，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减少70%（《广州日报》1957年5月8日和6月10日）。工人对此的抗议不仅被忽视，而且管理层还“责备顽固的工人被动，没有精神”（Gipouloux 1986:169），把这件事当作工人方面的意识形态问题。1957年5月，广州工资改革的一些不良后果得到了承认，广东省委

把对工资的不满作为年初以来全省十三次“罢工和闹事活动”的主要原因。特别提到“给厂（长）和领导人员涨得多，给工人涨得少”是引起不满的原因（企业缺乏民主也被列为动乱的主要原因）（新华社（广州）1957年5月14日），可见干部与工人的不平等对产生动乱的重要性。

最后，住房问题，此时在投资重点中排在很低的位置，在许多城市地区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现有的住房得到公平分配，这个问题可能还好，但相反，危机“因社会不平等而加剧”（Gipouloux 1986:183），因为干部往往在企业工会的纵容下，将新的住房分配给他们自己，比例过高（《广州日报》1957年6月9日）。工人们抗议说，他们和他们的家人被困在危险的、漏水的住房里，而干部的家属，甚至兄弟姐妹却有充足的住房（《广州日报》1957年5月29日）。从工人发言中可以看出，事实上，在“王才”辩论结束时，官方也承认，使工人们如此愤怒的，并不是住房短缺本身，而是有限的房源分配不公（《广州日报》1956年6月8日）。问题的症结一如既往地在于工人仍然处于从属地位，干部脱离工人。最早在辩论中发表意见的一位工人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只要那些有权影响工人生活的人，仍然让工人受到不公平待遇，并蔑视工人，所有关于工人已经“站起来”和成为“主人”的言论就毫无意义（《广州日报》1957年4月11日）。

## 工会危机

企业工会必须对上述状况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他们显然没有履行保护工人利益的职责。一位工人指责工会自1953年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失去了胆量”（《工人日报》1957年5月21日），这有

一定的事实根据，因为当时对经济主义的指控，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中华全国总工会许多高层领导的清洗，使工会胆怯，不愿意直言不讳地维护工人的权利，因为这种言论很容易被政府解释为经济主义和工团主义的进一步爆发。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层中的赖若愚等人承认，虽然有必要对这些倾向进行抨击，但后来工会在反方向上走得太远，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对会员的利益不关心，不支持会员的正当要求（《工人日报》1956年9月24日；1957年5月12日和22日）。

在这种情况下，还必须提到工会干部中的职业主义：工会干部往往是晋升阶梯上的第一级，工会干部最终可能获得党员身份及其所有附带的特权，这本身就给干部造成了压力，使他们不能站在工人一边反对工厂领导。这同样适用于已经是党员的工会干部。实际上，就像1950年春天发生的那样，在工人的意见与工厂领导层的意见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工会往往站在干部的一边。工会干部被严厉批评为“无原则的让步”（《工人日报》1957年5月4日），每当企业干部提出不同意见时，他们就不加争辩地让步。许多工会干部害怕“破坏与干部的关系”（《工人日报》1956年3月2日），从而失去干部对他们今后工作的支持；他们完全不敢反对企业干部，到了评比加薪和升迁的时候，就会被记住（《工人日报》1957年5月4日）。对工会来说，最安全的做法是集中精力处理属于他们管辖范围内的福利问题，组织劳动模范竞赛和其他促进生产的活动，这样就不可能与干部发生冲突。

私营企业转为公私合营后，工会对工人权利的维护似乎大大削弱，因为许多国家代表的专制倾向影响了他们履行职责，削弱了他们的监督作用。据1956年12月的报道：

有的国家代表认为：企业实行民办时，工会要实行监

督，防止资本家的违法活动。现在企业实行了公私合营，由国家代表领导行政，他们是代表国家来管理的，如果工会要行使监督，不就是反对管理，给自己人找麻烦吗？（《中国工人》1956年12月，23：3）

据说，有些国家代表“甚至要求工会服从干部领导”。而有些工会干部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在新形势下的权利，认为“国家代表是国家任命的干部，级别比我们高，我们怎么可能监督他们呢？”（《中国工人》1956年12月，23：3）。

企业工会干部在这篇刊登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刊物上的文章中被提醒了，因此可以认为他们得到了工会领导的支持，他们完全拥有宪法（第17条）和工会法（第7条）赋予的权威，可以保证群众对企业领导的批评和监督，保护工人的利益，监督干部对党的政策和法律的遵守。虽然行政和工会的共同任务是“促进生产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改善职工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虽然工会在正常情况下应该行使权力支持干部，但干部权力有可能被不正当使用，在这种情况下：

这〔会〕往往容易扭曲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损害职工群众的民主权利和物质利益。所以，工会作为群众组织和代表工人利益的机构，必须对干部实施监督，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中国工人》1956年12月，23：3）

这篇文章敦促工会“对所有滥用权力，对群众建议漠不关心，对提出申诉的人进行攻击或报复，对工人进行任意惩罚等等行为进行斗争。”（《中国工人》1956年12月，23：3），反映了他们在1956年没有做到这一点。苏联的中国专家AP达维多夫（Davydov）指出，

在此时的生产推动中，“不仅工人的意见被忽视，许多企业一级的工会也对提出申诉的人进行严厉的处理。工会对工人利益的忽视，在工伤事故大大增加的情况下是显而易见的”（罗兹曼 1985：112）。在广州，1956 年工伤或死亡事故增加的根本原因，被认为是领导层的官僚主义，即对工人的健康和安全的缺乏关心，认为安全防范措施会妨碍生产定额的完成，因此应该取消。工会经常受到批评，不仅因为他们没有保护工人的利益，更因为他们是危险做法的帮凶，如超时加班等（《南方日报》1956 年 6 月 14 日、15 日）。

为什么工会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如此不力？据说，1957 年广州工人“把工会称为‘工人管理部门’……‘官僚主义的喉舌’和‘干部的尾巴’”（《人民日报》1957 年 5 月 9 日）。他们对工会的怨恨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记住，官方工会的角色确实存在着内在的困难。他们既要支持干部，又要保护工人的权益。理论上这两项任务并不冲突，但实际上许多工会干部确实认为他们的双重责任是不相容的（《工人日报》1957 年 5 月 4 日和 7 日），当冲突出现时，工会要站在工人一边，而不引起经济主义、工团主义的指控，或挑战党和国家的权威，是极其困难的。

如果工会能得到干部的支持，也许可以履行对会员的义务，但干部的行为往往会损害工会的权威和在工人中的威信。在一些企业中，“甚至出现了干部对工会‘保密’生产计划和安全福利措施的情况”（新华社 1956 年 11 月 23 日）。当工人提出应享受的福利待遇（如紧急贷款或探病亲属补助等）的要求时，由其工会小组或科委主席处理，换言之，由相当低级的工会干部处理，在企业中没有什么实权，也无法控制预算。1956 年下半年有报道说，这种请求多次被武断地拒绝，这时，有关工人就会越过工会干部去找企业干部或工会主席，后者通常是党员，因此在企业中确实有实权。然后就会毫不犹豫地答应这个要求，让工人们得出结论：下级工会连一件简单的

事情都懒得为他们做，今后还是依靠自己的资源来完成任务吧（《中国工人》1956年8月，15：4；1956年10月，19：12）。

从上面的评论中可以看出1957年春天爆发的工会危机的轮廓。基本问题与1950年一样，即没有权力的义务问题：工会无权向企业中的任何人发号施令，只能依靠说服和教育来保证它委托给积极分子或普通工会会员的工作得以完成。由于它依靠这种动员，对会员的帮助不力，在工人中的威信降低，这种恶性循环的破坏力特别大。工会干部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组织“实在是没有地位，没有权力，出了问题，工会说的话不算数，不能承担责任，（任何事情）都要厂长批准才能生效”（《中国工人》1956年10月，19：12）。

1956年8月至11月间，工运杂志《中国工人》发表了一系列主要由工人投稿组成的文章，相当详细地描述了工会积极分子和下层干部所经历的工会工作危机，特别是强调了当时工业界实行的工资结构改革和物质奖励制度对这些人做工会工作的意愿和能力的影响。没有权力的责任问题，对于没有正式职务、工会工作纯属自愿的工会积极分子来说，一如既往地最为严重。他们的抱怨和普遍的士气低落表明，自从1950年的抗议以来，积极分子的地位并没有改善。

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出，大多数积极分子和低级干部都觉得工会工作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常常使他们与干部和工友们发生矛盾。许多人坦率地承认，他们正迫不及待地等待下一轮工会选举，届时他们将有机会把责任推给别人（《中国工人》1956年8月，15：6）。积极分子士气骤降的背后原因不难发现。首先，他们所有的工会工作应该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这一点有一个问题，也适用于下级工会干部，那就是下班后，不住在企业宿舍的工人会散开回家，这样就无法和他们一起做任何工会工作。另一个是无论积极分子的组织能力有多强，工作经验有多丰富，他们根本就没有足够的业余

时间去做所有应该做的工作，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同时担任着一个以上的职务。从这些文章中的证据来看，比如说一个工会小组长同时担任五六个职务是很正常的，过去一个人可能担任九个职务之多。

当工会工作确实侵占了工作时间时，不仅“招致干部的不满”（《中国工人》1956年8月，15:5），而且会直接影响积极分子、工会干部及其同事的收入。在新建立的八级工资制下，工人的升迁要参照其生产成绩、技术水平和劳动态度等因素进行考核。任何因工会事务而被迫离开车间的情况，都会对积极分子在所有这些标准上的评分产生不利影响。在实行集体计件制的企业中，一个积极分子表现不好，可能意味着整个小组没有达到目标，从而失去收入，而不是提高工会的威信。而如果积极分子和干部真的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做工会工作上，他们仍然会吃亏，在技术上落后于同事，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学习。一位小组长讲述了在他的工会生涯中，如何：

我的徒弟都超过了我，有的已经从二级工升到了六级工，不少和我一样原来是六级工的工人都走在了我的前面，而且工资都比我高。（《中国工人》1956年8月，15：6）

积极分子和下级干部的共同感觉是，他们的工会工作远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有害的，不仅在生产成绩、技术进步和工资方面对他们自己有害，而且对他们的同事也有害，因为如果没有企业干部的合作，他们就不能帮助他们，而且可能会因为花时间离开生产去做工会工作而拖累他们的收入和奖金。积极分子的一个共同问题是缺乏企业干部的支持，对于积极分子来说，也缺乏企业工会领导层的支持，一位工人指责他们（用词与我们在1950年看到的几乎相

同)“把我们当作‘一块捡来敲门的砖头’，他们能用我们时，就强迫我们，不能用时，就把我们扔在一边，谁也不理我们”。这位工人认为，领导的态度“不仅使有奉献精神、有活力的工会积极分子士气低落，而且让群众对积极分子产生了坏印象，所以没有人愿意做工会工作”。他坚持认为，他充分认识到工会工作的重要性，愿意在任何时候开展工会工作，但前提是工会和干部对积极分子的“理解、关心和支持”。否则，他觉得只要做好生产工作，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就能为社会主义作出更大的贡献，一些比较同情他的同事也正是这样劝他的(《中国工人》1956年10月，19:13)。

当然，在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后，工人对自己缺乏物质进步和民主影响的不满，首当其冲的是企业中的基层工会，这对上级来说是相当方便的。例如，当工会不能站在干部的立场上保护工人不受过度加班的影响，导致工人健康受损，并带来严重事故的危险时(《中国工人》1956年8月，16:5)，工人的怒火就会不约而同地主要指向工会。但是，尽管在1956年和1957年春天，工人们对于工会干部的官僚主义和普遍的无能提出了一些严厉的批评，但工人们似乎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作为“四等”干部，在企业中的影响力和权威性低于党、共青团干部和技术人员的困难处境。他们不同意干部工作作风是主要问题的观点，而是指出他们在企业中缺乏权威性，几乎完全得不到管理层和企业党委的配合。

工人们认为，工会“没有能力支持群众的正当要求”(《工人日报》1957年5月21日)，对这种要求的拒绝无可奈何。他们意识到，工会干部如果确实试图维护工人的权利，因此与企业中的干部或党的领导发生冲突，往往会被指责为试图使阶级斗争永久化，就像有人说：“我们的工会不是劳动的一方，干部不是资本的一方。没有理由上演同样的戏!”他们还指出了自己在选拔实际维护自己利益的工会干部方面的困难：那些“总是支持群众”的干部，往往仕途不

顺（哈珀 1969：88），而那些“坚持群众正确要求的干部”，则被指责为“自负”、“不尊重党的领导”或“挑拨离间”（《工人日报》1957年5月21日）。

事实上，就工人而言，工会的问题和1950年一样，是双重的：不仅中共的政策给工会施加了压力，使其无法响应工人的要求，站在干部的一边，而且工会仍然不是由会员选举和控制的民主组织。1956年2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了关于基层工会委员会选举的新规定（《工人日报》1956年2月24日），次月的一篇文章揭示了这些规定所要遏制的那种做法。据报道，许多工会没有定期举行选举和会员会议，即使举行会议，大部分时间也被主席的报告所占用，几乎没有时间进行讨论，工人们被阻止讨论或批准委员会的候选人，而是被迫以鼓掌方式进行选举（《工人日报》1956年3月17日；《广州日报》1957年5月17日）。这就使基层工会组织软弱无力，它们与工人分离，由干部领导，他们是阶级的“老板”，而不是会员（《工人日报》1957年5月11日）。如同1950年发生的情况一样，“干部的工会部门”软弱无力，与会员缺乏联系，使其无法有效地维护会员的利益，即使在工会干部倾向于支持工人反对干部的情况下，不民主的选举方式也减少了支持工人的干部上任的机会。

因为工人不重视工会，并且意识到了工会干部活动的限制，所以每当他们感到有必要在某个问题上与企业领导层对抗时，他们会迅速放弃正式的工会组织。这样，企业工会在纠纷中就成了无足轻重的角色，那些习惯于把个人问题和要求直接向行政领导或向党提出的工人，开始集体做同样的事情，组织起来向他们所知道的有能力满足他们要求的人提出要求。再加上无法通过民主代表或参与管理来影响管理层，这意味着在不满的工人与党和干部之间仍然没有中间结构，这意味着“决定性的对抗发生在党和工人阶级之间……”。所有的纠纷都发展成了政治对抗”（Gipouloux 1986:101）。

到了1957年春末，既是双百运动的高潮，也是前一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动乱浪潮，因此，党面对的不仅仅是个人的不满，而是来自部分工人有组织的集体抵抗。自治的工会成立了，通常被称为“平难会”，虽然这些团体中的许多都局限于一个企业，但在企业和地区之间也有一些联络和协调行动（裴宜理 1994:11）。这些独立的组织是短命的，从1957年6月开始被反右运动所终结，但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党和官方工会（现在显然是多余的）都非常关注。工人们自己也知道，他们所经历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在产业和管理政策上的决定的直接结果，现在从工资率到学徒期的长短，所有的行业和地区都已经标准化了，因此，“他们的大部分愤怒是针对工厂、政府、党和工会职位上的干部”（裴宜理 1994:15）。即使是那些待遇较差的工人（例如学徒或青年工人），在因不满大型国企中长期工人所享有的优势（或在临时工的情况下，长期工人自己的工作场所中享有的优势）而提出抗议的情况下，他们的愤怒也主要是针对那些对不平等现象负责的人，而不是其受益者。<sup>2</sup>

工资政策和其他政策的整个方向，强调计件工作，经常提高标准，以物质奖励来刺激生产力，到1957年初，促使许多工人改变了对企业领导和对自己劳动的态度。这时从报纸上的文章，特别是工人给报刊的来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工人在多大程度上把企业领导视为对手，通过收回或有选择地运用自己的劳动来争取让步和推翻不能接受的决定（《工人日报》1957年4月25日、30日；《南方日报》1957年5月19日；《广州日报》1957年5月10日、24日）。工人们经常认为，除非他们采取这种行动，否则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将继续被领导忽视，问题将得不到解决，许多人甚至认为制造骚乱

---

<sup>2</sup> 裴宜理举了一个企业里的正式工人和（被解雇的）临时工人之间发生冲突的例子（裴宜理 1994:13），但裴宜理总体上认为，不满的工人将抗议的矛头指向了那些最终要对这种情况负责的政府。

是影响企业干部的唯一有效手段，声称工人必须以这种方式站出来反对那些“欺善怕恶”的领导（《广州日报》19日和1957年5月21日）。在讽刺性的“按酬劳动”口号下，许多主张反抗的工人承认，这种手段确实属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工资关系（《广州日报》1957年5月3日和8日），不适合在社会主义下充当企业主人的工人，但鉴于企业管理实际存在的官僚主义和不民主的性质，他们还是为之辩护，认为这是必要的。这就近乎于指责企业领导者的行为像旧社会的资本主义雇主一样，显示出在工业领域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正在形成的分裂的严重性。

在吉普鲁看来，工人普遍采用这种公开的“工资-劳动心态”，“暴露了支撑政治经济的神话所希望掩盖的东西：把工人阶级和党捆绑在一起的剥削关系”（吉普鲁 1986：173）。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政策给工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到1956年，他们发现“工资微薄，工作节奏令人疲惫，生活条件恶劣。更不用说把工人排除在整个决策过程之外了”（Gipouloux 1986:270）。最后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参与管理本来是社会主义企业区别于资本主义企业的特征（赖若愚 1956a），是工人作为“企业的主人”的标志。

然而，尽管工人在解放后立即施加压力，要求进行意义深远的民主化和参与管理，但中国共产党有所保留，造成了它与工人关系的紧张，从而助长了他们之间的第一次重大对抗。这些同样的紧张关系也是第二次对抗的基础，并且由于工人对工业最终国有化的结果感到失望和幻灭而加剧。如果工人在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中的民主权利被忽视，他们没有公认的法律手段来抗议或试图行使这些权利，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地位确实比在资本主义或私营企业中要弱，因为在社会主义政府领导下的国营企业中，任何自我组织或罢工行动的尝试都将被视为对政权的挑战，而政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中共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地位之上的。

如果把党和工人之间的关系说成是剥削关系，听起来很极端的话，我们应该记住，在 1956-1957 年，工人们被要求为社会主义建设全力以赴地工作，却没有享受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好处，也没有享受到企业中社会主义工会的保护；他们是守住了自己承诺的一方，但许诺给他们的好处却都没有实现，无论是参与管理，还是物质待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理解一些工人的评论，即他们在旧社会中比较自由，当时他们至少可以用脚投票，如果工作条件无法忍受，可以到其他地方去找工作。这种自由被官方谴责为“不过是出卖劳动力的自由，是工资奴隶的自由”（Wen Jin 1956），但很显然，在 1956 年实行的政策下，一些工人实际上觉得自己是工资奴隶，而他们作为“企业主人”的地位却没有任何具体的体现。从这种观点在工人中的普遍存在，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关系危机的规模。

## 党的反应

正如 1956 年中期，早在 1957 年 4 月和 5 月罢工浪潮的高峰期之前，工业工人队伍内部出现严重问题的迹象就已经很明显了，因此，到 1956 年秋天，党对需要作出反应的意识也很明显。1956 年 9 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出现了高层转变产业政策的迹象，在这次大会上，最终摒弃了苏联严格的一长制模式，在产业中实行群众路线，实行企业党委集体领导。大会要求把加强群众监督作为“进一步扩大中国民主生活”的一部分（《人民日报》1957 年 3 月 22 日），并决定建立由工人随时可以罢免的直选代表组成的实验性职工代表大会，作为保证“扩大民主，在国营企业中实行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最佳途径（《人民日报》1957 年 5 月 29 日）。两个月后，在公私

合营企业的工会干部会议上，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把管理民主化确定为社会主义企业区别于资本主义企业的特点，并号召工会“保护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赖若愚 1956a），以使工人感到自己真正是“企业的主人”。

这一政策的改变，显然是为了避免在工作场所内外，不安分的、被疏远的工人与党和企业干部之间发生严重的公开对抗的危险；是承认政策在只强调生产而忽视民主、福利和工人权利的方向上走得太远。这个决定也一定受到 1956 年东欧事件的影响，中共认为这表明它不能对中国正在形成的压力置之不理。当我们看到工人的动荡时，匈牙利和中国之间的相似之处尤其引人注目。例如，匈牙利的官方工会和中国的同行一样，一直遭受着同样的问题，即在企业中缺乏权威和尊重，以及工人对自己的群众组织缺乏信心，那里的“对工会和工会工作的轻视……相当频繁地可以观察到”（Zinner 1956:366）。中国工人自己也在他们的口号和标语中宣传他们要效仿他们的匈牙利同行，而且他们明确认识到中国是社会主义世界的一部分：“1957 年的另一个口号是 ‘我们要把这一切从地区到城市，从党中央到带到共产国际’”（裴宜理 1994:11）。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后，高层表现出的对提高民主化程度、参与管理、关心工人物质福利的支持，可能有望改善中国企业的状况，但为满足工人的抱怨而采取的行动似乎是太少太晚，例如，一些工人对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信心不足，以至于拒绝选举代表参加大会（《南方日报》1957 年 6 月 3 日）。同样有可能的是，新政策加剧了工人对官方工会、企业行政、最终对党的愤怒和不满，从而在 1957 年春天引发了更加尖锐的冲突。这可以作为 1989 年以前东欧局势的一个中国例子，在那里，“官方意识形态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与日常现实相矛盾的主张”（Denitch 1981:254），导致了工人与政权之间尖锐而持久的冲突。

中国共产党试图推动更广泛的民主化，缓解工人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这确实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因为在工人阶级中引起如此大的动荡，主要不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相对贫穷和不发达的国家，而是民主和平等的问题。工人抗议的政治内容就在于此。这些抗议不只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很差，有时甚至是危险的，而是因为他们要求的些许改善可能会被干部冷漠地无视，甚至批评敢于抱怨的工人。不仅仅是工资仍然很低，制度上存在不合理的地方，而是旨在弥补这一问题的改革以高压手段进行，有时甚至是腐败的方式进行，违反了一切民主管理和工人参与的原则，干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操纵，而许多工人却失去了利益；不仅仅是住房严重短缺，而是有限的存量房没有按需分配，被特权集团垄断。简而言之，国家和党的官僚机构，一直到企业管理层面，包括官方工会，几乎控制了工人生活的所有重要方面，包括工人本应参与决策和充当“主人”的组织和机构。这使工人别无选择，只能采取非法或半合法的方法对影响其生活的最基本问题施加影响。

## 职工代表大会

企业民主化建议背后的意图是恢复和重振企业中的中间结构，包括官方工会、解放后国企（职工代表大会）和国有化前私企（增产节约委员会）中存在的那种参与性结构，将其进行修订并赋予更广泛的权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类型的中间结构的缺失，使造反的工人很快就与党发生了直接冲突。从1956年底开始，一场关于新民主机构权力的争论展开了，以早期机构的优势和缺陷为经验，在企业中试行了各种模式。辩论中讨论了职工代表大会，讨论了它的作用和权力，清楚地表明了它与早期的职代会的关系，尽管考虑

到人们公认工代会很快就沦为了形式主义，但显然有必要对这一机构进行修改，以确保工人的参与不仅仅是在会议上“作保证”（Li Chun, 1957年；《人民日报》1957年5月29日），以执行经理的指示。

从1956年11月到1957年5月的7个月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赖若愚一直主张为职工代表大会提供更广泛、更明确的权力，尽管这些权力总是以“不违反上级的计划、决定和命令”为条件（赖若愚1956a）。他强调如果要想工人和干部都不觉得自己在代表大会上浪费时间，所有符合上述条件的代表大会决议都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Zai Heng 1957），当然前几年的职代会也有类似的说法，但这些良好的愿望并没有转化为现实。根据赖若愚的建议，职工代表大会将有权对涉及工人利益和福利的事项做出决定，如工厂奖金的使用、国家安全拨款等，并有权“建议任免领导干部”，要求撤销“不适当的决定”（赖若愚1957a）。大会还有权“听取领导的报告，讨论……并提出批评和建议”（赖若愚1957a），尽管这种权利只是对干部施加了道德压力，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对工人的意见置之不理。大会代表要“由群众提名和选举产生”，而管理干部又要“由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工人大会选举产生”（《人民日报》1956年11月30日）。

赖若愚制定的职工代表大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为企业工会委员会提供了一个积极的作用，企业工会委员会将作为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组织选举代表，定期召开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日常事务。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工会重新获得工人的尊重和信任，并在企业中获得权威：按照赖若愚的说法，“工会管理委员会应该是职工代表大会领导下的一个经常性组织，也是一个有权威的组织”（赖若愚1956a）。事实上，效果却与预想的相反：职工代表大会非但没有挽救工会的威信，在许多企业还没有正式建立工会之前，工会在工人中的恶名就趋向于玷污职工代表

大会在工人心目中的地位（《工人日报》1957年1月11日、2月25日）。

早期提出的由工人选举厂长的建议（新华社1956年12月27日）在1957年5月底已经被否决，《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指出：

由于国营企业是全民所有，而不是工人集体所有……企业的领导行政人员应当由代表全民利益的国家行政机关任命，而不应当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人民日报》1957年5月29日）

这是一个相当不祥的说法，因为正是国家代表的这种不可挑战的权威，削弱了1949年以来国企中的企业民主和工人参与管理，在国有化后的公私合营企业中也是如此；厂长作为厂里的最高国家代表，其领导作用被认为是厂委会沦为形式主义的主要原因。同样，关于职工代表大会应是企业中的“最高管理机关”（新华社1956年12月27日），或关于职工代表大会应与管理层“平起平坐”（新华社1957年1月9日）的建议，也只在少数企业试行后被抛弃。

但是，工人自由选举代表大会代表的做法得到了大力强调：提醒负责监督候选人提名和选举过程的工会干部，虽然代表的能力很重要，但“最好不提所需的资格，以便群众在选择代表人选时有更大的自由度”（《人民日报》1957年5月29日）。但选举和其他一切活动一样，都要经过上级批准，并可能受到企业党委的强烈影响。干部对选举的干预显然还很普遍，尽管可能被伪装成对民主的关注。

有些人虽然不说反对民主，但还是不大相信群众。他们怕群众“觉悟很低，文化水平很低”，“不知道怎样实行民主”，“提出过高的要求”，所以，在选举的时候，〔他们认

为]有必要散发一份名单，让群众“保证”要选这些人……  
群众对这种“民主”不会有丝毫兴趣，也不会准备充当某种  
“投票机器”。(Li Chun 1957 年)

这正是解放后几个月工会干部对选举的态度，这种态度当时引起了被剥夺民主权利的工人的极大不满。应该记住，这些本应进行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的工会官员，自己在 1956 年初就因不民主的做法和操纵工会委员会选举而受到指责，这让人怀疑他们能否尽忠职守。

总的来说，尽管至少有一些有关方面的善意，但在 1956 年末和 1957 年上半年，并没有作出任何制度性的安排，使职工代表大会能够避免其前身的命运。无论如何，实际提供的东西与国家控制的媒体和官方工会为它提出的要求相去甚远，即使是受到限制的职工代表大会也遇到了干部相当大的阻力，很快就有人担心它可能鼓励工人要求“极端民主化”（《工人日报》1957 年 4 月 17 日）。除非党和管理干部被迫注意到这一点，否则代议制或参与制机构都无法让工人有发言权。事实上，干部对工人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一旦放弃了干部选举的建议，他们就可以随时无视大会的决议。

### 工人与干部的对抗：民主改革的失败

在这个时期，许多干部对工人表现出的蔑视是相当令人震惊的，而这是在一个被称为“中国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和他们的新社会主义政府之间特别亲密的时代”（裴宜理 1994:2）。因为单纯地欺骗工人，使工人做对他们不利的东西而引起劳资纠纷比比皆是，干部对反抗的反应更可能是惩罚、镇压和给抗议者贴上政治标签，而不

是重新考虑问题（Gipouloux 1986:193-8；裴宜理 1994:15-16）。许多干部面对工人的不满，不顾自己的工龄是否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厚颜无耻地拿党和军队在 1949 年以前的英雄声誉做挡箭牌。当广州一家机械厂的工人要求改善车间（这间车间即使在冬天也经常达到 110 华氏度）的通风条件时，他们被告知：“红军长征时，他们是靠吃树皮才得以生存的，你们的车间里有点热就不能工作了吗？”1957 年 5 月 17 日《广州日报》）。这句话出自一个办公室里电风扇的干部之口，但是工人们没有羞耻地收回要求，反而被激怒了。这种态度与官方坚持的工人和干部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他们在企业中的不同角色只是反映了现代工业组织中必要的分工，很难调和。

1957 年春天比较著名的纠纷之一，广州码头的不宣而战的罢工——在最严重的时候，一半以上的职工不上班（《工人日报》1957 年 5 月 9 日；《广州日报》1957 年 6 月 15 日）——是典型的干部对真正的不满的反应的一个很好的例子<sup>3</sup>。简言之，纠纷的发生是因为一种新的、对体力要求很高的轮班制（8 小时上班，8 小时休息，两天后休息一天），这会使工资下降（工资是计件工资），以至于工人实际上拿病假工资都比上班时的工资好。为了逼迫他们工作，还是请工会帮忙，禁止企业诊所的医生在病假上签字，并加强工作纪律，晚到几分钟的工人就不允许继续工作，而是被人事部门扣留整整八小时，在这八小时里，他们必须写自我批评；这段时间是没有工资的，只提供五十分的伙食补助（《南方日报》1957 年 5 月 19 日）。就这样，在工会的协助下，一个威胁工人健康和安全的、压低工资的轮班制，依靠管理者地强力来执行，不合作的工人就像顽皮的小学生一样被拘留起来。这是 1957 年干部与工人的关系已经沉沦到极点的一个比较恶劣的例子，但也不是非常罕见。

---

<sup>3</sup> 关于广州码头罢工的更详细的描述和更多的报纸参考资料可以在 Gipouloux（1986: 196-8）和 Sheehan（1995: 190-4）中找到。

不断地劝告工人不要什么都依靠国家，也有可能被反驳地无话可说，因为工人们不紧不慢地指出，如果说有人什么都依靠国家，那就是干部，他们有专门的疗养院和干部专用食堂；他们，而不是工人，“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就像笑话所说的那样，他们的一切按需分配（《工人日报》1957年5月21日）。1957年春，双百运动作为公开的党内整风运动重新启动，给了最大胆的工人直言不讳地批评干部的空间，因为最高领导层已经宣布对下级的官僚主义、傲慢自大、脱离群众、专制主义、不诚实、政策执行不当等问题进行公开批评。毛泽东本人曾表示，如果骚乱有助于揭露官僚主义，那么骚乱不一定是坏事，而且骚乱的责任应该归咎于那些在不满首次提出时未能处理的干部，而不是归咎于抗议者本人；知道主席本人采取这一路线，一定会对不满的工人起到鼓励作用。毛泽东在一次与地方领导人的会议上，对这种可能的效果表现出一定的认识，他开玩笑说：“你们不是都要回到你们的城市和省会吗，那就说在北京开了个会，现在全国都可以罢工了，主席是这么说的（笑）”（《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94）。

但是，即使毛泽东对普通职员为难老板的前景抱有典型的乐观态度，也不能指望那些直接承受工人愤怒（偶尔也会有身体暴力）的下层干部会认同这种观点（事实上，国家领导层中一些担心民众批评可能失控的人也是如此）。企业一级的干部，特别是公私合营企业的干部，在1957年罢工浪潮高峰到来的时候，已经受到不满工人的压力近一年了，当他们看到工人群众放弃官方工会而自发组织起来的时候，他们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礼貌地听取抗议，并决心通过扩大工人在决策中的作用来亡羊补牢。相反，他们越来越害怕任何可能让工人发泄情绪的措施，回避本就就工资等级和晋升等问题进行的民主讨论，还不愿意建立修改后的职工代表大会，以防它也被用作攻击干部和施加“极端民主化”压力的论坛。

因此，上级鼓励工人像其他公民一样，说出和揭露工作中的问题，而在近处，害怕失去控制的干部则以镇压和保密的方式来回应工人的抗议，而不是重新致力于民主和工人参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企业领导人不愿意用扩大民主来化解工人不满，导致他们采取镇压措施，实际上加剧了这种不满。因此官方认可的处理不满的渠道被剥夺，这时工人就会采取包括罢工在内的其他方法，这反过来又证实了领导人对工人好斗和极端主义倾向的担心，使他们更加倾向于用专制措施来应对，引发了动乱的进一步升级。正在报刊大肆宣扬工人第一次能够真正作为“企业主人”的新纪元已经开始时，干部们却非常担心他们在车间里所面临的反抗和敌意，他们的紧张情绪使这一纪元从未真正开始。这就是1957年5月之前发展起来的危机的关键所在：工人的不满只得到了相当有限的让步，报刊和国家领导人的声明中对这些让步提出了夸大其词的要求，而事实上，这种改善遭到了企业一级干部的抵制和阻碍。

### 反右运动：“大鸣大放”的结束

对于1957年6月反右运动的发起，通常给出的解释是，知识分子对党的批判超出了毛泽东发起运动时的预期，到1957年5月和6月扩展到要求结束中共对政治权力的垄断（MacFarquhar 1960:87-8, 106-9）。中共自己试图把双百运动描绘成毛泽东设置的一个诱使右派分子公开的陷阱，但尽管这种“狡猾的计划”理论在中国国内获得了一些信任，但似乎更可信的是，尽管毛泽东一直准备严厉处理任何在运动中暴露出来的敌人，但他并没有预料到实际出现的批判的规模和严重性。而且，这种批评不仅仅来自知识分子。到了反击开始的时候，工人们也开始罢工，包围企业办公室，对干部进行言

语攻击，偶尔也进行人身攻击，并称他们比革命前的资本家还坏；党本身也被一些人打成右派，是腐败、剥削和特权的根源（《广州日报》1957年6月10日）。当然，很难相信中共领导层在1957年春天之前就充分意识到工人和他们的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之深，因为它试图用过去已经失败的民主制度的修订版来掩盖裂缝，同时象征性地让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工人日报》1957年5月1日、3日、4日）。

反右运动的对象都是这样或那样的知识分子。在双百运动时期，只有被正式打成右派并受到惩罚的工会领导人相对较少，这给人的印象是，当短暂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的间歇期结束后，工人们并没有受到任何报复，只是在谴责主要右派分子的会议上“发声”，参与了反右运动。第一篇报道老工人批判右派知识分子的文章之一，标题有点虚伪，叫《工人开始说话了》（《人民日报》1957年6月10日）；工人们当然几个月来正是这样做的，但不是为了支持党。在运动中，没有明确提到此前18个月的工业动乱，这暴露了党与工人阶级关系的危机，尽管老工人在比较解放前和解放后的生活时提出的一些观点触及了有关问题。例如，知识分子声称中国共产党是剥削性的，生活奢侈，牺牲了普通人的利益，这些说法都被否认了，但并没有暗示许多工人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广州日报》1957年6月10日）。

但即使不公开承认，以工人抗议的范围和性质，认为他们会逃脱惩罚也是不可信的。早在1957年1月，反右运动开始之前，毛泽东就曾警告各省市党委书记，凡是反革命叛乱，都应武力应对，但这种针对“国民党诡计”（《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88》）的警告，本身就表明了中共将如何处理骚乱。一旦反右运动开始，就更容易把任何参与骚乱的人打成反革命分子（特别是当他们违反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修订本中规定的合法批判的条件时，虽然它在当时才公布），从而采取更严厉的镇压措施。在双百运动之后，

工人和一些工会官员事实上被关进了监狱，送进了劳改营，有些人被处决，但只有少数人被“贴上了反对党和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标签”（Bennett and Montaperto 1971:56）。大多数人与知识分子的区别在于被贴上了“坏分子”的标签（A Chan 1993:33），而不是右派分子，这个词具有刑事而非政治内涵。国家控制的报刊不厌其烦地把被捕的工人描绘成一小撮人，蒙骗他人造反，并强调他们所谓的非无产阶级家庭背景和历史问题（《中国青年报》1957年8月16日；《重庆日报》1957年9月22日；《广西日报》1957年10月16日），以便给人留下“真正的”工人仍然忠于党的印象。

事实上，1956-1957年参与罢工和骚乱的工人通常是相关企业中的少数人（裴宜理 1994:12），并且主要来自年轻劳动力。我们不应感到奇怪，即使有毛泽东本人的邀请，请他们发声批评干部，许多人也不愿意冒着“秋后算账”的风险，因为他们很清楚，在运动过程中他们的一切言行都可能被记入档案，将来用来对付他们。Anita Chan 最近观察到：

在整个毛泽东时期，就像在斯大林主义俄国一样，表现出任何真正的异见情绪都需要非凡的勇气——甚至到了愚蠢的程度。恐怖的监狱条件或处决就是后果，很少有人会这样做。（A Chan 1996:178）

这既适用于工人，也适用于知识分子；也许更甚，因为知识分子一直被视为意识形态上的嫌疑人，而工人阶级则一直被称为社会的领导和最进步的力量，是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因此，工人阶级对中国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批评，对党的合法性具有极大的威胁。学徒工和年轻工人更大胆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家庭责任（以及对政府有一些特别明确的不满），采取公开抗议这一非常

危险的步骤，损失较小，收益较大。工人在 1957 年下半年感受到的镇压程度，从许多工人明显不愿意参与 1966 年春夏的文化大革命早期阶段就可以看出，当时事件已经发生 9 年（Bennett 和 Montaperto 1971:56）。

官方工会在 1957 年春天对骚乱表示同情，起到了鼓励工人抗议的作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他们提出罢工和抗议的责任应该归咎于放任严重问题发展的干部，而不是相关工人（《中国工人》1957 年 6 月，11: 4；《工人日报》1957 年 11 月 11 日）。随着全国各地的工人抛开官方工会，在纠纷中自发组织起来（《人民日报》1957 年 5 月 9 日；《工人日报》1957 年 5 月 9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如果不能重新获得工人的效忠，就会完全丧失意义。在这种气氛下，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赖若愚和其他主要官员，如李秀仁和高远，开始为工会制定一个角色，即他们将主要或完全关心工人的利益和要求，而没有工人长期利益和国家长期利益一致的附加条件；换句话说，工会现在将站在工人一边，而不是党或管理层一边（《工人日报》1957 年 10 月 22 日、11、12 和 11 月 19 日）。

在反右运动期间，高远遭到了严重的诬蔑，因为他指出，如果工人团体愿意的话，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主持下，组织自己的工会是合法的（《工人日报》1957 年 10 月 22 日、12 日和 11 月 19 日）。所有关于独立工会的言论都被归咎于右派阴谋推翻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1957 年 8 月，16:3），这忽视了工人在 50 年代中期的一些纠纷中自发的自我组织和厂际联络的事实。其用意又是给人以少数社会主义的敌人挑起事端的印象，而不是承认工人抵抗的实际程度。在整个 1957 年下半年和 1958 年，官方工会受到了与 1951-1952 年类似的清洗，这再次使它们处于党的控制之下，工会极不愿意冒险采取任何可能被解释为工团主义的行动或声明，害怕被指责为企图篡夺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这使工人在工作场所的利益几乎得不

到任何保护。

### “镇压、劝说或让步”

尽管从 1957 年 6 月开始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但工人的不满情绪并没有立即停止，这些不满情绪一直零星地持续到年底，与此同时，中共还进一步推动民主化和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并于 1957 年秋季在企业中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主要内容是工人对企业领导人进行批评，以此来纠正干部的官僚主义错误。这样，中共试图严厉处理那些它认为最应受谴责的人，他们的言行已经远远超出了允许的范围，而对其余没有走到这一步的人，他们的不满被承认是合理的，作出一些有限的让步。周恩来等人承认，许多工人的申诉，特别是与工资改革和学徒制有关的申诉是合理的，应该得到处理（MacFarquhar 1960:281-2）。

但为了使这场运动受到控制，它还配合了一场“系统的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南方日报》1957 年 9 月 12 日），其目的是加强对工人的政治和思想教育。在广州宣布这场运动的同一家报纸，几个月前曾讥讽码头上的领导层用政治和思想教育的“护身符”来镇压工人完全正当的抗议活动（《南方日报》1957 年 5 月 19 日），这显示出当时气氛的突变。运动中要采用的方法，如“大辩论”、“自由发表意见”等，给人以民主化的表象（《南方日报》1957 年 9 月 12 日），但为其规定的主题，即民主与集中制、自由与纪律、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正确关系等，却掩盖了这一点。对这些问题进行有组织的讨论，早已成为和平镇压工人动乱的标准方法。

关于整个 1957 年下半年运动进展的报告表明，在前半年占主导地位的工人和干部之间的尖锐冲突被平息下来。虽然工人们在大字

报上对领导“坦率而精辟”（《南方日报》1957年10月5日）的批评得到了来访的上级官员，如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的赞扬（《南方日报》1957年10月11日），但对于他们所指的一些干部来说，这些批评显然有些过于坦率了，据说他们没有消除工人们的怀疑，认为邀请他们发言是某种陷阱，从而限制了运动的发展（《南方日报》1957年10月25日。Gipouloux 1986: 247）。有的人还阻止某些海报的张贴，将其遮盖甚至销毁，并对批评者进行报复（《南方日报》1957年10月25日）。但是，尽管一些工人坚持不懈地提出谁才是企业的真正主人，是工人还是党的困难问题，但到1957年12月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时，中国共产党运用“镇压、说服或让步”（Gipouloux 1986:256），基本上成功地结束了这第二个对抗时期。

## 结论

这第二次对抗与工人和党的第一次对抗一样，源于工人与党的关系的基本矛盾，但在政治理念和行动方法上又更进一步，这第二次对抗在某些方面可以看作是过渡性的，它把工人与中共的第一次冲突与第三次冲突即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在50年代初，工人曾批评他们的官方工会，而在1956-1957年，他们完全不理睬工会，在发生纠纷时自己组织起来，直接与党对抗；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工人对工会的敌意，工会实际上停止活动了好几年。同样，在解放后立即向抗议的工人提供的企业民主化形式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但在第二次对抗中被立即拒绝，因为工人们开始提出更多更深入的问题，即企业的主人到底是谁，到1966-1967年，争论已经完全从工人参与管理转移到了以工人为主导的“群众管理”。因此，这些周期性的对抗，都植根于同一个基本的冲突，每一次重新发生都

会升级，并逐渐成为中共难以控制的对象。

在第二次对抗中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人们的注意力从态度和工作方式的问题转移到了实际的权力不平等及其后果上。工人们并不是简单地抗议干部们的行为如同旧式的官僚或资本家，对工人颐指气使，对工人不屑一顾，而是抗议他们实际掌握了控制工人生活的权力，使他们能够以专制和独断的方式作出决定，而工人们没有合法的权力可以用来对抗。这就是为什么职工代表大会被否决，无法成为一个在企业中拥有实权的机构后，工人们又回到了非法的工业动乱的方法，制造在他们看来是唯一有效果的骚乱。

这种工人和干部之间权力的不平衡当然不是一个新的发展，但解放后时间越长，党的声誉越因干部特权和腐败而受损，工人条件的改善跟不上生产的改善，这种情况就显得越发鲜明。在这第二次对抗中，所有争论点，从工资改革中的腐败和不民主、住房分配不公、承诺的福利待遇没有兑现，到对表达合理不满的工人的批评、贴标签、惩罚，都可以归结为这种权力的不平等。党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即使在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工人们也主要是谈态度和工作方式（保持官方认可的批判运动的既定做法），但他们随时采取不再劳动和组织起来的方式，表明他们意识到，如果他们继续死守党设立的参与和代表结构，他们自己就没有权力。他们很快就意识到，新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不会给他们在企业中带来任何实际的权力，因此拒绝接受这种制度，有的甚至拒绝选举代表（《南方日报》1957年6月3日）。

这种对权力问题的关注，使我们看到了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在讨论工人与其领导人之间的冲突时将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开始的第三次对抗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官僚制，它的最低层次是企业官僚制，这些官僚可以构成一个新的“阶级”或阶层，掌握着控制工人的政治权力。随着官僚制常规化进

程的开始，干部可以脱离工人，开始充当特权阶级或阶层，这种思想是大跃进时期“两参”的基础，即工人参与管理和干部参与体力劳动（后者，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苗头，作为1957年党对造反工人的反应的一部分，被特别强调），这是当时工业界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在这一政策真正开始推行之前，1957年12月发表的一篇颇具防御性的理论文章，对劳动分工中固有的危险作了默许，声称：

相对而言，国家机关人员确实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而是直接行使行政权力，而人民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不直接行使行政权力。但并不能由此认为国家机关人员形成了一个站在人民之上的特权阶级，不能认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就是这个所谓的“特权阶级”与不享有这种特权的人民之间的矛盾。（Fu Rong 1957:20）

但是，尽管有人抗议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可以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但在6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泽东还是经常提到出现新的官僚阶级的危险。他警告说：

如果管理干部不下到车间的〔生产〕班组，〔与工人〕实行“三结合”，把工人当作老师，〔向工人〕学习，他们最终将与工人阶级进行激烈的、终身的阶级斗争。最终，他们作为资产阶级将被工人阶级打败。（PN Lee 1987:100）

正如莫里斯·迈斯纳所描述的那样：

在一个废除了私有财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里，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主要是经济矛盾，而是政治矛盾，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和不掌握政治权

力的人之间的区别.....（正如毛泽东在 1957 年所说的）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区别。从那里，他不可避免地被驱使着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官僚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吸食工人血液的资产阶级分子”——实际上，一个功能性的（尽管是无财产的）资产阶级能够凭借他们所掌握的政治权力来剥削社会和占有社会劳动成果的大部分。

（Meisner 1983:123）

关于剥削和阶级的辩论，在后面的章节中，特别是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会有更多的内容。现在只要指出，1956-1957 年不安分的工人的抗议活动已经开始触及这些思想，表明他们在解放后仅七年就与党的关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不能把 1956-1957 年的工业动乱仅仅当作工人中经济主义的又一次爆发（Harper 1969:100）。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工人的研究指出，旷工和罢工等活动具有“潜在的政治内容和公开的政治意义”（《真理报》1981:56），即使它们主要是由经济要求引起的，也不应该被忽视。在东欧，似乎当工人中爆发抗议时，“对经济进步的不满促进了政治和社会的不满，这种不满倾向于迅速蔓延，更激进的工人开始要求政治和工作场所自由化，特别是以工人委员会的形式”（Tyson 1981: 130）。我们可以在 1956-1957 年的中国看到类似过程的开始，因为在一五计划的最后几年，“从经济要求到社会政治要求的通常进展”（Montias 1981:173）开始在工人中出现。虽然此时工人的自我组织是有限的（Gipouloux 1986:211），大多局限于一个企业，而且持续时间较短，但如果镇压再晚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中国的工人活动很可能朝这个方向发展。

当然，许多工人在 1966 年至 1969 年的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参加独立的群众组织而获得了自主的集体政治行动的经验，这种活动

影响了他们对权威的态度，使得他们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与企业或上级机关发生冲突时，成立独立工会的可能性更大了，这一点我们将在本研究的后续章节中看到。虽然 1956-1957 年的动乱在范围上不能真正归为全国性的，因为它不涉及全国性的工人组织或协调行动，但它确实发生在几乎每一个中国的工业中心，使它接近于毛泽东认定的那种全国性的动乱，是党的总路线错误的标志，而不仅仅是党的方法或政策。从他在 1957 年的评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参与骚乱的人试图以 1989 年工人自治联合会的方式组织起来，他们会得到类似的回应：即是犯了路线错误，全国大乱，占了几省几县，甚至打到北京西长安街<sup>4</sup>，他也断言，“只要军队巩固，我们也不会亡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87）。中国领导层准备采取的镇压措施之严厉，证明了第二次对抗的严重性。“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就是第三次对抗期间，确实有必要派军队进入工厂恢复秩序，标志着冲突的进一步升级。

---

<sup>4</sup> 这是位于天安门广场的道路，它经过故宫，也经过中南海，中共最高领导人大多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三十多年后，毛泽东的预言应验了，因为在 1989 年的抗议活动中，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总部最早就是在广场北侧的这个角落。正如他所说，党的身边还有军队，这足以让党继续执政。

## 第三章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1958-1965 年

1957年秋冬，镇压、说服和有限让步相结合的政策恢复了企业的秩序，压制了工人的抗议，并阻止了工人成立自己的小规模独立组织的趋势。然而到了1966年秋冬，工人们开始前所未有地组建自己的大型组织，一开始是非法的，然后是在一些高层领导的支持下，一场数百万人的抗议浪潮席卷了中国的城市，其力量有可能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向。把几个月发生的事情说成是工人与党国机器关系的危机，有些轻描淡写，因为一些人在短时间内的行动，是对国家机器的全面攻击，企图彻底推翻它们。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考察双百运动结束后的九年中在企业中发生的事情，考察旧的问题如何发展，新的问题如何出现，1966年响应毛泽东造反号召的工人群众，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的。

### 大跃进

即使中共否认双百运动期间工人阶级进行了抗议，也不承认这种抗议的政治内容，但它的行动表明，它实际上已经理解了工厂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敌对关系的严重性。继上一章所引用的1957年12月的文章之后，全国性的和工运的报刊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了企业分工的政治后果和工人在社会主义下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上，抗议的内容也许太多，因为工人真的是“主人”（尽管别人可以决定他们在哪里工作，挣多少钱，在哪里生活，甚至在什么时候和谁结婚）。在1956-1957年的罢工中，工人们为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斗争，这些要求受到政府的谴责和拒绝，与此同时，政府设计了大跃进的工业政策，试图解决工人和干部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特别是提醒后者，他们对生产工人行使管理权只是他们被分配的工作，而不是一种政治权力或优越感。

## 工人和干部的关系以及“两个参与”

“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其中，“两个参与”是工人参与管理，干部参与体力劳动，“一改”是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是工人、技术人员、干部共同进行技术改革和创新，俗称“二一三”政策。黑龙江庆华机床厂是该政策的早期开拓者，《人民日报》为此写了一篇社论，它首先强调了该政策的政治效益，承认干部与工人的关系有时与革命前的关系并无太大差别。

在政治上〔工人和干部〕是绝对平等的，他们在工作中的关系是同志式的关系，这种关系与旧社会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剥削和压迫关系有根本的不同。但是……在他们之间仍然不断地发现旧的生产关系的某些残余。（《人民日报》1958年5月7日）

因此，“二一三”政策很有必要“从根本上改变干部的思想和工作作风”，这些干部不平等地对待工人，在安全的办公室里发号施令，很少在工厂的车间里看到他们的身影，也从不参与体力劳动。“两参”

成为了重点，因为它“有力地证明了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只有分工和职责的不同，而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社会地位的差别”（《人民日报》1958年5月7日）。

“两参”与1958-60年的“大跃进”联系最为紧密，但到60年代中期，这一政策仍或多或少地被强调。干部参加劳动最初是针对工人的批评而提出的，从1957年春开始，就一直强调干部参加劳动是解决官僚主义、拉近干部与工人阶级距离、防止干部政治上堕落的法宝。然而，它能否成功地改革在1956-1957年助长工人抗议活动的傲慢和高压态度，至少可以说是值得怀疑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工人中表现出深刻的反干部、反权威的特点（刘国凯 1987:46），这表明它在缓解对立方面收效甚微；1966年12月和1967年1月在全国工人中掀起的“反革命经济主义”浪潮中，工人们攻击干部的官僚主义，对工人缺乏关心，让人强烈地联想到1956-1957年的情况。因此，参加劳动似乎不太可能给干部的态度带来任何重大或持久的变化。安多尔斯曾指出：“参与本身并没有使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好、更平等。干部不得不改变他们行为的细微方面”（Andors 1977a: 72）。

在干部确实下到车间的地方，也并不总是能消除工人对领导的敌意。许多干部缺乏参加生产劳动的必要技能，所以最后往往在工厂的车间里闲逛，大部分时间靠在扫帚上（《南方日报》1964年9月22日），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非但不感激干部接近他们，反而普遍怀疑他们把“参与”当作更密切地监督工人的机会（Andors 1977a: 73），甚至监视他们。也有报道指出，干部普遍不愿意参加劳动，有一篇早期的文章发现，他们必须被“驱使”才能参加（《人民日报》1958年11月27日）；也有报道指出，只是“名义上”的参加，避免任何脏活、累活（《南方日报》1964年9月22日）。不过，应该说，干部的不情愿，部分是源于真正的、相当充分的信念，即经

常参加体力劳动与有效地履行其他职责相冲突（《人民日报》1963年8月7日）。

“两参”的另一半，即工人参与管理，最初似乎“进一步扩大企业管理的民主……提供了一种工人直接参与管理的新形式”（《人民日报》1958年4月26日），允许生产队一级的工人接管某些工作，如考勤和生产记录的保存、计划、工具的管理、质量检查和设备的维修等（Chung 1980:147）。这种新的直接参与形式并不是要取代与之并行不悖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而是要将管理“置于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上”（《人民日报》1958年4月26日），进一步加强群众监督和参与。显然，更直接地参与管理的政策，应该是满足工人要求，使他们在工作中发挥更大影响的一个重要步骤，然而实践证明，有许多原因使它令人失望。

## 大跃进期间的工会

缺乏强大的工会支持，也影响了工人利用“两参”政策或利用职工代表大会（这种形式在这些年里一直存在）的能力。同样，如上所述，在解放后初期和1956-1957年，这也是工人参与的一个障碍。工会组织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肃清，1958年再次被肃清，这一年，人们对工会是否有继续存在的意义进行了争论（《工人日报》1958年2月3日）。随着反右运动的发展，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赖若愚在1957年已经病倒，他在1958年去世，由刘宁一接任，在他的领导下，“中华全国总工会成了党的一个听话的工具”（Lee Lai To 1984: 65）。虽然中共确实希望工会继续存在，但现在只是为了对工人进行教化，更有效地动员工人进行生产，而且是以完全服从党为条件的（新华社1957年9月3日；《工人日报》1958年7月11

日)。

赖若愚的病逝，使他躲过了对所有直言不讳支持工人抗争的人的清洗，但也有其他突出的受害者。《工人日报》的编辑陈用文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他的罪名是一边拒绝刊登党的宣传品，一边极力搜集少数“落后工人”的“不正确意见”，并以此煽动工人反对资方、反对党和政府（事实上，1956-1957年是《工人日报》难得听到真正工人声音的时期，直到70年代末，《工人日报》很少再听到工人的声音）。据称，在陈的领导下，《工人日报》或多或少地制造了1956-1957年的工会“危机”，同时也纠缠于工人生活的“阴暗面”；在控诉书上又加上了资产阶级背景和私生活腐败的指控（《工人日报》1958年8月13日）。另一个主要的工运机关报《中国工人》月刊，在1956-1957年期间对工会内部的危机过于坦诚，在1958年期间完全停刊，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才重新出现。总的来说，官方工会还处于最弱势的地位，很可能无法支持工人在企业的层面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 大跃进期间的福利和条件

除了破坏工人参与管理的可能性之外，大跃进期间工会的软弱无力，还使工人面临其他问题，例如取消了1957年罢工中赢得的许多福利和生活方面的让步。这一时期提出的要求无一例外地被定性为“过分”（《工人日报》1958年2月3日），而现在福利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被认定为“企业对职工的福利过于照顾”（《人民电业》1958年2月20日）。报刊竭力制造这样的印象：工人是回归“朴素生活”的先锋（《工人日报》1958年7月7日），自愿放弃过高的福利待遇，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节俭奉献的无产阶级价值观的侮辱。

就计件工资而言，工人自己推动废除的说法比较可信，因为这种工资形式一直是有争议的，而且是 1956-1957 年工资改革的一些最激烈的争论的根源；很明显，许多工人支持脱离计件工资，即使他们没有主动提出。但是，关于大量工人也自愿放弃加班费和奖金，以便“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说法（《解放日报》1958 年 10 月 19 日），应该审慎看待，尤其是因为在大跃进期间，过度加班在许多企业中非常严重。鉴于 1956-1957 年人们对克扣加班费的愤怒反应，工人对强制、过度和无偿加班的态度似乎不太可能在短短两年内发生如此彻底的转变，不管他们接受了多少思想教育。

苏联的中国专家 A-P-达维多夫（A P Davydov）对工人在大跃进期间的经历作出了最黯淡的评价，他发现，在这些年里，工人们

他们被迫几乎不休息地劳动。他们被这种艰苦的经历弄得筋疲力尽，然后又经历了多年的饥饿，对许多人来说，还要搬迁到农村。大跃进的特点是：工人参与管理的程度降低，工资对勤奋工作没有什么激励作用，不关心工人的福利……事故发生率急剧上升。（Rozman 1985:117）

这些意见虽然直白，但也不失为一种典型，在参与、安全、加班这三个要点上，都能找到支持它们的证据。我们已经看到，工人直接参与管理和他们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对干部的监督，都由于干部对这些机构缺乏支持，甚至是抱有敌意，以及工会的软弱无力而受到破坏，工会已经被肃清，现在处于党的非常严格的控制之下。

担心为了追求更高的生产定额而牺牲安全，这种担心在大跃进初期就出现了（《工人日报》1958 年 3 月 26 日），此后又经常出现。此外，在 1956 年初国有化之后，事故率已经很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在大跃进期间，可以观察到的事故增加了。经常性地呼吁干

部们把安全措施看成是对增加生产的帮助而不是阻碍，似乎效果不大，因为这一时期的生产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所有企业都承受着巨大压力。《工人日报》一篇提倡安全生产的社论很好地说明了这几年安全问题的严重性，不过，这篇社论还包括对某企业在不停机的情况下对机器进行清洗和维修的“先进经验”的赞扬（《工人日报》1959年6月9日）。这类“创新”起初在党控制的报刊上得到了极大的赞誉，但事实上，如果撤掉安全防护装置，确实能更快地操作机器，但同时有可能在机器中失去手指，这本质上并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或进步的东西。

至于过度加班的问题，到1960年时，报刊已经很坦率地承认了过度工作的问题（《工人日报》1960年7月26日），尽管它被归咎于工人自己对生产的过度热情，但这并不是可信的（报刊中闪现的诚实之光越来越少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它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点，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许多报纸已经堕落为几乎无法阅读的口号和论战谩骂的汇编）。直到1965年，关于劳动和休息按正确比例结合的社论还在出现，说明这个问题非常顽固（《人民日报》1965年6月21日）。在评价劳动节期间工人参与管理的程度和意义时，必须牢记企业的这一方面情况。由于参加某些生产队的管理任务是在工人的业余时间，在通常的8小时生产工作之外完成的，过重的工作和低下的安全标准肯定大大挫伤了工人对这些额外任务的热情和能力。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出现的许多超负荷工作和忽视安全的问题，直接原因是‘二一三’政策中的‘一改’内容，即改革企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一政策的本意是推动修改‘那些限制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规章制度’（《人民日报》1958年4月26日），结果反而把对安全生产至关重要的措施作为‘不合理’的措施取消了，而没有先由‘群众’制定适当的替代措施（《工人日报》1959年6月9日

和 7 月 19 日)。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即一个旨在使工人受益的措施，至少是通过促进他们参与管理，打破一些不必要的僵化的规章制度，实际上对他们工作条件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

现在我们都知道，大跃进导致了农村的大面积饥荒，在 1959-1961 年夺去了多达 3 千万人的生命 (Becker 1996)。虽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城市里实际发生了饥荒，但粮食短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全国范围内的生活水平和经济产出的损害对城市工人的总体影响是巨大的。随着农村物资和市场短缺的加剧，更多的产业工人发现自己下岗了，往往被迫回到农村。然而，不同的工人受到的打击程度不同，因为双百运动时期明显的断层变得更加清晰，大型国营工厂中的长期工人、加入工会的工人处于优势地位，而“合同工则是第一批被送回农村的人” (L T White 1989:159)。除了这种直接的“支持农业生产”外，还大力鼓励工人尽可能地自己种植粮食，利用工厂周围的空地，甚至路边的菜地，努力实现粮食自给自足 (《工人日报》1959 年 7 月 20 日，1961 年 4 月 2 日)。

与反右运动期间一样，政治上可靠的老工人又被动员起来，在有组织的会议上“表明 1949 年以前的情况是多么的糟糕” (L T White 1989:162)。但是，尽管有人把大跃进的灾难性影响轻描淡写地说成只是“暂时的、局部的困难” (《工人日报》1961 年 4 月 2 日)，但从报刊上许多要如何改善工人福利和生活水平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实际上反映的是对经济和社会危机的绝望反应。所有关于自给自足的言论，以及对模范工人的赞扬，比如能够自给自足，修理任何东西，从工厂的设备到同事的破旧锅子和袜子，都是如此 (《工人日报》1961 年 9 月，下同)。

工人的家庭也被纳入到运动中来，对那些“不浪费一粒米、一滴水、一块煤、一根火柴”的配偶授予“模范家属”称号 (《工人日报》1961 年 9 月 14 日)。在大跃进期间，有一些关于罢工的报道 (Lee Lai

To 1986:104), 但总的来说,工人和他们的家人都忙于完成生产配额和维持家庭生计,没有产生任何广泛的反抗。

## 大跃进的结束

由于大跃进明显失败,从1961年起,工业政策和管理实际特点是普遍从大跃进的“群众路线”上退缩。但这并不意味着群众路线被完全否定或排斥。相反,大跃进路线仍然有强大的支持者,特别是毛泽东。在60年代初的辩论中,可以看到工业界所谓的“两条路线”,分别是企业管理的“修正主义”和“革命”方案,前者的代表性文件是《工业七十条》<sup>5</sup>,后者则是《鞍钢宪法》<sup>6</sup>。1960年毛泽东对《鞍钢宪法》给予认可,“工业管理中的群众路线问题继续被政治化”(PN Lee 1987:67)。概括地说,《鞍钢宪法》(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在70年代“四人帮”与邓小平的争论中都与毛泽东的路线密切相关)代表了:企业中的政治挂帅;党对管理和政治更有力的领导;企业中的群众运动和群众动员的方法;大跃进“二一三”政策的继续;以及技术革命(《光明日报》1970年3月21日)。

如果《鞍钢宪法》因此可以看作是坚持了大跃进强调的群众路线和相关政策,那么《工业七十条》则“实质上是为了否定大跃进的实验,回归到一长制”(Andors 1977a: 129),强调企业和生产的经济作用是第一位的(文革论战中所说的经济挂帅);厂长和总工程师的权威性;严格责任制和规章制度,加强劳动纪律;物质奖励和计件

---

<sup>5</sup> 俗称“七十条”,文件的正式名称是《《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由中共中央于1961年9月15日发布。

<sup>6</sup> 1960年3月,毛泽东亲自批示鞍山市委书记的《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

工资的恢复；减少政治学习（PN Lee 1987: 87-93）。当然，这两条“路线”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区别并不像上面的提纲那样泾渭分明。然而，工业管理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并非完全是虚构的：争论的背后有真正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高层领导，也关系到工人本身。

虽然大跃进的结果往往极端不利于工人的利益，但这主要是由于不断上调生产目标，达到不切实际的地步，以及随之而来的不惜一切代价提高产量的压力，还有大跃进导致的经济急剧下滑。然而，大跃进所宣称的目标并不一定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相悖：工人确实希望更多地参与管理；他们确实希望干部不再傲慢地蔑视工人，而是走出办公室，参与生产劳动，从而改革工作方式；他们确实希望自己的建议得到认真对待，如果可行的话，就立即实施，而不是被敷衍过去。因此，最高和最低层都有大跃进的支持者，而且在1961-1966年期间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存在。

毋庸置疑，大跃进时代影响工资、奖金和福利的紧缩措施，本来就不太受工人欢迎，结果它们实际上是两头不讨好，因为被谴责为奢侈、资产阶级和分裂性的物质激励措施被取消了，但却没有真正改变工人在企业中的作用和地位的措施。因此，随着大跃进的发展，“没有两参支持的革命言论可能会导致犬儒主义”（Andors 1977a: 150），这反过来又会促使工人从这些种类的政治激励转向物质激励。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例子，一方面官方声称工人是企业企业的主人，另一方面工人在工作场所的实际经验与官方的说辞大相径庭，造成了幻灭和不满。这不应该被误认为是工人对政治激励措施的断然拒绝，如更多地参与管理，更多地控制自己的工作。相反，这些激励措施未能实现（主要是由于干部的反对），导致不满情绪，这只能损害业绩，因此必须更多地依靠其他形式的激励措施，而这些措施是可以实际执行的。

## 工业七十条下的企业（1961-1965）

虽然工人的利益，像几乎所有普通公民的利益一样，一般都因大跃进而受到损害，但这并不一定会导致对“工业七十条”的大力支持，尽管有一些高层反对，但这些政策从1961年开始取代大跃进的路线。已经有人指出，这些政策在许多方面代表了一长制的回归（Andors 1977a: 129），加强了厂长、总工程师（P N Lee 1987: 89）和一般行政和技术人员的权力。一长制和干部的态度，一直是1956-1957年期间产生不满和抗议的主要原因，因此，一旦大跃进结束后的缓解开始消失，工人对这种政策的复活产生一定程度的不满是可以预期的。此外，如果说大跃进完全不屑于物质激励的话，那么根据《工业七十条》的规定，只有加入工会的国企工人，才能得到加薪和更多的福利，而许多其他工人则失去了机会（LT White 1989:184-5）。

“工业七十条”在1961年至1966年期间被“密集实施”（P N Lee 1987:91），任何调整似乎都是来自毛泽东的压力。

例如，重新努力使干部参与体力劳动制度化……试图通过制度化而不是动员化的渠道（工人和职工代表大会）容纳工人参与管理职能。（P N Lee 1987:88）

但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十中全会上提出修改“工业七十条”，直到1965年才进行，也很做什么实际的修改（P N Lee 1987: 92）。但是，在早期关于企业管理新方向的文章中，可以发现对政府对工人反抗的可能性很敏感，在这些文章中，经常强调管理

制度不是为了控制工人，只是反映他们自己的实践经验（《解放日报》1961年6月5日）。对社会主义企业中的责任制等制度的运行进行了区分，据说这种制度反映了“工人之间的同志式的相互合作关系”，而泰勒制等制度则被列宁“最恰当地称为……‘科学的血汗制度’”（《经济研究》1962年8月3日：30）。关于什么是合理的、必要的规章制度，什么是旨在对工人进行“控制、制衡和压制”<sup>7</sup>，这种争论一直持续到70年代，也是大跃进之后的争论话题。随着大跃进的结束，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的工人和经理人之间的关系，与资本主义企业的关系究竟有何不同，变得再次难以解释。

为了帮助证明这种差异，“两个参与”一直持续到60年代中期，但是它们的影响即使在大跃进的高峰期也很有限，随着企业中旧有权威模式的重新确立，很难看到它们如何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从1962年底开始，干部参加劳动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部分重新受到重视。随着大跃进的意识形态热情的消退，大约从1963年年中开始，人们认识到难以找到适合干部去做的生产任务。不过，在寻求改进方法的同时，也大力强调参与的政治重要性和好处（《红旗》1963年7月10日；《人民日报》1964年9月22日；《南方日报》1964年9月22日）。

然而，这一时期关于改进参与制度的文章，仍然把干部的抵触情绪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它们对大多数企业干部的描写表明，自1957年以来，在改进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方面进展不大，从这段对广州化学厂干部的描述中可以看出：

一些领导干部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严重影响……长期以来，他们疏远了群众，偏离了实际，……犯了相当严

---

<sup>7</sup> 这是“四人帮”的支持者在批判邓小平的工业政策时，特别是在1975-1976年，常用的一句话（管、卡、压）。

重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错误……。在领导干部中，有的放纵奢靡生活，索要特权。有的个别干部甚至屈从于行贿、偷盗，变质了。（《南方日报》1964年9月22日）

尽管从1963年中开始再次强调干部参加劳动的必要性，认为这是“防止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有效保证”（《人民日报》1964年9月22日），但在1965年我们发现：

大量重复的管理，细致异常的学究式规章制度，复杂的管理程序，管理人员脱离生产、疏远群众的浮夸气质，仍然是许多工业企业的共同缺陷。（《人民日报》1965年9月24日）

显然，这篇文章所说的“企业管理革命”早在一年前就已开始，但在打破过去十年里工人和干部之间的“无形障碍”（《南方日报》1964年9月22日）方面，还没有取得多大进展，而这一障碍在过去十年中引起了许多怨恨和敌意。

从1961年底开始，政府开始重新促进职工代表大会，但现在强调的始终是代表大会在解决生产问题和提高生产力方面的作用（《工人日报》1961年11月11日；《红旗》1962年1月16日）。这表明：第一，职工代表大会在大跃进之后得到恢复，主要是因为更直接的（虽然是低层次的）参与形式不再受到青睐；第二，工人在企业中的作用现在大多限于与生产直接有关的事务；第三，干部对实行代表大会制度的抵制，使得有必要大力强调代表大会对生产的有益作用，而不是有害作用。但是，尽管1961年职工代表大会出现了复兴的迹象，但直到1965年，对那些不满“工业七十条”的工人，政府作出的让步都没有什么进展。

那一年，政府宣布在一些企业中，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部分，职工代表大会的制度已经被“彻底改革和改进”，作为国企的一部分。它的目的是要纠正一些缺陷，如只是利用代表大会会议向工人下达指示，同时忽视工人的意见，以及“工人代表”由领导层提名的做法，被提名者大多是干部（《工人日报》1965年10月13日）。1965年底，企业工会委员会组织的每月一次的“民主生活会”也开始被提倡，作为工人自由发言、汇报车间情况、参与民主解决问题的场所（《工人日报》1965年10月9日）。但是，在1965年的记载中，没有任何关于如何改进制度的内容，使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程度显著提高。因此，在《工业七十条》生效的时候，尽管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势头增强，要求实施两参的政治压力重新出现，但“两个参与”似乎都没有能够取得重大进展；职工代表大会也没有使生产工人对企业决策产生多大影响。

## 等级和分裂：文革前夜的企业

在60年代初，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图将中国公民重新政治化，国家报刊的激进左派言论，与工人在“工业七十条”下的工厂生活的实际经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管理者们把“工业七十条”实行期间的事故率，作为他们过分强调纪律和服从的理由，同时左派人士也在政治上担心，干部们正在制定企业制度和规章，以控制或“统治”工人。越来越多的人把企业中干部和工人的关系看成，是少数有权力的人和多数无权力的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

我们已经看到，在大跃进期间，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运动，使重要的安全措施以及真正多余的规则都被取消了，导致这一阶段

工业事故高发，工作条件恶化。但必须记住，与“两参”一样，“一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纠正 1956-1957 年给许多工人留下的印象，即他们企业中的干部，以及他们的上级，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特权集团，他们对工人的生活拥有很大的权力，包括制定企业规则的权力。让工人在改革规章制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他们真正成为企业主人的一个具体途径。1964 年对过度控制工人的批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有的企业领导干部甚至成立了科室、分队和其他管理机构来控制工人。他们制定规章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工人听话……。企业的领导和行政人员强调“控制”，强调自己的权威，每一项决定都是由自己做主，不相信和依靠职工群众，而是死死地按规章制度办事，这是错误的。（1965 年 9 月 24 日《人民日报》）

虽然为了安全起见，大跃进出现一些倒退显然是必要的，但很显然，《工业七十条》强调管理和技术干部至高无上的权威，让那些喜欢分工非常明确的企业官员自由发挥，他们下达指令，工人遵守。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用一句话来概括：“领导制定法律，管理者执行法律，工人服从法律”（龚晓文 1976：67）。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个对工人的过度管制和控制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四人帮等左派分子用来打邓小平等“修正主义者”的方便棍子，工人对这些规章制度的不满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有的连上厕所的时间都要被管制<sup>8</sup>（P N Lee

---

<sup>8</sup> 这个在工人抱怨中的痼疾，在深圳外资企业中又出现了：见 Anita Chan 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下的中国工人》所附译文，China Information 5, 4 (Spring 1991)。泰勒主义在 1976 年以前在中国受到普遍的唾弃，但在 1984 年就在深圳卷土重来。

1977:90-1)，而且在文革前几年，当“工业七十条”在工业界大行其道的时候，这种不满正在不断积累。

根深蒂固的感觉是，工人无法参与生产和工业决策，而这些决策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工人操作机器、使用设备和制造产品，但他们却不被允许对他们的工作环境有任何发言权。相反，“专家”控制着工人的一举一动和操作或过程的每一个步骤。在阻止工人参与管理的同时，专家们并不一定做得更好。(PN Lee 1977:91)

即使在 1969 年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阶段结束时，对严格纪律的不满，以及工人对试图执行纪律的人的斗争态度，也在有关工业企业冲突的报道中反复出现（《中国新闻分析》1969 年 8 月 15 日），而企业中持续的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则是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经常出现的抱怨，被归咎于文革。即使是现在，也不能低估过度的管制和纪律，在中国工人中引起强烈情绪的可能性（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93 年 11 月 18 日：63-4）。

## 临时工与合同工：工农制度

六十年代初工业环境的最后一个特征是所谓的“工农”临时工和合同工制度，这对工人的抗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sup>9</sup> 到了 1966

---

<sup>9</sup> 严格地说，正如 Andors(1977a: 298, n.68)所指出的，城市合同工或临时工，与农村地区工业或与农业有关的合同工或季节工是有区别的。本研究主要涉及城市工业中临时工和合同工的使用情况；这在使用“工农制度”一词之前，但似乎只是从 1964 年“工农制度”开始推广时才成为冲突的主要原因。这两种雇佣形式之间显然存在着联系，因此许多作家将“工农制”和合同制这两

年，不论是合同工还是长期工，都有抗议的理由，后者担心自己很快就会被迫变成合同工。

自 50 年代末以来，合同工或临时工对工人的不利之处已经很明显。在 1957 年的罢工浪潮中，临时工也是抗议者之一，他们对没有就业保障或工会权利表示不满，而他们所做的工作往往与长期员工完全相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在“临时”岗位上工作了四年之久（裴宜理 1994:13）。在大跃进期间，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一些工人群体，即迅速扩大的劳动力队伍中的新员工、临时工或合同工，在工作保障、薪酬和条件方面，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工会会员资格方面，并没有享受到与历史较长、技术较好、经验丰富的工人相同的权利和福利。根据一位苏联评论家的说法，大跃进期间的新员工“工资很低，而且在获得新的工作技能和经验时几乎没有晋升的机会。他们得到的社会福利很少。这些工人不仅工资低，而且没有权利”（Rozman 1985:117）。而随着 1960 年大跃进在混乱、短缺甚至饥荒中停滞不前，摆脱临时工和合同工是管理者削减劳动力的第一选择（LT White 1989:159）。

大约从 1962 年开始，特别是 1964 年以后（LT White 1989:160），这种制度得到了巩固和扩大，它限制有保障的、工资较高的、有工会的岗位，用工资较低的、在企业中权利较少或没有权利的合同工或临时工来弥补不足，从而降低了成本，它被普遍称为工农制度。虽然这个计划有其政治上的理由，即逐步缩小在向共产主义过渡期间必须克服的“三大差别”中的两个差别（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sup>10</sup>，但这个制度对企业管理部门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它能节省福利开支。合同制工人无权带家属进城，减少了住房、托儿所等方面的压力，

---

个词交替使用。关于合同工在中国的发展，特别是 1964 年以来的争议性发展，见 *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Magazines* 616:21-30 中的非官方文革出版物。

<sup>10</sup> 另一个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区别，“两个参与”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不需要时可以送回老家或公社，由其他单位负责其福利。在干部面临工人抗议的情况下，这种制度也有明显的优势，因为任何临时工或合同工只要有引起这类麻烦的迹象，就可以迅速被除掉（LT White 1989:189）。

事实上，在 1962-1965 年，随着物质奖励和一般福利重新受到青睐，为那些编制较好、加入工会的工人提供的福利实际上得到了扩大，“但具有成本意识的管理者试图限制接受这种福利的群体”（L T White 1989: 184-5）。如同 1957 年一样，在大跃进期间，随着劳动力的扩大，大量雇佣了临时工和合同工，多年来他们在同一企业中做着与正式工相同的工作，因此，他们认为自己应当享有与正式工相同的基本权利。1963 年 7 月，国务院似乎承认了这种不公平待遇的诉求，颁布了《关于将从事正常工作的临时工转为长期工问题的通知》<sup>11</sup>，该通知允许企业在不违反国家 1963 年企业劳动计划的前提下，按正常条件和工资将这些工人作为长期工聘用。

但这显然与限制享有长期工人数量的愿望背道而驰，因此，从 1964 年年中开始，随着所有企业开始提倡少用长期工人，多用临时工和合同工，临时工或合同工转为长期工的做法被停止，1965 年 3 月政府宣布，1963 年的“通知”无效。对合同工制度的不满和抵制似乎主要是从这时开始的，因为那些认为自己有充分理由转为长期工的工人，在 1963 年认为当局已经让步了，现在却被拒绝给予长期工的身份。据报道，有的省劳动厅官员警告劳动部，这个决定工人很难接受。

---

<sup>11</sup> 除另有说明外，本书中关于合同制和临时工制度变化的记述，详细内容来自劳动部两个群众组织——红色造反队和工农革命造反队——的一系列文章，发表在广州红卫兵刊物《红色‘批判刘少奇’战斗队》（Red ‘Criticizing Liu Shaoqi’ Combat Corps of Canton）（广州）上，译文载于《中国大陆杂志调查》（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Magazines 616:21-5.）616: 21-5。

工业七十条强调物质奖励，已经开始在工作场所制造分裂，就像 1956-1957 年类似的政策一样：“对生产多的工人的奖励鼓励了一种精英主义，将官员和技术人员与群众分开。这种分离破坏了‘政治挂帅’的学说和普通工人的热情”（Vogel 1969:319）。随着工农制度的发展，一方面是大部分的普通工人，另一方面是一群（有时是多数，但有时不是，特别是在较小的企业里）有地位的、福利较多的、比较熟练的工人，加上干部、技术人员和积极分子，两者之间的分化变得更加明显。只有这有限的第二类人真正受益于大跃进之后的工业政策，因为工农计划“降低了管理者的成本；提高了成熟的工会成员的相对地位。但它压制了大多数其他人”（LT White 1989:182）。

分裂的根源在 1956-1957 年的抗议活动中已经显现出来，在那里，最积极的抗议者往往是城市劳动力中的“穷人”：年轻的工人，特别是学徒工，或者是来自小型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人，他们的工资和福利不如大型国企的工人。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即使是最盲目的中共意识形态者，也无法忽视这种分裂，因为他们深信工人阶级的团结是一种信仰；上面确定的两类工人，与运动中出现的造反派和保守派这两类群众派别基本吻合。因此，工农制度最重大的影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那些已经受到影响的工人，而且凡是担心自己可能会失去长期工身份的工人，都涌向造反派，要求废除他们所认为的不公正、不可接受的歧视性制度。

## 毛主义，修正主义，1964-1966 年工业“两条路线”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中，毛派在批判有关“工业七十条”和工农制度的政策时，无一例外地将其称为刘少奇所谓的工业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部分，而邓小平则被认定为这种倾向的另一主要代表。然而，

这种说法的矛盾很快就显现出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刘少奇的罪名往往自相矛盾，他既鼓吹“资产阶级专家”在企业中的权威，支持他们对工人的严格控制，又鼓励一些阶级工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推翻所有干部的倾向，而不仅仅是针对少数“资本主义读书人的权威”。这里的问题是，忠于毛泽东，忠于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文革活动的必要条件，反之，运动参与者所反对的倾向，都必须归咎于刘少奇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头号当权派”。当一些人随着文革的深入确实开始对毛泽东本人产生怀疑时，他们一般都不说出来；一些活动家，如湖南省无联的杨曦光，则把自己和毛泽东意识形态结实实地捆绑在一起，试图使自己的强烈观点符合毛泽东的著作（Jonathan Unger 1991a）。

既然我们没有必要遵循那种必要的曲折推理，把文革前工人的所有不满都归咎于刘少奇，我们可以看看为什么尽管在 1964-1966，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力美化无产阶级，却未能使大多数工人受益，以及毛泽东“路线”的某些方面是如何促使工人在文革期间采取行动。当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大多数工人的地位改善不大，其中一个原因是，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它对企业的经济结构影响不大，事实上，企业的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工业七十条”决定的。因此，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试图让工人唱出一个不利于自身的社会结构的优越性”（Vogel 1969:319）。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新强调“无产阶级主义”（L T White 1989:199），但它的主要受益者实际上是那些可以自称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人。党支部的地方领导人和社会主义教育斗争的积极分子。许多工人根本没有得到新的福利（L T White 1989:218）。推广“命令中的政治”，特别是毛泽东思想，也可以被用来赋予诸如工农制度等不受欢迎的方案以无可挑剔的意识形态权威，事实上，1966-1967 这确实使一些制度难以被批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特别是江青，对抗议合同工的公开支持是很短暂的

(Solomon 1968:9-12; 裴宜理和李逊 1997:101-2)。

60年代中期,企业的另一个主要变化是建立政治部门,这与毛泽东政策偏好密切相关,该部门通常由前人民解放军(PLA)人员组成,以在企业工作的所有领域推广“政治挂帅”的思想,同时也控制所有个人的机密档案,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城市地区已经收集了更多的信息(L T White 1989:197)。从1962年的学雷锋运动起,“向解放军学习”一直是一个常见的口号,但从1964年起,可以看到在工业企业开始大力学雷锋。官方工会似乎对此有所抵制(Lee Lai To 1984:70-1),提出了许多机械地把军人作风应用于企业的实际困难(《工人日报》1965年3月28日、4月7日、9月19日),在对这场运动的讨论中,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所有坚持解放军作风可以适用、必须适用于企业和工会工作的,都是政治部门和民兵干部,而提出反对意见的都是工会干部,一般是基层干部。另外,非常明显的是,1965年期间,《工人日报》的版面上几乎完全没有向解放军学习的劝告,这与其他大多数报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和其他报刊一样,几乎每一个版面都有毛泽东的身影,所以似乎只是反对军事影响工业领域。

如果说工会干部对政治部门的影响越来越大感到不满的话,那么许多工人也是如此,文革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这一点,至少在一些地方,政治部门的干部成了工人首选的攻击对象:

工人造反的矛头起初是指向工作单位的一些党政机关……。文革时,中国的基层工作单位有两种干部。一种是1964年以前实际管理工作单位的人;另一种……是政治部门的那些复员军人。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刘少奇派出的工作小组经常利用第二种人,批判第一种为修正主义。但当工人们自发造反时,他们很少把攻击的矛头指向管理干

部，而是指向政治部门中备受仇恨的干部。(Jonathan Unger 1991a: 18-19)

攻击政治部门的另一个诱因是，在 1966 年夏天，当大多数人还根本不清楚文化大革命将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时，许多人把它当作另一场反右运动（王绍光 1995: 68），政治部门在工业企业和学校里收集了很多的“黑材料”，收集嫌疑人的资料（那些阶级背景“坏”的人，那些在以前的运动中被批判的人，或者犯了政治错误的人，或者越过本单位有权势的人，以及任何喜欢说冷嘲热讽和抱怨的人）。在“文革”的前三年，档案的存在和控制仍然是一个爆炸性的政治问题，尤其是造反派的问题（王绍光 1995:91-2）。

从本研究的角度看，文革中的工人，并不是在“两条路线”中的选择一条——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或刘、邓确定的“修正主义”路线——因为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两条纲领中至少有一些工人反对的重要内容。相反，文化大革命的突出特点，正如我们在下一章中所看到的那样，是工人们以前所未有的自主性和自发性采取行动。无论他们加入哪个派别，都在某种程度上分享了大规模的自我组织和独立政治行动的经验，并在“独立的群众组织中表现出来，这些组织在短暂的时期内使工人真正获得了力量，使他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Walder 1982:229）。正是这一点，使文化大革命成为一个转折点，如果不是从工人在企业内外实现他们所期望的地位和影响的角度来看，那么至少从最终可能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自主集体行动的角度来看。

1958 年至 1966 年期间，工业界的毛派和刘派“路线”都在制造怨气和不满方面发挥了作用，这些怨气和不满在文革中得到了体现。其中一些怨气和不满可以追溯到 50 年代，基本上是 1956-1957 年一轮抗议和罢工中未解决的问题，而另一些怨气和不满则反映了 60 年

代工业生活的新特点，例如工农制度的扩大对就业保障的威胁越来越大。刘、邓的“工业七十条”强调纪律、等级和服从，使工人在 50 年代反对的一长制又回来了，同时还强调紧缩开支，限制有资格享受所谓“铁饭碗”的人数。另一方面，毛泽东的路线在剥夺物质利益的同时，也承诺提高工人在企业中的政治地位和话语权，但大跃进期间并没有实现，使工人两头受气。于是，它以企业政治部门的形式，对工人进行政治灌输，加强控制，发起模仿解放军的运动。当然，最终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的路线，不一定是因为它比修正主义者的政策更能激起工人的愤怒，而是因为 1966 年 8 月的“十六点”文件（Schoenhals 1997b: 33-43），自 1949 年以来第一次允许工人在党的控制之外组织起来，从而释放了这种愤怒。一旦工人的群众组织出现，这些反映“工人真正利益（虽然有分歧）”（Rozman 1985:128）的自治和代表机构，极难被政府重新控制，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而藐视党和军队。

## 第四章 “造反有理”：1966-1969 年文革中的

### 工人<sup>12</sup>

从党中央和国家控制的报刊的言论来看，到 1969 年，工人的地位和影响力因文革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无产阶级”成为对任何人或任何事的最高褒奖。然而，这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新时代（姚文元 1968 年），对大多数工人来说，与现实相去甚远，上海更是如此，上海是唯一一个工人群众组织的领导人真正掌握政权的城市<sup>13</sup>。即使在那里，正如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和李逊所表明的

---

<sup>12</sup> 当时，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中国人，都普遍认为文化大革命随着 1969 年 4 月党的九大的召开而告一段落，这就是第四章所涉及的时期。直到毛泽东在 1974 年的一份文件中把文革称为正在进行，官员们才开始再次说这场运动正在进行。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导层采用了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1976 年）的说法，当前大多数中国问题研究者也是如此，但尽管 1966-1969 年和 1969-1976 年之间有一些重要的连续性因素，但这两个时期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因此我认为，需要对术语进行某种区分。在本研究中，我试图把文化大革命本身，即 1966-1969 年的群众运动，与随后七年由“四人帮”的主导时期区分开来，其原因将变得显而易见。由于后一个时期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术语，我只用日期来称呼它。Anita Chan 对这一问题和运动期间相互竞争的社会分裂范式进行了详细的论述（Chan 1992: 69-70, 73-4）。

<sup>13</sup>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异常复杂的事件，在对它进行陈述时，对整个中国城市的情况一概而论，是非常危险的。然而，为了不使读者因不断的离题而感到疲惫，我在这里声明一下，本章中关于文革中工人的任何一般论断，在特定的城市中可能会有例外；文中只将指出最重要的例外。上海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个特殊的案例（裴宜理和李逊 1997），因为在那里，尽管是在“四人帮”的张春桥的全面领导下，一个造反派团体的联盟夺取了政权，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政权，直到 1976 年。上海 1967 年 1 月的“夺权”（实际上是在

那样，一些造反派工人领袖所取得的有限的成果，并没有转化为“改善同胞命运的阶级斗争”（裴宜理和李逊 1997:187-8），因此文革结束后，上海工人的地位并没有发生改变。

然而，不同的是，当时大量的工人已经做好了准备，试图去追求自身利益、反对党-国体系，具备了在企业内外自主进行集体行动的能力。就工人而言，这是文化大革命真正重要的遗产：在党的正常控制之外，进行大规模集体行动的经验，这份经验使工人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动乱时期可以进行自我组织和罢工。讽刺的是，这份重要的经验被后来的党领导层所否认，他们无法解释这种公开反对中国现有权力结构的现象，他们的解释是，刘少奇垮台后邓小平领导的“群众”，与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恶势力和跟随他们的少数流氓作斗争。很大一部分造反派从这一表述中完全消失了，这并不是偶然的：对于造反派激进分子提出的中共成为新统治阶级的论点，中共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回应，所以干脆把这一关键思想从文革史中删掉，尽量回避这个问题（A Chan 1992）。

## 工厂里的文化大革命 1966 年 5 月-12 月

从 5 月开始，政府开始动员工人批判北京党中央挑出来的少数知识分子，到 1966 年夏天和初秋，少数心怀不满的工人开始在一些企业里进行真正的抗议活动，还有一些学生红卫兵参与其中。起初，这种活动似乎受到企业管理层的镇压，但随着工人组织，特别是造反派组织在 11 月和 12 月的发展，工人的群众行动变得越来越普遍。

---

张春桥的领导下恢复秩序)的特殊情况，意味着它躲过了 1967-1968 年蹂躏中国大多数城市的最严重的暴力（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以及造反派和军队之间）。

1966年11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承认了这些组织的合法性(Lee Lai To 1986:108-9)，工人组织的最后一个重要障碍被消除了，1966年12月和1967年1月初，全国范围内爆发了被称为“反革命经济主义”的运动。这场运动实际上与1956-1957年的工人运动有着密切的相似之处，刘国凯的以下描述就表明了这一点：

一场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民主大潮，群众积压已久的思想和合理诉求，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喷涌而出。工资冻结期延长、迟迟不能从合同工转为正式工、高中毕业生劳动保险、福利、补贴或就业不足、分配宿舍、加班补偿金逾期等问题一旦一个单位的群众迈出了造反的第一步，这个消息就会传到其他单位，那里的群众就会立即效仿。群众们一怒之下，把干部们告上法庭，训斥他们，抱怨他们多年来受到的不合理待遇。他们指责领导层对工人无情、粗暴，对工人毫不关心，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那些工资低下，在工作条件和日常生活中受到可怕折磨的人很多。因此，抗议活动是真正的群众运动的表现，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要激烈得多。(刘国凯 1987:45-6)

“经济主义”运动的力量一度使文革完全偏离了方向，由于工人的要求暂时得到了满足，在许多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混乱。动员大量普通工人参加运动，也为文化大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特征——1967年1月的夺权运动——铺平了道路，在这场运动中，企业管理层经常被全部推翻(Walder 1996:187)。

## 只是另一场运动（1966年5月-9月）

1966年春夏的早期发展，似乎与正在进行的左派“政治挂帅”和企业意识形态革命化运动没有什么明显不同。然而，虽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说服干部“放弃他们在住房、子女教育和生活方式上的特权”（P N Lee 1987:99），但随着大庆油田的模范经验开始得到更有力的推广，对工厂现有权力结构的激进的批判，似乎确实可能成为更深远变革的基础。“修正主义者实际上把一个企业变成了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私有财产；他们用命令主义、惩罚和僵化的制度来管理企业”（《经济研究》1966年4月20日）。为了反对这种做法，在企业中贯彻群众路线，工人要有选举基层干部的权利，在任何会议上都可以批评干部。干部则要同意放弃特殊的特权：

他们不建办公楼、礼堂、招待所和接待室，他们将住在“临时住所”或单层楼房里。他们不开派对，不送礼物；他们既不跳舞，也不在办公室里放沙发。他们将在集体餐厅吃饭。他们要教育子女不要为自己谋取特权……。他们必须坚持参加体力劳动，决不做高高在上的官僚。（《经济研究》1966年4月20日）

工人选举自己的领导人，领导人可以被罢免，不会享受高薪或其他特殊的特权，这些主张是以巴黎公社为基础，建立新的社会和工业组织形式的思想核心，这种想法在1966年，特别是在1967年的“一月风暴”期间，表现的最为明显，主张这种形式的造反派主要有四个目标：

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他们通过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来管

理自己；这些领导人不会成为一个新的和压迫性的官僚机构，因为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被罢免，而且他们的工资不会比选举他们的人高；而且人民是拥有武装的。（Mehmert 1969:12）

当然，毛泽东在 1966 年 8 月具有开创性的“十六点”（Schoenhals 1997b: 39-40）中，又回到了巴黎公社这种群众组织形式的优点，即领导人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被普通民众罢免，他在该文件中规定了群众参与运动应采取形式。但在 1966 年初，《红旗》上一篇赞扬巴黎公社的文章就已经预示了这一趋势的发展，该文继毛泽东之后，强调了这种自治形式的重要性，可以防止一个新政权在工人起义成功后沦为特权和剥削精英的独裁（《红旗》1966 年 4 月 1 日）。作为对比，文章批评了赫鲁晓夫的苏联存在着特权、高薪、腐败和普遍的物质激励（《红旗》1966 年 4 月 1 日：14）。因此，在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之前，就有迹象表明，企业管理和干群关系的可能会发生相当彻底的改革。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个月，即 1966 年 5 月至 7 月，并没有看到这种彻底解决工人与干部之间关系的办法，因为展开的是一场非常传统的批判运动，很容易被误认为是 1957-1958 年反右运动的翻版。在企业里，确实有一些工人试图反抗自己的领导，但很快就被镇压了，工厂里以及学校和大学校园里的运动，一般都是针对“惯犯”的。在那些动员工人批判知识分子的会议和集会（知识分子正是文革的第一批对象，主要是作家邓拓和吴晗），只有政治上靠得住的积极分子和已经被纳入权力结构的工人才能参加；这时参加文革的权利还只限于“政治素质高”的人（刘国凯 1987:43），而这些人后来大多是保守派。在官方报告中，这些“进步的”工人和工作人员驳斥了知识分子所谓的主张（他们写了一些讽刺文章，没有明确提

出主张，但对他们所针对的人是相当清楚的，特别是毛泽东），即大跃进是一场代价高昂的、灾难性的失败，只给普通中国人民带来了痛苦，中国共产党轻视群众，无视他们的意见。据说，工人们用具体的证据反驳了这些诽谤，证明了他们自己的行业和企业在大跃进期间取得的进步。<sup>14</sup>

工人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阶段，比中小学生和大学生表现得更加谨慎，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虽然运动的重点仍然主要是文化，但许多工人都认为，几位作家在三年前所写报纸专栏中，到底有没有暗讽伟大舵手，和他们的生活无关。但是，即使他们在新的运动中发现有机会表达他们的许多不满，并对工作场所领导进行批评，他们也很清楚其中的严重风险，特别是那些经历过反右运动的工人，他们自己也看到了直言不讳的惩罚（Bennett and Montaperto 1971:56）。因此，大多数工人暂时停留在“当局允许的、鼓励的、甚至是要求的”活动上（王绍光 1995: 68）。少数敢于直言不讳的工人被软禁或拘留在他们的工作单位，被工厂管理层和外部工作团队谴责为“妖魔鬼怪”，被调到不太理想的工作岗位，被削减奖金（裴宜理和李逊 1997:64-5），在极端情况下，“斗争会议和殴打使一些人接近死亡”（Walder 1996:174）。在这个阶段，工厂里的酷刑比学校和大学里的酷刑要少得多，但确实有案例发生（裴宜理和李逊 1997:65）。除了少数人之外，这足以阻止所有的人说出真相。

工厂管理层一如既往地拥有一系列强大的武器，可以用来对付反叛的工人，但他们仍然担心，如果激进的学生能够与不满的工人接触，就有可能挑起抗议活动。在广州，1966年5月和6月批评领导人的工人遭到“残酷镇压”（Bennett 和 Montaperto 1971:57）的传

---

<sup>14</sup> 例如市广播电台关于广州工人集会的报道，译文见《省广播电台新闻》(News from Provincial Radio Stations (NPRS)) 第 158 期 (1966 年 5 月 19 日: 20-1 和 26-7)、第 159 期 (1966 年 5 月 26 日: 23-4)。

闻，促使一些中学生向这些被压迫的无产者提供道义上的支持，但是他们无法进入工厂，直到8月下旬，被派去指导那里的文革的工作小组撤走之后，他们才能进入工厂，与工人交谈，他们了解了工人在60年代中期最常见的（在许多情况下也是50年代中期的典型）不满：“家庭困难，而工厂领导却不理睬”，在同一单位工作多年“而工资却没有调整”，以及工人的妻子从仓库转移到农村（工农制度特别影响到像这样的运输和仓储企业（Solomon 1968:3-4））。<sup>15</sup>学生们发现，“其他工人对仓库领导层的官僚主义工作作风怀恨在心，他们总是呆在办公室里，几乎没有下到车间里和工人一起劳动”（Bennett 和 Montaperto 1971: 58-9）。最后这句话是在前十年的任何时候都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的抱怨。

这个案例中的学生，碰巧听到了在运动早期发表言论的广州工人遭到了怎样的迫害，因为一位老师和一些同学有亲戚在工厂当工人（Bennett and Montaperto 1971:56）；企业当局在这一阶段相当成功地将冲突控制在单位内部。一些参与的工人对“工业七十条”的主要受益者——技术人员和干部——发泄了他们的敌意，同时又注意用新运动的术语来表述他们的批评，把他们称作工作场所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们看不起生产工人，过于注意“书本上的规则和外国陈规陋习”；他们还指责技术人员和干部没有尊重或利用工人自己新获得的技术专长，尽管大跃进强调“三结合”，让工人参与技术事务。但是，这种无懈可击的毛氏批评，并没有让工人躲过企业领导人的迅速报复和谴责，他们认为这“明确无误地暗示了对领导层的

---

<sup>15</sup> 我没有找到多少明确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但似乎女工比男工更有可能失去她们在企业中的永久地位和福利，特别是女工会成员有资格获得相当慷慨的产假福利，这是管理人员热衷于避免的开支。裴宜理和李逊(1997:101)指出，妇女在工业劳动力中处于弱势地位，而且在中国最近的经济改革中，急于节省福利开支的企业肯定首先解雇妇女。

攻击”（Bennett and Montaperto 1971:56）。工人们意识到，同样都是攻击领导层的罪行，但他们总是会受到比学生更严厉的对待，直到1966年7月底，大多数人都很谨慎，只做了最低限度的工作，让人看到他们支持新运动。那些试图与志同道合的工人建立联系的人都是秘密进行的（王绍光 1995：88）。

### 1966年8月：炮打司令部

无论毛泽东是想把文化大革命仅作为对党内非毛派人士的一次大清洗，还是真正的反官僚主义革命，到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根据刘少奇指示派出的指导运动的工作小组，实际上是在控制运动，压制对地方领导人的真正批评。毛泽东的反应是在8月8日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常被称为“十六点”。这个文件把运动的对象界定为“党内当权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派”，从而表明这不是一场旨在普通民众中寻找右派分子的运动（刘国凯 1987:23-4），而是针对那些偏离正确路线的当权者。这种策略的改变，结束了在企业中针对明显目标（上一章所确定的“惯犯”，包括右派分子、阶级背景不好的人，以及任何曾经被企业干部批判、贴标签或以其他方式处罚的人）的运动，但并没有立即导致企业内部出现激进的发展。

各单位都成立了文革委员会和小组来指导运动，但由于“大多是前一阶段运动的主力，即具有较高‘政治素质’的人”（刘国凯 1987:24）被选入这些机构，因此，在企业中很少有攻击“走资派”的事情发生。“十六点”本身就非常强调生产的重要性，规定文化大革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动力”（Schoenhals 1997b: 42），不能把它看成是生产的障碍，要发动群众“抓革命与促生产”并举。这就给了企业领导

以保障生产的名义，限制工人活动的空间，他们在 1966 年 8 月和 9 月一直这样做，党的干部和管理人员都对“十六点”中关于生产和纪律方面进行了专断的解释：

例如，工人们的业余时间被无休止的会议填满，讨论生产和日常生活的问题；希望交流“革命经验”的工人被从白班调到夜班，或从一个车间调到另一个车间，使他们难以组织政治活动。当工人真的到其他工厂或向上级机关请愿时，他们被控以“破坏生产”和破坏“十六点决议”的罪名。

(PN Lee 1987:107)

这些都是企业领导人面对工人批评时的惯用手段，与 1956 年以前一长制之下所采用的控制方法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在上一章中已经看到，对于抗议的临时工和合同工，可以很简单地让他们下岗，但在运动的这个阶段，似乎连长期工人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来控制；企业领导层控制了工人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因此对制造麻烦者进行有效报复的空间是无限的。后来发现，许多工人，不管是长期的还是临时的，自文革开始以来，因为批判企业领导而直接下岗或减薪（《人民日报》1966 年 12 月 26 日）。

凡是宣称工厂文化大革命成功的地方，仔细看报道，往往只看到象征性的或形式上的变化。在广州，报告声称“打破了规矩，解决了困难”，<sup>16</sup>因为工人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下，废除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比如一个工厂里的考勤卡打卡制度，这被认为是“对工人革命自发性的极大侮辱”。然而，报告接着明确指出，这个工厂根本

---

<sup>16</sup> 这些细节摘自广州市电台 1966 年 9 月 10 日的报道，译自 NPRS174（1966 年 9 月 15 日：49）；1966 年 9 月 14 日，译自 NPRS175（1966 年 9 月 22 日：28）；1966 年 11 月 15 日，译自 NPRS184（1966 年 11 月 24 日：23）。

没有废除打卡制度，只是把令人痛恨的考勤卡改名为“革命卡”，这个制度还像以前一样用这个新名字继续执行。然而，现在理论上已经为普通工人开辟了攻击领导层某些人的途径，特别是从 1966 年 10 月开始实行了防止报复的实际保障措施后，工人们确实开始感到能够更多地参与文化大革命。随着 1966 年秋季工人活动的增加，工人团体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团体一样，明显地分为两大派别，即保守派和造反派，这两派的利益相当不同，并寻求在不同的方向上发展运动。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就是这种派别分裂的原因。

### 工人之间的派系分裂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人的传统观点，与双百运动时期是一样的：工人在社会上相对优越的地位和政治地位，使他们在抗议活动中置身事外，并保护党不受其他社会团体的攻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观点是对 1956-1957 年工人实际活动的歪曲，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在著名的知识分子运动和学生运动之外，还有强大的工人抗议和罢工浪潮。一些工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支持和维护党的权威的想法是有根据的：他们也因此被对手叫做保守派。但是，我们必须重视造反派工人，看到他们反抗的意义。

一般来说，派别效忠受到地位和利益等级的影响，有时也受更具体的个人经历的影响。刘国凯（回忆录作家、广州某工厂的造反派成员）用“有好的”和“有坏的”派别来概括这种划分，即那些从 1966 年的现状中获益的人，他们因此维护了现有的秩序（保守派），以及那些因为家庭（阶级）背景、在较小或较穷的工作单位就业而处于劣势的人。在任何企业中担任低级职务的人（学徒、青年、临时工和合同工，以及任何从事低级辅助工作的人），或者以前在政治上或

个人上有过失的人（包括家庭成员的过失，在这种情况下适用连带罪），他们往往成为造反派，攻击每一个处于权威地位的人，而不仅仅是少数“资本主义读书人”。这种表述受到了批评，因为人们马上就能想到例外，但只要不把它视为绝对的，我认为，把现存秩序的受益者视为保守者，把那些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视为造反派，这一总体框架仍然是有用的。

安德鲁·华尔德（Andrew Walder）提出了一种企业中的赞助网络模式，根据这种模式，积极分子和劳动模范被束缚起来，不得不对领导层保持忠诚（华尔德，1986，1996），因此很容易被动员起来保卫企业和上级机关，就像在文革初期这些机关受到攻击时那样。这种以积极分子和非积极分子之间的冲突，有时被认为是另一种解释模式，区别于把社会经济地位和相对地位作为主要因素的理论，但事实上，这两者并不一定是矛盾的。如果我们在计算判断工人中的“既得利益者”时，除了物质条件和利益之外，加上政治权力和影响力，那么这两者是相当相容的；被纳入政治网络的人在各方面都是现状的受益者，因此是保守派，而网络之外的人，则在物质和政治上都处于不利地位，而且往往对积极分子表现出相当的敌意。

“政治网络”论对解释保守派工人组织很有价值（裴宜理和李逊 1997:5），但 Walder 认为积极分子/非积极分子的分裂“是中国工业的政治社会结构最明显的裂痕”（Walder 1986:166），这与本研究的证据相矛盾。参与工厂政治网络的工人，在双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都是干部的忠诚卫士，只不过文革需要得到许多其他工人的支持，而这些工人在利益和机会分配中，往往处于某种特定的不利地位。坚持认为最具有政治意义的是两个工人群体之间的对立，而不是部分工人与当权者之间的对立，这与华尔德的另一个说法一样，即工厂中忠于干部的工人，能够阻止工人群体中集体抵抗的出现，然而这些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而事实上，正如这项研究所显示的

那样，这种情况自 1950 年代以来就一直在定期发生（正如 Walder 最近所承认的那样，尽管他仍然没有认识到许多爆发的抗议活动的政治内容，而是把它们归类为表达“职业不满”（Walder 1996: 168 - 9））。政治网络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即网络能够“在正常情况下”保持对工人的控制（Walder 1986:11），但如果我们把运动、政治极端主义、战争、饥荒、叛乱等“非正常”时期排除在外，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完美运作的控制体系，但只是在 1954-1955 年。

保守的工人团体（他们有时自称自卫队，以区别于学生红卫兵，这个名字可以追溯到民国时代的共产主义根据地（裴宜理和李逊 1997:72））被认为是工人的代表，主要是因为许多人认为他们是产业工人中的多数，特别是在大型的、更现代化的国有企业中。<sup>17</sup>在大型企业中，造反派工人几乎总是占不到劳动力的一半，这可能会使我们认为，这些群体与保守派相比，在总体上不那么重要，也不那么能代表工人的意见。但必须记住，工人们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不允许他们硬着头皮组织或参加叛乱团体，特别是在党影响最大的大企业：

在工厂里，特别是大工厂里，大多数“保守派”组织都是稳定和强大的，这是因为在大工厂里，旧的秩序拥有强大的控制力。上至厂党委、政治部、公安科，下至工会、

---

<sup>17</sup> 在长沙这样的城市，大多数工人加入了造反派，但即使在这样的城市，大企业的工人也往往不那么激进（Jonathan Unger 1991a: 20）。关于广州一些主要企业中造反派和保守派工人的比例，见 Hong Yung Lee（李洪勇）1978: 135 中的表 5；这些企业中的造反派工人占普通工人的 21%到 46%。在上海，最初的保守派多数在 12 月底就蒸发了，因为叛军被认为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裴宜理和李逊 1997:85），而在武汉，保守派直到 1967 年 7 月的危机之前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实力，他们“百万英雄”的称号，与他们的人数相比，并不是一种夸张（王绍光 1995:135）。

青联、妇联的干部、职工，甚至车间主任、班组长，几乎是以集团的形式加入了“保守派”工人组织。普通工人除了随波逐流地投身其中，还能做什么呢？政治和安全干部都是“有威望”的人……工人们也习惯于服从他们。如果有人敢不服从他们，加入“造反”组织，后果将是严重的。他们会遇到一个强大的对手，并受到应有的惩罚。例如，很容易被调到一个不受欢迎的工作。诚然，工人占了大多数，如果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去反抗，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大多数工人很难通过自发的行动奋起反抗。因此，只有少数骨干分子能够胁迫普通工人成立真正没有得到群众真正支持的组织。（刘国凯 1987:75）

因此，政治网络带来的影响，可以限制加入造反派工人的数量，尽管它不能完全阻止这种团体的出现。这是一个前造反派的观点，但它很有道理，并得到了其他调查结果的支持，即许多最初加入保守派的工人，并不认为这是正确的事情，而是因为积极分子和劳动模范、下级干部、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了这里，从过去运动的经验来看，它似乎是最安全的地方（裴宜理和李逊 1997:76-7, 85）。相反，由于当造反派风险很大，这一派的领导人异常大胆，行动果决。他们：

有自己独立的看法，有巨大的能力去完成事情……。每个加入的人都有一定的自我激励；没有人害怕后果而不敢加入。因此，他们的核心成员较多，名义成员较少，其效果无法用数字来衡量。（刘国凯 1987:44、79）

造反派领袖之所以成为造反派，是因为他们是那种人，这听起

来很不靠谱，但是，在研究谁成为造反派和为什么成为造反派这个问题时，个性这种模糊的因素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裴宜理和李逊通过详细的上海造反派领袖传记，来探索工人的动员，这种“心理文化方法”的努力是值得赞扬的（裴宜理和李逊 1997：44-64）。

我们应该始终牢记，派系效忠不一定是不会变的，也不一定是明确的。刘国凯记录了在 1967 年夏天，造反派在城市中占据上风，广州的工人有可能加入郊区大工厂的保守派组织，而“在城市的家里，他们是‘造反派’的支持者”（刘国凯 1987：96）。在 1967 年和 1968 年的激烈战斗中，两派的命运发生了变化，许多不那么坚定的人，由于他们原来的团体不受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青睐而改变了立场（Walder 1996:179；裴宜理和李逊 1997:95），而运动的坚定参与者的数量也下降了，因为在许多人看来，参与的风险大于收益。王绍光对武汉的研究非常清楚地表明运动参与者的收益是递减的，特别是关于 70 年代的残余派别，它所涉及的人口比例远远小于 1967 年夏天的大战（王绍光 1995：251-9）。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尽管保守的工人组织与企业和其他地方干部有着明显的联系，但它们并不仅仅是这些力量的工具。大企业中大量有组织、有工会、有技术、有保障的工人，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包括加入保守派，确实有自己的真正原因；他们不仅仅是服从命令。例如，在上海，赤卫队举行罢工，抗议市政府对造反的合同工和临时工做出的让步，同城的码头工人提出了自己的“经济主义”要求，要求在合同工加薪时维持工资差别（Walder 1978:48-9；Wylie 1981:102）。这些保守的“经济主义”的爆发，后来被归咎于地方党派的操纵和煽动，但证据表明，这些要求的主要动力来自工人自己（Walder 1978:48）。

## 群众运动的兴起

我们已经看到，即使到了 1966 年秋天，企业干部也比较容易辩解，稳定生产的需要是镇压工人抗议的理由。据报道，戴小艾小组访问的广州仓库的叛乱工人在学生离开后，“遭到了管理层的严厉镇压”（Bennett 和 Montaperto 1971:62），理由是保障生产的需要，这使干部的行动合法化。企业领导人不愿意让学生干预企业的运动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担心“工厂里的不良分子在学生的煽动下也会变得不守规矩”（Bennett and Montaperto 1971:62）。这正是可能发生的情况，在一部分工人中积聚的不满情绪几乎不需要什么鼓励就能爆发成公开的叛乱。但是，在 9 月和 10 月期间，由于大力强调维持生产，防止学生叛乱者向不安分的工人提供任何支持，这一时期广州工人的抗议活动“动摇了，几乎完全消失了”（Bennett and Montaperto 1971:62）。

与被镇压的早期造反派工人相比，保守派工人在秋季的街头更为显眼，他们常常被省政府动员起来，进行示威，反对从北京分批到全国各地推动运动的学生红卫兵。虽然很明显这些工人的行动受到所在企业和地方党委当局的控制，但他们本身的任务热情可能也不可忽视。这时的红卫兵大多还是“红五类”（党的干部、解放军人员、革命烈士、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后代，其中干部出身的红卫兵尤为突出，尽管工人阶级在中国社会中具有理论上的领导地位，但这些学生对工人（相对于其他三类“红”而言，对工人和农民的后代）的态度往往是非常高傲的：

1949 年以前受苦最深的人（工人和农民）对解放他们的革命者负有感激之情。作为从革命干部的努力中获得最大利益的被动接受者，工人和农民并不具备为其解放者的

子女提供阶级教育的强大能力。(罗森 (Rosen) 1982:78)。

学生红卫兵对工人的庇护态度，以及膨胀的态度，可能鼓励了保守工人在这一阶段积极参与官方动员。

不断劝告学生不要进入工厂，让工人“解放自己”，不仅是出于对混乱的恐惧，工人和学生之间的冲突也是令人担忧的原因（《红卫报》1966年9月9日；《人民日报》1966年9月12日）。除了大型国营企业的工会工人和学生红卫兵，特别是北京的学生红卫兵之间有组织的对抗外，学生造反派在企业中也不一定受到抗议工人的欢迎。“许多造反的工人对来自厂外的一切形式的干预都抱有极大的敌意”（Andors 1977a: 165）。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使底层工人进行抗议的原因是，他们不断地被别人告知该怎么做；在文革期间，他们最不希望的就是被告知如何造反。

造反派的工人往往和保守派一样，对学生居高临下的态度感到不满，合作被证明是困难的。一旦工人被允许自由组织起来，从11月中旬开始，即使是那些欢迎这一发展的学生也有一些疑虑，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很快就不得不与工人分担领导责任”（Bennett 和 Montaperto 1971: 144）。文革将不再是“他们”的运动。在1967年初，工人团体仍然被用作学生争夺权力的门面（Bennett 和 Montaperto 1971:157），学生红卫兵与50年代中期工厂中的国家代表一样的无懈可击：

“十六条”指出。“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然而，广东省革命同盟会的一些领导人，却没有这样做。他们一接手某单位，就高高在上，对该单位的革命群众发号施令，告诉群众该怎么做……。他们甚至狂妄地说：“我们接受毛主席的命令，你们也要接受我们的

命令。”（1967年2月10日《广州赤卫队》）

当然，这种行为正是造反派工人所反感的。

1966年9月广州召开的红卫兵会议上，学生们同样要被提醒“尊重群众的革命建议和意见”（《红卫报》1966年9月9日），而不是简单地接管工厂里的运动并亲自指挥，这是学生团体的典型态度。中国的学生常常把自己看作是抗议运动理所当然的领袖，像1989年春天一样，他们回想起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及其在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尽管他们往往热衷于得到包括工人在内的社会其他阶层的支持，但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就是保护他们对运动的领导和指导，并认为工人只适合扮演辅助性角色，他们的作用是后勤支援，偶尔进行街头战斗力量，而不是思想或领导。由于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工人被排除在任何政治角色之外，因此，工人如此热情地使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sup>18</sup>的口号，甚至抵制倾向于支持他们的外部活动家的干预，决心充分利用这个前所未有的机会来组织自己，这也许并不奇怪。

1966年11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允许工人像学生一样参与运动，在工作时间之外交流革命经验，并成立自己的代表组织，工人的群众组织得到了官方的认可（Lee Lai To 1986:108-9）。这个决定被说成是号召工人参加，但实际上只是承认了许多城市已经发生的运动（L T White 1989: 233; Walder 1978: 28）。从10月初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派出的工作小组领导下的文化大革命的行为）的运动，开始鼓励更多的、更真实的群众参与到运动中来，因为它第一次明确无误地允许群众对党的领导人本身进行批判，并削弱了自初夏以来垄断文化大革命领导权的“红五类”的

---

<sup>18</sup> 参见《中国新闻分析》（China News Analysis）第711期（1968年7月7日：3-4）的记载，解放军在企业中重新执行纪律时，工人用这一口号进行抵制。

精英地位。

许多人起初倾向于把运动方向的这一变化看成是“好得不得了”（刘国凯 1987:36），特别是那些被收集到的“黑材料”，现在他们被告知这些材料都必须销毁。但当人们清楚地看到，这个指示在一些单位得到了实际执行，在那里，它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信心大增：“由于这个运动的广泛性……广大群众开始敢于起来。这大约发生在 1966 年 11 月和 12 月”（刘国凯 1987: 37）。在这几个月里，学生和工人“革命造反派”的队伍都在膨胀，造反派的队伍很快就把保守派的对手给淹没了。有了这种人数上的优势和政治上的动力，在 1966 年 12 月和 1967 年 1 月上半月，工人们利用运动给他们的自由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上级一个说法，而不必担心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刘国凯 1987:45）。他们把矛头对准了企业的干部，准备发泄前些年积攒的所有怨气，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 1956-7 年，这场运动很快就被打成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短时间内，出现了一场真正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它的势头使一些工人在 1967 年的“一月风暴”中，对企业内外的整个权力结构进行了全面的反抗。

### 经济主义和对合同工体系的攻击

党中央将工人对物质改善的要求称作“经济主义”，这清楚地表明它认为经济要求玷污了文革的纯政治斗争，它对此表示反对。经济主义一直是“列宁对失去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的善心态的蔑称”（裴宜理和李逊 1997:98）。由于对经济主义的大部分反弹似乎是对造反派的，所以一些评论家往往把经济主义运动和 1966 年 12 月—1967 年 1 月的造反运动混为一谈，但事实上，两派成员（以及不

属于任何一派的人)都热情地参加了运动,他们在其他团体胜利的鼓励下,利用当局的明显弱点,看看他们能得到什么(Walder 1996: 181)。各派之间唯一的区别是,保守派往往来自工人中较为优越的阶层,他们的行为往往是以经济主义的方式来试图保护自己的优越地位,抵御来自较贫穷者的挑战,而造反派则大多来自劳动力中特别贫困的阶层,如年轻工人、学徒,当然还有临时工和合同工。

裴宜理和李逊发现,造反派的领袖们大多不在乎要工资、旅行资金,或者接管空旷的国家住房,他们“小心翼翼地将(他们的)基本政治目标与物质主义的暴动区分开来”(裴宜理和李逊 1997: 117)。对这些人来说,政治目标比经济利益重要得多,而且他们很有政治意识,并热衷于让别人相信,他们在文革中坚持毛泽东的路线,以推进他们的目标。造反派的优先事项也不像有时所描述的那样是市侩的:大多数造反派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不是仅仅受到短期经济利益的激励”(王绍光 1995: 305, n.3),1967年1月的企业夺权浪潮就表明了这一点。

1966年12月在整个中国城市发动的群众运动,显然是无意中发动的,但几周后就遭到了普遍的谴责,包括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江青,她第一次看到合同制工人的要求时,似乎倾向于支持这些要求。造反派学生也经常站在运动的最前线,让工人放弃得到的让步,并归还许多人收到的拖欠工资(刘国凯 1987:48),敦促他们不要被企业和地方政府中的“资本主义反动派”的阴谋所愚弄,他们认为,这些反动派试图“贿赂”工资被拖欠的工人,将活动转移到经济要求,以此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们坚持认为,经济主义可以追溯到这些地方党政领导,他们首先煽动工人提出要求,然后满足他们的要求,从而扰乱生产,给国家造成损失,企图迫使北京的领导层妥协,因为文革现在已经开始威胁到地方掌权者自己的地位。

正如安德鲁·华尔德所指出的那样,许多西方关于文化大革命

的论述，部分或全部接受了这种经济主义的解释（Walder 1978:39），但这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工人对各种问题的不满和抗议实际上已经酝酿了数月甚至数年之久，而先前试图利用文革来提出要求的人受到压制，这只能增加压力。其实没有必要去寻找幕后操纵工人的证据，因为在文革初期的特殊条件下，对独立于党之外的组织的控制已经解除，领导人成为合法的攻击对象，工人们抓住难得的机会，提出自己的诉求，发泄自己的愤怒，为他们多年来受到的一些不公正待遇寻求补偿，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是群众发自内心的呼声，是千千万万人自发发出的呼声，没有事先商量……。没有必要去煽动他们，也没有必要帮助他们进入队伍。（刘国凯 1987:46）

干部们在这个时候决定对工人的许多要求作出让步，不一定是阴谋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让步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拒绝几乎是不可能的。工人没有得到他们依法应得的加班费或医疗补贴（刘国凯 1987:46），干部们没有正当的理由拒绝他们，因为这些要求很难被归为过分或“不合理”的要求。文化大革命使一些工人群体能够获得文件，证明并不是所有的工资拨款都被实际用于支付他们的工资：柯庆施在上海主政时，为了讨好北京的党中央而压低工资的案例已经被提及（裴宜理和李逊 1997:99），在哈尔滨也有类似的案例，造反派运输工人发现当地政府支付给他们的工资比交给他们的拨款少。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干部都很难拒绝补发工资的要求，事实上，工人们：

据报告，他们要求并收到了工资和实际工资之间的差额，并追溯到三年前。据报道，哈尔滨的运输工人每人收

到了大约 1000 元的拖欠工资，于是其他行业的工人要求并收到了类似的报酬。（Solomon 1968:13）

对作出让步的干部来讲，最坏的指责可能是他们屈服于一些真正不合理的要求，而不是向工人解释国家的困难，劝说他们撤回过高的要求。然而，考虑到运动的力量，这样的行动方案是否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似乎值得怀疑。毕竟，在 1957 年，工会高层官员和党内都曾提倡过同样的政策，当时工会干部能够和工人讲道理，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要放弃脱离现实的要求。在 1957 年的一个案例中，上海化肥厂的两名工会干部被抗议的工人架到黄浦江畔，为了迫使他们同意工人的要求，差点把他们淹死（裴宜理 1994:24-5）。就像官方工会授权的许多方面一样，这种处理不合理或过度要求的政策在理论上听起来不错，但在实践中似乎根本不起作用，特别是当干部面对“刚从暴力和……血腥的失败中走出来的工人群众，可能还拿着棍棒和石头，（而且）可能没有心情谈判”（Walder 1978:48）。

1 月最后几周对经济主义的攻击集中在资本主义反动派所谓的阴谋上，即通过给工人补发工资、奖金和串联<sup>19</sup>的交通费，来破坏生产，腐蚀工人的革命意志，但事实上，“经济主义的邪风”至少有一部分源于《人民日报》12 月 26 日的一篇社论。这篇文章在鼓励企业在文化大革命中掀起新的高潮，让工人阶级成为“主导力量和最积极的因素”的同时，也揭露了前几个月试图发声的工人的遭遇，并禁止企业干部今后采取类似的报复措施：

党中央规定：……工矿企业的领导不得打击和报复提出批评和揭露事实的工人，也不得降低这些工人的工资，不得解除这些工人的职务，也不得解除合同工或临时工的

---

<sup>19</sup> 即“联动”，到全国各地的其他单位，交流革命经验。

职务……凡是被冤枉为“反革命分子”的，必须平反。不允许调动生产中的任何岗位。对工人家属的威胁和迫害也是不允许的。被撤职和被迫离开工厂的革命工人，必须允许他们回厂参加生产和文化革命。这些革命工人在被迫离厂时被扣下的工资，都应该给他们。（《人民日报》1966年12月26日）

这些向因抗议活动而被解雇或被辞退的长期和临时工人补发工资的规定，为“经济主义”要求的进一步激增铺平了道路。

合同工和临时工尤其如此，他们是整个中国劳动力中最不满和最反叛的群体之一，大字报广泛报道了他们的代表在12月26日晚与江青会面，并得到了江青的全力支持。1967年1月4日广州的海报报道说，江青“谴责劳动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官员允许工农制度存在”（Solomon 1968:9）。刘国凯对工人代表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接待也有类似的描述。

12月25日，北京劳动部被上访者封锁。第二天，江青接见了上访者，当着上访者的面，她训斥了劳动部副部长奚占元。她说：“劳动部简直就是一个老爷们的部。国家虽然解放了这么多年，但工人们还是受了这么多的苦，真是不可思议。你们劳动部到底知道不知道？你的意思是说，合同工是后妈的后代吗？你也应该去当合同工！”说着说着，江青竟哭了起来。（刘国凯 1987:47）

这种支持合同工的消息，通过电话和海报“以闪电般的速度传遍了全国各地……。人们高兴极了，人们兴奋极了，他们准备掀起更强大的浪潮”（刘国凯 1987：47）。对工农制度的谴责继续出现在报

刊和大字报上，不过很快就出现了“经济主义”的反弹迹象，特别是对合同工和临时工的反弹：在后来与周恩来的一次会议上，合同工代表被告知，尽管工农制度有缺点，但为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工农制度还是要暂时维持的（Solomon 1968:10）。

有的海报指称，刘少奇和劳动部计划从 1967 年起停止雇佣长期工人，以后所有复员军人都要按合同制雇佣（Solomon 1968: 10）。其中第二项指控非常重要，因为复员军人组建了一些特别激进的文革群众组织，由于他们可以为日益激烈的运动带来军事技能，这引起了当局的极大关注。例如，在广州，1967 年 1 月中旬成立的八一战斗团，是最大、最激进的造反派组织之一，其成员大部分是现在在工厂或附近劳动服务站工作的复员军人（Hai Feng 1971: 61-2; G White 1980: 207-8）。这些退役军人中的许多人，是在大跃进期间和随后的几年里加入劳动队伍的，因此与早先的复员军人相比，他们处于不利地位（G White 1980:202），他们是“新工人”群体的一部分，在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他们的工资和条件，特别是工作保障，不如他们较有地位的同事。

大多数在 1955 年和 1956 年前后复员的士兵，在刚刚被集体化的企业和农场找到了有希望的新工作，但那些在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复员的士兵很难找到类似的机会。许多退伍军人抱怨说，地方官员没有给他们提供好的工作，也没有给他们的家属提供足够的福利。（Vogel 1969:342）

复员军人现在只能按合同制就业的传闻，使本来就处于弱势的群体失去了长期、有保障的就业前景，这就激起了那些觉得积极参与文革不会有什么损失的人的好胜心，这与工业劳动力中最有特权和保障的成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早在 1966 年夏天，广东就有报道

说，工农制度将推广到所有企业，所以许多工人很容易相信全民合同制的传闻。这个消息不仅使合同工和临时工很难转为长期工，而且会威胁到将来可能被纳入这一制度的工人。再加上最近大量的合同工和临时工因为文化大革命本身造成的混乱而下岗（Hong Yung Lee 1978:131），使得这些工人非常激进地提出要求，并在 1966 年 12 月初就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Hong Yung Lee 1978:137）。

工人“经济主义”要求的政治内容和意义，也许在合同工和临时工的反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虽然这种用工制度在为国家节约成本方面有明显的好处，但要在意识形态上给出理由，让企业对一群工人拥有如此全面的权力并不容易。对普通工人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公平，在他们看来，与其他人做同样的工作，但报酬较低，没有权利，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不是社会主义：

从合同工的角度看，这种制度显然是“反社会主义的”……。他们]没有资格享受附带福利，如医疗保险、意外保险、工作保障、退休金、病假等。而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一般由供需法则确定工资，工会保护工人的利益，对抗老板，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管理层强烈地追求利润，没有这种机制来保护合同工的利益。企业掌控着雇佣合同的条件……。在一些地方，管理层为了削弱合同工的地位，要求合同每月续签以此。（Hong Yung Lee 1978:131）

鉴于这种在工作场所完全没有权利和影响力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一位苏联观察家称工农制度为“一种强迫劳动”（Rozman 1985: 120）。合同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受到歧视，因为他们不仅被排除在工会之外，也无权参加职工代表大会等机构（Walder 1978:

45)。因此，受影响的工人很容易攻击这种制度，认为它“把工人分成两个阶层，制造分歧，瓦解工人队伍，消除革命热情，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Hong Yung Lee 1978: 131）。

60年代中期形成的劳动合同制，给企业管理层带来了明显的好处，一是经济上，二是加强了对工人的控制，因此工人们指责劳动合同制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工业七十条”强调“利润挂帅”、严格控制企业的表现，这很难以反驳。据报道，1967年1月6日，在上海举行的10多万临时工和合同工集会上<sup>20</sup>，工人们呼吁党“彻底废除不合理的合同工和外来合同工制度，建立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全新劳动制度”。《文汇报》的一篇报道把这些制度说成是“资本主义劳动就业制度的残余”（Solomon 1968: 11）。一月，红卫报纸上的文章赞扬了其他地方的工人农民，因为他们已经：

“摧毁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摧毁了他们伤害工人的合同工和临时工制度”。这个制度被认为是为了“筹集最大数量的廉价劳动力，榨取最大利润”。（Solomon 1968:11）

陕西的合同工也用类似的语言表达了这个问题：

“我们西安冶金电器工业建设大队 95%以上的工人都是临时工和合同工，我们和旧社会的同志一样吃了不少苦头”。文章称，文革开始时，西安的工人就要求废除临时工和合同工制度。据报道，省委领导回应说，这个制度是中

---

<sup>20</sup>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中国估计有 1000 万合同工，在一些企业中，他们占劳动力的 95%（李洪勇（Hong Yung Lee）1978: 130）。上海和广州一样，拥有大量的合同工，因为上海是区域性和全国性的轻工业和运输中心，而这些部门通常招募合同工。

共中央制定的，“但我们揭穿了这一点，说是修正主义者刘少奇制定的”。（Solomon1968:11）。

我们不知道工人们这样强调合同工制度与刘少奇的原因，也许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直接攻击整个党中央很危险，或许他们真的认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造成合同工制度的原因。刘少奇是这个制度的推动者，而红卫兵出版物，特别是劳动部造反派制作的出版物，给工人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来支持这一点，因此，工人们有可能“认为他们过去所遭受的苦难，是各级领导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而毛泽东领导的党中央仍然关心他们”（刘国凯 1987：46）。无论答案是什么，这显然符合工人和反对刘少奇的最高领导层的需要，刘少奇最终成为主要替罪羊。戈登·怀特（Gordon White）在讨论文革中的退役士兵组织时指出，老兵们“往往用‘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语言来掩盖派别要求”，掩盖了真正激励他们的“面包和黄油的问题”（G·怀特 1980:210），而工人们一般都有足够的智慧，对中共的群众运动方法也有足够的经验，所以他们也会玩同样的游戏。话虽如此，但很明显，在 1966 年 12 月至 1967 年 1 月，在工人群众运动的高涨中，他们也提出了重要的政治要求，这些要求是相当真实的，而不是为了掩饰政治上不正确的物质要求。

## 政治议程

尽管后来官方试图把 12 月和 1 月的工人行动描绘成只涉及经济要求，因而危险地偏离了政治性群众运动的真正目标，但很明显，工人们也提出了政治要求，而且即使是纯粹的经济要求也有一些政治内容和意义。裴宜理和李逊曾把经济主义的爆发描述为“工人正义

的呐喊”，“它把矛头指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运作中的不公正……在某些方面比造反运动的批评更为深刻”（裴宜理和李逊 1997:116-17）。临时工和合同工认为他们的工作条件本质上是反社会主义，这个例子表明，经济上的不满可以有政治内容，当然，许多工人早在 50 年代中期就已经意识到，他们的政治上级决定了他们所抗议的工作条件和工资（裴宜理 1994:29-30），这就使经济的纠纷有了政治内容。在文革初期，“修正主义者”和那些在工业界执行刘少奇路线的人，成为合法的攻击对象，给这次爆发的工人造反运动提供了新的动力，赋予其明显的反权威和政治特征。

雷蒙德·怀利曾指出，上海码头工人批评了用工制度和各类工人的区别对待，这不可避免地使人们对地方党委的权威产生怀疑：

由于党的当局与这种经济制度密切相关，工人们在经济上的不满往往表现为对党委政治权威的批评。同样，那些试图挑战党的政治权威的码头工人，也常常以工人阶级的经济不满为诉求，以获得支持（Wylie 1981:93）

工人与领导人的关系，是以往爆发的抗议活动的主要内容，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直接提上日程。对党和管理当局的常见指责是，他们“高人一等和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拒绝执行群众路线”，实施“使工人与工人对立”的个人奖金制度，以及干部“不愿离开办公室，避免体力劳动……享受高薪和个人特权，在任务和晋升中偏袒某些工人”（Wylie 1981:97）。经济上的不满是真实存在的，<sup>21</sup>但工人的抗

---

<sup>21</sup> 在中共稳定工资的政策下，大多数工人的工资自大跃进以来大致保持在同一水平上（Wylie 1981:99）；学徒被迫在极低的工资下接受三年的培训，而大多数人在六个月内就可以轻松地掌握他们的工作，这使他们成为广州和其他地方最委屈和最活跃的群体之一（Solomon 1968:21; Perry 1994:13）。

议经常集中在他们在企业中的地位和权利，以及“高度政治化的权威问题”（Wylie 1981:104）；也就是说，他们究竟是否是“企业的主人”。这并不奇怪，因为正是这个问题使工人在解放后立即与党和国家发生冲突，并在 1956-1957 年再次发生冲突。

对许多企业中的工人造反者来说，“分配问题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但权威和道德问题最终更重要”（Andors 1977a: 167）。反对工业七十条的僵化分工和对企业工人的严格控制，在造反派的工人运动中又浮出水面，因为“工厂办公室的职能人员制定定额，并控制着车间通讯和生产速度，这点燃了工人造反的火花”（Andors 1977a: 167）。在双百运动中，工人甚至无法控制机器的速度，他们所感受到的疏离感是如此明显，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种疏离感又是显而易见的，造反派工人迅速行动起来，“直接批判工厂高层官员”（Walder 1996: 177）。

道德进入了工人的考虑范围，他们不仅关注自己个人的物质利益问题，而且关注“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相对分配。他们抨击工厂内外的特权”（Andors 1977a: 168），以及干部腐败问题，文革早期阶段滥用权力镇压工人抗议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试图加强工人和干部之间理论上的政治平等和“同志关系”，主要是迫使后者放弃“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态度”，参与劳动，但在开始 9 年之后，进展甚微，在文革高度政治化的氛围中，干部是“领导者”还是“统治者”的问题变得更有争议。工人们关心的不仅是谁在工作中拥有权力，还有如何行使这种权力，“一种决策方法和工作方式。恶毒和势利是许多造反派的关注点”（Andors 1977a: 167）。他们一直被企业干部蔑视，但他们对此无能为力，直到文化大革命打破了“地方政府代表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所以是不可动摇的”神话（王绍光 1995: 80）。

在波兰工人叛乱的背景下，J·M·蒙蒂亚斯观察到，工人们往往避免公开的政治抗议和要求，因为他们很清楚这种行动的可能后

果，即迅速镇压和报复。然而，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政治和道德问题在工人的抗议活动中非常重要。（Montias 1981:182）

从〔工人〕的正式申诉和与官员会晤时正式提出的观点可以看出，正义和人的尊严——包括对工作条件和其他相关事项的发言权——实际上与价格、工资和工作时间一样，是事关波兰工人利益的基本问题。

中国工人似乎也持这种态度，强烈反对将他们排除在影响其生活的决策之外，并对干部表现出深深的不满，因为他们在处理与工人直接有关的问题时，表现得蛮横而傲慢。

鉴于这种对企业中干部行使权力及其行使权力方式的关注，以及对特权和缺乏责任感问题的特别关注，文革中工人最重要的问题，与中国社会的造反范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这种范式认为社会中对立的双方，是群众和少数有权力、享有特权、剥削工人的“红色资本家”（A Chan 1992:70）。因此，尽管只有少数人是积极的造反者，但工人对文革的参与不能被解释为是边缘性的，只关心狭隘的经济问题。然而，也不应该忽视支持经济要求的工业行动，它们本身可能具有政治意义。蒙蒂亚斯发现，在 1953 年至 1977 年期间，东欧和前苏联共产主义国家发生的 10 次重大动乱中，有 8 次“起源于经济动机引发的停工”（Montias 1981: 175）。

## 1967 年 1 月：夺权和反经济主义

正如在整个文革中周期性地发生的那样，党中央在关键时刻“发现”了一个群众组织编制的谴责经济主义破坏运动的文件。这是上海

一些造反派组织发表的“紧急通知”，1967年1月9日在全国广播，1月12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全国和地方报刊和群众组织自己的刊物，很快就被这场运动所占据，通知中的严厉措施揭示了危机程度：

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凡是破坏文化大革命和生产的人，立即由公安局依法逮捕……凡是违反上述〔反经济主义〕规定的人，立即按破坏文化大革命罪论处。（《人民日报》1967年1月12日）

除了叫停“串联”，要求偿还到其他单位和城市去的所有费用（必要时分期偿还，事实证明，要收回发给工人的钱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许多人干脆把钱花掉了，或者拒绝承认发给他们的钱是经济主义（裴宜理和李逊 1997:115-16）），文件还强调工人和干部要坚守岗位，每天正常工作8小时，并要求所有人员回到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此外，还冻结了企业资金，防止再擅自支付给提出“经济主义”要求的工人，并将“调整工资、补发工资和福利”的问题搁置到文化大革命的最后阶段，“以免转移斗争的总方向”（《人民日报》1967年1月12日）。

然而，很明显，尽管官方和非官方的批评声此起彼伏，但人们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工人的要求和抗议背后的感情力量，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认识到了它们的合法性。并非所有提出的问题都被断然否定，但是几乎所有问题都被推迟到运动的后期（《光明日报》1967年1月16日）。后来，上海对学徒制的条件作了一些调整，未加入工会的工人得到了与工会会员相同的福利待遇（裴宜理和李逊 1997:116）。临时工和合同工经常失去工作，可能会被送到农村，1967年2月被禁止成立自己的组织，但禁止对他们进行“阶级报复”，他

们被赋予了和其他工人一样的政治（而不是经济）权利，这表明他们的抗议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Solomon 1968:16）。

学生对反经济主义运动的热情，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1月中旬，电台报道说，在广州的一些企业中，工人对造反学生的攻击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上海，码头上的一些造反派领袖也对此作出了反应，他们试图劝说工人先集中精力推翻地方党，然后再转向经济问题，但许多工人认为，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并不冲突，可以同时进行。这个案例的特点是，少数人和学生一样，遵循中央制定的意识形态路线，而普通工人则不愿意放弃在他们看来非常合理的要求，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同样的分裂（Wylie 1981: 115-16；裴宜理和李逊 1997: 111-12）。

但经济主义并不是1967年初工人中真正受欢迎的群众运动的唯一表现。党中央同样关注的是“极端民主化”或“极端民主”的趋势（《人民日报》1967年1月12日；《光明日报》1967年1月16日），所谓“极端民主化”是指一些工人“反对、否定、排斥和推翻一切干部”的倾向（广州电台1967年3月31日）。到了3、4月份，“极端民主”变成了无政府主义（新华社1967年3月18日），这个词也是第一次被准确地使用，而不是被随意滥用的政治词汇。发出“广泛民主”的号召后仅几天，就开始攻击“极端民主化”，这表明国家的态度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导致这一转变的原因是企业中出现了夺权现象。特别是造反派工人，他们有的进行批判，有的干脆把工厂里的整个干部编制赶走，通过自己组建的新机构来掌握权力。

整个1967年1月，中央文革小组鼓励在省市一级进行夺权。夺权的形式包括巴黎公社模式，也有黑龙江的“三结合”模式上，后者很快成为官方政策，并作为全国效仿的榜样加以推广（《红旗》1967年3月1日：12-14），公社形式的主要问题是，作为一种激进的直接民主形式，它没有给党的领导作用留下空间（P N Lee 1987:

111-12; Walder 1978: 60-3)。三结合形式保留了一些现有的权力者和军事代表，能够在新的权力结构中拥有一定的地位，第三要素是群众组织的代表。1967年2月期间，党中央实际上禁止使用“公社”一词（上海的张春桥暂时例外），以消除这种直接民主的颠覆性思想，这种思想使所有的权力持有者都成为多余的，在官方对企业级权力夺取的反应中，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事情。

杨曦光在著名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中回顾了1967年的“一月革命”，庆祝夺取工业权力的成功：

并不是象官僚们在革命前吓唬工人们的那样，“没有我们，生产会崩溃，社会会混乱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实际上没有了官僚和官僚机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常出，铁道部垮了，运输照常进行，省委各部都垮了，各种工作照常进行，而且工人阶级的生产热情，主动性大大得到解放，工人们在一月份后已管理工厂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动，工人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一次是感觉得为自己而生产，干劲从来没有这么大，主人翁的责任感从来没有这么强，长沙纺织厂等地还创造了造反班等无数新鲜东西。

在“一月风暴”期间，生产不间断地进行，并达到新的高度，这显然是一幅高度理想化的图景。我们知道，大多数工人只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夺取政权，而且面临着保守派工人和军方（他们在1967年2月底之前在大多数情况下重新实行控制）的不断反对和攻击，而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之前，生产就已经受到相当严重的破坏，结果生产受到严重干扰，例如在1月份，有的武汉工厂的生产下降到目标的20%（王绍光 1995: 118）。不过，尽管有这些违反事实的地方，

但这段记载确实抓住了这一短暂的激进主义时期的一些精神。在党和解放军明确表示只能进行三结合式的夺权之前，工人们经常在报刊上受到赞扬，因为他们在企业中成立了新的“革命生产委员会”，采用了巴黎公社的选举方法，根据这种方法，代表可以随时被工人召回，而且没有特殊的头衔和特权（《人民日报》1967年1月14日和24日；新华社（上海）1967年1月15日）。

在官方报刊报道的一个案例中，官方赞许地指出，为了消除工厂的官僚主义，一个企业的所有前工作人员都被解除了职务，尽管他们有专长：

有的人提出，既然以前的工作人员在管理上很“精明”，那么可以留着他们来处理技术问题。但大多数人不同意，他们认为革命意味着与旧的完全割裂，完全开辟新的道路。必须拒绝任何和解与妥协的想法。于是，原职能部门的人员被解除了职务，到车间工作。（新华社1967年1月23日）

这种情况发生上海，是在放弃公社形式，改为三结合之前，也是在关注干部离职或被迫离职之前（《人民日报》1967年2月11日）。这种把所有干部都撤职的潮流，在大多数地方从未得到官方的认可，在上海也很快得到纠正，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频繁地强调，大多数干部（经常给出的数字是95%）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应该根据他们的全部记录来判断，而不仅仅是最近的几个错误。反复强调干部是“正确的”，这表明了工人夺权的力量，在这种趋势中，所有的干部都站在一边或被推翻。

关于一月革命期间广州一些企业造反派工人夺权的报道，尽量淡化了参与的人数和造反派从工人中吸引到多少支持，报纸的说法常常是“一小撮”闹事者（《广州日报》1967年4月2日）。但是，从

这些描述的细节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描述是在城市实行军管之后的），“一小撮人”不仅能够推翻现有的企业领导层，而且能够“蒙蔽”足够多的工人支持他们，使他们能够抵挡住保守派工人、积极分子和干部的反击，并且后者能够得到解放军的增援。在解放军重新控制局势之前，他们不得不进行几次攻击（《广州日报》1967年4月2日；广州电台1967年3月15日）。文化大革命的夺权阶段，和经济主义一样，暴露出学生和工人表面上站在同一阵营，但实际上存在分歧。在这一时期，凡是造反派工人扰乱正常工作的地方，学生可能会介入，实际上充当了罢工破坏者的角色；这种情况发生在广东的铁路上，学生在那里做收票员（广州电台1967年4月6日），在上海的码头上也是如此（Wylie 1981: 117）。

## 二月逆流和三月黑风：造反派的军事镇压

最初他们攻击地方政府和企业中的“走资派”，并发现毛泽东领导下的党中央不会维护他们，于是造反派就顺理成章地进行了下一步的挑战。在政府接近崩溃的时候，他们把关键的个人档案交给了军队，这些档案对造反派来说是一种威胁，造反派的敌人可以很轻易地利用这些档案，指责造反派是包庇坏阶级的“妖魔鬼怪”。于是，许多地方的造反派就把矛头指向了“旧体制的最后一根支柱”（王绍光 1995:118），对关押档案（和被捕同志）的军事设施进行突袭（Vogel 1969:332）。1967年1月，军队奉命去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但是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军队都支持保守派，而造反派的突袭和反抗，为镇压这个最激进、最麻烦的团体，以及在许多城市实施近乎戒严的法律，提供了一切必要的理由。

为了从政府的角度了解危险的所在，我们可以看看1967年2月

和 3 月哪些团体首先被禁止，受到最严厉的对待。对工人比对学生更严厉，这是显而易见的，也多次重复出现：广州大规模逮捕的第一个目标是“非学生分子的组织”（Zi Chuan 1977a: 8），根据戴小艾（Dai Xiao'ai）的说法，当军队开始打击控制了广东省政府的造反派联合会时，“职工……始终比学生附属机构受到更严厉的对待”（Bennett and Montaperto 1971: 166）。工人是第一批被逮捕的人，与此同时也有证据表明，在毛泽东于 1967 年 4 月赦免造反派后，工人也是最后被释放的。在长沙，不是学生的造反派，他们的刑期比学生要长得多（Jonathan Unger 1991a: 20），在广州，镇压解除之后，造反派的工人组织并没有像学生组织那样迅速地恢复（刘国凯 1987: 69），直到 1967 年 8 月，一份非官方报纸还描述说，他们只是在最近才恢复和扩大（1967 年 8 月 22 日 *Red Insurrection*）。

那些被取缔和打为反革命的团体，不仅造成了意识形态上的威胁，而且造成了组织上的威胁，这些被取缔的工人组织，是跨行业、跨产业、跨地区的（复员军人的组织和所有被打上“经济主义”标签的组织也被取缔（1967 年 3 月 1 日《红旗》）。合同工和临时工所构成的威胁，不仅在于他们光脚的不怕穿鞋的，非常好斗，而且在于他们很早就寻求成立全国性组织。人们经常观察到，当抗议活动局限于一个工作单位，或者局限于有限的地理区域时，中共可以很轻易地对付它们；当抗议活动冲破党的控制时，就很难在萌芽状态消灭。跨地区组织的威胁并不是中共时期的新现象：国民党在镇压有组织的工人时，首先要防止工会联合会的出现（Epstein 1949: vi）。解散跨行业和跨地区组织的规定，对造反派工人组织的打击特别大，因为他们依靠这些联系获得力量，他们在单个企业中往往是少数：“很少有人能在自己的单位里夺取政权，大多数人参加了全市、全省或全国性的活动”（刘国凯 1987: 79）。

毛泽东认为派系斗争尚未达到目的，并从 1967 年 4 月初开始恢

复造反派，这时出现了关于在“三月黑风”下如何对待参与被禁组织的人的说法。在广州，所有被禁组织的成员都受到严密的监督，必须在市公安局登记，后来有人说，在三月被逮捕的人比当局承认的要多得多（Zi Chuan 1977a: 8），而且往往没有逮捕证。当提到文革的暴力时，人们通常会想到群众组织的暴力，特别是1967年夏天的暴力，但在运动的许多阶段，国家使用武力也是一个同样显著的特征；经历过这些时期的造反者，特别是广州造反派的回忆录强调了暴力的残酷性（Zi Chuan 1977a: 7-8）。在1967年春天，受到报复的不仅仅是被取缔团体的领导人：普通成员及其家属受到各种惩罚，如上所述，八一战斗团是一个主要由退伍士兵组成的造反派工人团体，该团体被镇压：

八一战斗团解散后，所有成员被强行勒令投降、登记，并写出检查报告……。许多人的家被抄家，许多人遭到批斗和毒打。他们和妻儿普遍受到歧视和举报。有的人被解雇，有的人被调到其他岗位，有的人被扣了工资，有的人应得的福利待遇被取消。这使一些人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家园。（Steel August 1 1967年10月15日）

这些正是最初使许多工人不敢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报复手段。开除、调岗、扣薪、对工人进行批斗，这些手段对于那些经历过五十年代的工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而在文革的早期阶段，同样的手段也曾被用来对付工人。但尽管有了过去的教训，“经济主义”运动和一月革命夺权的势头，还是使工人在了解后果的前提下参与了有严重风险的行动和组织。

## “我们现在是工厂真正的主人”

工人们在1967年初夺取了他们的企业，人们常常声称他们终于以“主人”的身份行事，将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以此来践行社会主义原则。不过，这个激进的夺权阶段是短暂的，造反派“推翻管理层……的明确政治（议程）”（裴宜理和李逊 1997:29）暂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三结合形式——革命委员会，干部和军队占据主导地位。在“一月风暴”中被推翻的干部，许多企业中复职（王绍光 1995:127），党中央给工人的通讯强调了纪律、维持生产、效率、节约、保持八小时工作制、注意质量、与解放军合作、正确执行毛泽东的干部政策（即与95%的“好”干部或改正错误的干部一起工作）（《红旗》1967年3月10日:3-4）。三结合在许多地方相当于军管（王绍光 1995:127），很难看到企业管理的革命如何能够继续下去。

然而，在“三月黑风”期间和之后，来自中国各地工厂的记述表明，工人在工作场所建立了新的权威，这意味尽管著名的工人组织被取缔，许多积极分子被逮捕，但这并没有阻止企业管理和民主革命的势头。更大的权威问题以及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现在已经被排除在外，因为“极端民主”和推翻一切权威的做法受到了谴责，但在扭转七十条时代管理制度中一些比较不得人心的措施上，可能还是可以取得进展的，比如僵化的分工、不必要的、复杂的、严格的规章制度、排斥工人参与决策等问题。

据报道，在全国各企业的三结合夺权过程中，“造反派和革命干部联合起来，把一切权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并迅速开始在工厂里建立新的秩序”（新华社1967年2月21日），解决长期阻碍工人的官僚主义：

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执行的是一种十足的官僚

制度，扼杀了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一些领导干部坐在办公室里，就像高高在上的官僚。他们所做的只是发布命令，制定计划，沉迷于制定规章制度。分工太死板，成了干部与工人之间、管理科与生产科之间、一个车间与另一个车间之间的障碍。（新华社 1967 年 2 月 21 日）

这些官僚已经被一种新的行政人员所取代，他们被描述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开路先锋和生产中的模范工作者”，这些人具有“很高的政治素质”，是工人自己选出来的“真正的仆人”。

他们在工人中开展工作。计划人员到工人中去讨论他们的想法，得出的计划完全符合实际情况。而管理部门现在开始为车间服务，而不仅仅是“控制”车间……。一位工人表达了他的同志情谊，他说：“我们现在是工厂的真正主人。毛主席把管理权交给了我们，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好”。（新华社 1967 年 2 月 21 日）

我们在 50 年代就看到，选举制度的存在，并不能保证工人在选择干部时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当时的管理干部选举只是进行了短暂的试验，所以无论给工人提供了多大程度的选择，这种管理改革都是一种进步。

另一个被推荐效仿的例子是贵阳棉纺厂，在那里，工厂的二十二个管理部门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四个领导革命和生产的办公室，非生产人员的比例减少，工人特别是技术干部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现在他们“已经……到车间里去，和工人阶级一起生活、学习和斗争”。据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消除前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管理制度的邪恶影响。”但是，也有迹象表明，尽管说了那么多关于政

治挂帅、贯彻群众路线的言论，但在一些企业中可能实际变化不大，原因很简单，虽然“少数人”被撤职，但据说“许多革命干部参加了领导工作，建立了健全的指挥系统”（《北京评论》1967年4月7日：27-9）；换句话说，在许多情况下，差不多是同样的人在负责，纪律还在执行。

下一章我们将看到，即使这些关于工厂改革的描述是准确的，这也不一定意味着其他未被选为样板的企业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即使是在1967年上半年，关于进行中的企业全面变革的描述，也明显是公式化的，紧紧贴着《人民日报》规定的条款和原则；在双百运动时代的报纸上，带有地方色彩的语言，使工人的报道言论具有真实性，而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真实性是不存在的。裴宜理和李逊对此提供了一种解释：在工厂里，许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言论，无论是出版还是内部使用，都不是由工人自己写的，而是由企业中专门负责这个的毕业生或知识分子写的：“到1968年底，报刊上以工人名义发表的几乎所有内容，实际上都是由前（学生）红卫兵或激进的学者和记者写的”（裴宜理和李逊 1997:26）。总的来说，新的临时权力结构似乎包括了大量的干部，包括前领导层的成员，那些被选入新机构的工人代表往往是老工人、毛学家和模范，换句话说，是旧体制的代表。而且，他们是通过职工的“反复考察和讨论”选出来的，而不是通过任何形式的选举，更不是几个月前大力提倡的巴黎公社式的选举（《人民日报》1967年5月8日）。因此，在工人似乎没有在企业中获得多少实际权力方面。

## 1968年：造反派的衰落和“工人专政”的兴起

在1967年夏天，各派别之间以及造反派与武装部队之间，发生

了尖锐的战斗，这场战斗的烈度几乎相当于内战，这将企业管理和权力问题推到了一边。暴力的程度最终迫使党中央承认，迄今为止参与文革的群众组织，是由两个不同的、对立的派别组成，这种分裂贯穿于城市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包括工人阶级，这是这些群众组织最显著的特点。在公开声明中，这种分裂被平淡地认为是不必要的，是走资派欺骗群众互相倾轧的结果（《人民日报》1967年9月14日），但中共还采取了行动，迫使所有的群众组织结成“大同盟”，然后从这些组织中选出代表，参加暂时取代各级党委的革命委员会。

但在工人中建立“大同盟”的进展是缓慢的，一直拖到1968年春天，经济主义、临时工和合同工抗议等不良现象也再次出现（Solomon 1968:23；王绍光 1995:168-9），甚至在一些军管的工厂也是如此（广州铁路总指挥部 1968年2月；春雷战士（Spring Thunder Warriors）1967年11月25日）。中共试图说服、哄骗和威胁工人结成同盟，但却遭遇了明显的困难，其根源在于这次和以前的对抗中尚未解决的问题。造反派工人仍然坚决反对大批被罢免干部复职，反对解放军代表在革命委员会中的强大作用。中共担心干部继续受到攻击，所以它要求工厂车间采取消除对立情绪的通常措施，督促领导干部下到群众中去，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群众中，并表现出民主的工作作风，平等地对待别人（广州电台 19-21年10月19日和1967年11月21-2日传）。

这些劝告如果得到重视，在50年代中期也许会得到工人们的积极响应，但现在，经过18个月的文化大革命，事情已经走得太远了，这样的姿态根本起不到任何真正的作用。工人们现在并不是要求干部们痛改前非，给他们更多的尊重，他们已经把许多干部推翻了一次，彻底否定了他们的权威，并试图在短暂的时期内把自己确立为真正的“企业的主人”。此后，中央坚持恢复大多数干部的职务，遭到造反派的痛恨。许多造反派到现在也已经清楚地认识到：

他们的所有行为都必须落入某种只有上层人士才知道的轨道。那些不甘心扮演这种角色的人开始愤怒了。他们开始喊出口号：“我们要的是真正的群众运动，而不是被操纵的群众运动！”。（刘国凯 1987:115）

从最高领导层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危险的发展，也是他们转而求助于唯一还能依靠的机构——解放军的又一个动机，以便在必要时用武力镇压那些抵制干部复职的力量。

### 抵制复职与“极左思潮”

派系主义持续存在和攻击复职干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归咎于工人中“极左思潮”的重新出现（黄永胜 1967），这种指责有一定的道理。在 1967 年最后几个月和 1968 年上半年，左派思想在一些造反派中日益流行，极左“思潮”对广州工人的影响，导致 1968 年 6 月省电台呼吁粉碎“工人团体与思潮之间的非法团结”（广东电台 1968 年 6 月 7 日）。1968 年 1 月至 3 月间，由省无联提出的激进造反派宣言《中国向何处去》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它抨击“红色资本主义”的干部阶级进行剥削，并号召不要“走革命委员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Zi Chuan 1977b: 46）。地方上的极左派应运而生，如“八五思潮”，提出了“广东向何处去”的问题。（Zi Chuan 1977b: 46）与省无联的分析相呼应，这个思潮的成员在一次会议上指出，“目前的矛盾，是苦难最深的劳动人民、青年、合同工和临时工的基层（一方面），与爬上工人宝座的人之间的矛盾”（Hai Feng 1971: 330）。这一表述清楚地指出，存在一个剥削工人和农民的新官僚阶级，并将

这种思想与工人与干部的冲突联系起来，就像我们在1966年和1967年初看到的那样，这是工人抗议与文革中最重要的一个思想之间的密切联系。

1968年4月，《人民日报》在一篇关于企业中的革命委员会的文章表明，认为干部在企业中构成新的剥削阶级的思想，其危险性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在这篇文章中特别否认干部的政治权力是剥削阶级的权力。但告诫干部，他们的政治权力的无产阶级性质取决于与工人保持密切联系，成为“做官的普通人”，防范官僚主义、傲慢和压迫行为（《人民日报》1968年4月3日）。当年下半年，随着造反派对革命委员会“右派翻案”（即把被造反派打倒的干部纳入其中）的攻击势头愈演愈烈，官方试图进一步强调革命委员会具有独特的适合群众路线和反官僚主义的特点，革命委员会的代表是普通劳动者，没有特殊的特权；甚至有人声称，一些造反派对革命委员会的批评是民主气氛的证明（新华社1968年6月30日）。

官方强调革命委员会的地位是工人在文革中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的，是“红色政治权力”，因此批评这一机构是不对的，但广州的造反派工人团体非常明确地谴责旧干部接管企业新机构的方式，谴责他们和保守派都把造反派工人（和干部）有效地拒之于新的权力机关之外，不仅包括革命委员会，还包括1968年春夏组织的工人纪律小组，这个小组负责进行“阶级队伍的清洗”（《广州工人》1968年5月28日）。

当各工厂成立革命委员会时，造反派……受到各种歧视。例如，在广州钢铁厂和其他工厂里，一些造反派的领导人……被指责为有“强烈的派性”或“极左派”，不能参加“三结合”机关。在广州炼油厂成立革命委员会时，造反派集团的代表都被排除在委员会之外。（《广州工人》1968年

5月28日：9)

工人纪律小组的情况也是如此，造反派工人几乎完全被排除在这些组织之外，特别是被排除在领导层之外；据报告，那些加入的工人受到占据多数的保守派成员的骚扰。造反派还抱怨说：

除了受到政治上的攻击和歧视外，许多造反派还受到经济上的迫害，在广州造纸厂和广州造船厂，不断出现造反派工人被无理降低工资、无理取消困难补助的情况。（《广州工人》1968年5月28日：9）。

造反派在广州处于特别不利的地位，因为在广州，林彪的亲信黄永胜领导下的军方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此，在1968年期间，保守派占了上风，而造反派则受到残酷的镇压。但其他地方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武汉，1967年7月武汉事件后，造反派的势力已经超过了保守派，但随着新的权力机关的巩固，造反派的成果迅速蒸发。由于参加开展1968年“清洗阶级队伍”运动的团体需要良好的阶级背景，因此保守派在运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造反派又发现自己变成了嫌疑人。1968年至1969年初，武汉各级革命委员会都进行了改组、重新洗牌和整顿，所有的变化都产生了同样的效果：“造反派被保守派所取代，支持过造反派的干部被不支持造反派的干部所取代”（王绍光1995：208）。

各地造反派工人最关心的是旧干部复职。在他们中的许多人看来，过去两年的所有努力和动荡，在许多单位都没有什么变化。《中国向何处去》曾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不是要革除个别干部的命，而是要推翻企业和社会的整个权力结构，但现在看来，这种革命不仅没有成功，造反派甚至连旧体制的个别干部都无法除掉。广州工

## 人被迫得出结论

同一批人仍然掌握着实际的权力，而群众代表只是附属物……目前在广州，无论是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还是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不仅同一批人掌握着权力，而且工作制度也没有改变。（《广州工人》1968年5月28日：15）

所举的例子是，旧党委和政工部门、民兵部门似乎还在“新的红色政治权利”的框架内活动，据说“这些部门的一些人甚至现在还在搜集反对群众的黑材料”，有的还在企业里做了逮捕造反派头目的准备（《广州工人》1968年5月28日：13）。在企业中的“无产者”看来，他们又回到了起点。

##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1969年4月）

在1966年底和1967年初，党对组织的控制被解除，对党和行政干部的攻击被合法化，工人们利用这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力图解决多年来在他们中间积聚的所有不满，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权力或权威的问题以及谁才是企业真正的主人，这可以追溯到工人和国家之前的两次对抗。在文革中，工人们日益认为，干部不是合理分工下的一种工作，而是一个享有特权、进行剥削的阶层或新的阶级，并最终得出了结论，短暂地试图自己接管企业。事实证明，这一点和群众运动中的“经济主义”同样不能为中央所接受，运动很快又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造反派随后的斗争，永远不可能在企业的经营方式或权力方面实现任何根本性的改变，到1968年中期，他们的斗

争只是为了避免完全被消灭。

似乎很矛盾的是，当造反派的工人团体，特别是他们的领导人，正成为镇压的受害者时，工人似乎终于走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台，国家派遣工人宣传队进入学校和大学以及“上层建筑”的所有单位，以行使“全面的工人阶级领导权”。但必须记住的是：

只有“政治素质高”的工人才被招进宣传队。在广州这样的地方，典型的“保守派”粉碎了典型的‘造反派’，大批工人不仅被剥夺了行使“全面领导”的荣誉，而且成为清洗运动的牺牲品（刘国凯 1987:126-7）

“清洗阶级队伍”的运动针对的是前造反派工人，不仅如此，“一打三反”运动和针对极左派的政治迫害，包括虚构的“5月16日阴谋”，也针对造反派工人（Walder 1996:190-1）。在无产阶级的名义下，1968年是“一个49年以来最严重的镇压和恐怖时期”（Walder 1996:190），不是像术语所暗示的那样，由工人阶级进行，而是更直接地由军队和警察进行。”“文化大革命随着革命新秩序的实施而戛然而止，令人震惊”（刘国凯 1987:118）。同样，这种情况或许在广州最为典型。上文引用的广州造反派工人的报告，本来是想作为一个较长文件的第一部分，结果却没有时间让他们准备。1968年夏天，对造反派的最后镇压开始了，7月15日，编写报告的造反派工人联合会总部成为军方“扫荡”行动的目标；军队从大楼一层一层地打上去，有4人被流弹打死（Zi Chuan 1977b: 48）。

对于造反派工人来说，他们对企业经营方式问题的分析，被新的、左派占主导地位的党中央部分接受，这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安慰。在1968年期间，人们承认，干部在某些情况下已经成为侵占工人劳动成果的剥削、特权阶层，工人和干部之间的关系也因此从领导者

之间的关系，退化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人民日报》1968年7月9日）。但他们所指出的原因是刘少奇及其代理人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他们实行“经济挂帅”和物质奖励，使企业管理变得头重脚轻，造成党和人民、无产阶级国家和群众的分裂（《人民日报》1968年7月13日）。解决的办法是群众路线，密切与工人的联系，反对特权，裁减行政人员，成立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1968年7月13日）。这种表述显然代表了毛泽东在工业领域的路线对刘、邓路线的胜利，当然这并不一定代表任何工人群体的胜利，也不代表造反派中最直言不讳的人的胜利。

工业中的这类政策，毛泽东主义的政治挂帅和依靠群众摆脱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路线，即所谓的群众管理，在文化大革命的余波中一直存在，而且至少在纸面上一直延续到70年代；它们是1975-1976年“四人帮”和邓小平之间激烈辩论的主题。事实上，当讨论文革在工业界的持久影响时，通常指的是这一政策路线，而不是工人早期的自组织、“经济主义”和夺取政权的经验。在此必须区分文革本身的三年，以及1969年底到1976年四人帮主导的几年。前一个时期，许多工人都认为是广泛的社会民主化、言论自由、组织自由的高潮，但在后七八年中，虽然无处不赞美工人阶级的优越性及其在社会和政治中的领导作用，但这与工人的地位和影响的现实并不相称，工人似乎和中国社会的其他阶层一样，受到专制统治；事实上，在抗议这种统治的人中，工人往往是突出的。下一章将考虑这一时期的情况，考察被大肆宣扬的“群众管理的革命”究竟如何，并追溯1974-5年罢工浪潮再次爆发的原因，以及青年工人在1976年春天有可能打倒“四人帮”的抗议活动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

# 第五章 “人民万岁”：1969-1976 年的抗议与 不满

1969-1973 年企业旧干部的复职、

在 1969 年 4 月党的九大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说：

看来，除了进行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外，别无选择，因为我们的这个基础还不够健全。根据我的观察，在相当多的企业中，即使不是全部或大部分企业，领导权没有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中。（P N Lee 1987:111）

1969 年以后的几年里，人们经常重复这样的说法：现在大多数企业的权力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中”，但许多前工厂干部重新回到他们的岗位上，再加上没有任何有效的新机制允许工人参与企业决策，这使人们对变化产生了怀疑。造反派一直是最积极地要求改变权力结构，但正如上一章所看到的那样，他们日益发现，文革前的精英和受益者所开展的运动，是针对他们的。

从当时的宣传著作来看，文化大革命确实带来了一场工业管理的革命，这场革命使工人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处于应有的地位，与管理者和技术人员在政治上平等，能够为自己制定规则和制度，并在技术革新中充分发挥作用（Andors 1997b）。在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

过程中，非常强调依靠工人，《鞍钢宪法》再次被推崇为一切管理工作的指导原则（《光明日报》1970年3月21日；Andors 1977b）。这意味着工人参与管理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巨大的提高，一些研究者发现情况确实如此，他们认为工人管理小组等机构“试图发展组织结构，为群众参与管理工厂和发挥他们的力量提供最大的可能性”（Bettelheim 1974:43）。夏尔·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在北京六家模范企业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以此为基础，得出了研究结果，他认为新路线确实在中国的工厂得到了落实，中国正在向“多数人管理或群众管理”过渡（贝特兰 1974：70）。

但是，其他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大多认为贝特兰夸大了“变化的程度及其持久性”（Lockett 1985:5）：

一部分工人阶级运动要求对工业组织体系进行根本性变革，并得到了中央更加激进一些的领导人的支持，然而这些更为激进和平等主义的要求，早在文化大革命的悲惨历程之前就被斥为“极左主义”。（Meisner 1989:104）

在革命委员会的案例中，“通过选举从下层进行控制的表象，并没有制度化，因为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形式的重新选举”（Lockett 1985：15），这个屡见不鲜的问题，使工人无法对企业负责人产生强大的影响力。正如我们在 1956-1957 年的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中所看到的那样，没有代表定期改选的规定，往往是破坏参与性制度的致命因素。至于工人管理小组，“从 1973 年起，它们被置于改革后的工会的控制之下，到 1975 年，这种机构既没有贝特兰所预期的规模，也没有独立于管理层和党的自主权”（Lockett 1985:18）。

工人参与管理和技术革新的措施，似乎并不能说明工业组织和管理发生了革命，它们“充其量是改良主义性质的……”。大多数措

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逐渐被放弃，转而恢复文革前的管理权威、工厂工作规则和劳动纪律（Meisner 1989:104）。另一种“参与”，即干部和技术人员参与劳动的结果同样令人失望。这种参与已经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进行了近二十年，但仍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它产生了工人所期望的效果。干部参与体力劳动“也许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但（它）对参与者意识的影响，在短期内需要打上问号，而在长期内可以忽略不计”（Meisner 1989:104）。

在“清理阶级队伍”之后，文革结束了，前干部被“解放”，纷纷复职，造反派工人在 1967-1968 年反对这一政策，他们所担心的正是这个，因为它“逐渐侵蚀了文革的大部分影响”（Blecher and White 1985:111）。在一个企业里，情况就是这样：

前干部被“解放”之后，被安排在革命委员会中，他们的人数、技术和经验都超过了群众代表。随着单位恢复正常活动，政治事务越来越多地让位于管理和专业任务，此外，革命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失去了它的常委会权力，而常委会群众代表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他们的意见越来越被忽视，他们发言的次数也越来越少。（Blecher and White 1985:111）

这几乎与第一章提到的解放后成立的第一个参与性机关——职代会——如出一辙。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 70 年代初赞美《鞍钢宪法》，批评“七十条”，但是“七十条”的基本取向，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具体规定，已经压过了它们的反对者（P N Lee 1987:93）。

但是，虽然“工业机构的结构，以及既得利益者，在 60 年代初到文革之后的这段时期，几乎没有受到什么中断和干扰”（P N Lee 1977:87），但是我们不能说文革对工业或工人的生活 and 思想没有持

久的影响。文革期间，“工人和新干部明显地涌入地方政府机关”（Andors 1977a: 213），不仅在上海，而且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裴宜理和李逊 1997: 187），尽管事实证明工人或造反派干部更难在工作单位内获得或保持权力地位（王绍光 1995: 229-30）。而即使在工作单位内部，文革也使工人“在一些被排除在外的领域有了有限的发言权……从而宣泄了许多批判性思想”，也“减少管理部门在劳动纪律等领域的控制”（Lockett 1983:229-30）。那些抱怨 70 年代末企业纪律松弛和无政府主义的人，无一例外地将文革作为其主要原因，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尽管这种有害的影响来自 1966-1969 年的反叛，而不是四人帮在 70 年代对工人的影响。文化大革命的经历造成了管理层的合法性危机（Lockett 1983:230），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所有权威都遇到了合法性危机，尤其是在年轻工人中。那些在“一月革命”中推翻企业领导人的工人，对这些干部的复职方式（大多数情况下以军方为后盾）感到不满，并不断地和复职后干部斗争，一直到 70 年代。

即使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一些地区的动乱仍在继续，1969 年 4 月，武汉发生了“越来越广泛的野猫罢工”（王绍光 1995: 212）。在其他地方，士兵在企业无法保证正常的秩序和生产。

我们在前面看到，工人们急切地采用“人人解放自己”的口号，证明他们在文革初期自我组织的合理性，但这句话在 1968 年和 1969 年也出现了，其侧重点稍有不同，被工人用来抵制企业管理层和军队重新实施的纪律。干部责备青年工人持续迟到或旷工时，工人可能会告诉他们管好自己的事，因为工人只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从刘少奇实施的奴役工人的修正主义规章制度中“解放出来”（《中国新闻分析》711，1968 年 6 月 7 日；769，1969 年 8 月 15 日）。

文化大革命和 70 年代初颂扬工人意识形态优越性的激进言论，似乎产生了一些持久的影响，即使是无意的，因为它可以被工人利

用起来。领导层的口号虽然与工人从属于国家机器的现实不符，但当不满的工人以玩世不恭和完全消极的方式，用这些口号来给自己辩护时，例如为旷工或工作缓慢辩护，就很难进行反驳。尽管军队恢复秩序的运动十分严厉，但从 60 年代末开始，关于不守纪律和蔑视权威，特别是青年工人不守纪律和蔑视权威的报道比比皆是（从 1974 年开始上升到新的高度）：

国家用恐怖来恢复劳动纪律。工人们受到威胁，如果他们不上班就会被指控为反革命分子；无偿加班被称作“对毛泽东事业的忠诚”——这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是一个明显的威胁。（Walder 1996:194）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极端措施似乎是无效的。即使在各级党委取代了革命委员会，在企业中重新获得了忠诚的积极分子之后，也没有恢复到 1966 年之前的纪律和控制水平（裴宜理和李逊 1997：191-2）。

左派对旨在对工人进行“控制、制衡和压制”的规章制度的批评，特别容易被工人转为己有，因为它给了他们充分的意识形态理由，反对他们工作生活中的任何控制，并认为这是对他们革命自发性的侮辱，是对他们“解放自己”权利的侵犯。党的理论家们试图坚持认为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这与所谓的工人奴性服从完全没有相似之处，但这仅仅是贴上了一个“革命”的标签，并不能欺骗工人。他们可以玩同样的游戏，坚持说他们零星的出勤或缓慢的工作节奏，是在抵抗残余修正主义者的“控制、制衡和镇压”，是一种革命的表现。双方都很清楚对方的真实想法，但由于毛主义的语言限制，导致双方僵持不下。

讴歌工人在企业中的主人角色，似乎确实给了他们一个武器，

他们可以用这个武器来阻止企业公开恢复 1966 年以前的管理方法，尽管这种抵制总体上是不成功的；当然，它的另一个主要作用是，当工人发现“四人帮”不愿意或不能实现他们大肆赞扬的工业管理和组织革命时，对“四人帮”的怨恨油然而生。文革和 70 年代初的亲工人阶级言论，有利于工人在政治上提出自己的主张，在 1989 年的抗议中，虽然工人们很清楚工人不是中国的“领导阶级”，但当这一说法遭到学生活动家的抵制时，工人们仍然试图利用“最先进阶级”的地位，来夺取运动中应有的地位，而且在使用经典的亲工人阶级术语时，他们当然也没有拒绝。但是 80 年代的改革对他们不利，因此诸如“群众”或“工人阶级是最进步的阶级”这样的术语对他们和他们的拥护者来说，基本上已经失去了意义（Chan 1993:50）。总的来说，工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似乎让他们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地位有了新的自豪感，也让他们有了一种强大的阶级语言来挑战不受欢迎的政策”（裴宜理和李逊 1997:193）。

### 1974-1975 年重新出现的派别和工业动荡

1969 年春天，文化大革命似乎已经结束，但是许多人对他们所处的地位感到不满。群众组织的领导人短暂地推翻了对手，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但他们的对手很快就官复原职，除此之外，工人们还积压着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不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满只会变得更加激烈，他们会越来越多地寻找任何机会来表达这些不满。1971 年底，林彪突然去世，并被揭发为叛徒，工人第一次有机会要求改变文化大革命的结果，这导致军队的政治作用迅速减少，并从工厂撤出（Walder 1996:194）。但只要反“阶级敌人”和“极左”的运动还在进行，群众组织的前领导人和积极分子，特别是造反派，仍然要小

小心翼翼；林彪死后，全国各地关于造反派被释放的传言，只是个别事件（王绍光 1995：227）。但是，因为此前的活动家们很擅长利用中央的模糊言论和运动指示，掩饰自己的信仰和利益方面，所以他们很快就利用了下一个重大运动，即 1974 年的批林批孔运动（piLin-pi-kong）。

这场运动被描述为“最令人费解的”文化大革命遗留的谜团之一（裴宜理和李迅 1997:177）。在大多数的描述中，周恩来扮演着孔子的角色，而这场运动被解释为左派，特别是毛泽东和四人帮对周恩来、邓小平派的攻击。大多数普通人，包括以前积极参加群众组织的人，在 1973 年年中刚开始时，似乎对这场颇为玄妙的批判运动没有什么反应，但从 1974 年 1 月开始，有人进一步解释说，这场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反对：

一切敌视文化大革命的人。〔群众〕被敦促摒弃一切过时的规章制度，投入到运动中去。此外，还警告各级官员不要试图打击群众参加运动的热情。（王绍光 1995: 233）

对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是重启文革和实现目标的最好机会。不同单位的群众组织之间重新建立联系，进行串联（Heilmann 1993:9），除此之外，伴随着这场运动，出现了一波工业动荡和生产中断。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一些工人离开工作岗位重新加入派系冲突的结果，但也有工人故意施加压力以满足自己的要求，因为新的派系竞争“为劳工抗议提供了机会，就像文革期间的‘经济主义’浪潮一样，经常发现激进的言论与压制劳工要求的言论（与 1966 年或 1956 年以来被忽视和压制的要求相同）混合在一起”（Walder 1996:196）。

到 1974 年 4 月，许多地区的混乱，特别是重新出现的造反派，促使党中央采取行动来控制运动；在武汉，甚至出现了新的对军队

的攻击（王绍光 1995：240），尽管人数比 1967 年夏季的高峰期少得多。生产方面，一些省份的数字显示，1974 年前 5 个月的产量同比急剧下降（王绍光 1995：245），据报道，许多行业的工人进行了反抗（Heilmann 1993：3），其中铁路工人的反抗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他们以前曾有过激进主义的历史，而且他们有可能影响经济的其他部分。党的回应表明，他们认识到了这种威胁的政治和经济层面。1974 年 4 月发布的第 12 号文件禁止“自发的群众组织”和跨单位或跨地区的串联，还命令工人返还他们通过提出要求而得到的所有钱（王绍光 1995:242），这一行为让人想起 1967 年的反经济主义运动。许多工人提出与工资有关的要求并不奇怪：许多工人从 1963 年起就被冻结工资，不过他们在 1966-1967 年冬天的“经济主义妖风”中，通过抗争暂时得到了加薪。据报道，到 70 年代中期，上海对工人的福利服务也大为恶化；官方工会最近才开始重新运作，政治气候使他们很难提出任何形式的经济申诉。王洪文的新“上海工会联合会”，说明左派对任何带有福利工会主义味道的东西的敌意，事实证明，工会甚至比 1966 年之前更不愿意关注民生福利问题（裴宜理和李逊 1997:188）。

与 50 年代和 1969 年的文革一样，在这场新爆发的动乱中，工人们的不满并不纯粹是经济方面的，还有失望，因为文革没有改变他们的工作地位和影响力。1974 年上海码头上的工人们表示，令他们普遍感到气愤的是，当时 90% 或 95% 的干部已经回到岗位上，他们的行为往往和以前差不多，但他们却不断地鹦鹉学舌，认为真正当家作主的是工人。

我们区的领导总说要依靠群众，但工作开展时却忘记了群众。这就是我区这几年来变化不大的原因所在。领导层没有把工人看成码头的主人，而是看成吨位的奴隶。

(Wylie 1981:123)

在某种程度上，企业管理层可能陷入了工人期望值不断提高的陷阱：工人因文革而获得的工业管理方面的让步，在 20 年前甚至 10 年前可能会让他们满意，但在文革标志性的自主集体行动和夺权浪潮之后，这些让步被认为是不够的。

此外，还可以明显地看到，工人们不愿意忍受不满意的状况，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诉诸于自我组织和独立行动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得多；与同一企业、其他单位、其他地区的联系可以迅速恢复，工人们在重新建立这些联系时，并不像 1968-1969 年大量下乡的学生那样面临困难。即使是“被管理的参与”（Strand 1985），比如把工人组织成学习小组，为官方运动准备大字报，现在也可能对党产生反作用，因为参与者很可能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情况发生在 1974 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和 1976 年春的四五运动中（Heilmann 1993:15）。

此次运动的另一个标志是强调干部特权和“走后门”的问题。实际上，1974 年 1 月，一场反对这种现象的官方运动就已经发起，据说它得到了民众的热烈响应。事实上，这场运动是过于受欢迎，很多文革后被平反的人并不喜欢，它只进行了一个月就被叫停，理由是它干扰了同时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Heilmann 1990:32-3）。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从 1974 年 4 月起，批林批孔运动本身就被遏制了，以保护生产为由重新被各级党委牢牢控制（王绍光 1995: 245）。但干部特权及相关问题不会消失。1974 年的夏季和秋季，广州发生了“沸腾的城市抗议”（A Chan et al. 1988:8），其中很多内容让人强烈联想到文革期间的造反派抗议。白云山事件是一系列抗议活动的高潮。

十几万人的群体，主要是工厂工人和被派到农村定居的青年，他们登上白云山，表面上是按照中秋节的传统祭奠祖先。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利用这个机会抗议干部特权和其他不公平现象。（A Chan et al. 1988:8-9）

其他关于这些事件的记载也提到，有复员军人参与其中，他们的不满情绪和工资有关（Zi Chuan 1977f: 23）。

1974 年秋天，广州还张贴了著名的李一哲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这份文件在四五运动和民主墙运动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篇小册子又回到了文革抗议的一些主题，即新的官僚统治阶级或“新贵族”的存在，以及普通人无法像理论所说的那样，行使民主权利和参与政治。它特别担忧干部与普通百姓之间的不平等（陈一阳等人 1988:77-8），还提出了长期冻结工资和工人缺乏物质激励等问题（陈一阳 1988:82-3）。政治和经济问题的交织，已经成为工人抗议活动的特点，并延续到四五运动、民主墙和 1989 年民主运动中。

从所有这些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从 70 年代初到 70 年代中期，青年工人的关注点和想法，与 1967-1968 年并没有太大的不同，这说明就特权较少的工人而言，主要的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仍然可以成为大规模抗议的原因。文革以来政治上缺乏进步，加上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工人中产生了普遍的不满，这在 1975 年夏天杭州的动乱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二十几家企业突然罢工，在最严重的时候，政府派了三万名士兵才结束罢工（Forster 1990:218）。经济问题显然是杭州动乱的重要原因：在一些论述中，工资纠纷被强调为原因之一，更普遍的是工作条件问题（特别是在当年夏天异常炎热的天气中）、福利待遇差、干部对参加体力劳动的抵制，所有这些都使工人“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不公正和不平等”，也感受到了剥削（Andors

1977a: 234-5)。

然而，Keith Forster 指出，到 1975 年中期，这些不满是全中国产业工人的共同心声，他从杭州再次发生的派系斗争的细节中，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杭州动乱的范围和严重性的理论，反对王洪文采用破坏生产的阴谋，以诋毁他在地方领导层中的对手（Forster 1990:226-8）。不过他也承认，使用军队的目的是为了全面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和不满者”（Forster 1990:219），自 1967 年以来，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企业中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人，他还表示，后来所谓杭州青年工人劳动纪律明显改善的说法，显然是大大夸大了实情，因为许多人继续随心所欲地进出工作岗位（Forster 1990:224），仍然从八小时工作制的束缚中“解放自己”。另据报道，杭州工人在 1975 年及以后的几年里，甚至组织了独立的工会（Chiang 1990:93）。

总的来说，到 1975 年底，大多数工人已经开始反对“四人帮”的紧缩政策和政治激励政策，而邓小平之所以重新回到最高领导层，是由于他的物质激励政策，他在其他经济问题上的务实路线，以及他所代表的稳定和结束大规模政治冲突的希望（裴宜理和李逊 1997:188；王绍光 1995:254-5）。在大多数地方，只有少数顽固的造反派领袖仍然坚持他们的左派立场，只有在上海，“四人帮”才有社会基础（裴宜理和李逊 1997:192）。从“四人帮”的宣传机器来看，在文革十年结束后，工人的力量和政治意义都达到了顶峰，但就像“四人帮”的许多“路线”一样，实际上只存在于《解放日报》的专栏。“四人帮”的工业路线与邓小平和周恩来的路线相比，一个是无权无钱，另一个是无权有钱，在经过十多年的斗争和强制紧缩之后，大多数人选择了后者也就不足为奇了。当 1975 年 11 月四人帮发动了一场新的反对邓小平“右派偏离主义”的运动时，大多数人对重新陷入混乱和派系街头斗争的前景感到惶恐和沮丧（王绍光 1995:254-5），但很少有人敢于直接反对新的运动。然而，随着 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

来的逝世，这种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民众的反应是四人帮下台的重要转折点。

## 1976年四五运动中的工人<sup>22</sup>

四五运动在几个方面是不寻常的，特别是它的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性质。在运动结束后，人们指责邓小平策划了这场运动，以此挑战“四人帮”的挑战，但从来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相反，参与者和许多观察家都强调，“这场运动的意义和重要性在于它来自基层，而当时这似乎几乎是不可想象的”（Heilmann 1993:17）。它也在从双百运动开始的民众抗议活动中脱颖而出，因为在大多数地方，这场运动是由年轻工人而不是学生主导的，而且它与众不同地强调高层政治问题，而不是更接近家庭的问题。到了1976年，党的高层领导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工人的关键问题，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反对的很多东西，都来自于领导层反对物质激励和福利主义的左派教条。这个运动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它起了作用，因为它帮助推翻

---

<sup>22</sup> 1976年3月底和4月初的抗议活动，包括著名的北京天安门事件，在中国被称为四五运动。这个词的优点是不意味着运动的地理范围仅限于首都。关于其他城市的运动，见 Philip Williams, "Some provincial precursors of popular dissent movements in Beijing", *China Information* 6, 1 (Summer 1991:1-9); Keith Forster, "The 1976 Ch'ing-ming Incident in Hangchow", *Issues and Studies* 22, 4 (April 1986:13-33); Sebastian Heilmann, *Nanking 1976: Spontane Massenbewegung im Gefolge der Kulturrevolution, and 'The social context of mobilization in China: Factions, work units, and activists during the April Fifth Movement'*, *China Information* 8, 3 (Winter 1993-4:1-19). 威廉斯指出了某些省级抗议运动与天安门事件之间明显的因果关系。关于天安门事件本身的意义，以及它与支持或反对周恩来的感情之间的关系，见肖平（Xiao Ping）《中国民运的兴衰》，原载于地下刊物《野草》1983年，译载于《问题与研究》（*Issues and Studies*）22, 1（1986年1月：157-8）。

了“四人帮”，阻碍了毛泽东去世后的左派接班人，反而促进了邓小平上升到最高权力。这是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的最低目标；一些人有更进一步的、更激进的议程，从清除四个可恨的左派分子，扩展到对 1949 年以来党的权力如何演变的系统性批判。

1976 年的抗议活动始于各省，并以 4 月 5 日的天安门事件在首都达到高潮。在周总理逝世后，许多中国城市的活动家（通常知道在中国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开始计划在 4 月 5 日（Williams 1991:2），即清明节，举行非官方的集会来纪念他。事实上，天安门广场上的许多花圈都是在 4 月 4 日或之前摆放的，4 月 4 日是星期天，因此大多数人都是休息日。4 月 3 日和 4 日是周末，前往广场宣读悼词和献上自己的花圈的人数达到了高峰，约有 50 万（Heilmann 1993:6），广场上的悼词被连夜搬走，引发了第二天的暴力骚乱。

悼念周恩来的政治色彩非常明显，尤其是对“四人帮”而言；对周恩来的赞美是对他们的暗中攻击。四人帮对媒体的控制，特别是在上海，使他们能够在周恩来死后的几个月里，对周恩来进行或明或暗的攻击，而正是这些攻击在一定程度上煽动了一些城市的舆论，以至于以大字报和街头演讲的形式对四人帮进行公开的批评。1976 年 3 月中旬开始，一些地方开始直言不讳地反对四人帮，进行抗议，南京就是其中之一（Williams 1991:2）。海尔曼指出，最近中国人对四五运动的描述一致认为，运动是从南京开始的，然后被带到北京（Heilmann 1990:69）；最早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口号之一是：“我们决心支持南京人民的革命斗争”（Williams 1991:2）。

南京事件的消息大多不是通过官方媒体传来的（虽然发给党委的谴责南京抗议活动的指示，在这个群体中起到了宣传南京事件的作用（Heilmann 1990:72-3）），而是通过积极分子之间的非正式接触，也是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即在火车上，特别是去北京的火车上写口号或贴海报。这些来自南京运动的“流动广告牌”最早于 3 月 31

日开始运抵北京，据海尔曼说，在4月的头几天，这种广告牌非常多，以至于车站工人都顾不上清理它们（海尔曼 1990: 70-2）。学生和铁路工人合作，用柏油涂抹标语，使其无法被洗掉（Garside 1981:113; Heilmann 1993:10）。同样涂有标语的火车从杭州抵达上海，上海是四人帮的大本营，杭州是1976年大量活动的地方（Forster 1986:22），也是1975年被解放军镇压的严重工业动乱的地点。

其他发生重大“四五事件”的城市包括太原、郑州、武汉、西安、洛阳、安阳和开封（Heilmann 1990:74, 88; 1993:5; Forster 1986:17; Williams 1991:2），在这些事件中，大多数情况下，就像天安门事件本身一样，运动的骨干由青年工人组成。南京的运动在这方面略有不同，因为它起源于学生，但得到了大量工人的支持。南京一直有一个特殊的工人和学生合作的传统，这种传统甚至在文革期间也一直延续着，许多青年工人养成了下班后到南京大学校园看海报、了解其他地方新闻的习惯。这种情况在1976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左右又开始出现了（Heilmann 1990:60-1）。

在北京，1976年3月和4月，学生的身影少了很多，在“天安门事件”期间，由于学校锁上大门，并派人在校园里巡逻，学生们有时被阻止参加纪念或抗议游行（Heilmann 1990:88, n.3）。这让人联想到1970年12月格但斯克和格丁尼亚阻止学生参加工人抗议活动的策略（Laba 1991:30），但那里的关键措施并不仅仅是把学生关在教室里，而是为了让他们离开城市，让他们提前开始圣诞假期。在北京和波兰的案例中，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学生冷漠在起作用，或许也意识到了政治行动的风险。在那些必须证明自己的左派资历才能进入大学的学生中，也还有人支持“四人帮”，而且在当时的紧缩政策下，这些学生还不必谋生，他们仍然对激进的毛泽东主义抱有信心：据报道，一些确实去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发表了反对周恩来的言论，并被殴打（Garside 1981:130; Heilmann 1993:6）。参加运动的

青年工人和学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最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经历；许多人也熟悉广为流传的李一哲的小册子《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Williams 1991:3; Zi Chuan 1977e: 41)。<sup>23</sup>有很多前红卫兵，既有造反派 (Heilmann 1990:88)，也有保守派 (Heilmann 1993:3-7)，许多参与者也从 1978 年开始积极参与民主墙运动。

因此，四五运动与文革的思想和行动形式具有高度连续性。但在 1978 年之后，天安门事件被邓小平政权说成是支持已故的周恩来和他的学生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也隐含着反对毛泽东）的自发群众行动；它首先被描绘成民众对文革的拒绝。青年工人确实是在拒绝 1969-1976 年的经历，对于 1966-1969 年参与群众组织的人而言，他们也在摆脱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正如魏京生在 1976 年 4 月的评论中所表达的那样：

自文革开始以来，我们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起初，人们愤怒地站起来捍卫这个造成他们痛苦的人。他们反对奴隶制度，却崇拜它的创造者。他们要求民主权利，却鄙视民主制度。他们甚至试图用独裁者的思想来赢得民主权利。最终人们认识到了他们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他们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人在 1966 年像傻瓜一样站在天安门，在那个剥夺他们自由的人面前流泪，而在 1976 年他们勇敢地回到原地反对他。(Garside 1981:277)

---

<sup>23</sup> 也可参见 Stanley Rosen 关于海报阅读状况的评论 (Rosen 1988:8)。即使实际阅读过海报的人数不多，但对它的讨论无疑是广泛的，特别是在广东，李一哲思潮的成员有时似乎被允许利用批斗会来进一步宣传他们的观点，在他们于 1979 年被正式平反之前就是如此。(A Chan et al. 1988:13-14, 109-14)。

但是，正如魏京生的话所暗示的那样，他们当然不是拒绝文革初期的反叛精神和对权威的质疑，也不是反对行使自己的政治表达权（当时是第一次，仍在人格崇拜所允许的范围内）。他们中的许多人，把这种政治自主和组织看作是文革的积极遗产，尽管文革运动带来了种种残酷、苦难和破坏（刘国凯 1987:140）。

四五运动的海报毫不含糊地表明，1976年民众对“四人帮”抱有深深的敌意：当时贴出一张海报，指名道姓地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还是一种了不起的大胆行为，但在南京的几张海报上，张春桥被点名了（Heilmann 1990:63）；更多的海报作者用暗喻和同音双关来掩饰对“四人帮”的攻击。但是，从这一点出发，把“四五”说成对1966年至1969年文革群众运动阶段的否定，则是错误的。1976年4月人民对前“走资派”的尊重和支持，就像他们对左派的排斥一样明显，但正如上一章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也要注意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民众对某位领导人的支持。虽然参与这些高层权力斗争的人有一个目标，即要求尽可能多的群众支持自己，但使群众参与文革和四五运动的社会力量，比“两条路线的斗争”所允许的更复杂。

如前所述，“四五运动”的参与者，无论是青年工人还是学生，都在文革中活动过，并受到1974年李一哲大字报的影响。李一哲大字报谴责中国新的官僚统治者和“中共极左主义和无法无天的专制”（Williams 1991:3），特别是针对“四人帮”。红卫兵之前是反对走资派的，因此反对邓小平和周恩来，但是到1976年，示威者攻击“四人帮”，而赞扬周恩来和邓小平，而四人帮在当时是高层权力斗争的胜利者。对于青年积极分子这种明显的180度转弯，Xiao Ping作出了解释。

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选择了毛泽东暂时倡导的造反和反对官僚主义，而不是选择周恩来的保守主义和维持

现状。1976年4月，与“四人帮”的极左主义和专制相比，周恩来的路线得到人们的支持和憧憬。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周恩来，在他们的外在情绪背后，这些人都在与特权官僚阶级的专制主义作斗争。（Xiao Ping 1986:162）

王希哲（李一哲集团四人之一）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将天安门事件描述为：

一个自发的民意调查……一个真正的人民选举……。  
这是人民重新夺回已经与人民日益疏远的党和国家的勇敢尝试。这不是“四人帮”篡夺政权造成的意外。它只是对社会……对我党与人民疏远的暴露和验证。（王希哲 1979a: 148）

换句话说，人民的行动不仅是为了反对“四人帮”，而且是为了反对这个以他们名义行事的党，反对缺乏控制党的手段的事实，由于缺乏这种控制，他们自己无法“召回”“四人帮”。四五运动的参与者以此向党内那些不支持“四人帮”的人发出了警告，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党与人民的关系需要彻底改变，否则就太迟了。这是对领导层的指责，他们在民众渴望变革的情况下，让四人帮的影响（当然有毛泽东的默许或至少是宽容的支持）持续了这么久。

邓小平重新掌权之后，党的领导层把前文革造反派当作四人帮的支持者，但事实上，在1974-1976年，他们是四人帮最大胆的挑战者之一（Williams 1991:4; Chan 1992:72-3）。四五运动是他们展示自己在文革中所学到的东西的时刻，让党内温和派注意到，在他们不能或不愿行动的地方，人民现在已经准备好并愿意自己动手。王希哲指出我们应该注意，抗议活动是自下而上和自发的：

运动的先锋和主力军大多是青年工人。这就像一个巨大的路标，表明整整一代产业工人已经有了社会主义意识和文化的成长。在无产阶级事业最危险的时候，在机会主义政客胆战心惊、战战兢兢、不敢说话的时候，不正是他们挺身而出，维护人民的福利，表现出了他们管理社会的巨大能力吗？（王希哲 1979a: 154）

在四五运动中，有许多对蔑视和咒骂“四人帮”的言论，也有许多尊重和支持邓小平的言论（他被认为是周恩来改革方案的继承人），但最引人注目的口号，是“人民万岁”（Garside 1981:130; Forster 1986:21），这是毛泽东 1966 年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红卫兵集会上说的一句话（Forster 1986:31），它在整个运动的不同地方反复出现，并且没有表达对权力斗争中任何一方的支持，它不仅被人民用来反对毛泽东和“四人帮”，而且用来反对党的领导层中任何认为可以无视人民意愿的人。

### 从四五运动被镇压到四人帮倒台

四五运动没有像 1978-81 年和 1989 年那样，向非官方出版或自治组织的方向发展，在这出现之前它就被镇压了。但是，在 4 月 5 日天安门广场被强行清场之后，也出现了一些与自治组织相关的建议，比如一个北京工人提出的“保护周总理全国委员会”（Garside 1981:135; Heilmann 1993:16）。4 月 4 日，广场上成立了一些临时的小团体，在第二天，由于报复行动明显迫在眉睫，“青年工人和中学生临时联合起来，充当诗歌作者、演讲者和其他著名活动家的保镖，

试图保护他们免受秘密警察的伤害” (Heilmann 1993:16)。鉴于抗议者有许多参与过文革的群众组织运动，因此我们认为四五运动如果再持续几天，很可能会发展出自己的自治组织。

关于四五运动中被杀、受伤、被捕、入狱和被处决的人数，数字很粗略，但大多数城市现有的统计数字表明，在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被捕的人数最多 (Forster 1986:29; Heilmann 1993:11-12)。据估计，北京共有 100 多万参与者，他们来自各个社会群体，南京有几十万人，在杭州、西安、洛阳、太原等其他城市也有几万人 (Heilmann 1993:7)，其中大部分是工人。运动中最直言不讳的积极分子为数较少，但工人在其中也占多数 (Heilmann 1993:11)。

众多工人公开反对“四人帮”的原因包括：经济和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工业士气降到历史最低点，但是却不得不在无休止的政治学习会上，被灌输教条主义的毛泽东主义 (Garside 1981:85)。年轻一代参与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是因为他们在经历了 60 年代末后，最有挑战权威的准备，追求自己的信仰和利益，而且他们没有经历过 1949 年以前的糟糕日子，因此并不崇拜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就 (Garside 1981:86)，在他们看来，中国社会主义充其量只是在他们的生命中打上了时间的烙印。但是，尽管经济状况引起了工人对左派领导层的不满，是一个很重要的诱因，但经济要求本身在运动中并不突出。在南京的一个案例中，人们提到了工资问题，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它的重点是指责偏袒、伪善和不平等。南京的工人们听到了来自长江下游的传言，说在四人帮的大本营上海，工人们得到了加薪，但没有公开，而此时四人帮还在向全国其他地区宣扬平等主义和节俭的美德 (Heilmann 1990:44, 62-3)，这也激发了他们的抗议。

四五运动大多数都是围绕着工作单位 (workunit) 来组织的，往

往有来自工会、管理层甚至党的企业干部的参与，或者至少是不干涉。工作单位可以迅速动员大部分劳动力；一个单位 50%以上的人参加运动是很正常的（Heilmann 1993: 9）。但这种形式的“细胞抗议”也把运动分割开来，抑制其更广泛的发展（Heilmann 1993:9-10）；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局最关注的是跨单位和跨地区的行动，一个单位内部的抗议则容易处理得多。然而，1976 年有几个跨单位合作的例子，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城市，尽管 1974 年以来地方派系斗争重新抬头，但前造反派还是能够与前保守派合作，至少是暂时的（Heilmann 1993:6-7, 16-17, 19）。

70 年代初的运动非常成功，大量的人被迫承认基本上是虚构的政治阴谋，并将其他人牵连进来，但是这次运动则恰恰相反，人们并不急于告诉政府四五运动的参与者，或在运动中产生的材料，例如许多人在运动过程中抄下的对周恩来的诗词和悼词。一些派系的清算确实发生了（Heilmann 1993:7），这并不奇怪，但许多人表现出一种反抗政府的崭新意愿，他们把文件埋在院子里或郊外，有时还秘密地编纂文件集，这些文件集开始成为中国的地下读物（Garside 1981:136），为民主墙运动中的民刊提供了一个先例。墙上的海报似乎是为了纪念周恩来的逝世和天安门事件，而 1978 年 11 月开始的民主墙运动被许多参与者视为四五运动的直接延续（Seymour 1980:7, 77, 85, 155, 267）。参与者为他们的运动感到骄傲，他们不会让运动受到谴责或被遗忘。

文革削弱了干部的权威，由此产生了反抗，这种反抗也反映在 1976 年夏天的持续动乱中，据报道，武汉、南昌、保定、四川和西安都发生了罢工（Garside 1981:138; Walder 1996:468-71）。尽管这种动乱的大部分在表面上是派别主义的，但在许多情况下，工人们是在利用派别运动作为掩护，来发泄对工作场所的不满和对干部的敌意（Walder 1996:468-71）。民众大规模反对“四人帮”，甚至得到

许多下层干部的支持，他们自己也希望邓小平而不是与“四人帮”有关的人接任舵手，因此四人帮的地位仍然岌岌可危，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此后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及其许多同伙被逮捕。这引发了可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自发聚会，被中国人形容为“三空”，即酒铺、烟花爆竹店甚至医院的病床都被清空，以示庆祝。上海，四人帮的基地，也发生了自发的庆祝活动和反四人帮的示威（裴宜理和李逊 1997:187），那里只有一个人敢于在半年前纪念周恩来的去世。

至少在北京和南京，大多数参与真正的群众运动的工人（Heilmann 1993:6）都准备给邓小平新政府一个机会，让它去改善现状，然后再考虑重新进行抗议，但邓小平并没有全权，尽管在初期，人们对“四个现代化”计划普遍抱有热情。前造反派对新政府的上台特别警惕，如果对新政权不满，他们准备再次自主地发表意见，组织起来，集体行动。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那样，当1982年邓小平要从中国宪法中删除罢工权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正是这种态度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邓小平重新掌权后两年，就与邓小平发生了冲突。紧缩政策的结束，以及1977年-1979年连续的补偿式加薪，是非常受欢迎的，但邓小平改革的其他方面，强调结束“铁饭碗”，加强管理层的管理权，很快就威胁到了工人的安全，而扩大工资差异的政策，也遭到了工人的抵制和颠覆，尽管他们反对七十年代前半期的低薪紧缩政策，但他们还是坚持平等主义。因此，对邓小平来说，1976年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胜利，而以《鞍钢宪法》为基础的毛泽东主义工业路线之所以被拒绝，是因为它在一些重要方面失败了，而不是因为工人不重视工人参与管理，或者不在乎与干部在政治上平等。

文革十年的动荡之后，中国又回到了工人与国家之间对抗的基本主题：谁在企业中掌握权力和如何行使权力，以及工人是否真正

成为“自己企业的主人”。在这当中，工人在工作场所内外的代表如何产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允许他们代表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是两个重要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影响就在这里，因为在文革当中，解放后的工人第一次进行大规模的自主组织和政治行动，这一经验对工人后来的行为和抗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还突出了一种新思想，即中国存在着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其形态是工业和党的官僚机构，这一思想在运动过程中逐渐被许多工人所接受，但是在 1966-1967，当造反派工人大举进攻干部的时候，这一思想还没有完全表达出来。当我们审视民主墙运动，以及在企业中重建纪律和合法性的问题时，我们会发现这个思想很重要，而且尽管 1989 年的抗议往往“缺乏激进的言辞”（Jonathan Unger 1991a: 3），但它在 1989 年的抗议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人与国家之间的下一次危机，仍然是由之前的原因引起的，即关于参与方法、官方工会的作用、干部态度和工作方式的争论，但工人的反应、自主的罢工和其他抗议行动，显然带有文化大革命的印记，而这些长期争论的话题，也将因此而不再完全相同。

## 第六章 “别人才是你们的主人”：1976-1984 年的不满、民主和改革

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工作场所的冲突和不满的根源与 50 年代中期非常相似，党和企业管理层提出的主要解决办法也很相似，包括恢复官方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的活力。1978-1981<sup>24</sup>年民主墙运动的海报和非官方刊物，使工人的不满情绪有了公开宣泄的机会，而在 50 年代，双百运动中异常直言不讳的官方报刊起到了作用；两个时期的最后一点相似之处是东欧事件的影响。中国的官方和非官方媒体，都报道了列宁船厂的罢工和团结工会的兴起，从 1980 年下半年开始，中共领导人就开始担心中国也可能出现团结工会（廖盖隆 1980）。这些忧虑在整个 80 年代都很明显，1989 年民运期间工人组织早早被列为镇压对象，可能也是出于这种原因。

但是，非官方期刊和信息来源存在，是 50 年代中期与毛泽东时代后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来自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青年工人和学生在文革中积累了政治活动和挑战权威的经验，是民主墙运动的主力军。前红卫兵在许多非官方期刊的编委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Chen Ruoxi 1982:14-15；Xiao Ping 1986:155），文化大革命所关注的问题，如中国新官僚统治阶级的兴起，工业中的所有权

---

<sup>24</sup> 这场运动在 80 年代被广泛地称为民主运动（如 Munro 1984b）。我把它称为民主墙运动，以区别于 1989 年春天的运动。这个词包括持续到 1981 年 4 月的“非官方出版物”运动，而不仅仅是 1978 年 11 月至 1979 年 2 月至 3 月（此时出现了第一批被捕者）最初墙阶段，这一时期有时被人称为“北京之春”。

和控制权问题，以及巴黎公社组织形式的可取性等，在这次运动的著作中都有明显的体现（Lu Min 1979a）。

正如在上一章中提到的，刘国凯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1966-1969）是人民真正能够行使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对干部提出意见、组织起来的时期，尽管时间很短。在此后的“四人帮”时期，文革中的积极分子更加坚定地希望这些权利得到明确的法律保障，不再是党根据自己的利益可以给予或不给予的东西。从1974年李一哲思潮在广州发出的海报开始，非官方刊物上充斥着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讨论（Chen Ruoxi 1982:74），要求从法律上保障公民的权利，尤其是言论、出版和组织自由的权利。鉴于文化大革命与民主墙在参与者和议题上的联系，政府谴责一些民主墙积极分子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反对党的官僚体制，也就不足为奇了（《红旗》1981年3月1日：17）。

## 民主墙

1978年11月中旬，北京开始了民主墙运动，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西单路，墙上张贴了大量大字报，民主墙运动由此得名。除了海报，非官方的刊物也很快开始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流传，包括广州、长沙、武汉、太原、天津、青岛、哈尔滨、上海、南京、贵阳、昆明等地（Chen Ruoxi 1982: 107-15）。第一波大字报浪潮，是由11月16日《人民日报》引发的，它宣布推翻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判决，宣布这是群众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行为；紧接着其他城市，包括南京、杭州和郑州，也推翻了关于四五抗议的判决（Garside 1981:200-1）。1976年3月和4月的抗议活动当时已被宣布为反革命，毛泽东的直接继任者华国锋一直维持这一判决，但邓小平在1977年

重新进入最高领导层，使人们看到了逆转的希望。这一决定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一个月作出的，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方案在这次全会上推出，标志着他的党派在毛泽东之后的权力竞争中占据了上风。

但是，尽管民主墙紧接着四五运动，被许多参与者视为四五运动的直接延续（Seymour 1980:7），但它最初是一种不同的运动。它不像北京和南京的四五运动那样，是一场群众运动，尽管许多非官方出版物和墙报在城市地区有许多读者。“目前，四月份的社会力量更为广泛，但现在它已经不再扮演积极的政治角色，并准备将国家事务委托给等邓小平的新政府”（Benton 1982:103）。然而，剩余的少数积极分子，往往不仅有四五的经验，而且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他们对中国的分析表明，在毛泽东时代的系统中，安插一个“好”官僚，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正如李一哲思潮中唯一在民主墙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成员王希哲所说的那样：

当人民高兴地庆祝〔1976年〕10月的胜利时，同时出现了两种要求。一部分群众因为没有任何手段来直接召回“四人帮”而感到不满；他们进一步要求民主。另一部分群众似乎觉得有必要再找一个“世界的救世主”。他们散布希望：“希望邓伯伯多活几年”；甚至有人为他烧香祈祷……这些行动……表明现在人民群众仍然不确定是否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王希哲 1979a: 149）。

四五运动不仅针对四人帮和毛泽东，而是针对一个所有的政党精英，他们不仅垄断政治权力，而且享有相当的物质特权。民主墙运动的积极分子认为，这是四五运动的继续，他们认为这是一场“反对专制和独裁的革命运动”（Seymour 1980:267）。邓小平新政权曾发表过声明，强调民主化在改革方案中的重要性，但如果这种模糊的

善意，不能带来政治制度的具体改善，就不足以让红卫兵一代满意。如果经济上的改善也不能实现，更多的人可能也会开始对邓小平的施政失去耐心。很明显，尽管 1976 年民众大力支持邓小平，但如果他未能满足民众对改革的期望，他与中国城市市民的蜜月期将是相当短暂的。魏京生认为，邓小平政权要想保持人民的信任，就必须继续支持人民的正当要求，保护人民的合法利益：“人民支持邓小平这个人吗？不，他们不支持。如果他不为人民争取利益，他本人就没有什么值得人民支持的东西”（魏京生 1979：198）。自 60 年代中期甚至更早以来，工人们积压了大量的不满，包括经济的和政治的，现在这些不满可以在民主墙的“人民刊物”中公开表达出来，其中许多刊物是由工人团体撰写和编辑的。

### 工人在民主墙中所关注的事情：生活标准，工资，干部特权

尽管 1976 年数十万人走上街头的主要是防止左派接班，但经济状况、生产停滞和长期的工资冻结是抗议活动的经济背景。周恩来、邓小平制定的“四个现代化”方案在 1975 年就已经公布，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因此，国家未来的经济走向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前景问题，一直是运动的关注点，宏观和微观的经济问题也是民主墙的重要关注点，在如何进行改革的争论中，很多人献计献策。当然，这些经济问题与民主、代表权和责任制等政治问题密切相关，民主墙运动的非官方期刊，提出了经济改革的方案，它们的方案就表明了这一点。这种联系最初在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方案中也得到了承认，尽管民主墙运动者断言经济发展取决于民主化和政府的有效公共监督，但邓小平领导下的党中央却反其道而行之（Rosen 1988:9-10；

Brodsgaard 1981:773)。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就引起许多人不满的城市住房短缺问题，在 70 年代末又被提出来。然而，这次抱怨的一个新特点是，现在年轻人质疑的不仅仅是不平等，而是中国整体的不发达状态，他们对三十年“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明显不以为然（Chen Ruoxi 1982:75）。在民主墙时期和后来的 80 年代，将中国与资本主义西方进行比较，认为中国不如西方，是很常见的，尽管这并不意味着积极分子对西方不加批判。参与者显然怀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特别是工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因为他们虽然应该是“主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生活水平很低。这些问题要求政府证明工人在社会主义下享有的优势，特别是参与管理的权利和民主选举部分企业领导的权利。因此，这些对中国的比较和批评有助于增加压力，要求真正实现管理民主化，以及采取更多的补救措施，如稳定物价、改善住房和福利。

北京的非官方刊物《北京之春》（1979 年 1 月 8 日、6 月 17 日、8 月 10 日《北京之春》）多次强调北京许多工人家庭的居住空间不足，而青岛的《理论旗》（*Theoretical Banner*）则称，自“四人帮”倒台后，“红色大佬”为自己和家人建造豪宅已成为普遍做法，即使在经济“濒临崩溃”、老百姓饱受住房短缺之苦的中国也是如此（《理论旗》1981 年 2 月：35）。叶文夫的诗《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的灵感，来自于一个滥用特权获得豪宅的案例，据说是一位解放军高级军官为了给自己的新豪宅让路，下令拆毁了一所幼儿园（Siu and Stern 1983:157-71）。显然，在 1974 年反特权运动中短暂出现的对干部特权的怨恨仍然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为许多家庭极其狭窄的居住条件与干部为自己和亲属建造的豪宅，形成了鲜明对比。与 50 年代中期一样，人们认为重要的是不平等和不公平，而不是住房条件差本身。

在广州，从 1980 年开始，官方报纸对各种案件进行了报道（《南方日报》1980 年 2 月 9 日、1981 年 5 月 6 日和 10 月 5 日；《广州日报》1984 年 1 月 21 日和 29 日），证实了官员在建房或分配住房中滥用权力问题的严重性。涉及住房的腐败案件，是工人对管理层和上级官僚机构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个工潮相对频繁的时期，（腐败的）住房分配处理不当有时是引发罢工的问题（新华社 1984 年 4 月 28 日；《中国日报》1981 年 10 月 8 日）。从 1982 年《南方日报》的一篇文章中，可以判断出对企业干部滥用权力的关注程度，该文赞扬了一个企业，让职工代表大会负责住房分配和招聘职工后代填补空缺的敏感工作。这篇报道的意思是，这起到了防止滥用权力的效果，否则，滥用权力的现象就会极为普遍；文章特别指出，到目前为止，在已经获得工作机会的 50 个年轻人中，大部分是车间工人的后代，没有一个是“领导”家庭的后代（《南方日报》1982 年 4 月 15 日）。

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在 50 年代是引起不满的主要原因，当时导致不满的工人普遍采取“给多少钱，干多少活”的态度，同样的问题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也引起了人们的不满。经济改革给予一些企业更多的自主权，可以保留和支配部分利润，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制定工资和奖金，似乎加剧了这个问题。在一些情况下，反对的是不同工厂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异，一个企业的员工可能会看到自己的工资迅速下降，落后于另一个产出较高的工厂的工人（《南方日报》1980 年 4 月 25 日）。在其他情况下，企业内部的奖金取决于是否达到了设定的标准，但是一些工人仅仅因为他们所从事的特定工作过程，获得的奖金就比同事更低（《南方日报》1980 年 4 月 28 日）。对工资和奖金分配不公的抱怨出现在广州非官方刊物《人民之声》<sup>25</sup>

---

<sup>25</sup> 《人民之声》由一个叫广州社会主义学会的团体出版，其中大部分是工人。

的定期栏目“工人论坛”中，这里还有许多关于当地生活水平、住房问题、物价和工人生活水平的报道（Chen Ruoxi 1982: 57, 76）。

在许多方面，早期的改革措施和关于未来的辩论，似乎对工人的工作保障和他们迄今所享受的福利构成了威胁。官方报刊的文章认为，工人对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在福利服务方面的期望过高，提供这些服务是一种“不合理的负担”，有损于企业的主要经济目标和效率（《南方日报》1979年1月10日）。在官方谴责“吃大锅饭”之后，很快就有人猜测，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工作保障这个“铁饭碗”可能会保不住。这方面的举措自然在工人中极不受欢迎，尤其是在干部终身制还在实行的情况下（《人民之声》1979年12月）。许多民主墙活动家认为后者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工作场所和政府中实行民主问责制的障碍。

因此，在50年代中期对住房和福利的担忧之外，工作保障也遭到了威胁，工人还担心收入的增长可能被通货膨胀赶超。《北京之春》公布了基本食品的价格表，显示了“调整”前后的价格和涨幅百分比（《北京之春》1979年4月2日：26），在广州，《人民之声》在“世界之窗”栏目中一直关注工资水平和日用品价格（Chen Ruoxi 1982: 57）。到了80年代初，许多人开始认为，自邓小平改革方案开始后，工人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已经下降，以至于官方报刊上出现了试图反驳这一说法的文章。在一场“算细账的运动”中，政府坚持认为实际工资的增长超过了物价上涨的速度（粮食价格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是农业改革的连锁反应），并且在为工人家庭的后代寻找临时工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从而减轻了家庭预算的负担（《南方日报》1982年5月3日）。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很明显，许多工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了，这与领导层中的改革者所做的承诺相反。中国的

---

刘国凯和船厂工人、原红卫兵何求是主要编辑，王希哲也经常投稿（Chen Ruoxi 1982: 57-9）。

党的领导人应该知道，1970年12月和1980年8月，食品价格的上涨曾在波兰引发了罢工（新华社1980年12月18日）。

总而言之，关注民生、有经济不满的不仅仅是明显的弱势群体（如失业者、非法返城的下乡知青，或来京申诉冤屈、沦为街头乞丐的农民），民主墙的非官方报刊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地方。普通工人家庭非常关注经济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困难，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威胁，在工人编辑的许多非官方刊物，这些意见占了很大的篇幅，这并不奇怪。

### 工人在民主墙中所关注的事情：参与和控制

更为明显的政治问题，如工人如何控制自己的工作生活，如何在企业和社会中代表自己的意见和利益，也在“人民刊物”中有所体现。在民主墙的非官方刊物和海报中，有大量批评意见，而在它们的背后，有一个首要的问题，即工人理论上作为企业主人和社会领导阶级的地位，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实现了。所有关于管理部门、企业党委和工会的作用，职工代表大会的权力和范围，自我管理的可能性，民主选举干部，以及公有制问题的争论，都是这一问题的分支。

工人在企业和社会中的地位问题，一直是以往工人与党对抗的核心问题，但现在民主墙活动家和抗议工人比之前更明确、更直截了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运动中许多人在文革中是造反派：对他们来说，从中国革命后的精英阶层中产生一个新的、剥削性的统治阶级的想法并不陌生。由于李一哲思潮及其引发的讨论，对中国“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制度性批判，也不是民主墙运动中的新事物。但是这些早期的运动和思想，为新运动

提供了基础，使批判和抗议可以进一步发展。在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垮台后，人们感到现在没有什么是神圣的，迫切需要说出以前不能说的话，揭露中国社会和经济组织方式的弊端。要求彻底重新评估整个中共统治历史的呼声，现在已是司空见惯。随着邓小平的“开放”，人们对外部世界也有了更多的了解，这可能也促使人们对解放后三十年来的成就采取更多的批判态度。

民主墙文章的共同主题是中国企业工人缺乏民主权利，许多作家认为这是中国近年来经济表现相对较差的一个原因；还有，虽然“人民”名义上拥有所有国营工业企业，但实际上他们对这些企业的运作没有任何控制权。相反，这种控制权掌握在终身的党政干部手中。1978年12月，在运动初期，北京张贴的一张墙报就很直白地说明了这一点：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人民应该掌握生产资料。但是，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你们扪心自问，你们除了每月领取的那点工资外，你们控制了什么？什么是属于你们的？答案是可耻的。别人才是你们的主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产品应该属于劳动者。但你能得到什么？只够你继续工作！更高的工资并不足以补偿飞涨的物价，我们的生活水平也没有提高。（Anon. 1978）

另一篇文章则把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控制问题和各级党委的主导地位，与干部终身制联系起来：

在我国，生产资料不是由人民直接控制，而是委托给人民代表——各级行政干部。因此，人民不控制干部，就不能掌握生产资料。由于“干部职务名称表制度”使人民无

法监督和控制干部，如果不逐步废除这种旧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将受到威胁。而且，人民的主人翁地位迟早会变成官僚和皇帝的主人翁地位，人民又会被奴役。(Lu Min 1979a:76-7)

《四五论坛》和大多数民主墙团体一样，总体上赞成当时开始实施的改革，支持“四个现代化”，但认为工业领域的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企业的民主化。论坛早期的一个声明指出，在中国，“在经济上，人民的力量一直被浪费”，并这样描述中国工业的状况：

如果我国少数非生产者控制了生产工人的个人档案、工资和调动，就不可能指望工人超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生产率。恰恰是那些不喜欢别人发表独立意见的人，在压制生产工人发表对生产、分配和交换的意见。如果是这样，社会主义下的劳动者就只能像过去传统的手工业工人那样，管好自己的事。(《四五论坛》 1979: 159-60)

魏京生在《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它》中认为，中国社会普通劳动者的地位低下，并不仅仅是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即使生产力不再落后，“权威问题、分配的管理权问题、剥削问题”（魏京生 1978:51）仍然会出现。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下能否存在剥削和压迫的问题，在一些非官方刊物上有专门的论述。青岛的《海浪花》指出，在“名义上的社会主义世界”，这个问题迄今无法讨论，它表示，在像中国这样的官僚主义、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剥削和压迫实际上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因为在这种制度下，特权可以作为资本的一种形式（《海浪花》 1980: 34）。<sup>26</sup>

---

<sup>26</sup> “特权资本”的思想是陈尔晋（现名陈泱潮）在《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中

民主墙运动中的这一主题，是文革“四人帮”后中共合法性减弱的证据，也表明民众的政治和组织自信增强了，最明显的是在运动的积极分子中，但也在工人和广大公众中。一些人特别认为，工人（或一般的人民）现在已经表明，他们已经准备好更多地直接管理他们的企业，管理更多的经济和政治工作。他们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预言的党和国家消亡过程的开始。如果党在这方面不听从民众的要求，就可能像苏联那样，而值得效仿的正面例子是南斯拉夫，它的工人自我管理制度。正如前一章所说的那样，王希哲认为天安门事件本身就是新一代工人准备以自己取代党的领导。他进而提出改变旧的《鞍钢宪法》而主张：

“工人的直接民主管理”。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只有在工人自己直接民主管理生产资料的条件下，才能有坚实的物质基础。这就是巴黎公社的目的，十月革命的目的。（王希哲 1979a: 156, P N Lee 1987:140）

在许多人看来，工业企业这个层面是一个合适的起点，让工人直接接管进行民主管理，而党组织则退居其次：

要给工人真正的民主权利，取消工业企业基层党组织的行政领导权……。既然现在阶级斗争已经消亡了，那么党也应该逐渐消亡。这应该首先在工业企业的基层单位进

---

提出的，罗宾·芒罗（Robin Munro）翻译（Munro 1984b: 18-19）。芒罗认为陈尔晋是青岛非官方刊物《理论旗》的编辑之一，并以陆机的笔名为其撰稿。上文引用的文章使用了陈尔晋关于“特权资本”的表述，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两份期刊是在同一个城市出版的，而且民主墙活动家向其他期刊投稿是很常见的。但由于这篇文章是《Sea Spray》编辑部的文章，所以陈尔晋很可能也是当时编辑部的成员。

行。(Lu Min 1979b: 163)

一位北京工人的另一篇文章也同样认为，“如果我们要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制度，就必须在经济管理上坚持人民民主制度”（Han Zhixiong 1979: 162）。

许多人不仅把产业工人士气低落、业绩不佳与企业乃至整个国家的不民主直接联系起来，比如，经济业绩和人民生活的长期恶化，完全是“由于缺乏民主”（Han Zhixiong 1979: 162）。他们还对早期为弥补民主不足而采取的一些改革措施提出了批评。有一篇文章指出，在车间的实权属于企业党组织的情况下，让工人选举车间、工段、班组的负责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此，这种部分民主选举不能从根本上唤起工人的生产热情。而工人们对此种小改革也采取了冷漠的态度”（Lu Min 1979b: 163）。一些民主墙积极分子认为选举某些级别的管理干部选举权根本不重要，这与党最高领导层中的改革派之间存在着鸿沟。1979年推动干部选举时，这种选举权曾被称为工人的“重要权利”，同时有报道说，尽管当时职工代表大会的权力相当有限，但它的恢复在下层遇到了干部相当大的阻力（《南方日报》1979年11月8日）。所以，积极分子和工人嘲笑改革不痛不痒，但对于受其影响的管理人员来说，显然已经是太多了。

指定的工人代表也没有逃脱批评。与双百运动时期一样，70年代末，官方工会也陷入了危机，工人对工会的信心非常低落，又有人提出工会没有继续存在的意义：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认为有必要说明官方工会“不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不必要的组织”（邓小平 1978: 7）。工人们把他们的官方代表描述为“招牌工会”（新华社 1979年10月10日），即徒有其名的工会，他们不为工人做任何事情，不代表他们的意见（甚至不知道他们的意见是什么），不代表他们面对党委或

管理层，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不定期召开会议（《工人日报》1980年11月18日）。

在后毛泽东时期，工会早期的一些问题得到了更加公开的承认，而工会也确实是在一段时间内，至少在理论上获得了更大程度的独立。在重新评估中国1949年以来的历史和政治的总体过程时，人们承认，早在50年代就在工会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李立三和赖若愚分别于1980年和1979年平反，并指出指责他们工团主义和经济主义是“错误的和没有根据的”（Ni Zhifu 1981年；《工人日报》1981年10月13日）。然而，在后毛泽东时代的早期阶段，工会的作用并没有得到界定，这与50年代的作用有明显的不同。动员工人参加生产，实现四个现代化，仍然经常被列为工会的核心任务（《南方日报》1979年3月3日、11月8日；《人民日报》1983年10月19日），而劳动保护、教育、提高技术水平、保障工人民主权利等任务则被排在更靠后的位置。1979年春，广州在“四五”运动纪念日前后，发生了与民主墙有一定关系的动乱，市委市政府号召工会引导工人“正确”行使民主权利，反对极端民主化和个人主义，带领工人同“破坏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的“少数犯罪分子”作斗争（《南方日报》1979年4月9日）。因此，工会似乎仍然是工人的控制者、动员者和教育者，而不是工人利益的代表。

这些对中国工业经营方式的批评，比起具有政治色彩的住房和生活水平问题，是对党更明显的挑战，许多为非官方刊物撰稿或编辑的工人活动家，都以相当的力度和口才表达了这些批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证据表明，这种观点并不限于少数具有政治意识的活跃分子。在1980-1981年的一些纠纷和罢工中，人们要求建立独立工会，体现了工业动乱的政治内容。在这一时期记录最详实的一次罢工中，在太原钢铁厂，罢工工人给自己贴上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工人”的标签，要求“打破社会主义的锈门”，要求有决定自己命

运的权利，要求结束专制，要求推翻政治官僚制度”（Wilson 1990b: 263）。这一时期还发生了许多其他罢工，<sup>27</sup>尽管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详细的报告，但有可能还有其他工人集体行动，提出要求的案例，这些要求与非官方刊物上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批评一样。广州《人民之声》的何求暗示，这些刊物只是跟上了工人的观点，他把这些刊物称作“民主运动的机关和前卫”（Chen Ruoxi 1982: 36）。

### 1979年1月-1980年8月处于压力下的民主墙

对民主墙的镇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1979年1月就开始了，并持续了两年多。1979年1月，中国人权同盟的傅月华被捕，他的主要罪行是带领各省上访农民在北京市中心示威。到了3月，中国的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否认“外国”式的人权保护，认为它对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好处，并攻击少数人在进行“极端民主化”和“资产阶级民主”的运动（《工人日报》1979年3月22日）。魏京生在3月29日被捕后，发表了《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一文，文中把邓小平政权处理民众抗议和政治活动的措施称作“新旧法西斯独裁

---

<sup>27</sup> 关于这一时期的罢工报道，如安志国（An Zhiguo）1981: 3；《中国日报》1981年10月8日: 3，载 FBIS-CHI1981年10月9日: Q1；SWB/FE/6715/BII: 5；Wilson 1990b: 260-3。1981年1月底，广东省发生了一系列罢工和其他“经济骚乱”（和中社，北京，转引自《十月评论》1982: 18）。关于试图成立独立工会的报道也可以在 Wilson 1990b: 263 中找到；在 Wilson 编制了一份发生过罢工和要求成立独立工会的地点名单（武汉、太原、鞍山、上海和昆明），《十月评论》补充了山东（1982:18），除此之外，还有拉萨工人要求成立独立工会的示威报道（1982:47）。蒋振昌（Chen-chang Chiang）报道了1981年初上海一家钢铁厂、一家柴油机厂和其他企业的工人提出的建立自由工会的要求，并引用了台湾的消息，还指出了山西、重庆、南昌和新疆部分地区的其他情况（Chiang 1990: 91-2）。

者的惯用手法”（魏京生 1979：32）。

邓小平最初容忍了这些海报和出版物，主要是因为这些海报和出版物，主要是反对他的政敌。民主墙也为他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机会，让他向外界展示中国的变化有多大，与毛泽东和“四人帮”相比，他对不同意见的容忍度有多大，这种态度与他在 1 月底访美时戴的那顶 10 加仑的帽子很相配，当时中国刚刚与美国恢复了全面外交关系。但显然，民主墙对中国政治和工业体系的系统性批判，邓小平很不喜欢，作为文革中的幸存的“走资派”，他与那一代人中的许多人一样，对任何群众再次走上街头的迹象都会立即做出反应。在 3 月 30 日的一次演讲中，他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形式，阐述了自由辩论的界限（Munro 1984a：75）。4 月 1 日宣布了限制张贴海报的新规定，尽管北京西单的“民主墙”直到 1979 年 12 月才被关闭。

在接下来的 18 个月里，非官方期刊的出版商和撰稿人，或多或少地受到当局的压力，要求他们停止活动。1980 年 9 月，“四大自由”（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举行大辩论、写大字报的自由）被从《宪法》中删除（Chen Ruoxi 1982：27）。面对政府的施压，许多非官方期刊改用通讯形式出版，期刊只向订户发行而不公开销售，试图以此逃避停刊。1980，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将幸存的期刊和活动家联系起来。1980 年 12 月，在“团结工会”的影响下，民主墙积极分子被正式打成挑起社会动乱、企图破坏经济改革的反革命分子。随着 1981 年 2 月中共 9 号文件的颁布，一场大规模的打击“两非”（非法出版物和非法组织）的运动在各工作单位展开，这也预示着最后一轮逮捕和关闭非官方刊物的行动，1981 年 6 月出版的最后一期《职责》（*Duty*）是最后一份流向香港的此类刊物（Chen Ruoxi 1982：36-8）。

在广州，运动所受到的压力起初比其他大多数城市的情况更微妙一些，这就是为什么南方大约从 1980 年中期开始成为运动的中心。在早期阶段，这个城市甚至被一些人描述为民主运动的“解放区”，王希哲在 1979 年秋天证实了这是一个准确的描述（王希哲 1979b: 11）。这种相对宽容的态度有很多解释，其中一个可能是这个城市靠近香港，这意味着在吸引外国技术和投资的“门户开放”政策刚刚起步的时候，严厉镇压的消息会很快传到外界，损害国家的形象。此外，这场运动还可以作为新思想的试验场，对当局很有帮助；积极分子经常抗议被贴上反党的标签，因为许多最初在非官方刊物上发表的思想，后来实际上被中共采纳了（Rosen 1988:2-3）。这个运动最初似乎比较弱，在广州的发展比其他城市更慢（王希哲 1979b: 11-12），因此它可能看起来是一个不太严重的威胁。

斯坦利·罗森（Stanley Rosen）曾指出，学生期刊编辑更容易受到官方的压力而停刊，因为他们的活动对他们的经济和学习时间都是一种沉重的消耗，而且他们也意识到，继续下去可能会影响他们毕业后的就业分配。学生编辑的《未来》杂志是广州第一个主动停刊的，因为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提出，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努力解决群众生活水平低下这个公认的重要问题，挽回“四人帮”等人以前所犯的错误，该杂志还在纠缠这个问题是无益的（Rosen 1988:16）。像何求和刘国凯这样的工人，对于这样的情况，不太可能做出理想的反应，不过，正如罗森所指出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有时会被挑出来，受到不同的待遇（Rosen 1988:18）。

在 1980 年，就像 1989 年一样，活动家们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了保持他们的活动的合法性，必须注册一个出版物或一个组织。广州的《人民之声》杂志在 1980 年春天被省委宣传部告知，该杂志必须遵守 1952 年的《出版物登记暂行（原文如此）法》，该法仍然有效，因此《人民之声》暂停出版。《人民之声》和它的分支《人

民之路》都抗议说，它们在很早以前就试图去政府登记，但没有成功，而且要求他们遵守这样一部过时的法律是不合理的。他们特别反对的措施是，出版物必须得到两家私营商店的法律担保才能注册。这在 1952 年也许并不是一个苛刻的要求，但在 1980 年，正如《人民之路》编辑部所指出的那样，“由于（社会主义）商业的改造早在 1956 年就已经完成了，私人商店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我们要出去取得两个店主的担保是完全不可能的”（《十月评论》1980: 12）。同样，1989 年 5 月，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试图取得合法地位，但公安局拒绝登记，然后被谴责为非法组织（Walder and Gong 1993:7）。

但是，尽管有这样的压力，一些“人民刊物”一直到 1980 年还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出现，而且如上所述，制作这些刊物的工人群体比学生更不容易受到恐吓。他们分享了从文革中产生的强烈的工人阶级自豪感，并在抵制期刊关闭时，将这种阶级身份作为他们的辩护理由，称自己为“长期的雇佣工人”（《人民之路》1980:12），或者“有思想觉悟的工厂青年工人”（《自由谈》（Free Talk）1981:21），以强调他们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以及他们作为工人，参与社会决策的权利。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被文革的动荡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一代人，工厂的工作已经是他们所能期望的最好的工作了，但是，在把他们送进产业工人队伍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远远没有摆脱潜在的校园激进分子，而是最终创造了刘国凯所说的它最害怕的那种人，“来自工人阶级队伍，能够独立思考的人”（A Chan 1992:79）。从群众组织和四五运动中“毕业”的“思考一代”在民主墙运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使得民主墙比 1949 年以来的大多数运动更具有工人阶级的运动性质（Brodsgaard 1981:774）。

## 截至 1980 年 8 月，工人对改革的反应

那些能够在 1979 年和 1980 年继续出版非官方刊物的工人活动家仍然不缺乏材料，因为工人广泛的不满和动荡仍然是改革初期的一个特点。新政权试图向工人推销自己，声称要提供更多的物质利益和更大的民主，并把它政策和“四人帮”时期的做法进行了明确的对比（《南方日报》1979 年 1 月 7 日和 2 月 7 日），但企业的改革有许多方面是工人反对的。我们已经看到，对工作单位福利制度和就业保障的明显威胁引起了工人的关注，工资问题也引起了争议。个人奖金作为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一个特别有争议的问题。这些奖金旨在打破产业工人中“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心态，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对工人个人的业绩进行奖励。事实上，至少在短期内，个人绩效奖金完全没能结束工资平均主义。苏珊·雪克（Susan Shirk）曾指出，由工人自己在小组“评估和比较”会议上发放奖金，因此资金的分配带有强烈的平均主义色彩。打击这种现象的措施似乎很容易被规避，比如非正式的轮换制度，工人轮流领取最高的奖金，或者干脆对领取高额奖金的人施加压力，让他们以礼物或饭局的形式与同事分享自己的好运气（Shirk 1981：585）。

尽管报刊一再宣称“吃大锅饭”对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利益都有损害，而且与许多工人的观点相反，平均主义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南方日报》1979 年 10 月 9 日、1981 年 6 月 21 日和 8 月 21 日；《广州日报》1984 年 5 月 14 日），但这些态度似乎依然存在。有趣的是，虽然从 50 年代到 1978 年的低工资政策本身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文革时期的冻结工资更是让人怨声载道，但人们对扩大行业收入差距的热情似乎并不高，许多工人反而赞成相对平等地分配更大的“蛋糕”。

文革中特有的对干部的敌意似乎挥之不去，一些工人强调他们都“为社会主义做出了贡献”，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因此应该得到平等的回报），而那些干部给自己建豪华别墅，但是什么也没创造（《理论旗》1981:35；《帆船》n.d.: 11）。这似乎并不像我们在60年代末看到的那样，是对政权自身言论的冷嘲热讽或颠覆性使用。相反，它似乎像前面所引用的期刊编辑们激昂的自卫声明一样，反映了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真正认识。即使在十多年的改革之后，1989年活跃在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工人们，仍然宣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合法主人”（Walder and Gong 1993:12），这表明，尽管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在80年代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些价值观念仍然存在。这一切都与改革的大方向极不相符，改革倾向于把企业党委的权力只交给管理层，而不是工人。管理者的管理权和雇佣、解雇权在早期关于如何进行改革的讨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有关“科学管理”的讨论，没有任何反对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血汗制度”的迹象。

## 企业改革和团结工会的影响

然而，有了“文革”和“四五”的前车之鉴，党的领导层知道不能对城市工人队伍中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置之不理，并意识到必须重建和振兴工人代表机构和参与管理的机构，要比“四人帮”更好地实现工人的“主人翁”地位。民主墙的工人阶级性质使这一要求更加迫切，至少在早期阶段，可以发现民主墙主流的要求，和中共“改革派”的建议有相当程度的重合。邓小平在坚持官方工会仍有作用的讲话中，也要求把民主管理作为改革成功实施的重要一环。管理的民主化要通过振兴职工代表大会（通常以工会委员会为工作机构）来实现，除了通常的监督、讨论和批评的职权外，还要组织选举企业内

部的车间、科室和班组长。针对民主墙活动家的一些主要关切，邓小平认为，需要扩大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以解决“党和国家内部权力的过度集中以及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如官僚主义、组织僵化、家长制、广泛的特权和终身制（干部）等）”（PN Lee 1987: 138）。

同样，对民主墙中有关中国公有制的辩论，官场里也有类似的说法。我们已经在一些非官方刊物上看到了这样的说法：“全民所有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变成了少数干部对生产资料的控制，甚至是实际的所有制，因此，他们开始靠剥削别人的劳动成果来生活。但是，在党控制的《北京评论》的版面上，遇到这种论调就更令人吃惊了：

在一些缺乏民主生活、实行家长制的地方和单位，企业的管理权和产品的分配权实际上掌握在党委书记和厂长手中……。（职工代表大会）不过是没有实权的橡皮图章……社会主义公有制，至少可以说是空洞的，甚至是没有内容的。（《北京评论》1980年12月29日：16）

这篇文章的日期，即1980年12月，是很重要的，因为此时政府处于对团结工会和中国动乱的高度恐慌中。

在后毛泽东时期，管理民主化本身是目的，还是仅仅是整个改革方案中的工具，这一点值得商榷。许多人认为推动职工代表大会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是该方案的主要政策之一：增加企业自主权所必需的。如果要成功地将一些权力下放给企业，就必须要有有一个技术能力强的管理层，他们在工作场所享有一定的支持和合法性。最简单的说法是，给企业留有更多的利润空间，例如以生产效率和完成定额的奖金形式进行分配，就会使工人有动力选出最能干的人员来管理企业，因为低效率的管理会直接对工人的收入产生不利影

响。这种观点认为职工代表大会是改革过程中的副产品，主要是用来“支撑企业自主权”（Hong and Lansbury 1987:152）。

从稍微宽泛的意义上说，人们担心工人与管理层和官方工会的疏远程度，会对效率和生产力产生影响，从而使企业民主化成为改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考虑到民主墙的影响，有一种可能是，民主化本身很重要，它的目的是将民主参与的诉求，引回官方认可的渠道，同时也是改革的道具。在这种观点中，推动企业民主化的是“管理效率和其他与民主压力有关的原因……包括非官方的‘民主运动’”（Lockett 1983:232）。除了接受企业自治的说法外，Peter Nan-shong Lee 更进一步地认为，邓小平以不同于毛泽东的（制度性的而非动员性的）形式推动了工业民主，但却同样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思想根基”（P N Lee 1987:140）<sup>28</sup>。然而，如果说工业民主本身对最高领导层来说确实是可取的，那么，它肯定是一个从属的目标，首要目标是改善经济绩效和维护“团结和稳定”。否则，很难理解为什么在 80 年代初的改革中，中国企业的民主管理新时代事实上没有出现。

职工代表大会是一个有趣的案例，因为我们考察了 1979 年-1981 年关于职工代表大会职权的争论，发现民主墙运动的性质变化和东欧事件对中国改革的影响。后毛泽东时代的职工代表大会，开始于激进改革的实验，但最后又回到了 50 年代中期的形式主义和幻灭，民主墙活动家和一些工人的要求逐渐脱离企业和党的领导人的让步，最后他们之间的鸿沟变得无法弥合。这最终导致工人们寻找其他方式来更多地控制其工作生活，其形式是兼具政治和经济内容的自治组织。

职工代表大会在“文革”期间被废弃后，从 1978 年起又开始推广，

---

<sup>28</sup> 关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根源的认识，有另一种观点，见 Meisner 1989:107。

但《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直到 1981 年 7 月才公布，直到 1984 年才成为永久性条例。这就留下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不同企业、不同地区的实践差异很大。当时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全国性的、地方性的和专业性的工会报刊也进行了大量的讨论，讨论如何避免 50 年代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缺陷。有些建议如果得到实施，将使职工代表大会在企业中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机构，不仅是传统的福利和奖金，而且是所有重大决策的制定。这种建议“引起了一些猜测，认为中国即将开始一种比过去更积极的工人参与形式”（Henley and Nyaw 1987:144）。但这种猜测只限于外部观察者，而工人以及许多工会干部起初对这些建议相当怀疑，怀疑究竟能否贯彻这些建议，鉴于过去促进参与和民主化的尝试效果不佳，这种怀疑绝非毫无根据。

官方对南斯拉夫的去中心化工人自我管理感兴趣，一些外部观察家认为，这表明中国政府这次真的想促进管理民主化。许多民主墙活动家，如王希哲，对南斯拉夫的制度赞许有加（王希哲 1979b: 4-6; Han Zhixiong 1979: 162），显然没有意识到它的实际局限性，一些官方资料也传播了类似的观点。但 Nina Halpern 认为，中国之所以赞扬南斯拉夫模式和东欧的其他实践，并不是认为这些模式适合中国，而是出于外交政策的考虑（Halpern 1985:98-101）。因此，关于南斯拉夫经济的文章似乎主要是为了提供证据（从部分的、过于积极的图景中），证明中国领导层已经付诸实施或决定采取的政策可能取得的成功。因此，政府赞扬南斯拉夫式的“工人自我管理”，似乎只是为了加强官方对职工代表大会的宣传，并不一定意味着与中国过去的做法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综观 1979 年至 1981 年有关企业改革和民主化的文章，特别是有关职工代表大会的文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主墙的要求和团结工会的出现，对 1980 年下半年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从 1980

年 9 月左右开始，讨论的基调和内容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而之所以会有这种变化，很可能是因为团结工会的兴起，以及对民主墙活动家和中国不安分的工人对它的欢迎。

这并不是说，在团结工会出现之前，高层领导没有改革和民主化的冲动。是有的，如上所述，早在 1978 年邓小平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曾要求所有企业实行民主管理（虽然仍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1980 年 3 月《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讨论了扩大职工代表大会权力的必要性；文章还提出厂长选举是一项必要的改革（《人民日报》1980 年 3 月 6 日）。廖盖隆 1980 年报告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该报告详细讨论了民主化和工会改革（廖盖隆 1980：U1-2）。印在《七十年代》（*The Seventies*）上的报告版本所附的编者按显示，报告的大部分内容在 7 月份就已经被党中央讨论过了，在 1980 年 8 月 18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中阐述过，这是在列宁船厂静坐开始四天后，也是中国报刊首次报道罢工的那一天。然而，10 月最终版本的报告特别提到了“波兰危机”，提出中国工人阶级也有可能“起来造反”，除非“允许工人在选举自己的工会领导人时享有自由和民主”，而这些领导人将为工人的利益提供真正的代表（廖盖隆 1980：U11）。

报告明确提到波兰事件表明，随着波兰起义的性质和规模明朗化，中国在企业民主化和工人代表权方面要求真正让步的压力大大加强了。1980 年 9 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全会通过了在所有企业建立职工代表大会、推进民主管理的决定，这是整个决策过程的结果，随后几个月关于职工代表大会的几篇文章都提到了这一决定（《工人日报》1980 年 10 月 21 日；《南方日报》1980 年 10 月 22 日）。官方报刊的一些文章，指出要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将企业民主与更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相联系（《南方日报》1980 年 10 月 22 日和 11 月 29 日），并要求工人在企业中获得实权，因为这是接管国家政治、社会

和经济事务管理的前提（《工人日报》1980年10月21日），但是即使是这样的高层决定，也不能完全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文章。

这正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所要做的事情，有关改革的讨论以及提出的实际措施，都相当清楚地表明，民主墙和那些赞成改革的官员之间正在进行对话。早期提出的一些改革工业组织的建议，特别是有关职工代表大会作用的建议，是激进的，如果没有“民主墙”和抗议工人的强大影响，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这些工人表明，面对管理部门的顽固态度，他们准备在合法渠道之外提出他们认为合法的要求。

促进工人享有更大的民主权利，在短时间内远远超出了双百运动时期的任何建议；这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政府突然背离了它之前的言行，而同一时刻，党对民主墙积极分子的活动，特别是参加地方人大选举的积极分子极为关注，对“极端民主化”所造成的威胁表示担忧，此时距离这场运动最终被镇压，距离“四人帮”和毛泽东的历史遗留问题的最后判决还不到几个月。换句话说，按照正常情况，中共并不会在此时提出促进企业民主的激进政策。所以，之所以突然摆出一副要使工人成为企业和国家主人的样子，其原因一定在于当局的外部压力，即民主墙和团结工会。

关于民主管理和工人作用的态度转变，可以从《南方日报》关于企业改革辩论的报道中看出来。直到1980年9月，关于经济改革的文章都在讲企业自主权和如何放松对厂长的官僚控制上。广东是早期经济改革的排头兵，许多文章以效率、放权、承包、管理层的管理权等为中心，这与该地区把迅速进行经济改革的热情置于社会主义企业性质的政治教条之上的名声是一致的。团结工会出现之前，有关企业改革的报道的典型基调是1980年春夏的一些文章，主要涉及通过扩大自主权来增加企业利润、企业之间的竞争、利用个人经济激励措施来调动工人的积极性等主题（《南方日报》1980年3月

21日、4月25日、5月21日、6月28日)。

但进入8月份以后，关于企业改革的文章基调和内容突然发生了变化，1980年秋冬提出的一些建议，十分激进和直言不讳，但是我们很难认为这是在重申让工人成为企业主人翁的承诺，相反这很可能是担心民主墙运动联合大量不满工人，在中国制造“波兰危机”。此时出现了一些文章，强调所有下放给下层的权力都必须掌握在工人手中，他们应该管理工厂，并在将来成为国家本身。对待工人的态度也明显不同了：关于纪律涣散和“四人帮”的残余影响的说法（暂时）消失了，相反，工人被描绘成理智和负责任的人，可以把权力交给他们。到11月底，《南方日报》提出了一个问题：“企业的权力属于谁？”并回答道：“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权力无疑应该属于广大工人和职工”。同一篇文章还把过去的职工代表大会说成是“民主装饰品”，被党委和管理层忽视或当作橡皮图章，并指出“卑微的仆人”（干部）和“主人”（工人）之间的正确关系早已被颠倒了（《南方日报》1980年11月29日）。这种论调的大部分内容可以直接从广州的一份非官方出版物中找出来。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官方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承认了以前的职工代表大会的缺点，指出只有最近的试验才赋予民主管理以“真正的内容”（《南方日报》1980年10月5日和11月23日）。民主墙影响了官方，一些官方资料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民主墙运动中的一些论点和议程，这从对实验企业的赞扬中可以看出，在这些企业中，工人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现在有了“真正的发言权……有了被征求意见的权利，有了决定重大事项的权利……（还有）分配一部分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同一篇文章还报道说，这些企业把企业内部的一些招工、分配工作交给了职工代表大会，以增加干部“走后门”、徇私舞弊的难度（《南方日报》1980年10月5日）。这些措施在非官方的民主墙杂志上被提出过，还有其他类似的例子。

为了防止 80 年代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础的新的民主管理制度像过去那样沦为形式主义，提出了各种措施，有的还试行了。《工人日报》对过去的问题直言不讳，要求中国的企业在事实上和名义上都要成为社会主义，并认为公有制只是工人成为企业主人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1980 年 8 月，青岛的非官方刊物《海浪花》当然也使用了完全相同的论点（海浪花 1980:34），这再次表明，最初在民主墙文章中表达的、被当局谴责的相当激进的思想，后来可能会成为改革政策的组成部分。

但是，尽管有关职工代表大会的一些讨论是激进的，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所采取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回归 50 年代中期的政策”（Lockett 1983:233）。1980 年的一篇文章实际上说出了与 1956 年的赖若愚相同的话，断言“民主管理是社会主义企业区别于资本主义企业的标志之一”（《人民日报》1980 年 3 月 6 日）。但人们意识到，50 年代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未能保障工人参与管理的权利，因为干部可以很容易地规避它，于是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很多是由官方工会提出的，目的是使职工代表大会成为企业中具有实权的机构。但这些最终未能为工人建立起比 50 年代更有效的参与或代表形式。

为了确保职工代表大会不会再次被干部和技术工人所支配，相关法令规定 60% 的代表应该是车间工人（《北京评论》1980 年 9 月 1 日：22），而不是干部、技术人员或工会代表。据报道，广州第一棉纺厂是一个试点企业，在大会的常设机构主席团中，普通工人占到了 60%。由于该机构负责监督大会决定的执行情况，并在大会闭会期间作出决定，因此可以说，确保车间工人在主席团中的多数，比确保大会代表的多数是工人更为重要。据报道，过去工人在主席团中只占 10%，所以很容易被机关干部成员否决。关于这家企业的报告，在批评过去职工代表大会的功效时，采取了与当时许多其他企业类似的路线。改革前，据说职工代表大会每年只开两次会，不过

是厂长作报告、党委书记作指示、工人保证支持的座谈会（《南方日报》1980年11月23日），这种对职代会传统作用地描述，我们已经屡见不鲜。

1981年年中公布的《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规定，普通工人应构成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的多数。然而，这些让步远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重要，因为在《暂行条例》中，几乎所有试验性地赋予职工代表大会的新权力都被降格，从决定权本身降格为对决定的协商权和对部分决定的批准权（《人民日报》1981年7月20日）。广州第一棉纺厂是一个实验性企业，大多数企业无论如何也不会实行工人代表占60%的规定。此外，即使在这个试点企业里，也没有举行过干部选举，尽管选举和罢免干部的权利应该是80年代最重要的创新之一。

还有人提出，要把代表大会作为企业的决策机构，而党委则集中精力解决更广泛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Lockett 1983:246）。1980年秋，佛山第五塑料厂党委超越了其应有的思想政治领导作用，试图限制职工代表大会，使其只是在企业领导层作出决定后进行讨论和执行，因此受到批评。领导层遭到斥责，因为他们连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讨论与其他企业合并的可能性都不允许，并得到提醒：党不是行政机关，企业自治范围内的权威机构是职工代表大会（1980年11月29日《南方日报》）。另据来自广东另一家企业的报道，那里的党委正在将生产和财务计划、用留下的利润建设职工住房、公开考试录用新职工、规章制度的建立、修改和取消等重要事项，交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强调职工代表大会必须参与落实企业自治所增加的权力，这与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并不矛盾（1980年11月8日《南方日报》）。

在一些实验企业，成立了新的常设组织，其职责是保证干部及时执行职工代表大会的决定。这些机构被赋予了强制干部遵守代表

大会决定的权力，与过去的做法不同的是，它还有进一步规定，职工代表大会所制定的任何规章制度，除了另一个代表大会的决议外，都不能推翻（《南方日报》1980年11月8日和29日）。除了明确成立各种小组监督代表大会决议的执行外，企业工会仍然发挥着作用，职工代表大会的召开频率也比过去高，一个试点企业每季度召开两次。然而，就像之前提到的工人代表占60%的规定一样，《暂行条例》将代表大会的权力缩减为对企业重大决策的咨询权，这些创新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最终，职工代表大会只剩下了在其传统的安全、福利和一些关于工资和奖金的决定范围内的决定权。这意味着，它在企业内部施加影响的权力并没有比50年代大多少。看来，尽管早期对它的重要性有一些过于乐观的评估，但对80年代版本的职工代表大会的最好评价是：

一个对最高管理层施加有限义务的协商论坛。像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大多数代表机构一样，代表大会往往由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人和主管人员主导……由于党委书记是与管理层发生纠纷时的最终仲裁者，他的影响往往是无处不在的（Henley and Nyaw 1987:144）。

虽然一些观察家还是认为职工代表大会仍然可以“超越过去‘形式主义’，实现有意义的参与”（Henley and Nyaw 1987:144），但在许多企业中，情况并非如此，真正参与的可能性仍然取决于管理层的态度，而不是工人权利的制度化。与50年代一样，所有其他的管理改革措施最终都要靠它来发挥作用，那就是在企业中举行直接选举，不仅要选举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代表，还要选举组长、科长和车间主任，甚至选举厂长。除非工人能够以某种方式影响经理人的职业前景，否则他们将无法在工作场所发挥任何真正的权威。许多干部

是终身制的，而且在选举中没有失去职位的危险，这样干部们就可以继续无视职工代表大会等机构，组织在工人中的声誉就会受到损害，他们也就不再对组织抱有任何期望。这就是 50 年代的一连串事件；下一节将探讨 80 年代工作场所选举的理论和实践，查明为什么类似的民主化方案在这一后期没有取得更好的效果。

## 企业选举

一些广州民主墙活动人士的文章和公开声明都强调选举，他们设想通过某种形式的选举，让干部对人民负责。例如，在一次由省共青团主办的官方论坛上，Li Min 指出，干部在需要连任时，对职工的态度有所好转，但现在选举不再提上日程，态度又变回来了（《七十年代》1980：56）。这种对民主选举必要性的坚持，是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民主墙所关注问题的一部分，它的目的是用民主和透明公平的法律体系，代替专横的独夫统治。

民主选举是运动的积极分子和党的改革者之间的另一个共识，虽然不是完全的。自 1978 年改革开始以来，一直在推动厂长以下干部的企业选举，结果有好有坏。但到了 1980 年下半年，民主选举作为对干部官僚主义和滥用权力的制衡，其重要性得到了大力强调（《南方日报》1980 年 10 月 9 日和 11 月 8 日）。全国性的报刊也承认，“选举和罢免包括厂长、经理在内的领导干部，是工人群众非常迫切的要求，但基本上没有实现”（《人民日报》1980 年 10 月 5 日）。与其他后毛泽东时期的改革一样，这个政策有着多重动机。干部选举之所以成为企业改革方案的一个板块，并不仅仅是因为党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管理民主化，还有经济效益的原因。将工人的奖金与企业业绩挂钩，是为了确保工人有强烈的动机去选举有能力的管理

人员；这样，干部选举就可以引入年轻的、受过较好教育的、更有能力的管理人员，以取代老一代退伍军人或来自农村的“死木头”干部，他们的职位更多的是来自他们的政治地位，而不是工业管理的专业知识（Lockett 1983:234-5）。因此，干部终身聘用制的改革，可以通过民主选举来进行。

但除了这些效率方面的考虑外，民主墙、团结工会和中国的工业动乱也有助于形成民主选举的压力。就像其他问题一样，1980年下半年，一年前在非官方刊物上写的东西，以稍微温和的语言进入了国家控制的媒体。王希哲在捍卫他谈论中国官僚制（在他看来，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的权利时，曾指出，无论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多么糟糕，干部仍然可以终身工作，而且永远只能往上走，不会往下走（王希哲 1979b: 16-17）。1980年11月，《南方日报》也认为，官僚主义是由于干部制度产生的，在这种制度下，官员只对上面的人负责，而不对下面的“主人”负责，民主选举将有助于结束官僚主义和专制主义。与王希哲不同的是，该文并没有把巴黎公社当作理想，但它指出，中国的各级民主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不健全的，全国人大的一个决议的影响力还不如一个高级干部的几句话，这使中国在某些方面甚至不如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南方日报》1980年11月8日）。当然，李一哲小册子的作者在1974年也曾因说过这样的话而被拘留，这对王先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讽刺。

团结工会的要求，首先是选举独立工会的权利，已经在一些非官方期刊上全文发表（《十月评论》1982:45-9），1980年8月官方媒体也有报道。1980-1981年冬天，一些罢工的中国工人提出了一些类似的要求，比如职工代表大会的特别代表权，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显然受到了团结工会的影响，而对波兰工人的报道似乎也可能加强了来自下层的压力，要求允许中国工人对管理者有更大程度的影响。廖盖隆的报告强调，如果要避免“波兰危机”，就必须在中国进行工

会代表的民主选举，同时也强调要允许工人建议罢免不称职的管理人员，并及时选举企业人员（廖盖隆 1980：U13）。

但是，尽管党承认干部选举（包括厂长在内）是工人的“迫切要求”，尽管党显然接受了通过工作场所选举对管理层进行民主问责，但最终企业定期选举制度进展甚微。早在 50 年代中期，赖若愚提出的提案中就有关于选举厂长以下干部的规定，但这是最早被排除在外的管理民主化措施之一，理由是厂长必须由国家任命，而不是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仅仅是特定企业职工的利益。同样，虽然厂长选举在多年的试验中得到了官方的一定支持，但在 1981 年 7 月颁布的《国营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中并没有提及。该条例只规定了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行政领导人员”，而职工代表大会还肩负着“维护厂长权威”的职责，厂长只需接受该机构的“检查监督”（《人民日报》1981 年 7 月 20 日）。

所以，在新的民主管理制度的规定还没有最后确定之前，这项本来可以使工人获得重要权力的措施，显然已经被放弃了。选举厂长仍被当作是未来的一种理想（1981 年 10 月 26 日《南方日报》），一些企业实际上也进行了选举，据说效果不错（1982 年 4 月 15 日《南方日报》），但似乎还没有成为普遍做法。1984 年报道了深圳进行厂长选举的试验（《广州日报》1984 年 4 月 11 日、6 月 27 日），但当年也有人提出，由国家任命的厂长，在企业内部有自主任命干部的权利，并可以调任被选拔出来的干部（《广州日报》1984 年 6 月 8 日、6 月 27 日，12 月 29 日），因此，虽然试验还在继续，但似乎并不都是朝着选举高层管理人员的方向发展。总的看来，在这一阶段的改革中，职工代表大会和类似机构只有权向上级提出关于任免高层管理人员的提案和建议。

而在其他各级管理部门，干部则要面对全体职工或职工代表大

会的选举。我们在前面看到，组长、科长、车间主任的选举最初在工人中引起的热情不高，他们意识到企业的真正权力在党委和主任那里。对于选举的自由民主程度，人们也普遍持怀疑态度，鉴于 50 年代企业干部和工会代表选举的经验，这种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这些选举中，有时在提名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我审查，工人们不会提名任何因家庭背景或以前的政治问题而可能不被上级批准的人（所有的任命都要经过批准），如果被提名，这些人可能会寻求退出选举（《China Reconstructs》1979：7-8）。并非所有的企业都被认为具备举行选举的适当条件，在一些选举“不可行”的地方，“政府主张定期进行民意测验，为工人提供检查和评价企业领导干部工作的手段”（Tung 1982：165）。近年来，企业管理外包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建议每年对这些企业的领导干部进行民主评议，而集体企业仍可进行选举（《工会简报》1991 年 4 月 1 日：9）。

改革初期，选举程序不规范，不同城市、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选举程序不尽相同。在 80 年代初，一些企业以举手方式投票，而另一些企业则进行无记名投票，还有一些企业举行“初选”，作为提名程序的一部分。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公开提名、小组讨论和逐步淘汰的过程得出的候选人名单中，所包含的人数与需要填补的职位数相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两个或两个以上候选人的支持率几乎相等时，最后的候选人名单才会多于职位数（《China Reconstructs》1979：7-8）。

在这些选举中，干部没有理由不连任，而且他们经常连任，特别是技术人员，他们通常比企业中任何人都更适合他们的岗位。但不难理解为什么“习惯于发布行政命令”的干部“如果受到群众的监督，会担心自己的威信”（《北京评论》1980 年 9 月 1 日：23），他们可能会把选举看作是一种威胁，并竭力阻挠选举。公开的操纵选举的企图，例如给选票编号，使投票反对某干部的工人能够被识别

出来，或者威胁对反对者进行报复，“决不是不存在的”（Lockett 1983:237），但领导管理层和党的干部的影响，往往甚至不需要这种明显的方式。工人对选举公平性的怀疑，可能使他们参与的热情不高，让干部来主导选举过程，因此工人的意见实际上并没有在选举结果中得到反映。干部也可以为反对选举找到合理的理由。“反对来自下层的控制”的理由，可以有很多，比如管理工作中所谓的保密需要，工人队伍没有做出“正确”选择，“文化大革命在工作纪律方面的遗留问题”（Lockett 1983:238）也可以作为反对选举的借口，以防“生产秩序”因此受到干扰。同样，这些论点在 50 年代就已经出现了。

增加职工代表大会的权力，在企业中建立定期干部选举制度，这些改革主要障碍似乎是来自干部的阻力。干预选举程序的现象并不少见，职工选举出来的干部，厂长或上级可以不经通知或协商就将他们调走。关于干部阻碍管理民主化和职工代表大会工作的报道，在改革过程中一直没有消失（《南方日报》1979 年 11 月 8 日、1980 年 10 月 22 日、11 月 29 日；《人民日报》1980 年 3 月 6 日、1983 年 10 月 27 日），但在 1981 年期间尤为频繁（《工人日报》1981 年 2 月 18 日、11 月 7 日；《南方日报》1981 年 10 月 26 日；《人民日报》1981 年 6 月 10 日）。这就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在前几个月里，一些相当激进的建议被提了出来，明确指出企业自治意味着给工人更多的权力，而不是干部，这在管理层和党的官员中引起了反弹。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最支持建立强大的职工代表大会和干部选举的，是工运报刊，即《工人日报》。1980 年 10 月，《工人日报》在一篇关于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开创性文章中，采用了民主墙的语言，指出过去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仅限于协商和讨论，工人的参与权没有制度和法律保障。该报坚持认为，今后必须用法律明确规定和保护职工代表大会的具体权力，使代表大会的决定不再取决于“少数高级干部的素质”，必须制定法律法规来规范职代会代表和主席团

成员的选举和罢免，避免代表大会的权力最终落入少数人手中（《工人日报》1980年10月21日）。1981年底，该报仍在坚持职工代表大会的“无数优点”，认为这是在企业内部建立“民主和法制”的途径（《工人日报》1981年11月7日），但其他机构对管理民主化的支持可能不那么强烈。

1981年的职代会报告显示，虽然大多数企业都建立了职工代表大会（到1981年6月，大城市90%的大中型企业都建立了职工代表大会），但只有25%左右的企业运行良好。据说有60%的企业运行得比较理想，15%的企业运行得很差，已经沦为形式主义（《人民日报》1981年6月10日）。万里副总理叮嘱全体干部，作为共产党员，不要怕群众，要愿意把权力交给职工代表大会，并再次强调，职工代表大会不代表否定中央，不等于无政府主义。干部得到保证，职工代表大会的权力只限于协商不影响工人直接个人利益的事项，而且要逐步实行干部选举（《人民日报》1981年6月10日）。但尽管有这些保证，干部似乎并没有支持民主化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南方日报》把企业对职工代表大会的主要疑虑归纳为“四怕”：党委书记怕职工代表大会开得太久；厂长怕被一个“不肯下台”的机构夺去权力；工会主席怕把资方和工人的关系搞僵；工人和职工自己怕被人“穿小鞋”（害怕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行使民主权利，会遭到资方报复）（《南方日报》1981年6月10日）。

广东的情况被认为比其他地方更糟糕。据报道，1981年底，许多大中型企业仍未成立职工代表大会，即使在改革走得最远的那些试点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成立后运行良好的也很少（《南方日报》1981年10月26日）。十年后发表的对广东改革的评价，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该省忽视了民主管理和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削弱了工人的主人翁意识，导致工人普遍存在“打工仔”心态，觉得自己是在“给厂长打工”（Wang and Wen 1992:265-6）。

广东在这方面表现不佳的原因，似乎在于该省改革进展快速，厂长得到了更多的企业自主权下，权力大大增加。理论上，是“厂长负责制”与民主管理和工人、职工参与管理相结合，但在实践中，结果往往与过去的一长制相似。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工会报刊和普通报纸上，有许多文章提到了这个问题。工人中的“雇工”和“给多少钱，干多少活”的心态，是这一阶段的老生常谈，厂长负责制下工人的民主权利难以维护，职工代表大会经常被绕过或者没有干脆不召开，厂长“一长制”的重新出现，也被讨论过（《工会通讯》1991 年 2 月 1 日：18-19）。

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厂长自主权的增加与管理民主化之间存在着矛盾，事实上，在一些人看来，如果要避免回到一长制，那么厂长负责制就使得职代会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赵紫阳提醒国营企业，一旦国家把指挥生产和管理企业的权力全部委托给厂长，就必须保障工人参与管理的权利（《广州日报》1984 年 5 月 16 日、8 月 26 日、10 月 19 日）。但是，尽管意识到了这个潜在的问题，但似乎并没有能够在改革中保护工人现有的、相当有限的参与管理的权利。这再次让人怀疑，管理民主化和促进职工代表大会到底是不是改革的工具。到 90 年代初，尽管工人的主人翁作用和民主管理都已载入《企业法》，但工人们似乎普遍感到经济改革削弱了他们。80 年代企业内部的权力转移了，但仍然不在普通工人手中，这就是“过去工会干部听命于党委书记，现在他们听命于厂长”（Chiang 1990:86）。

## 工会

在这次改革初期的讨论中，工会没有像 50 年代中期那样引人注

目，我们可以借此来衡量工会的危机程度。许多关于民主管理的讨论，即使是在《工人日报》上，也丝毫没有提到工会的作用。有人提议，工会应该再次作为职工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但在许多企业中，监督代表大会决议执行情况的机构，是与正式的工会完全分开设立的。

从1979年开始，特别是在“团结工会”运动出现后，中共更加强调工会的职责是首先保护工人的合法利益和民主权利，同时也要考虑到企业和国家的利益。据说，工会在向企业党委反映工人的意见时，已经由“怕”转为“敢”（《工人日报》1979年3月23日）。工会正在努力恢复工人对基层工会组织信心，工会内部的一些人承认，他们过去难以在业务上独立于党，部分原因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不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必然是软弱的”（《工人日报》1980年11月18日）。工会官员和积极分子似乎已经意识到，如果工会缺乏会员的信任，那么工会确实“没有存在的意义”。《工人日报》的一篇文章总结了双百运动以来官方工会的遭遇：“自1957年以来，许多工会组织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威信和作用，发生了倒退，只负责教育、组织效仿模范的运动、党和政府的一些多余的工作。”同期的另一篇文章认为，工会对工人的切身利益“兴趣不大”，因而工人“从来没有把工会做的事情当回事”（1980年11月18日《工人日报》）。

针对这种批评，党批评基层工会干部倾向于把对党的责任和对工人的责任对立起来，并提醒他们，工会应该是工人信赖的组织，当上面的命令与工人的愿望或利益发生冲突时，工会完全有权代表会员说话（《工人日报》1979年10月9日）。但是，尽管工会高层中至少有一些人似乎是真心实意地在做这种努力，但总的来说，只是在强调工会的作用方面有所改变，他们并没有被赋予自由的权力，站在工人的立场上，首先代表工人的利益。这些改革最好的特点也许是“试图使工会看起来更独立于党”（Saich 1984:164）。

当我们追溯工会的“新路线”在 1978 年到 80 年代初的执行情况时，可以看到团结工会和民主墙的影响。工运报刊在 1980 年秋季开始更多地关注工人与工会疏远的程度，在文章中借鉴了民主墙的语言。1980 年 11 月，《工人日报》就此问题发表了多篇文章，其中一篇文章坚持认为，工会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全体工人的合法权益，工会干部应首先对全体工人负责”。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明确把干部对职工的责任放在对企业内外其他机关的责任之前；二是提到了合法权益。工会现在的措辞让人强烈地联想到李一哲和民主墙，联想到他们对社会主义法制对公民权利制度化保护的要求，他们要求“法律的必要保护和政府的支持”，并要求工会与职工代表大会、行政和党组织的关系“应在法律上或制度上予以明确规定”（1980 年 11 月 18 日《工人日报》）。

廖盖隆的报告也是写于 1980 年秋天，他非常明确地指出，如果不振兴官方工会，不使工会更加民主，不摆脱党的专横干涉，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波兰危机”，他还引用列宁的话说，即使在社会主义下，也必须有工会代表（廖盖隆 1980：U10）。还有人提出了工会自身内部缺乏民主的问题，强调工人能够选举自己的工会代表的重要性。也有人提到民主选举的工会代表，未经协商就被党的官员任意调离岗位的情况（新华社 1980 年 12 月 4 日）。当然，所有这些讨论的背景，都是民主墙赞扬团结工会，加上中国工人的反抗和零星的自我组织；到 1981 年中期，当这种对改革的刺激逐渐变得不重要时，就看不到支持工会更加独立的言论了。在 1983 年 10 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倪志福的讲话把为职工说话办事、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列入工会的核心任务，并呼吁密切工会与群众的关系，但更多地关注工会在改善经济成果方面的作用，以及对职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道德和文化教育，这是 1978 年以前对工会主要任务的一种非常传统的看法

(倪志福 1983)。

### 团结工会对民主墙和工人的影响

波兰团结工会的兴起让中共感到害怕，但是它对民主墙活动家和工人的鼓舞，更加令中共胆战心惊。工人的不满情绪一直在稳步上升。两年的经济改革，虽然在某些方面是成功的，但也产生了一些严重的问题。此时能源和原材料的短缺也相当严重 (Halpern 1985:79, 101)，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工业企业别无选择，只能降低产能运行，甚至暂时完全停产。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工人面临困难，他们只领取基本工资，除此之外没有与绩效相关的奖金。在 50 年代，有人声称，如果没有超额完成规范的奖金，一些工人的基本工资不足以维持生活，当管理不力导致物资不到位，生产停顿，从而威胁到他们的生计时，工人感到非常愤怒。1980 年又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当时奖金已经成为许多工人工资的重要部分，并被广泛视为工人基本收入的一部分，而不是可选择的额外收入 (Shirk 1981:586)。

改革初期的物价上涨，给工人的家庭预算带来了额外的压力，也被视为对工人安全的威胁。后来，在 1989 年，对通货膨胀超过工资增长的恐惧，是促使工人支持民主运动的一个主要因素。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 80 年代初这样的条件下，工人的不满情绪会加剧，并有可能转变为集体抗议。从当局的角度来看，团结工会发生的时机实在是太糟糕了，而现在民主墙运动正开始积极寻求工人群众支持，它的宣传方式更让人感到震惊。

工人的不满总是能够在民主墙的出版物中找到表达的机会，而且有迹象表明工人支持民主墙的目标 (Chen Ruoxi 1982: 35-6)。但最初这个运动并没有真正寻求群众基础。直到 1979 年，一些积极分子才开始笼络下乡知青或上访农民 (Benton 1982:6)，直到 1980 年，运动才开始试图获得工人的支持。在民主墙最早的几周和几个月里，

一些团体和个人既向领导层中的改革派，也向广大公众阐述他们的想法。只是到了后来，当运动受到逮捕和修改宪法限制言论自由的严重威胁时，它才开始尝试“摆脱孤立状态，在善变的精英阶层之外寻找新的盟友”（Benton 1982:11）。有了之前团结工会的例子，像何求这样的活动家现在呼吁民主墙与中国工人，与国际工人运动建立联系（《观察者》1980：14；《十月评论》1982：3）。一些运动的积极分子“努力扩大其社会基础，组织、宣传和捍卫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工厂条件而进行的斗争”（Benton 1982:120）。

团结工会的影响是双重的。首先，它向心怀不安的中国工人表明，他们并不是唯一与把他们捧上天的国家作斗争的人，这个制度实际上使他们在政治上无能为力，使他们的生活水平低下。在1989年的抗议中，一些参与自我组织的工人们，一直追踪着团结工会在80年代的进展，他们将团结工会视为社会主义国家工人政治意志和力量的试验（陆平 1990：90）。其次，对于民主墙的活动家来讲，团结工会表明，尽管文革后的中国城市中普遍对政治活动感到失望，但反对一个已经堕落为军人—官僚独裁政权的运动，是可以获得群众支持的。当局在团结工会运动出现之前就已经把民主墙和日益高涨的工潮联系起来，官方报纸谴责“少数人的方法”，谴责他们通过罢工、示威、请愿和演讲来追求快速民主化或“极端民主化”（《南方日报》1979年5月31日；《人民日报》1980年2月8日），而对中国发生“波兰危机”的担忧，更坚定了当局在事情走得太远之前关闭民主墙的决心（Wilson 1990b；廖盖隆 1980：U10）。

尽管大规模的工业反抗和民主墙运动并没有结合到一个组织框架里，但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局害怕两者结合是正确的。北京、青岛、上海、广州和太原的民主墙活动家都报道了波兰团结工会的活动（《理论旗》1981:94-5；《海浪花》1980a:34；《十月评论》71（1982:45-9）；Benton 1982:86-7），有的还印制了团结工会的

《21项要求》和《波兰工人权利宪章》的全部内容，并明确地将引起团结工会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与中国的状况进行比较。许多人期待着中国的团结工会，并给出了中国工人阶级抵抗“官僚特权阶级”统治的例子，以支持他们的预测，在武汉的一个案例中，民主墙活动家据报道甚至领导了一次罢工（Benton 1982:11）。

由于工人对工会表现的极度不满，中国的罢工和抗议工人多次尝试成立独立工会，尤其是有了波兰团结工会的例子之后。据报道，80年代初中国爆发的几次工业动乱，最终都以要求建立自由工会而告终（Wilson 1990a: 54; Benton 1982: 85; FBISCHI 1981年1月29日、2月2日、3月3日和10月9日；SWB/FE/6175/B11/4-6），包括1981年太原钢铁厂的纠纷（Benton 1982: 120-1）。这些罢工的开始，往往是住在厂里的单身工人（即虽已结婚，但远离家人住在工厂宿舍的工人）抗议生活和工作条件。这些要求可以理解为狭义的经济要求，但与1957年广州码头不宣而战的罢工一样，争端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工人与党组织之间的对抗，而企业的实权仍在党组织手中。

太原的一份非官方期刊《帆船》明确指出，在运动中，工人的这种自发的集体行动意味着对党本身的挑战，因为它表明工人意识到，当他们的官方代表（工会）失败时，他们需要组织起来：

他们明白，如果要改变自己的悲惨境遇，就不能依靠任何救世主，而必须开始组织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选出自己的代表为自己说话，如果选出的代表不能很好地代表自己，就会被罢免，重新进行选举。这种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是中国民主改革的社会基础。（《十月评论》1981a: 11）

该刊的记述还明确指出，这场纠纷是为了维护工人合法权利；这是民主墙著作中不断出现的一句话，它也给本来可能被归为经济要求的東西赋予了政治内容。

抗议工人的要求之一是在职工代表大会上有自己的特别代表（Chen Ruoxi 1982:35-6）。这说明，从目前的情况看，尽管经过两年多的改革，职工代表大会也正式推广，但这些工人仍然觉得它不能代表或维护他们的利益。从希望在官方认可的机构上有单独的代表，到工人有必要拥有自己的、自我组织的、自主的工会，才不至于屈服于进一步的剥削和压迫，这并不是很大的一步。《帆船》明确地将当代工人的抗议活动与 19 世纪一长串反对剥削的斗争联系起来，并描述了工人的状况，认为这是反抗的根源：

在官僚制度下，他们光荣的主人翁头衔与他们实际的无权地位不相称，他们的生活水平与有特权的官僚相比十分不平等，他们生活的改善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关系。  
（《十月评论》1981 年 a: 11）

这篇关于太原动乱的报道没有提到官方工会的参与。只提到了“领导干部”和党委成员，这可能表明，工人们并不指望工会能帮助他们，提出他们认为合理的改善条件的要求，而是直接去找那些在企业中有一定权力的掌权者。和 50 年代一样，处理工人不满的官方公式是，如果他们的要求是合理的，就应该得到满足；如果要求是合理的，但不能直接满足，就应该向有关工人解释原因；如果要求不合理，就应该告诉工人为什么不合理。但在这起事件中，企业领导的反应是立即谴责：指责工人们在一起开会讨论诉求时开“黑会”，指责工人们相互拜访时搞串联，显然是想把工人们描绘成红卫兵式的流氓和“四人帮”的支持者。由于提出诉求和解决纠纷的官方渠道

似乎根本不起作用，自发组织随之产生。积压的经济上的不满，和对官僚特权的普遍不满助长了这种现象，而文革中在党控制之外的有组织行动的经验也提供了相关的先例。但是，团结工会对普通工人和民主墙活动家的影响（Chen Ruoxi 1982:35），无疑对推动中国工人成立自己的独立工会也极为重要。

虽然党的领导层非常担心“波兰病”蔓延到中国工人身上，但它并不想真正满足他们的民主化和独立代表的要求。当1980年秋天最初的恐慌平息之后，被下层干部所阻碍的有限改革旧模式再次出现，因此，工人的要求和当局的让步之间，越来越无法调和。最终，只有激烈的行动才能解决这一问题，例如邓小平在1982年首次从宪法中取消罢工权；而党也对独立的有组织的劳工感到恐惧和怀疑，所以在1989年它特别严厉地镇压自治工会。但是，在最终镇压民主墙和随之而来的工业动乱发生之前，工人对民主墙表示了，不应当被忽视。

### 1980年地方选举中的工人和其他活动家

1979年通过了新的选举法，规定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直接选举，允许更多的候选人参选，而且“提名过程更加开放”（Strand 1989:41），候选人不再需要得到当地党委的批准（Benton 1982:11）；任何选民只要得到另外三个人的提名就可以参选（Munro 1984b: 12）。在中国的一些城市，许多民主墙积极分子利用规则的（事实证明是暂时的）放宽，作为候选人参加了他们的工作单位的地方选举。在大学校园里，这样做要容易得多，因为在大学校园里，党的控制比较松懈，辩论被认为威胁不大（Strand 1989:42）；在单位里参选的工人往往会受到企业管理层的施压，但是尽管有这些不利的

条件，一些人还是参选了，并赢得了他们的同事的大量支持。

在 1980 年的选举中，有两位来自广州地区的民主墙积极分子和非官方期刊编辑作为候选人参选。其中的一位，方志远，是在北京的北大参加了选举，他从 1978 年开始就在北大读书（Munro 1984a: 79）。在那里，他担任广州杂志《人民之声》的北京联络代表，他在家乡时曾与该杂志有联系。在竞选期间，方志远提出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民主也是必要的，它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他还表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失败的反官僚主义革命，反动的“四人帮”和林彪试图利用这场革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两个观点都显示了 1974 年李一哲海报的影响，方志敏和广州及其他地方的几乎所有民主墙活动家一样，都熟悉这个海报（Benton 1982:91-3）。

从各方面来看，北大竞选期间的辩论是热烈的，而且常常是有争议的，它坦率地讨论了“中国是否真的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出现了一个可能已经成为新的统治阶级的官僚阶层，以及中国与苏联的政治性质是否基本相同等敏感话题”（Munro 1984a: 79）。同样，这场辩论的性质也相当清楚地显示了文革和 70 年代初民主墙的遗产。另一位参加地方选举的广东候选人是韶关的钟月秋，他是韶关一家冶炼厂的工人，曾任《平民之声》（Voice of the Common People）和《北江》（North River）两份地方非官方刊物的编辑。遗憾的是，由于许多关于运动的报道都带有都市偏见，而且与工厂相比，独立的选举候选人在大学校园更有机会宣传他们的观点，进行真正的竞选活动，因此，关于钟月秋的选举活动，我们知之甚少（Chen Ruoxi 1982: 30）。

在 1980 年，上海的傅申奇是工人活动家参与地方选举最著名的例子。<sup>29</sup>傅申奇作为《民主之声》的编辑，在上海的运动中已经很有

---

<sup>29</sup> 傅申奇在 1981 年春最后一次镇压民主墙时被捕。获释后，他似乎继续积极

名气；后来，他在全国人民刊物联合会中很活跃，并一度编辑联合会的刊物《责任》（Munro 1984a: 77-78；Chen Ruoxi 1982: 27, 32, 54-6）。傅申奇的参选遭到了他所在的发动机厂企业党委的强烈反对。虽然他经过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登记为候选人，但在领导层拒绝承认他的提名后，他最终不得不以非正式候选人的身份参选。他向当地选举委员会投诉这一事件和其他干涉他竞选的事件，结果委员会把他打成反革命和反社会主义分子（Chen Ruixi 1982:27; Munro 1984a: 77-8）：

尽管如此，他在竞选期间仍能发表一些言论（Chen Ruoxi 1982:27），在选举前一天，他向 500 名工人发表讲话，指出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林彪、“四人帮”等少数恶棍的行为，而是系统性的，其根源在于中国的苏联式政府和组织，它们过于集中。“解决方案在于彻底的政治改革，将国家的命运从少数特权者手中转移到‘合法的人民意志’手中”（《观察家》1980 年 10 月 20 日: 15; Munro 1984a: 77）。尽管企业党委采取了一些相当强硬的手段，在选举前不久，企业党委甚至威胁工人，如果投票给傅申奇，就会失去奖金，失去晋升的机会，但他的竞选活动还是获得了厂里工人的大力支持。他在第一轮投票中名列第二，但在第二轮选举中，当局违背新通过的《选举法》，干脆指定了第二位候选人，使他失去了获得席位的机会（Chen Ruoxi 1982: 27）。

北京也有工人参选的情况，和其他地方一样，他们和他们的支持者受到了企业管理层相当大的压力和骚扰。《责任》报道了两名北京工人何德福（He Defu）和龚平（Gong Ping）的竞选活动，显示了工人在藐视企业当局时通常会出现的问题，即使他们是站在法律一边的。何德福是有机化工厂的工人，龚平是氧气厂的工人，他们

---

开展政治活动，90 年代初，他因抗议上海逮捕独立劳工活动家，向外国记者谈论各种案件而被判处三年徒刑（《卫报》1994 年 2 月 21 日: 14）。

准备了一份联合宣言，是典型的民主墙论点：

中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长达十年的摧残。这清楚地证明，由于人民不治国，不掌握自己的命运，权力落入少数人手中，他们的错误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目前，中国的主仆地位是颠倒的。但人民强烈希望他们选出来的人能够真正代表他们。人民代表的作用是维护和争取人民的根本利益，监督执政党的政策和措施……。我们把这次选举看作是对执政党的一次考验。它是相信人民，与人民站在一起？还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

(Zheng Xing 1981:101-2)<sup>30</sup>

他们的竞选纲领还要求把提高生活水平作为全国性的优先事项，并将这一承诺写入宪法，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案中(Zheng Xing 1981: 102)。何德福在选举中得了第三名，而龚平在他的厂里得了第四名。但龚平的领导干部对竞选活动进行了公开的干预，“对每个选民都进行了‘个别谈话’和‘打招呼’，所以弃权的人很多”（郑兴 1981:102）。这表明，工人提出民主要求，而干部希望维持地位、平息车间反对意见，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干部仍然在用 50 年代流行的对付闹事者的方法——“一对一的威胁”。

在他们的宣言中，何德福和龚平指出，工厂里普遍认为“选举只是一种形式，代表是事先秘密选出来的”，并补充说，“我们相信以前的选举也是这样。但现在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从现在开始，情况

---

<sup>30</sup> 另参考《十月评论》1982b: 18-19 中的何德福、龚平。本文引用了这两位工人宣言的原文注释中文。在 Munro 1984b: 12 中也提到了他们的运动，在那里，他们两人被描述为既在化工厂工作，又是非官方杂志《北京青年》的编辑。《责任》只把何德福列为该杂志的编辑。

将有所不同”（郑兴 1981：102）。前一年，在新《选举法》通过前不久，作为官方有限民主化改革运动的一部分，一篇文章提出了非常类似的意见，承认工人对民主选举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

在以往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各类工人代表等职位的选举中，厂党委公布了候选人名单……。这往往是在没有进行民主协商的情况下进行的，而这本应是首先进行的，投票只是一种形式（Zhi Exiang 1979:6）

据报道，在其他试验性选举的例子中，工人们也同样对程序产生怀疑，不去参与选举，并说：“我们想等一等，看看选举是否会以民主的方式进行！”。《北京评论》1980年9月1日：24）。鉴于有充分的怀疑企业内部选举和地方人大选举的公正性，再加上有时干部会明确地威胁，各种工人活动家在1980年如此接近于赢得选举，这个结果就更有意义了（Munro 1984b：12）。在某些情况下，工人也提供了经济和选举支持，比如在长沙，工人募集的大量资金资助了一名学生候选人的竞选活动，该候选人在官方骚扰和反对的情况下仍在努力坚持（Benton 1982：11）。据报道，长沙工人还在当地党委外面张贴大字报，支持学生活动（Chen Ruoxi 1982：35）。

但是，民主墙活动者走出去寻求群众支持的机会期是短暂的。从上面讨论的几个案例中可以看出，地方当局有能力破坏选举，阻止具有威胁的候选人当选，而本应保护这些候选人自由竞选权利的法律规定，是不充分的。1984年的下一轮地方人大选举“是在一种更有控制的气氛中举行的”（Strand 1989:42），而1986年地方选举再次成为表达异议的媒介，这将在下一章中看到。

## 对民主墙的最终镇压

1980年9月起，民主墙运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加上工业动乱的兴起和要求独立工会的呼声，党认为这些都与民主墙有关，这也最终决定了民主墙的命运（Chen Ruoxi 1982: 36）。1976年的抗议大体上是地方性的，规模相当于工作单位，比较零散，全国人民出版联合会（National Federation of People's Publications）的成立（Rosen 1988:13, 26-30）使抗议活动从上升了一个层次，使它更多地威胁到党的控制，就像文革中的大型造反派联合会一样。同时，不安分的工人不仅组织起来应对企业中的具体纠纷，而且要求组建完全独立的工会，有时还这样做了，甚至主张工会发挥明确的政治作用：一份非官方刊物《海浪花》坚持认为，团结工会是一个工人政党，只是由于必要的谨慎才使该组织本身不承认这一点。它认为大罢工和组织自治工会是明显的政治行为（《海浪花》1980: 20）。1981年3月，三名太原印刷工人因组织“中国民主党”而入狱（《十月评论》1982:47）。

民主墙太迟钝了，没有意识到群众运动实现民主和自治的潜力。起初有许多充分的理由让大多数人不敢积极参与运动，比如对政治的失望，害怕与那些被党打为无政府主义者、破坏分子、罪犯、反革命分子和“四人帮”党徒的人联系在一起（南方日报 1979年4月9日和18日、5月31日；人民日报 1980年2月8日和21日；罗森 1988: 20；Chen Ruoxi 1982: 25-6）；《南方日报》甚至把与警察发生冲突的民主墙“闹事者”与强奸犯、杀人犯相提并论，所有这些人都是用专政的“铁拳”来对付（《南方日报》1980年2月9日）。大卫·斯特兰德（David Strand）认为，早期的运动关注改造个人，这阻碍了运动向群众运动的过渡，“在更明显的集体表现中……运动的动荡使

得与它产生联系变得危险”（斯特兰德 1989: 29）。这里面有一些道理，虽然民主墙不是由改造个人引发的，而是由“四五”运动的引起的，是一场数十万人参与的运动（Heilmann 1990:80）。

党比民主墙活动家更早地察觉到，民主墙与大规模的工业反抗和工人自组织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危险的。“在把动乱归咎于民主墙的时候，中共表明了它的信念，即每当普通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开始制造麻烦的时候，一定有更聪明的人在幕后指挥”（Leijonhufvud 1990:136），但是二者联合起来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党是新的统治阶级，它篡夺了工人阶级的名义，为的是更好地剥削它。1981年春天，官方报刊开展了一场驳斥民主墙的运动，并为中共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最终裁决做准备。在这一系列文章中，中共否认中国存在任何官僚阶级或特权阶层，并指责那些声称要攻击这个新阶级的人是文革式的无政府主义，企图推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中共也否认党和国家以剥削的方式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并在为中国共产党辩护时，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一贯反对官僚主义和多次开展消灭官僚主义的运动，但没有提到三反等重大运动实际取得的进展非常有限（《解放军报》1981年2月9日；《红旗》1981年3月1日：12-18；《南方日报》1981年4月2日）。

1981年6月29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做出了正式评价，在定稿前已经讨论了一年，并经过了多次修改，似乎主要是为了减少对毛泽东的批判（MacFarquhar 1990:329-30）。它的正式通过，以及1981年初结束的对“四人帮”的公开审判，标志着毛泽东去世后高层权力斗争的一个转折点，这对民主墙运动具有重要意义（Benton 1982:12-13）。邓小平一派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了胜利，运动对他们来讲就不再有用处了，于是最后一轮逮捕就可以开始了。

考虑到这一背景，对“四人帮”的审判，以及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它称作一场中国的一场浩劫），中共把民主墙运动者与林彪和“四人帮”联系在一起是很正常的，民主墙对官僚主义和特权的攻击被谴责为要制造“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解放军报》1981年2月9日；《红旗》1981年3月1日：12-18）。前造反派又一次“从林彪、毛泽东和‘四人帮’的牺牲品……变成了‘四人帮’的所谓走狗”，忽略了“造反派的普通成员与‘四人帮’及其党羽没有任何关系。”这一事实（《解放军报》1981年2月9日；《红旗》1981年3月1日：12-18）。事实上，像李一哲思潮这样的前造反派，在批评四人帮的激进政策时，是冒着极大的危险的（A Chan 1993:72-3）。也许更令人惊讶的是，八年后，人们发现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中共也是这样谴责工人活动家的，当时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报纸上，把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和其他工人团体的成员比作“四人帮”，并贴上“‘四人帮’的罪恶残余”的标签（陆平 1990：16；《工人日报》1989年6月28日）。

虽然在80年代初期，把企业的实权交给工人的建议都没有取得成果，一如既往地因干部的抵制、党的最高领导层对民主化缺乏决心而失败，但随着1982年起改革的推进，生活水平提高了，这压制了民主墙被镇压之后愈演愈烈的工潮。但这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因为它现在仅仅依靠保持收入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来赢得城市工人的忠诚。这就意味着，如果经济不景气，或者通货膨胀对工人家庭收入的侵蚀过大，一个斗争经验相当丰富的群体，很可能会再次向统治者发起挑战。下一章将探讨1989年胡耀邦逝世引发的民主运动是如何发生的。

## 第七章 “让整个国家知道，工人们组织起来了”：1984年-1994年

1989年春天，学生们发起了一场民主运动，许多城市工人给予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工人们改革的信心发生了动摇，再加上对城市高通货膨胀的担忧和对日益明显的官场腐败的愤怒。在运动中，工人活动家首先是作为支持者参与其中，然后建立了组织，提出了政治纲领，就其激进性和对党的统治所构成的潜在威胁而言，它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学生提出的建议。当时许多观察家认为，工人史无前例地参与到1989年的抗议活动中；本研究已经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但在1989年，中国确实出现了一个历史上最广泛、最公开的工人自治组织。

在80年代的工业改革过程中，工人开始失去了许多福利，如就业保障，而这些福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们在工作场所的无力，与此同时，对他们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企业要求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疏离感和被剥削的感觉日益普遍。中共明显放弃了工业领域的社会主义原则，而工人的反应，表明了他们忠于对其中一些原则。让我们先来看看工人如何看待改革，以及改革如何在80年代影响工人的利益，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政治对抗。

## 1984-1989 年产业改革的影响

1981 年民主墙被最后镇压后，经济改革顺利进行，虽然工人仍然关注他们与企业管理层、党和官方工会的关系，希望解决其中的问题，但是这些并没有阻碍改革。在 80 年代初和中期，在反对文革时期的“广泛民主”、过度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运动中，工人的民主权利不可能有太大的进展（《广州日报》1984 年 9 月 25 日）。

任何试图维护底层人民权利的行为，都可能被视为红卫兵式，被看作是对合法权威的攻击，属于越界行为。最近与不安分的工人的对抗，似乎也成了官方工会的心头大患，因为在 1984 年底的一次中华全国总工会会议上，工会被警告要用一切手段阻止工人进行任何“全国性的、跨地区的和跨行业的活动”（Wilson 1986:237）；当然，罢工的权利已经从宪法中删除了。经历了一次这样的风暴之后，领导层决心防止中国工人中的“波兰病”进一步爆发（裴宜理 1995:314）。

民主墙结束后，官方工会的作用再次回归正统，在团结工会式的运动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之后，很快就不再强调工人经营企业的权利，以及工会对会员的义务。虽然中共承认企业中的干群关系并不完善，但很少强调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强调工会要动员工人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及对工人进行思想教育（《人民日报》1983 年 10 月 19 日）。当报刊坚持工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同一性时，这表明工会回归正统，并对工人的不满熟视无睹，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不满就不能提出来，否则就是不合法的。

80 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大部分地区经济衰退，中国当局借此机会提醒国内工人，他们的日子相当好，西方的高失业率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人民日报》1983 年 10 月 27 日）。到 1983 年底，

中国 70 年代末的青年失业高峰（通常与民主墙期间的抗议和暴力有关）已经过去，一些工人已经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好处，比如工资和奖金增加，并且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所有工人都会受益。在此刻，这种比较是安全的。城市里的人都知道，农业改革成功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有人认为，改革对工人的好处会更大，因为工人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群体，文化水平比农村的工人高（《人民日报》1981 年 7 月 22 日），因而更能理解改革，推动改革。工人们改革的期望值很高，不仅仅是物质利益，还包括提高工作效率，改善工作中的组织和管理；他们常常觉得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无能管理和供给瓶颈，使自己的辛勤劳动付之东流。人们的期望值很高，尤其是因为官方宣布的改革有意提高了期望值（M M Yang 1989:55），但是后来的现实没有达到工人及其家庭心中的希望，从而产生了不满情绪。

## 打破铁饭碗

中共的工业改革方案，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表述上的困难，因为它不想让工人觉得它放弃了社会主义。然而，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合同制和企业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这两项措施都是在 80 年代开始的，后者是 90 年代改革更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被解释为将资本主义的因素引入中国经济。当局不遗余力地证明，他们所批判和计划废除的制度，即所谓的终身职业保障和工作单位福利，也就是“铁饭碗”，并不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是这个制度的扭曲之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制度是中国工业生产率低下和质量问题的原因。但要让工人们相信，改革并不是在攻击他们最珍视的成就，始终是一场斗争。

反对“铁饭碗”和“吃大锅饭”的运动就是一个例子。新闻界对旧

制度缺陷的描述，强调了工人知道无论工作表现如何，都会有工资，而且工资差不多，并认为这对生产力造成了负面影响（《广州日报》1984年7月8日），还竭力把旧制度与文革左派时代联系起来，这样的话，为平均主义或社会保障辩护，就显得是在为后期的毛泽东主义和“四人帮”极端主义辩护（《广州日报》1984年5月28日）。大概是因为工人的态度似乎是最容易改变的部分，改革派强调抱着“铁饭碗”的心态是中国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唯一原因，但正如帕特·霍华德（Pat Howard）所指出的那样，这忽略了关于技术和充分就业目标的争论，这些因素也是生产率低下的因素（P Howard 1991: 94）。这实际上就是在告诉工人们，他们的懒惰是企业业绩不佳的罪魁祸首，如果他们反对向少数人支付大笔奖金，他们就是在嫉妒别人来之不易的成功。媒体在这一问题上的一致态度，使人们对改革中的“公平或社会公正的诉求”没有任何表态的余地，所有这些诉求都被归结为“吃大锅饭”，是“名誉扫地的毛泽东时代的残余心态”、是不合理的“平均主义”，是嫉妒导致的“红眼病”（A Chan 1993:41）。

但是，尽管不断有人公开诋毁平均主义和过度的工作保障，但工人们根本不相信，他们依恋这些旧制度的特征，他们不认为这是旧式左派教条主义和嫉妒的产物。相反，许多年长的工人尤其感到深深的怨恨，因为他们一直认为保障是社会主义的一项好处，而这在80年代从他们身边溜走了，他们抱怨说，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新社会而奋斗，却又回到了为工作和工资保障而恐惧和焦虑的噩梦中”（P Howard 1991:114）。“我们许多革命同志，为了全国人民能有一个铁饭碗而奋斗了一辈子”（G White 1987:379），这种信念在工人当中十分强烈。党坚持认为铁饭碗和平均主义不等于社会主义（《广州日报》1984年12月29日），但工厂里似乎很少有人相信。看来，三十年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比中共预期的要成功得多，特别是在就业保障和工人在中国的地位问题上，他们不仅仅是雇佣劳

动者（G White 1987:384）。

对于邓小平提出的“少数人先富起来”，工人们并不买账，他们认为这仅仅是不公平的分配（Leung Wing-yue 1988:207-8；王绍光 1993:184），因为这些少数人生产的价值，怎么可能真的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十倍或二十倍呢？工人们对个人奖金差距急剧拉大的反应，往往是颠覆奖金分配，向管理者施压，以确保资金相对平均地分配（Walder 1987:26），甚至设计出在他们之间集中奖金的方法，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得到大致相等的利益（Shirk 1981:585）。一些按照西方标准不会被认为是非常大的工资差异，却使许多工人感到愤怒，他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的（A Chan 1993: 40；Walder 1991: 479）。工人的奖金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奖金之间差距越来越大，有时可能比工人的报酬高出二三十倍，而且这些奖金并不总是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的事先批准，这进一步降低了这一机构在工人眼中的合法性，从而引起了工人的强烈不满（《北京工人》1989年5月）。即使职工代表大会确实批准了，这也会使工人与干部之间的报酬差距日益扩大，“导致工人与干部之间的对抗增强”（Walder 1991: 480）。

工人们发现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比起他们自己卑微的铁饭碗，老板们享受的“金饭碗”是否更应该被废除。但是，改革对工人与干部关系的不利影响，不仅仅是因收入不平等加剧而引起的纠纷，尽管这些纠纷很严重。企业对工人提出了更高的效率要求，管理上的缺陷成了争论焦点，并且程度空前激烈。早在50年代，就有因为管理无能导致材料短缺，工人因达不到生产定额而丢掉工资的情况，这经常会引起人们的抱怨，而在改革中，由于奖金成为工人正常工资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管理的失误而被迫放慢或停止生产，达不到目标，引起了工人的极大不满，有时会导致工人集体缺勤或者说一些闲言碎语（M M Yang 1989: 52-4）。管理者的无能，被认为与工人对“铁饭碗”的依恋一样，是生产率低下

的重要原因（G White 1987:379），虽然在改革之初就有人建议，允许工人选举厂长以下的管理者，以提高管理质量，但这一制度从未得到广泛实施，使得受管理不善影响的工人，除了罢工或者怠工以外，别无他法。管理人员似乎仍然只觉得对上面的人负责，而不是对下面的工人负责（M M Yang 1989:49）。

### “科学管理”和改革中工厂经理的权威

在国营部门，中共很小心地掩饰明显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做法，但是在为外资建立的经济特区中，就没有必要掩饰了，资本主义形式的管理和劳资关系是存在的，因为这些地区被隔离在中国工业的其他地区之外，被视为试验区。然而，工人们意识到，今天在深圳发生的事情可能在一两年后发生在他们自己的企业里，他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看着短期雇佣合同等措施的出台。经济特区里外资企业的经营方式，似乎确实对周围地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诸如“更多的管理控制和监督，更快的流水线速度……（以及）加班时间的数量”等特点，使观察者们印象深刻，这与远离经济特区的老牌国企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里，这种改革几乎还没有实施（P Howard 1991:106-7）。虽然泰勒制或科学管理只在受经济特区影响最大的地区（如广东）得到充分和公开的实施，但在中国工业界，可以看到向更多的管理权威、规范和纪律的转变。不仅是在中小型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事实上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在这些地方，改革使权力从党委书记转移到厂长，厂长现在负责企业的利润和亏损，并寻求“加强劳动纪律，实施重罚，提高生产规范，调整奖励制度”（A Chan 1993:42），试图确保劳动力的服从，提高生产力。

广东是许多工业改革措施的先锋，不仅是深圳和珠海的经济特

区，整个省也是如此。1984年中，《广州日报》在城市改革计划正式开始后仅几个月，就刊登了一篇关于海珠区钟表装配厂的文章，赞扬该厂大胆借鉴国外和香港的经验，引进“严格的科学管理制度”。该厂实施的是典型的泰勒制。定额上调，完成一项任务所需的时间以秒为单位；训练工人“消除多余的动作”，以达到尽可能高的生产效率；所有员工都背向门口，这样当有人进来时，他们就不会浪费宝贵的几秒钟时间抬头看，而且在工作时间内绝对不允许说话、吸烟、吃东西或喝水；计件工资；以及严格的纪律，一个工人迟到一次就会失去整个月的奖金（《广州日报》1984年7月10日）。但与六七十年代不同的是，现在没有人急急忙忙地证明这种制度不是泰勒制，不是资本主义式的“科学管理”；该厂作为企业自治的早期试点企业，自诩为拥有雇佣和解雇的自由，不受工业官僚机构“婆婆妈妈”的干涉，并自豪地宣布，已经辞退了三十多个不合格的工人。这种“旨在从这些人类机器中尽可能多地榨取剩余劳动力的管理方法”（A Chan 1995:48）在90年代变得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在中国东南地区的外资制造业中，但令人震惊的是，早在1984年就有人吹嘘这种方法。

一些支持这种管理的人，认为它十分“严格”，并不厌其烦地指出，保守的左派守旧派反对这种改革，他们则是进步的、自由化的和民主的，但事实上，许多主张科学管理的技术官僚对民主也有非常具体的定义，他们倾向于精英的新权威主义，而不是大众民主（A Chan 1993:46），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不民主的、榨取式的劳动过程对他们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虽然国营企业没有经历泰勒制，没有达到类似的程度，但在80年代，确实出现了一个类似的过程，即企业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厂长手中，而把工人、职工代表大会、官方工会，甚至党支部都排除在外。厂长的权力范围如此之大，以至于这种趋势被一些人描述为相当于回到了一长制的状态（Wilson

1986:233; Leung Wing-yue 1988:99)。

权力下放和扩大企业自主权、赋予厂长权力的计划，与民主管理和工人参与的目标之间存在着矛盾，这在改革之初就十分明显。尤其是1984年实行“厂长负责制”后，更是如此。厂长负责制规定，企业党委退居二线，转而扮演政治和思想教育的角色，而厂长则独揽企业日常管理、远期规划和生产定额达标的权力，只是在某些方面要征求工会或职工代表大会的意见，而工会或职工代表大会的反对意见，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被否决(Child 1994:66)。厂长还有权任命、调任和解聘中层管理人员，即使在那些进行职工民主选举的企业中也是如此(《广州日报》1984年6月8日)，这清楚地表明，旨在让工人在企业决策中拥有话语权的制度，与企业改革的新方向之间存在矛盾。

1984年实行厂长负责制时，报刊上就有警告，其中不乏赵紫阳这样的人物，认为如果要避免权力从大多数工人手中转移到一个最高领导人手中，就必须加强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等民主机构的建设(《广州日报》1984年5月16日、8月26日、10月19日)。但从制度实行三到五年后的结果来看，这些警告并没有得到重视。《工人日报》曾按捺不住地使用“对立统一”的毛派老口号，试图将这些根本不相容的制度成功地结合起来(《工人日报》1987年5月5日)，它还说，正如工人和工会干部原来所担心的那样(Leung Wing-yue 1988: 99)，在实践中，厂长的全能角色被过分强调，而民主管理却被放任自流(《工人日报》1989年6月27日)，导致厂长负责制成为像50年代一长制一样的独裁者。虽然早在1979年就开始了企业自治和将权力下放到厂长的实验，但直到1995年，工人在新环境下的权利才得到了《劳动法》的保护，这表明维护工人利益的具体措施远远落后于最高管理层权力的增加。劳资关系的急剧恶化，是泰勒制在中国工业界蔓延的主要结果(王绍光 1993: 185;

陈 1993: 40)。

## 工人在自治企业中的声音：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

许多报告批评厂长的权力增加，比如干涉工会任命，不支持和执行职工代表大会决议。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这些代表和保护企业工人利益的机构改革，在 80 年代初并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在 80 年代末的中国企业里，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与一开始一样的无力”（Walder 1991:479）。职工代表大会的有效性仍然取决于党委的态度，而且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厂长的态度（Leung Wing-yue 1988:110），而官方工会并没有能够重新赢得工人的效忠和信任，在民主墙期间，工人们有时会在纠纷中采取自我组织的方式，他们认为官方工会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他们斗争中的有用盟友。改革的开始，情况就不容乐观，到了 80 年代末，随着厂长权力的增加，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的影响力进一步降低，情况变得更糟。到了 80 年代末，工会自己的预测是，如果不进一步发展民主管理以制衡厂长的全能地位，那么企业中的冲突就会增加，这一点被罢工的增加所证实，其中很大一部分罢工是由于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未能维护工人在企业中的权利（Leung Wing-yue 1988:117; FBIS-CHI-89-042 1989 年 3 月 6 日:32; 裴宜理 1995:315）。

整个 80 年代的报告给人的印象是，官方工会的主要问题，自毛泽东时代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改善。1984 年年中，广州市总工会响应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号召，要求基层工会组织使成为工人的“家人和朋友”，报告说，全市很大一部分企业工会分会，没有达到这一理想，需要尽快整顿组织，与工人建立密切的联系，代表工人说话，为工人排忧解难，从而取得工人的信任（《广州日报》1984 年 5 月 28 日）。

更令人震惊的是中华全国总工会自己在 1988 年春进行的一项调查。在调查中，只有不到 10% 的被调查者认为工会能“为工人说话，解决工人的问题”，25% 的被调查者认为工会“只收会费，搞娱乐活动”。当被问及自己所在的企业工会能否称为工人的“家人”或“朋友”时，只有不到 20% 的人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而近 55% 的人回答“没有”或“不是”。30% 的人认为职工代表大会是有效的或非常有效的，但 70% 的人认为职工代表大会只是偶尔有效，或者只是在形式上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工人们注意到，在 80 年代末，工会运作方式唯一不同的地方是，现在工会干部由厂长指挥，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由企业党委书记指挥。工人们说，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向工会求助来解决他们的问题（Chiang 1990: 85-6）。

两年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工人意见进行的一项类似调查也显示，大多数工人对工会的表现持负面评价，其中年轻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对工会的批评最多（Wu Shouhui 和 Guo Jinhua 1987: 55-6）。当被问及职工代表大会和民主管理时，工人的回答也是同样的，即使是 45 岁以上的受访者，其评价也是消极多于积极（Li Hua 1987: 69-70）。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研究人员在分析调查数据时声称，几乎没有发现工人强烈要求民主管理的证据，大多数工人反而更关注工会在福利和帮助他们提高技能和生活水平方面的无能（Li Hua 1987: 72, 79）。但到了 1988 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官员经常把企业缺乏民主权利作为罢工和劳资纠纷的原因（《工人日报》1988 年 4 月 13 日和 7 月 8 日；Leung Wing-yue 1988: 117）。

有可能在这两年中，工人们越来越认为，他们在企业中的政治地位薄弱和缺乏权利，是他们经济困难和工作越来越不安全的原因，特别是随着通货膨胀和腐败问题的出现，使工作场所的纠纷政治化（Walder 1989b: 34）。同样，工人对官方问卷的回答也完全有可能是持戒备态度的；其他研究者发现工人在某些情况下愿意表达对民

主管理的要求，但当高层管理人员在场时就不愿意了（M M YANG 1989: 48）。也可能是因为工人对民主管理期望值很低，对许多普通生产工人来说，这种选择“无法实现”（Pateman 1970:81-3），而工会提供福利和社会服务，则是最起码的期望，因此，当工会无法履行这一基本职责时，工人们很有可能表达不满。

为了说明工会在工人中的名声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我们举1987年青岛的一个案例。在这个案例中，一个企业的工会分会连保护自己的能力都没有，站在管理层一边，反对工人自己民主选举的代表。一家压力表厂的工人因批评企业领导层在生产数字上弄虚作假，对医疗费赔偿的规定执行得过于死板，被迫离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的岗位。一位工人（他最终去世了）的医疗费纠纷，使双方的情绪对立升温。企业工会负责人违反正当程序，下令将这位工人代表从生产岗位上撤走，并让这位工人拿着每天一元钱的生活费“等待重新分配”（《工人日报》1987年6月15日）。

一个被选为职工代表大会成员的人，却受到这样的待遇，企业工会还为管理层的报复行为撑腰，但工厂的工人对此已经见怪不怪，工人们评论说：“整天说民主，但在我们自己的职工代表大会上，连真话都说不出来”（Leung Wing-yue 1988: 110-11）。中华全国总工会评论说，当一个工会不能维护工人的民主权利，不能发挥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管理作用时，它不仅失去了工人的信任，而且还与工人对立起来，这样的工会是没有价值的（《工人日报》1987年6月15日）。许多工会官员在80年代末已经严重担心，像这样的事件，进一步降低了工人对官方机构的信心，只能导致工人放弃官方工会，就像1956-1957年一样，在发生纠纷时自己组织起来（《工人日报》1987年8月11日；FBIS-CHI89-042 1989年3月6日：32）。

当工会确实试图维护工人的权利时，他们经常会遇到位高权重的厂长的阻碍，发现自己受到管理层的骚扰和恐吓，或者被调职、

降级，甚至被解雇，管理层通过这些手段对他们合法的工会活动进行惩罚（Leung Wing-yue 1988: 116；《工人日报》1987年8月9日和11日）。在1989年的示威爆发前几周，人们还在紧急呼吁工会改革和民主化，使工会真正代表车间工人，独立于管理层和党之外（《工人世界》1989年2月），这证明了人们对工人诉诸自主组织的担忧是有根据的。在最高层，中华全国总工会能够推动官方工会有更多的独立性，但当时党内的政治路线普遍保守（Wilson 1990b: 271），并且在工会组织的基层，厂长或党委占据主导地位仍然是常态（Wilson 1990a: 56）。那些加强工会对党和管理部门的独立性，并使工会处于成员的民主控制之下的措施，显然未能缓和工人们的不满，面对城市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工人们在1987年和1988年进行罢工和停工，并参加了1989年的民主运动。

职工代表大会变成橡皮图章，只能肯定管理层的决定，工会受制于企业中拥有实权的人，并受到大多数成员的蔑视，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再熟悉不过了，这意味着仍然没有适当的官方渠道来表达和解决工人的不满，以免它们变成重大对抗。从1986年到民主运动前夕，工人们的不满不断增加，这为工人们日益增长的罢工、怠工和其他抗议活动埋下了伏笔，他们看不到任何其他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也看不到如何反对日益不安全的大趋势，如何解决自己从“企业主人”被贬为“雇工”的不满。无论这些罢工是多么的地方性、小规模和短暂，它们都表明“一些工人已经意识到组织的重要性”，1989年运动中独立工会的形成不是“突然冲动的产物，（而是）一个重要趋势的指标”（王绍光 1993:186-7）。

1986-1989年城市改革的失败：不安全、腐败和通货膨胀。

如同以往所有的对抗一样，经济环境和工人日常生活，是工人支持 1989 年抗议运动重要原因。在 1989 年的春天，自治的工人组织非常迅速地出现了，这可能是因为，在 80 年代后半期的改革中，工人的处境明显恶化，由此激发了不满。上一章指出，在改革的早期阶段，不安分的工人在某种程度上被涨工资成功地“收买”了，但是即使在那时，对价格上涨和工作保障减少的担忧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似乎很明显，中共兑现其承诺的机会是有限的。如果未能实现改善，那么 1980 年和 1981 年开始出现的动荡和自我组织可能很快在中国重现。

在 80 年代的后半期，特别是 1987 年以后，人们对生活水平提高的期望，与大多数工人阶级家庭经济状况恶化的感觉发生了冲突。这种感觉是否真实并不是真正的重点；正是由于工人们普遍感到中共的承诺被打破，工人的希望被背叛，所以他们才会去民主运动（Walder 1991:470-3）。在对改革时期的调查中，香港期刊《明报月刊》指出，公众对改革的情绪从 1987 年初开始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并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直到 1989 年春天，对政府的普遍不信任和对生活水平的悲观，以及对官员腐败的厌恶，使城市居民几乎普遍支持民主运动（《明报月刊》1991 年 10 月：24-8）。关于民众对改革的看法，首先要注意的一点是，在 1987 年以前，城市居民的收入总体上一一直在增加，人们希望农村承包责任制的成功能够在城市重演，从而使生活水平得到同样惊人的逐年提高，这令人想起 40 年代末的土地改革，当时土改的成功在城市也产生了很高的期望，二者形成了讽刺性的呼应（《明报月刊》1991 年 10 月：24）。到了 1987 年，许多城市市民实际上已经把收入的提高看成是改革的代名词，但当收入增长放缓，甚至出现了倒退时，政权就会面临问题。1988 年，中共开始进一步进行价格改革，但没有了城市工资上涨的缓冲，出现了恐慌性购房和挤兑银行的现象（《明报月刊》1991 年 10 月：

27)。

《明报月刊》文章指出，在 1987 年的两次民意调查中，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安全比个人收入增加更重要（《明报月刊》1991 年 10 月：26），虽然从 1979 年开始，改革就体现出对这种保障的威胁，但直到 80 年代末，政府才真正开始拆除 50 年代建立的社会主义福利供给体系，在住房、医疗、就业等方面进行改革（特别是推行无保障的合同制就业，这意味着自 1949 年以来，城市失业第一次成为经济的一个长期特征）。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对改革派关于“砸烂铁饭碗”的口号，工人们的反应是惊恐和敌意，现在恐惧已然成真。此后开始出现下岗工人生病和无法获得医疗费帮助的案例（王绍光 1993：186），工人们普遍越来越担心缺乏社会支持；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他们一生中第一次为医疗费而烦恼（Wang Xiaodong 1993：156）。

同时，1988 年全年，中国执行了紧缩货币的政策，这意味着到 1989 年初，多达三分之二的城市工厂都没有满负荷运转，因此，从事短时工作的工人（往往是每周工作两三天）得不到全额工资，更不用说达到生产定额的常规奖金。许多人的工资只有平时的 70%（1990 年 3 月 9 日《南华早报》），在物价改革不断深入，通货膨胀率为改革以来最高的情况下，这成为工人们不满的主要原因。一般认为，城市通货膨胀率非常高是主要原因，但也受短时工作制和停发奖金的影响，1986 年底至 1988 年底，城市工业实际收入实际上略有下降（Walder 1989b：31；1991：471；《明报月刊》1991 年 10 月：26）。据中华全国总工会自己估计，1988 年大多数城市家庭的实际收入下降，25%至 30%的工人降到了温饱水平（Wilson 1990b：270）。

尽管这只影响到少数劳动力，而且是国营部门的少数劳动力，但 1986 年实行的定期合同制，是工人不满情绪积累的里程碑之一。

对工人来说，合同制“既是侮辱又是威胁”（G White 1987:377），一劳永逸地消除了他们“主人翁”地位的幻想：

即使工资被重新分配或降低，企业仍然可以说服工人，让他们觉得自己在控制着企业；但要让那些面临裁员的工人相信他们是企业的主人，则需要很大的想象力。（Leung Wing-yue 1988: 97-8）

当局很难在意识形态上为这一措施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因为这一措施显然是为了让管理层更容易地解雇多余的或不受欢迎的工人；这种“新的”合同制与 60 年代刘少奇推行的制度也很难区分开来，而后者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大推动了工人地激进主义（G White 1987:377；Warner 1995:61）。将工人隐蔽地划分为第一阶级和第二阶级，实际上复制了苏联的双重雇佣制度，这种制度不仅是苏联的特色，从 50 年代末以来就被认为不适合中国，而且更具破坏性的是，它完全是资本主义的措施（P Howard 1991:105-6）。

最初在广东进行制度试验时强调，只有新员工才应该实行合同制，这些新式合同工在企业中不会是低人一等、受剥削的群体，而是在享受企业同等权利的同时，获得比正式工略高的工资，以此来补偿他们缺乏长期保障的处境（《广州日报》1984 年 6 月 5 日），60 年代的合同工和临时工缺乏政治权利，已经被认为是一种公然的不公正。但从有关该制度实际运行情况的报道中可以看出，80 年代后期合同工在企业中的待遇和作用，往往与 60 年代的合同工差不多，并没有享受到与正式工平等的权利（《广州日报》1984 年 11 月 9 日）：

有投诉称，尽管被分配到最困难、最肮脏和最危险的工作，但工资却受到歧视。有关于违反合同的报道，还有

工人在以最低报酬完成学徒期后，企业拒绝给予晋升的报道。有报告说，在“许多”单位，工人被排除在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成员之外。有报告说，工人在生病〔或〕受伤时被解雇（P Howard 1991:100）。

预计到 2000 年，大部分劳动力将处在合同制之下（P Howard 1991:98），但实际上进展相当缓慢（在编写本报告时仍在进行）（Walder 1987:41；Wilson 1990a:50），特别是在国营部门，据估计，1992-1993 年，只有不到 20%的国企工人签订了定期合同（M Warner 1995:61）。进展缓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被动、不同意和抵制”，这不仅是因为既得利益受到攻击，而且也因为“一般的意识形态原则”（G White 1987:378-9）。对这一制度提出反对意见的，不仅是那些直接受影响的工人，而且是所有其他担心这一制度迟早会落在他们头上的工人；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流传着将所有人变成合同工的谣言，而一些国营企业确实将合同制应用于所有工人，而不仅仅是新雇员（P Howard 1991:98-9），这种担心变得更有可信度。因此，即使是在仍然长期受雇的工人中，到 80 年代末也产生了“对工作保障的恐慌”（Walder 1991:478）。

合同雇佣制进一步增加了厂长的权力，因为与解雇长期工人不同，不续签雇佣合同不必经过职工代表大会的批准（P Howard 1991:102），而是在最高管理层的权力范围内。但是，即使不解雇工人，管理者也有其他措施可以对工人施加压力，包括将不受欢迎的工人强制转到劳务公司，等待重新分配到另一个岗位，这期间工人的薪水会大大缩减，这些为建立中国劳动力市场而设立的劳务公司，成为管理层“惩罚顽固的或反抗的工人”的工具（Walder 1991:478）。在这个企业自治的新时代，厂长的行为缺乏约束，这也使得一些厂长的行为明显是腐败或自私自利的（A Chan 1993:42），这只能增加

工人的愤怒和不满，因为他们开始将自己视为城市改革的主要牺牲品。

对于工人支持抗议的规模和力度，有人提出了两种解释，一是以前在大型国营企业中享有特权的工人感到被剥夺(Chan 1993:43)，二是尽管城市收入普遍提高，但对改革的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Jonathan Unger 1991b: 3; Wilson 1990a: 58)。这两种解释都有相当的道理，但它们并没有完全看到，工人的政治地位以及物质地位在80年代末急剧恶化(王绍光 1993: 187)。将企业出租给经理人一段时间，这样的措施，极大地削弱了工人的“主人翁”意识(Leung Wing-yue 1988: 207-8)，而在没有正式向工人宣布外包的情况下，情况更加恶化，工人从晚间新闻中得知这一决定后，认为自己只是被当作单位固定资产的一部分，由经理人拥有，他们可以继续留用这些工人，或按自己的意愿处置(Leung Wing-yue 1988: 100)。再加上合同制就业使工人感到自己越来越像“雇工”(G White 1987:380)，这一措施有助于打破任何残存的观念，即工人和管理层之间的关系不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也不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

对立是如此的清晰，因此工人当然需要自己的独立组织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对抗管理层庞大的新权力，不仅是在准资本主义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工人世界》1989年2月)，甚至在国有企业中也是如此。50年代也有许多工人极度疏远管理层和政权，并认为自己在某些方面，不如1949年以前资本主义下，甚至在工业领域完成了社会主义过渡之后也是如此，到1989年，工人们更有理由感到有必要进行自主的集体抵抗；企业中的疏离程度，使得工人的自主集体反抗不可避免(Wilson 1990a: 59; P Howard 1991: 113-14)。

在民主运动前夕，工人们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十分低下，这是引人注目的，他们把诚实工作所得到的回报，与那些通过关系

所得到的回报进行了比较，并发现自己不如那些投机钻营的人（《中国新闻》1989年1月4日：6；Walder and Gong 1993：20）。在工运报刊上，有人公开认为，工人认为自己不是主人是正确的，因为尽管他们的生活比1949年以前要好得多，并且在某些方面从改革中受益，但他们在工作场所却没有民主权利或权力（《北京工人》1989年4月）。甚至基本的安全和工作条件也在工业的“市场化”趋势下受到影响（Wilson 1990a：52）。和以前一样，工人们没有办法行使他们的协商权和批准决策的权利，因为在没有民主选举的情况下，唯一的可能是说服厂长与工人分享他们的权力（Chan 1993:58），而事实证明，在缺乏对旧式“老板”行为进行制裁的情况下，这样做是极其困难的。惩罚性的管理方式盛行，一些企业的条例有上百条惩罚工人的规则（《中国新闻》1989年1月4日：6），而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本身往往由厂长或党委书记进行任命（《工人世界》1989年2月），工人几乎不可能利用指定的渠道来表达他们对改革的反对意见。

在80年代末工人与管理层关系中，有一个细节很有启示意义，那就是高层管理者往往会为自己雇佣保镖，这显然不是出于对城市暴力犯罪增加的恐惧，而是专门为了保护自己免受“下岗”或其他不满工人的愤怒和暴力报复（《北京工人》1989年4月；FBIS-CHI-89-022 1989年2月3日）。这些攻击事件在东北的“铁锈带”似乎特别常见，1988年上半年，辽宁省发生了276起针对经理人的暴力事件，这一年沈阳至少有3名经理人被谋杀，而工人们普遍认为受害者是罪有应得（王绍光 1993：186）。有人指出，旧社会的资本家也有保镖保护他们不受工人伤害，是当时阶级斗争尖锐性的反映，同时也在暗示80年代的经理人（《北京工人》1989年4月）。

到1989年，工人总体情绪的特点是士气非常低落，因为他们越来越觉得自己不过是雇佣劳动者，甚至是机器的一部分；对企业管

理层的对抗情绪急剧上升 (Walder 1991:433-4), 常常通过罢工或其他工业行动来表达; 对不安全深感忧虑, 尤其是并非所有被裁员的人都能找到新的工作 (FBIS-CHI-89-042 1989年3月6日:32); 对公开的官场腐败越来越厌恶, 而自己的生活水平却停滞不前或下降。改革派提出的交易是用更多的工资来补偿相对较少的保障, 但工人们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个交易, 而在80年代末, 国家甚至没有遵守这个可疑的承诺 (Saich 1990: 11)。就像以前一样, 工人们履行了他们对雇主的承诺, 但却发现没有得到报酬, 无论是工作场所的民主权利和权力, 还是更高的工资, 都没有得到, 他们放弃了表达和解决冤情的官方渠道, 因为它们是无效的, 已然信誉扫地。而当1989年4月胡耀邦死后, 学生们进行抗议活动时, 在学生们的鼓舞下, 工人决定自己动手。

## 1989年抗议中的工人

1989年4月开始的学生示威活动有前例, 比如1986年12月和1987年1月在中国一些城市发生的抗议活动。在那次事件中, 大多数评论家认为, 工人“基本上是被动的观察者”, 对抗议活动态度冷漠 (Wilson 1990b: 270)。然而, 也有人指出, 工人参与了, 或者至少是在合肥、上海、北京等地, 他们与学生同时进行了抗议, 为政治改革和他们自己经济上的不满而示威。在1986年的地方人大选举中, 工人和其他城市居民进行了某种形式的抗议, 他们在选票上写上虚构的候选人名字(从水浒英雄到更现代的米老鼠), 使选票无效, 以至于在上海的一些地区, 第一轮投票因为废票的数量而无效。在上海的一家工厂, 管理层威胁工人, 禁止他们去投票, 否则就要扣他们的工资 (Wang Ruowang 1987)。党对这些选举的干预和政治改

革的停滞，产生了不满，促成了冬季示威，在学生上街的同时，也有罢工的报道，企业也收到通告，警告工人不要参加运动，支持罢工。甚至有人认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只是在工人参与运动的威胁显现出来后，才开始认真关注这场运动（Leung 1988: 119）。

后来，积极参与 1989 年抗议活动的工人解释说，在早期的运动中，当局成功地实行了分而治之的策略，把学生描绘成自私的、娇生惯养的精英，他们挥霍着工人和农民辛勤劳动积累的公共资金，他们的抗议是虚伪的（Mok and Harrison 1990:111），从而使工人不愿意同情这样一个特权群体。几乎所有描述 1989 工人活动的记载，都提到他们更关心的是生活中的经济问题，而学生和知识分子则更关注抽象的政治问题，但事实上，学生和知识分子不论是在 1986-1987 年还是在 1989 年，他们都非常关心自己在改革中受到的物质损失（Erbaugh and Kraus 1991:159; A Chan 1991b: 142）。在 80 年代末，人们与中国大陆的学者相处时，不用 5 分钟，就能听到理发师、餐馆老板和出租车司机赚的钱，比学识渊博的教授赚的钱多得多，在 1989 年的抗议活动中，出现了一张工人手抄报，警告学生们不要过分强调“知识分子的待遇和高等教育的预算”而疏远普通人（Mok and Harrison 1990:110）。早在改革初期，一些知识分子就把工人看作是城市改革的主要受益者（Benton 1982:92），这种想法似乎一直持续到 80 年代，知识分子的圈子，更多地注意的是某些行业或企业中少数工人获得高额奖金的报道，而工作不稳定、通货膨胀和惩罚性管理对工人的影响，则被忽视了。

学生们在 1986-1987 年没有寻求工人的支持，1989 年他们也没有不顾一切地从整个城市市民那里寻求更多的同情和后勤支持（这很容易得到）；他们不认为工人能对运动有所贡献。他们一般将工人排除在运动之外，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一种衡量，即工人运动会立即遭到镇压，而学生和知识分子向政府“抗议”的权利则可以被政府

接受，他们的抗议也会被允许继续。但是，蔑视工人的智力和政治能力，也是学生不愿意积极地将运动扩大到其他社会群体的重要原因（Walder 和 Gong 1993:24； Jonathan Unger 1991b: 4）。当学生们确实蔑视工人时，“学生们并没有努力扩大社会参与的基础”（Wilson 1990b: 273），这是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状态，因为北京和中央政府最关注的，似乎是阻止工人与学生运动联系起来（Chan and Jonathan Unger 1990:278；王绍光 1993:178），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明显和自然的发展。

### 工人运动的开始：参与者和议程

1989年有许多工人自治组织，其中最著名的是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它是在运动的早期出现的，它的核心是年轻的工人活动家，他们下班后，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非正式的夜间讨论会，讨论党的领导的缺点、通货膨胀、腐败和工人在企业中的待遇等问题。早在4月20日就出现了以工自联为名的手抄报，它谴责安全部队对和平抗议的学生施暴（Walder 和 Gong 1993:1-2；陆萍 1990:2），尽管这个组织直到5月18日才正式成立。长沙、福州、广州、贵阳、杭州、呼和浩特、济南、昆明、兰州、南京、上海、苏州、武汉、西安和西宁等地也成立了规模和组成各异的独立工人组织，许多人使用工自联的名称（王绍光 1993:179；陆平 1990:17）；在一些较大的城市，存在着几个不同的自治团体。此外，北京工自联还包括来自中国东北和中北部等其他地方的工人，包括天津（陆平 1990: 13）。尽管在6月3-4日的军事镇压之前，北京工自联的核心活动家只有150人左右，但在那个阶段，它声称有近2万名注册会员（Walder 和 Gong 1993:9），并且还和首都的其他工人组织有联系。

运动的成员主要来自各种企业的青年工人（陆萍 1990:13），他们一般很少或根本没有政治活动或反抗的历史，也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Walder 和 Gong 1993:15）。虽然年长的工人、低层的管理人员和工会干部往往不愿意冒着风险直接参与运动，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也普遍反对中共政府的腐败和管理不善，而且他们愿意与工自联总部（位于天安门广场的西观礼台）周围的人群打成一片，并为积极分子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和建议（Walder 和 Gong 1993:12）。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据报道，广东工自联的队伍中有大量的低级管理人员、白领工人和“工人知识分子”，以及普通的车间工人（Chan and Jonathan Unger 1990:275, n. 19; China Spring April 1990:60）。

大型国营企业的工人一直被党认为是工人阶级中最安定、最可靠的部分，但尽管他们在过去总体上是一个特权群体，但他们和其他工人群体一样，受到改革的严重影响，在 1989 年的抗议中，他们在北京和其他地方得到了充分的代表。然而，他们的参与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而在运动被镇压后，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试图证明首钢或燕山石化等知名企业的正规工人实际上没有参加。这种努力程度表明，中共在政治上仍然希望得到城市工人阶级核心的支持。但是，尽管官方否认，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1989 年著名的大型国营企业的工人，如上面提到的两家企业的工人高调地参与了进来（王绍光 1993:179；陆萍 1990:16-17）；首钢甚至有自己的工自联，隶属于北京工自联（Walder and Gong 1993:11-12）。

然而，但是还有许多首钢的工人（首钢在北京西部的工厂有 12 万名员工（Hassard and Sheehan 1997:74）没有站出来完全支持这场运动，北京工自联中的一些人对此表示失望。同样，在长春，学生们与长春第一汽车厂的工人进行了接触，但尽管工人们是否应该出来支持运动进行了大量的争论，但最终没有进行罢工，尽管据报道，工厂内部发生了一次怠工事件（R Howard 1991:61-2）。在邻近

的辽宁，另一个大型重工业国营企业集中的地区，直到戒严实施六天后，工人和其他公民才开始加入示威活动（Gunn 1991:73）。Anita Chan 认为，在这种大型和相对繁荣的国有企业中，处理申诉的官方渠道——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运作得更令人满意，因为它们的资源更充足，减少了工人建立独立组织的可能性；不过，她强调那些最大和最有声望的国有企业工人，在自治组织中十分重要（Chan 1993:55-6）：

位于边缘的工人，包括那些已经从国营企业下岗的工人、临时工和失业者，也在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Chan and Jonathan Unger 1990:274），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最直接地受到改革的影响。人们还注意到，工人参与运动的程度和性质在各地有所不同，这取决于该地区在改革中获得的利益或失去的利益。这就意味着，在福建和广东这些蓬勃发展的沿海地区，整个运动相对温和（直到6月4日之后，大屠杀的消息才使工人和市民涌向广州的街头）。在福建，几乎没有工人参与运动的报道（Erbaugh and Kraus 1991:150）；当学生确实试图在工厂中进行接触时，管理层向校园当局抱怨这种干扰，很快就制止了它，尽管有工人支持抗议学生的迹象，例如一家工厂的工人为这一事业筹集了1万元的捐款（Erbaugh and Kraus 1991:160）。相比之下，在6月4日之前发生过与工人相关的重大暴力事件的地方，只有西安和长沙，这两个地方都位于内陆省份，还没有从经济改革中得到任何巨大的好处（Jonathan Unger 1991b: 3）。

因此，总的来说，参与运动的工人有着各种背景，比之前的运动要广泛，他们很快就在八九运动中成为了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尤其是因为他们真正代表了绝大多数城市人的心声。虽然他们同样对胡耀邦抱有真诚的敬意和哀悼（Walder and Gong 1993:21），但他们很快就从纪念活动转向了国家的问题，诸如官方特权、经济管理不善及其对工人生活的影响、官方工会的无用性等问题（Walder and

Gong 1993:5)。他们特别关注通货膨胀，但这不应该被看作是他们只关注经济的证据，因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具有“深刻的政治性”（Walder and Gong 1993:17），总体来说，工人对政府经济管理的批判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基于对经济既得利益的维护（尽管 Alan Liu 曾指出，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对传统的维护可以是激进甚至是革命性的，而不是保守性的，并把 1989 年的工人看作是一个很好的例子（A P L Liu 1996:130））。在工人提出的各种要求中，最重要的是工人必须在工作场所和政治上有选举代表的权力，必须有相关的民主权利，以使他们能够维护自己的利益，其他要求并不重要（Walder and Gong 1993:17）。正如本研究所显示的那样，当工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时，缺乏有效的政治补救措施，是以前工人与政府对抗的一个特点，但在 1989 年，这种情况得到了更多的强调。

无论是讨论自己在企业内部的待遇，还是讨论国民经济的管理，工人们都一再指责当权者缺乏责任心，对人民不诚实，在许多城市家庭为生计而挣扎的时候，他们凭借自己的行政权力中饱私囊。在北京工自联对邓小平和李鹏政府的判决书中，它将中国政权称为典型的法西斯专政，“这个二十世纪的巴士底狱，这个斯大林主义的最后一个据点”<sup>31</sup>（Walder 和 Gong 1993:12-13），这种类型的语言自魏京生十年前因对邓小平提出类似的指控而入狱以来，几乎没有听到过。工人们强调了他们的无力感，以及他们对被领导人欺骗和蒙在鼓里的不满，因为领导人并没有像普通公民那样承受自己行为的后果（Walder 1989b: 34-5; Mok and Harrison 1990: 108-9）：

---

<sup>31</sup> 1989 年是魏京生入狱十周年、建国四十周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也是法国大革命 200 周年。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了巴士底狱的提法，而不是因为魏京生自己在 1978 年写的关于中国政治监狱的文章《二十世纪的巴士底狱》。

你们把中国这个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搞得一团糟。说中国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你们是带领人民摸着石头过河，这太容易了。你要带着我们往什么方向走？而那些找不到垫脚石，被淹死的人呢？难道人民的生命就这么一文不值，可以被官僚们当作赌筹吗？（Mok and Harrison 1990:117）

在要求民主和公正的法律的同时，工人们还谴责工作场所的一人独裁，要求集体制定和公正执行企业规则（Walder 和 Gong 1993:18），而不是厂长的绝对权威。除了充分意识到如果要成功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必须在工作场所组建自己的独立组织外，像北京工自联这样的组织还要求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监督（Mok 和 Harrison 1990:116）。当工人们宣称他们不是“碰巧生活在社会上的监狱劳工，而是共和国的合法公民”（Mok and Harrison 1990:118）时，他们把对自己在工作场所内外地位的关注集中在一起，在这两种情况下，对改革的攻击都有助于产生“一种日益增长的愿望……被当作完全的公民”（Walder and Gong 1993:28-9）。

1989年，工人阶级身份和工人作为社会领导阶级的强烈意识，与70年代中期一样强烈，但尽管游行的工人展示了毛泽东和其他前领导人的肖像（Esherick 1990:224; A Chan 1991b: 141），工人们并没有寻求让中国的时间倒流。他们回顾毛泽东时代，认为至少在言辞上他们享有很高的地位（A Chan 1991b: 141），而且政府相对廉洁，仍然与革命的原始思想相联系，但1989年所表达的“毫不掩饰的工人阶级工会心态”（Walder and Gong 1993: 4）与改革所带来的工业生活的变化是不谋而合的。如果工人被当作雇佣劳动者，在惩罚的威胁下被迫服从专制管理，那么他们就会成为一个与所谓的阶级先锋队完全分离和独立的群体，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文革造反

派曾说过，社会的基本对立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但现在不仅是工人阶级中的“无产者”这样看问题，而是绝大多数人这样看问题（Walder 和 Gong 1993:8）。

### 工人组织的性质及其与学生的关系

工人的政治激进主义与学生运动的关注点和方向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尤其是在5月下半月，当时亲近赵紫阳的知识分子智囊团参谋们，一直在招安学生，这产生了效果（韩敏珠 1990: 246-51）。尽管学生运动中的一些人一开始就知道，在以往运动中，高层的一些派别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利用运动，随后又将之抛弃，但他们日益被政治精英的内部权力游戏所吸引（Walder and Gong 1993:23）。不过，工人们似乎已经吸取了民主墙的教训，从1989年5月17日北京工会的这一公告中可以看出：

我们现在必须警惕中共党内的职业政客，他们会利用现在的民主运动篡夺权力，达到自己的目的。邓小平利用1976年4月5日的人民运动取得了政权。事后，他的邪恶意图暴露无遗。（韩明珠 1990:234）

由于运动的重点是腐败问题，特别是最高领导人子女的腐败问题，因此，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在广场上泪流满面后，学生运动对赵紫阳的态度变得如此之好，就更加引人注目了，因为在运动爆发时，赵紫阳和他的两个儿子已经是大多数人心目中最臭名昭著的腐败例子（王绍光 1993: 185）。工人们对整个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深刻反对和不信任，使他们倾向于把赵紫阳与被憎恨的李鹏和杨尚昆归为同一类，即“害人派”（Walder and Gong 1993:21-2）。

当局再次试图重施 1986-1987 年的故技，在工人和学生之间煽

动对立，以防止运动的两个部分联系起来（Chan and Jonathan Unger 1990:278），但学生们并不愿意进行合作；这被认为是学生运动的一个关键的弱点（Saich 1990:32）。北京学生对工人运动的态度，从他们长期拒绝让北京工自联或任何其他工人团体在天安门广场上设立总部就可以看出；他们只是在5月底才在这一点上有所松动，此时已进入戒严期，广场上的学生人数正在减少，他们感到越来越容易受到强行镇压。之前至少有两次工人试图进入广场，但都被拒绝了（Walder and Gong 1993:24）。这种将工人隔离在长安街远处的做法，不仅是一种象征性的侮辱外，还使工人活动家面临着被便衣警察抓走的风险，这种情况在5月底就开始发生了（陆萍 1990：16）。

工人们在实施戒严后提出了总罢工的建议，但学生领袖阻止了5月20日的总罢工和5月28日的总罢工，他们坚持要求工人服从“他们”的运动的重点事项（Walder 和 Gong 1993:25）。北京工自联和其他团体在工作场所内组织起来有很大的困难，他们决定把精力集中在其他地方，因为他们可以组织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给党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绕过工作场所的组织工作（Walder 1989b: 37）。但是，由于依赖与工作单位的非正式联系，对总罢工的响应可能会非常有限（Walder and Gong 1993:3），尽管有强烈的传言说，中华全国总工会（它捐了10万元，对学生的事业表示同情，这对一个政府控制的组织来说是一个独特的姿态）会支持5月20日总罢工（王绍光 1993:179）。当6月3日解放军开始进驻北京，学生们惊慌失措地呼吁举行总罢工时，为时已晚，因为工人们不会再跳出来服从学生的命令，因为在前几周里，他们经常遭到学生的阻挠（Walder and Gong 1993:25）。

运动中的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最让他们愤怒的精英行为的一些因素，正在被学生精英复制。自运动结束以来，学生领导层的权力斗争和派别主义、追求个人荣誉、等级制度、秘密、特权甚至腐

败的倾向，已经被广泛记录（A Chan 1991b: 146; Walder and Gong 1993: 25; Forster 1991: 随着工人们对学生领导层内部所发生的事情有了更多的认识，他们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的组织和运动，与学生的组织和运动对立起来（Walder 和 Gong 1993:26），他们蔑视学生为金钱和挪用资金而争吵，称学生为“资本家”。工人团体在处理来自公众的资金和捐款时要谨慎得多，他们意识到，正如广东工自联的主要活动家所做的那样，学生滥用公众捐赠的钱财，会给政府留下口实（China Spring 1990 年 4 月: 62）。

工人运动在很多方面是学生运动的对立面，与此同时，工人运动也反对社会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结构，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工人组织与波兰的团结工会惊人的相似，团结工会也是反对列宁主义国家，是一个自觉的、反等级制度的组织（拉巴 1991）。据广东工自联的一位成员说，团结工会直接启发了许多工人，一些积极分子从 1980 年起就一直在关注团结工会的进展：

波兰的团结工会给了我们很多启发。虽然波兰有社会主义制度，但那里的工人在 80 年代建立了团结工会。经过多年的努力和斗争，他们成功地获得了合法性。我们在想，能不能借鉴波兰团结工会的经验，在共产党之外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陆平 1990:79-80）

1988 年夏天，波兰再次爆发工业抗议，此后团结工会重新成为波兰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并在 2 月份与政府进行谈判后，于 1989 年 4 月 17 日恢复了它的合法地位（Lewis 1994:237-8）。许多工人和党的最高领导人一样，都了解东欧的团结工会和其他改革的发展，当然，他们认为这与其说是一种鼓舞，不如说是一种警告，一些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发言者赞许地提到了团结工会的合法化（Wilson

1990b: 271-2)。在 1989 年运动期间，至少有一个在南昌成立的独立工会，实际上自称为团结工会（Chiang 1990: 97）。

北京工自联坚持由积极分子集体领导工人运动，他们被分配了一定的责任，但他们没有任何官方头衔或任何权力来命令其他人做任何事情；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则（Walder 和 Gong 1993: 25-6）。不难看出，工人为什么如此强调这一点。在 60 年代，工人们曾黯然地开玩笑说，他们处于工作岗位的最底层，只能命令机器运转；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造反派拒绝接受学生造反派的领导，因为他们的工作生涯都是被人指使的，所以他们在造反时不会接受他人的指挥。在 80 年代末，工人们清楚地看到大权在握的厂长们是多么的专横和不负责任，他们丝毫不想模仿这种领导方式，而这种领导方式正是他们当初造反的主要因素。他们非常反感学生过来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因为对他们来说，摧毁等级制度、独裁和专断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人人都应该平等。虽然我们工人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但我们非常清楚这一点”（Walder and Gong 1993:26）。

工人们日益把运动中的学生看成是只对权力感兴趣的特权精英，因此他们不相信学生们实际上是和他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 6 月 3 日冲去阻挡军队，“而剩下的大多数学生则紧紧地围在纪念碑周围，等待着预期中的殉难”（Walder 和 Gong 1993:15）。事实上，当军队在 6 月 4 日清晨推进到广场时，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剩余的学生能够活着离开广场，而在解放军进入首都中心的道路上，在远离广场的路口，北京工自联和其他工人组织的成员则首当其冲地遭到了屠杀（陆平 1990: 12）。在这一阶段，工人已经成为北京运动的主宰，这也许他们在运动最后被镇压时伤亡率高得多的原因，而这个原因，是残酷的。

## 六四前后的工人运动以及中共的反应

党的领导层在以往的对抗中，就特别关注工人有组织的抵抗，特别是波兰的例子出现之后（王绍光 1993:180），中共高层害怕中国发生类似的工人起义。在八九运动的早期，他们就把防止工人与学生联系起来作为首要任务，在一些城市的企业中，共青团和工会活动家被动员起来，试图阻止青年工人参加运动（Forster 1991:177-8）。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政府其实几乎不需要担心学生去动员工人，因为尽管在中国的一些城市，学生尝试或成功地进入了工厂，但学生活动家本身，往往和中南海的守旧派一样，并不热衷于让工人阶级参与进来。

但在 1989 年，工人们并不需要任何外来的鼓动，因为城市改革已经积累了巨大的政治不满情绪。在纪念五四运动的示威运动中，工人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参加抗议活动的学生（Walder 1989b: 38），戒严之后，学生人数和坚定程度在下降，而工人的运动实际上在增长，对戒严的愤怒大大促进了工自联的成长（Walder and Gong 1993: 9）。社会主义阵营内的类似案例表明，工人们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他们反叛可能会招致严厉的镇压，但他们在与国家对抗的过程中获得了信心（Pravda 1981），这一点在 1989 年的中国得到了证实，因为北京工自联开始在整个运动中发挥更多的领导作用，而当政府拒绝让他们注册为合法组织时，工人采取了特别的立场（Walder and Gong 1993:14）。

必须始终牢记，工人们知道，他们参与反对党的最高领导层的运动，是冒着严重的生命危险的（他们强调，他们并不反对整个党或社会主义）。虽然他们知道自己在运动结束时可能会有怎样的结局，但还是有那么多人参加了运动，而且像韩东方这样的积极分子，

在运动中公开地表明自己的身份。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比学生要严酷得多，但他们还是决定，组织起来，提高自己的形象，为今后其他工人团体树立一个先例：

‘ 你知道，对学生来说，这没什么——他们抓你几天就放你走。但当我们工人被逮捕时，他们就会开枪打死我们……。政府对我们是无情的。他们还说工人是统治阶级。真是一派胡言！被抓的工人〔6月4日以后〕都被打得半死……。大概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我们会被打败，政府会镇压我们。但我们不能解散。如果我们解散了，就会被镇压，而不解散也会被镇压。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不如一口气做到底，让人们知道有一群像我们这样的人，有一个像我们这样的组织。（Walder and Gong 1993:24-5）

八九运动结束后有一个特点，常常被人们所忽视，那就是中国各地城市的工人和市民，对军队在北京向手无寸铁的市民开枪并将其打死的消息，虽然不是完全出乎意料，但也感到震惊。6月4日凌晨，随着消息的传播，民众的愤怒压倒了之前的保留态度，给一些城市的工人运动注入了新的动力。6月5日，杭州成立了新的工自联支部，6月4日广东工自联正式成立。

现在，北京城兵荒马乱，人民躺在血泊中，国家已经到了危急关头。历史性的重担落在了每一个劳动者的肩上，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反对暴力，支持学生，促进民主和科学。

国家混乱不堪，官僚主义泛滥，政治经济体制腐败。

国家的前途已成为每个工人个人的切身利益。广东工人不能袖手旁观，广东工人自治工会紧急呼吁各界人士支持和参与全国性的爱国民主运动。(Mok and Harrison 1990:120)

6月4日之后的几天里，各种传言席卷全国，很难知道罢工人数有多少可信度，比如6月6日沈阳据说有60万人出来罢工(Gunn 1991: 76)。但是，确实有许多相关的报道，比如罢工和大规模缺勤，企业和整个工业区处于停滞状态，1989年5月-7月的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因此，工人广泛抗议和工业行动的印象，不可能纯粹是那些希望运动仍能以某种形式存活下去的人的一厢情愿。6月4日之后的监测服务报告显示，中国各地城市的道路、桥梁和铁路线被封锁，尽管官方的新闻报道试图淡化工人的参与，将那些在路障上的人描绘成流氓和犯罪分子、失业者或农民工，但无法掩盖事实，在屠杀后的民众反弹中，那些不是学生的人，发挥了关键作用(FBIS-CHI-89-107-22 1989年6月同上)。

在西安，许多企业都有罢工的报道，其中包括一些知名度很高的大型国有企业，一位外国观察家的印象是，在西安市周围的路障，青年工人比学生多得多(Esherick 1990: 230)。西安的官方报刊指责少数人包围企业，剥夺了忠诚守法的大多数人复工的机会，但从这些记载中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支持停工；和往常一样，官方的版本无法解释在30万忠诚工人的坚决反对下，“少数人”怎么会使一个大城市几乎停工6天，造成4000万元的工业产值损失(FBIS-CHI89-111 1989年6月12日: 90-1)。据报道，杭州也发生了罢工、封锁公路和铁路的事件，杭州的工人在6月4日之后比之前更愿意积极参加运动，尽管那些留在工作岗位的人可以领取高达300元的报酬，而那些被发现参加街头抗议的人，则会受到相应的严厉经济处罚(Forster 1991:183)。6月4日之后，中共为使工人

继续工作，奖惩措施力度都很大，考虑到这一点，官方报刊上关于工人在公共汽车停运时步行数里打卡，或自掏腰包购买出租车的英雄故事，有可能是真实的。

在东北有传言说，哈尔滨的工人在罢工，而沈阳飞机厂的工人也出来了；传言说那里的一个工人在北京的大屠杀中失去了一个孩子（Gunn 1991: 77）。在以前的动乱中，像飞机厂这样与军方有联系的大型国有企业，是最难以看到抗议或工业行动的地方，这表明在 1989 年，对国家的不满和敌意已经蔓延到了什么程度。沈阳铁西工业区似乎也处于停滞状态，与其他地区相比，老工人似乎更倾向于接受党的路线，即必须制止动乱和破坏公共秩序和生产（Chan 和 Jonathan Unger 1990:277），在辽宁，即使是退休工人也仍然相信学生继续抗议是正确的（Gunn 1991:77）。

不过在 6 月 4 日之后，上海的工人却很消极。该市的工人团体确实在呼吁全国性罢工的海报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上海和中国大部分城市一样，在 6 月 5-6 日期间处于停滞状态，在市政府外，人们（主要是工人）进行着安静但非常紧张的集会（S Warner 1991:220-2）。但总的来说，工人们似乎决定放弃已然失败的事业，并且尽管交通严重受阻，还是尽可能地去上班，避免被扣工资；据报道，许多人对被阻止去上班感到愤怒，不仅因为他们可能会损失钱，而且因为城市里的必需品越来越短缺（S Warner 1991:225, 230-1）。上海是 20 年代以来中国工人运动的一个据点，现在仍然是中国最主要的工业城市，上海工人运动缺乏激进性，令运动中其他地方的工人，如广东工自联的肖亚群（Xiao Yaqun）感到非常失望：

让人失去希望的是，有着光荣民主传统的天津、上海和南京的工人并没有动员起来。上海工人反而反对学生运动，为了一天的奖金，他们宁愿赶回工厂去打卡，这是中

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段耻辱。(China Spring1990年4月:  
62)

如前所述,在6月4日之前,政府就开始针对运动中的工人,但从那天起,他们加强了镇压。他们的策略是双重的,一方面更严厉地惩罚参与运动的工人(与学生或知识分子相比),同时又否认有任何“真正的”工人参与其中,尽管所有的证据都指向相反的结论。所有关于镇压的描述都同意,在运动结束时,工人比学生更有可能被逮捕,被判处长期监禁或被处决,并在拘留期间受到虐待(陆萍1990:18-19; Wilson 1990b: 274-6; Walder and Gong 1993:24)。据报道,在上海(S Warner 1991:229)、沈阳(Gunn 1991:78)和重庆,被捕的人大多数是工人,在重庆,被拘留的工人在电视上被“殴打和羞辱”,以警告其他人(Chan and Jonathan Unger 1990:276)。北京工自联的主要活动家韩东方宁愿向警方自首,也不愿在追捕过程中受到同样的待遇。

在六四之后的两周内,全国各地的工人组织陆续被取缔,官方的工会常常带头揭发这些“冒牌”的犯罪分子和煽动者组织,指责他们“冒用工人的名义”(《广州日报》1989年6月11日)来掩盖反革命或犯罪活动。那些在6月4日之前那些支持学生运动、甚至工人运动的工会领导人,他们感到自己会被清洗,因此工会需要证明自己的忠诚,许多省市的工会呼吁政府关闭非法的、具有破坏性的工自联(当然,这些工自联之所以是非法的,是因为政府拒绝让它们注册;官方工会没有支持独立团体获得合法地位的尝试(Walder和Gong 1993: 7))。

那些有工人参与工人组织的企业,以及那些示威旗帜中出现的企业(Walder and Gong 1993: 7)也不得不带头谴责,以避免被牵连,在6月28日,《工人日报》发表了七篇谴责工自会的文章,在这些

文章里，首都钢铁公司工会、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工会、北京人民机器制造厂工会，以及北京市总工会本身，都不遗余力地与运动保持距离（陆萍 1990: 16），它们声称那些在运动中举着“他们”旗帜的工人并不是正式工，一个常见的借口是他们要么是年轻的实习生，要么是在 1989 年 4 月之前已经被解雇的工人。一些企业采取措施，禁止任何员工在未经职工代表大会事先批准的情况下，在公开场合举着工作单位的旗帜（《广州日报》1989 年 6 月 23 日），这似乎表明，那些打着工作单位旗帜游行的人，至少有一部分是完全有权这样做的正式员工。

官方说法大力抹黑被逮捕的工人，说他们有前科（Warner 1991:229; Gunn 1991:78），使用暴力，勒索公众钱财，煽动对农民工偏见，试图把所有不是学生的参与者都变成“不法分子”。一位流亡的广东工自联成员指出，在编制通缉名单时，许多白领工人活动家和其他在工作中负责处理钱财的人，没有被列为反革命分子，而是被列为诈骗或贪污的通缉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他们逃到国外后获得政治庇护的机会（China Spring 1990:62）。党控制的报刊，还刊登了工人纠察队在 4 号之后帮助恢复城市秩序的故事，给人留下了无产阶级对党忠诚的印象，而事实上，所谓的工人纠察队中的许多人，都是因为政治上可靠被选拔出来的企业干部（S Warner 1991:228）。但总体效果是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真正的工人一直远离抗议活动，或者积极反对抗议活动，捍卫党和国家利益，而少数流氓和犯罪分子则在所谓的“独立工会”中以工人的名义进行暴乱。

因此，官方说法与现实有尖锐的矛盾，没有提到工人对党的挑战，常常是以明确的社会主义和阶级术语来表述的，使人联想到早期的对抗，如北京工人的匿名评论说：“人民所有”这句话实际上是指“为一小撮资产阶级所有”（Mok and Harrison 1990:109）。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1989 年抗议活动的语言中没有意识形态（例如没

有提到“红色资本家”），但是，工人们至少认定他们的领导人是靠别人的劳动为生的少数剥削者；而且上面引用的文件确实用“资产阶级”一词来指代特权官员。这种对工人与党的权力关系的分析，可以追溯到民主墙、四五运动、李一哲海报、文化大革命，乃至双百运动，当时首次出现了官员可能是“站在人民之上的特权阶级”（Fu Rong 1957: 20）。1989年的工人认为，他们作为社会最先进的阶级，有参政议政的权利，甚至是义务。回顾《共产党宣言》的话，北京工自联对其宗旨作了这样的说明：

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而身处民主运动的我们，应该展示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我们完全有权利把独裁者赶走……。打倒独裁和极权，促进中国的民主，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民主运动中，“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我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Mok and Harrison 1990:115）

这可不是一群一心想要搞破坏和谋取私利的罪犯的号召。

### 1989年之后，处于改革中的工人

有人指出，1989年民主运动后，中共立即“试图重新确立工人作为中国‘首要’阶级，来赢得工人的忠诚”（Lam 1995:273）。口号的变化当然是显而易见的，强调管理的言论暂时被强调民主管理和社会公正的言论所取代（A Chan 1993:57）。官方工会尽管在1989年不得不谴责独立工会，但仍继续表达工人对分配不公、厂长负责制下的一长制，以及为什么工人理论上的主人翁地位还远未实现等问题

的不满 (Chan 1993:56), 这表明他们认为工人的抗议有一部分是合理的。虽然在公开场合, 官方工会被牢牢地重新置于党的控制之下 (《人民日报》1990年2月1日), 但在1990年期间, 他们在内部交流中抱怨说, 他们在企业中被当作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 因此, 当工人向他们提出问题, 他们除了发出同情的声音外, 无法做更多的事情。因此, 他们报告说, 由于他们无法保护的工人的利益, 工人往往拒绝接受党的“依靠工人阶级”的口号, 认为这只是空洞的言辞 (Union Bulletin 1990年9月15日: 8-9)。

如此看来, 尽管工会努力争取工人支持, 但只要工人没有有效的工会代表, 在管理中没有发言权, 他们对有关自己领导地位的言论仍然并不买账。90年代工人对企业组织和管理行为的抱怨, 往往与50年代时的抱怨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989年以后, 仍有报告说, 工人被排除在管理之外, 因为管理者认为他们不能有效参与。当发生这种情况时, 官方工会的回应可能是直接从1950年夏天的一份报告中摘录出来的, 他们重申了这样的论点: 只有当工人被允许参与管理时, 他们才能学会有效地参与管理, 尽管他们可能不了解企业的所有部门及其活动, 但他们确实拥有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知识, 他们作为一个集体对企业的成功运作极为重要。

因此, 在改革时期, 支持民主管理的论据不得不重新提出来, 因为习惯于大权独揽的厂长们, 对民主管理的接受程度甚至不如50年代的厂长 (《工人日报》1989年7月25日、8月8日和22日; 《Union Bulletin》1991年1月15日、2月1日和4月15日)。在50年代, 中国企业摆脱了资本主义管理形式, 走向社会主义, 当时尊重工人地位的意识形态要求是很强烈的, 但改革下的企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如果民主理想被认为有碍于经济效益, 管理者甚至不必再在企业中复读民主理想。一些报告不仅提到了90年代的一长制和工人行使民主权利的困难, 而且还提到了工人中普遍存在的“雇工”和“给多

少钱,干多少活”的心态(Wang Zhuo and Wen Wuhan 1992: 265-6),以及工人对分配不公的普遍不满,特别是管理人员在没有征求职工代表大会意见的情况下,违反《企业法》作出不民主或腐败的工资和奖金决定(《工人日报》1989年7月25日和8月8日;《工会简报》1990年9月15日:8-9,1991年1月15日:30,1991年2月1日:18-19,1991年4月15日:7-8)。

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抱怨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工人们甚至感到改革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地位,尽管现在《企业法》和其他法律规定了他们作为企业主人的地位,规定了民主管理。然而,在《企业法》通过之前,车间里的现实是,工人的影响力进一步减少,而管理层的权力大大增加。企业自主权的增加意味着国家对企业管理控制的削弱,合同管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1990年第二轮合同谈判时,有人担心工人把合同管理部门看成是企业的“主人”(Wang Zhuo and Wen Wuhan1992:265),认为这种改革没有给民主管理留下空间。官方工会推动工人定期对管理人员进行民主评议,推动职工代表大会代表参与合同的授予和评价管理层(Union Bulletin 1990年11月1日:22-5,1991年4月1日:9)。但是,国企管理性质的变化所带来的问题,往往强化了工人的感觉,即他们在企业中的所谓民主权利是一种虚构。

在90年代,中国的工人日益发现与15或者20年前相比,剥削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A Chan 1993),这不仅适用于越来越多的私企或外企工人,其中一些企业因其恶劣的、几乎军事化的工作条件而臭名昭著(A Chan 1996b)。在许多国营企业中,也强调控制和惩罚性管制,以及从劳动力中榨取最大的生产量,在这些企业中,工作制度的特点是“增加定额和提速;延长工作时间;让效仿劳动模范的运动,服务于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对劳动出勤进行新的严厉控制;用货币制裁和惩罚来控制工人”(Zhao and Nichols 1996:1)。

将工人的工资与绩效更直接地联系在一起，是经济改革的一个关键，但在一些工厂里，它已经在一连串复杂的规章制度中消失了，这些规章制度使工人无法计算出他们每月应该得到多少工资（Zhao and Nichols 1996:15）。人们会想到米克洛什·哈拉斯蒂（Miklos Haraszti）在 1989 年以前的东欧与数百页的计件规定搏斗（Haraszti 1978），而在 90 年代的中国，工人们也有同样强烈的疏离感和背叛感。

自 1989 年以来，中国工人中的动荡，包括罢工和组织独立工会的尝试，一直在持续，而在 90 年代末，国企工人的反抗程度急剧上升。1997 年 9 月，党的十五大提出允许大多数国有企业出售、合并或破产的计划，只会加剧动荡，甚至那些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被迫推向市场的大型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有企业，也计划在 2000 年之前大规模裁员，裁减多达 50% 的工人（Hassard and Sheehan 1997:92）。工人们似乎越来越愿意走上街头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被告知，他们将不得不承受短期的痛苦，而这种痛苦是中国工业经济重组的必然，但没有看到经理或党员干部被赶出工作岗位的迹象。虽然经济上的不满，如拖欠工资或单方面改变福利待遇或养老金，往往是引起抗议的原因，但在这些抗议中，往往有对腐败政治的怀疑（Sheehan 1996:555），工人们强烈感到这是对社会主义的侵犯。

1989 年 6 月 4 日以后，工会内部文件就公开承认了工人抗议的政治性，文件中说，1989 年和 1990 年，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政治动荡是中国工人罢工、停工和请愿的主要原因，只是到 1991 年，企业层面的经济问题才成为焦点。文件承认，六四和苏东剧变在中国工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动摇了部分工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Union Bulletin 1991 年 4 月 15 日：28）。1991 年，据说国家安全局仅在北京就调查了十四个地下工人组织，这些组织每个成员都有二十到三百名工人；其中有两个组织明确地以“团结工会”为榜样，

“发誓要组建一个以工人为基础，倡导‘真正民主’的另类政党”。这些团体也在发行非官方出版物（Lam 1995:273-4）。其他的报道则引用了1990年洛阳和株洲的独立工会活动（《南华早报》1990年3月9日）。一位前北京工自联成员在1993年说，参与抗议的工人在镇压后继续秘密聚会，地下活动“组织良好”（《南华早报》1993年2月25日）。由此看来，自主组织在一定规模上似乎还在继续，而且很可能是中国未来工人抗议的一个共同特征。

除了上述关于独立组织的报道外，1994年3月，“中国劳动人民保护联盟”（劳盟）成立。1994年3月，这个组织几位领导者，其中一位是北京工自联的创始人，因组织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请愿，要求在中国宪法中恢复罢工权，并允许工人和农民成立独立工会而被捕（Lam 1995:277; Human Rights Watch-Asia 1994:1-2）。该联盟提出将罢工权纳入中国宪法，并特别提到国有和集体部门以及其他形式的所有制，提出了以下论点：

面对资本主义所有者及其管理者，工人和雇员只能援引法律赋予公民的特定权利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不受约束的财富也会异化为社会不公的根源。而公民的权利——包括罢工权——是制约财富不公正使用的基本因素。劳动人民一旦失去这些权利，他们的命运就会被资本主义所有者及其经理所主宰……。在这种情况下，侵犯劳动人民权益的行为将不可避免，条件将更加恶化。社会将惨烈地分裂，发生暴力的非法冲突。因此，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我们提出以下建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三十五条修改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人权观察·亚洲1994:7）。

Anita Chan 质疑它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工人组织，他指出，组织的领导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工人而是专业人士）设定了加入的条件，其中包括要有“一定程度的理论基础”，并得出结论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捍卫自己的权利时，即使做好了坐牢的准备，也仍然高傲地拒绝与群众共同奋斗”（A Chan 1996a: 181）。尽管这一组织的性质有争议，但总的来说，在“市场社会主义”下，工人需要独立的组织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像劳工在资本主义经济下一样，这一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工人所接受。在 90 年代末，新式国企经理人可以大肆嘲笑工人当家作主的观念，工人自己对他们的实际地位也没有什么幻想，因此他们重拾了回罢工、静坐、在工作中的放任自流和故意表现不佳等武器，这就是一个证据。（李志强 1998）。

到目前为止，在 90 年代的中国，工人运动的激进化，出现了两种模式，中国东南地区的外企和血汗工厂的农民工，以及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的国企工人，还没有联合起来（A Chan 1995）。工人阶级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化，在 80 年代末是显而易见的，一个群体怀疑另一个群体不公正地从改革中获得更多利益，在 1989 年运动期间，这种分化暂时被对腐败无能的最高领导层的敌意所掩盖，但现在又体现了出来，特别是下岗和长期失业的前国企工人不得不放低眼光，开始与农民工直接竞争稀缺的城市工作。但是，这两个群体的反抗，很可能会给政府带来持续的困难，特别是国企工人，他们被改革所影响，越来越愿意在必要的情况下上街集体维护自己的权益，这将是一个特别严重的挑战。

## 第八章 结论

过去，中国工人的形象普遍是一个相对安静和政治上被动的群体，尽管最近的一些研究提供了相反的证据，但这一形象并没有改变。在大多数人的描述中，在双百运动、文革和民主墙等运动中，最受关注的仍然是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然而，正如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所指出的那样，“在每一次著名的知识分子抗议的背后，都发生了鲜为人知但却非常重要的工人运动”（裴宜理 1994:4）。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让更多人知道这些周期性爆发的工人抗议活动，并强调这些爆发的政治性质和内容，这些抗议活动往往被扭曲了，变成了在知识分子理想化的政治煽动下，为了蝇头小利而进行的机会主义活动。

事实上，从 50 年代到 1989 年，工人不仅在中国所有重要的反党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从政府对工人活动的反应来看，这些运动中的工人因素，对政府来讲是最严重的威胁（裴宜理和李逊 1997:194）。在历次运动当中，工人始终受到更严厉的惩罚，人们对此提出了各种解释。例如，在 1989 年的运动中，人们常常认为，与学生和知识分子相比，工人缺乏国际联系，他们处于不利地位，而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名字在国外广为人知，他们的被捕、监禁或处决会引起国际人权团体和外国政府的强烈反应（Wilson 1990b）。但是，除了它可以对工人进行更严厉的镇压之外，中共似乎确实更关心工人的抗议，这一点在团结工会（它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基层工人运动可以破坏共产党的执政）出现之前很久就体现出来了，比如它对中国工人抗议的态度。团结工会加剧了中共对工人起

义的恐惧，但从始至终，“中国领导层的这种恐惧，几乎失去了理性”（裴宜理和李逊 1997:194）。

安德鲁·华尔德（Andrew Walder）提出了一种关于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工人的理论，它的基础是施恩-回报的关系网络，使工人形成依赖，它确保工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保持沉默，无法组织集体抵抗（Walder 1986）。虽然它只适用于大型国企中的少数工人，但还是必须根据本研究和其他关于中国工人抗议的研究结果进行修正。他认为这种控制网络排除了使用胁迫和恐怖的必要性，但国家采用这种方法的实际频率，以及对抗议工人的镇压程度，都削弱了他的论点；戴维斯（Deborah Davis）指出，“1949 年后的城市政体的特点是高度的胁迫和恐怖”（Davis 1988:496），其中大部分是针对工人的。华尔德本人在最近的一份出版物中指出，“除了波兰之外，中国工人阶级动员集体抗议的次数，要比其他共产党政权多”（Walder 1996:168），这一说法违背了他在《共产主义新传统主义》中所描绘的图景，这本书认为中国工人只有在不正常的、罕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采取这种行动。

华尔德所说的罕见的情况是 1989 年的民主运动，在当时，80 年代末的一些改革措施使城市居民普遍对政府抱有敌意，而“领导层的分裂及其强大的镇压机器的暂时瘫痪”（Walder 1991:492），使得国家无法用正常手段来镇压这种动乱。这种分析承认警察措施在控制工人方面的重要性，但在我看来，它仍然夸大了 1989 年的运动，把它当作一次前所未有的工人动员。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人组织虽然广泛而强大，但并不不是 89 年运动的先例，因为是地方和国家掌权者的派别斗争，将工人动员了起来，而不是工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并行动。但这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工人们很善于利用派系运动提供的政治空间来追求自己的目标，这一点在本书的第四章和第五章中已经看到。

在 1989 年，出现了一个影响工人自治团体的新因素，那就是由于改革开放政策，国内和国际新闻界能够更公开、更详细地报道中国的事件。中国其他地方的工人可以通过当地报纸，读到关于北京工自联的报道，看到它的照片，还可以与积极分子进行个人接触，从而在北京工自联中获得启发，而在 70 年代，他们不得不采用一些低效的方式，比如用柏油在火车边上画标语的方法，来告诉其他城市或省份他们的抗议活动。工自联这样的团体出现的速度之快，在一些城市（尤其是北京）的规模之大，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之广，都是八九运动的显著特点，但由于运动的生命期很短，不断受到镇压的威胁，以及戒严的压力，它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很不平衡，也缺少协调，在工作场所内的组织方面也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它无疑会改善这些方面，但在我看来，与 80 年代初相比，1989 年似乎并不是工人的“新型政治抗议”（Walder 和 Gong 1993:3-4），在 80 年代初，一些城市也发生了政治化的罢工，还出现了独立工会，第六章讨论了这一点。

在 1989 年，城市改革的具体影响，以及它对工人心目中中国社会主义最宝贵的、甚至是唯一的成就的破坏，促使工人和市民普遍对民主运动抱有同情甚至是支持，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的许多城市出现了独立的工人团体（但不要忘记，其中一些团体的成立，只是因为六四屠杀造成的愤怒）。然而，工自联这样的团体和普通的工人活动家，基本上都是在重复他们的前辈在 50 年代的运动中所提出的观点。一些观察家已经认识到，民主墙和文革与 89 年的运动有着同样的关注点；杰克·格雷（Gray 1994:1157）和乔纳森·昂格尔（Jonathan Unger 1991a: 3）都提出了这一点。但把目光集中在工人的活动上，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这种联系。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使工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根本冲突凸显出来，但这种冲突一直存在，在没有任何有效的代表或参与渠道的情况下，工人在面

临特殊压力的时候总是以自我组织的方式来应对，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 50 年代，这些组织大多是有限的，只限于一个企业，但文革初期不同寻常的组织自由，使更大的、非党的工人组织得以出现，就有了跨厂、跨地区、跨行业工人组织的例子。文革后，由于这种独立组织的先例，参与其中的工人在运动中获得了政治经验和信心，而运动对国家的权威和威望造成了持久的损害，不满的工人群体变得更愿意自主地组织起来，表达他们的不满，而且他们自己也越来越意识到这种趋势的政治意义，中国的一些独立团体将团结工会视作一个工人政党和工会，并明确地以它为榜样。

一些关于双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强调了中国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尤其是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的著作有力地证明了这些分化是中国工人进行反抗的重要原因（裴宜理 1994；1995）。王绍光的著作也使人们注意工人和干部的内部分化，他认为这些分化掩盖了这两个群体之间的根本政治分歧，直到改革时代（王绍光 1993：181）。但是，正如第二章所观察到的那样，尽管工人阶级各阶层之间不公平地差别待遇激起了抗议和反抗，但他们的愤怒一般是针对这种不公平制度的设计者和执行者，而不是其受益者。本研究中所提及的所有抗议事件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那就是工人和干部之间明显的敌意，这似乎是主要特征。在多次的抗议运动中，工人都认为，中国社会的关键分化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分化，这种根本性的分化在政治上远比工人之间的分化更重要。当工人提出这种理论观点时，它对国家提出了特殊的挑战。从 50 年代开始，在每一个十年里，工人们都会指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根本对立，并由此延伸到他们关于地位、条件、工资、代表权和参与的其他无数不满，从而几乎将每一个重大争端都变成了政治对抗。

在与工人对抗之后，中国共产党试图用自己的历史版本来取代

现实，掩盖工人挑战其政治权威和合法性的现实，在中共的历史中，工人是党和国家利益的可靠捍卫者，反对学生和知识分子自私或错误的攻击。关于早期的对抗，中共在一定程度上让国内接受了它所创造的历史，但国内对 1989 年抗议活动更公开的报道，可能会使 1989 年的事件更难被掩盖。当然，中国以外的许多观察家已经认识到 1989 年工人活动的重要性，也认识到工人民主运动本质上的政治性，这与仍然流行的认为早期工人活动不重要和出于经济动机的观点不同。这种对 1989 年的认识更为准确，或许也将有助于改变对早期对抗的看法，中国工人的形象将不再是中共永远可靠的捍卫者，而是和学生或知识分子一样，为了捍卫自己的理想而准备面对国家的子弹。

以往工人与中共之间的对抗，大多是反党抗议运动的一部分，而这种运动往往是由学生或知识分子领导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等待下一次这样的运动才能看到工人再次变得活跃起来？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模式不太可能重演，尤其是因为在目前的环境下，似乎很少有机会出现 1989 年那样由学生发起的运动。在 90 年代，中共对著名的积极分子采取的策略，总体上是非常有效的，特别是自愿流亡这种策略。许多积极分子被说服接受流亡，因为那些选择留在中国的人面临着毫无吸引力的长期监禁，或者他们本人及其家人不断受到骚扰，在监狱外也会失业。参与 1989 年工人运动的流亡者证明了这一制裁的有效性，他们认识到自己无力为 90 年代的工人斗争和自我组织做出贡献；这种帮助往往被留在中国境内的人拒绝（*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94 年 6 月 16 日：36），理由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如果涉及外国，就有被指控从事叛国活动的风险），也有可能是认为流亡者选择走捷径，并认为他们不了解中国境内的情况，无法提供有价值的帮助。许多 1989 年或民主墙的知名人物现在都被流放出中国，只能向外界报道中国的活动；

许多人要么在国外，要么在监狱里，以至于有一个人阴沉着脸开玩笑说，当王丹在 1995 年再次被判处有期徒刑时，已经没有足够的人去组织一次像样的请愿来抗议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们在学生/知识分子反对中共的力量恢复之前会无所作为。他们中的许多人等不起这样的机会；在 90 年代末，在日益恶劣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工人们有许多迫切的理由寻求党外自组织来维护自己的利益。随着国有企业下岗人数的增加，尤其是在东北“铁锈地带”或四川老“三线”工业区，下岗工人几乎没有再就业的前景，也没有足够的社会福利来帮助他们渡过产业结构调整最困难的阶段，政治化的抗议活动正在兴起，因为许多工人认为他们的困境是政府政策的直接结果，而且政府和产业官僚机构成员们仍然在吃香喝辣。在撰写本报告时，1998 年 3 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刚刚宣布了一项大规模的计划，将精简整个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并完全取消许多工业部。但是，这在短期内能产生多大的效果还有待观察，工人们早就指出，那些向他们宣传经济结构调整的干部，告诉工人要灵活，“没有付出就不会有收获”，但他们却继续享有工作保障，这是不公平的。因此，这种常态化的抗议似乎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

同样，明显而广泛的官方腐败，仍然刺激着面临经济困难的不满工人。而失业率上升、出售、合并或允许中小国有企业破产的政策，很可能使情况恶化。在关闭企业或将企业卖给特定的买家时，经常会滋生大量腐败，个人关系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现在这几乎遭到了普遍的怀疑。工人们再次将诚实的努力工作所获得的回报，与依靠关系所获得的回报进行比较，并认为他们的老板在最后一刻假装就关闭或合并工厂进行协商，而这些工厂的命运早已内定了，这是在愚弄他们。

在中国的后社会主义经济中，无论是国营部门还是私营部门的

工人，都越来越感到需要有独立的组织，通过这些组织来维护自己的集体利益。中共自己放弃了社会主义经济，而社会主义经济在理论上能比资本主义更好地保护工人的利益，所以中共越来越难以拿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在现在的经济下，不能建立独立的组织。但在中国，任何自治组织的存在，都将成为中共政治权力垄断的第一道裂缝，对现在的领导层来说，就像 1989 年春天一样，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中国各地工人群体对自组织的共同愿望，仍然可能与中共准备让步的东西发生冲突。但是，目前大量中国工人所承受的压力是如此之大，甚至那些仍在国营部门工作的工人也可以连续几个月不领工资，这种对抗很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尖锐和频繁，而其中许多对抗的一个共同特点无疑将是像 1989 年那样，组织起既有工业议程又有政治议程的工人自治团体。

# 参考文献

## 中国报纸和期刊

文中均为日期和页数，书目中只列出作者标识的文章。

Beijing Review (《北京评论》)

《北京工人》

China Daily

《中国新闻》

China Reconstructs

《中国工人》

《中国青年》

《重庆日报》

《经济研究》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光明日报》

《广西日报》

《广州日报》

《广州工运》

《广州红卫报》

《解放军报》

《解放日报》 (上海)

《明报月刊》 (香港)

《观察家》(香港)

《十月评论》（香港）

《人民日报》

《人民电业》

《红旗》

《红卫报》

《上海劳动报》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香港）

《南方日报》

《工会信息》（全国总工会内部刊物）

《文汇报》（上海）

《文汇报》（香港）

《工人日报》

《工人天地》

新华社

## 监测的无线电广播和新闻监测服务

FBIS-CHI Foreign Broadcasts Information Service, China section  
(monitoring service).

Guangdong/Guangzhou Radio 15 March 1967 'Guangzhou Ribao on  
uniting with PLA', translated in News from Provincial Radio  
Stations 199: M4-9.

——'Canton workers' praise for Red Guards', translated in News from  
Provincial Radio Stations 202: M8-9.

——'Setting up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the Canton "Workers'  
Alliance" acclaimed', translated in News from Provincial Radio  
Stations 234: M1.

- ‘Canton Rally to support the centre’s resolution on Guangdong problem, in News from Provincial Radio Stations 235: M1–7.  
 News from Provincial Radio Stations (monitoring service)  
 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Magazines (monitoring service)  
 SWB/FE Survey of World Broadcasts, Far East Section (monitoring service)

## 引用的著作

- All-China Federation of Labour (1950) ‘Annual Report of the All-China Federation of Labour’, Chinese Worker 15 May, translated in Current Background 24:10 November.
- 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ACFTU) (1949) ‘Resolution on the present tasks of the Chinese labour movement’ (《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Chinese labour movement (《中国职工运动文选》), Beijing: Workers’ Press.
- An Zhiguo (1981) ‘On the question of disturbances caused by small numbers of people’, Beijing Review 24, 15:3–4.
- Andors, S (1977a) China’s industrial revolution: Politics,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1949 to the present, London: Martin Robinson and Co. Ltd.
- (1977b) Workers and workplaces in revolutionary China, White Plains, NY: M E Sharpe.
- Anon. (1978) ‘Who should be the masters?’, wall poster, Beijing, December 1978, translated in J D Seymour (ed.) (1980) The Fifth Modernization—China’s Human Rights Movement, 1978–1979, Stanfordville, NY: Human Rights Publishing Group.
- 四五论坛 (April Fifth Forum) (1979) ‘The state of the economy’, original title ‘The people’s democratic movement and the style of

- “upright officials” the people expect’, *BeiMei Daily* 9 (29 April 1979), translated in J D Seymour (ed.) *The Fifth Modernization—China’s Human Rights Movement, 1978–1979*, Stanfordville, NY: Human Rights Publishing Group.
- Becker, J (1996) *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 London: John Murray.
- 《北京之春》(Beijing Spring), dates in text, in C.Widor (ed.) *Documents on the Chinese democratic movement 1978–1980* (see under Widor).
- Bennett, G A and R E Montaperto (1971) *Red Guard—The political biography of Dai Hsiao’ ai*,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Benton, G (ed.) (1982) *Wild lilies, poisonous weeds: Dissident voices from People’s China*, London: Pluto Press.
- and A Hunter (eds) (1995) *Wild lily, prairie fire: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 Yan’an to Tian’anmen 1942–1989*,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ettelheim, C (1974)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Chin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Blecher, MJ and G White (1985) *Micro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A technical unit during and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 Brodsgaard, K E (1981) ‘The Democracy Movement in China, 1978–1979: Opposition movements, wall poster campaigns, and underground journals’, *Asian Survey* 21, 7: 747–74.
- Brugger, W (1976) *Democracy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 1949–195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an, A (1991a) ‘PRC workers under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 Information* 5, 4:75–82.
- (1991b) ‘Protest in a Hunan county town: The profile of a

- Democracy Movement activist in China's backwaters', in Jonathan Unger (ed.)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China: Reports from the provinces*, Armonk, NY: M E Sharpe.
- (1992) 'Dispell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Red Guard movement: The necessity to re-examine Cultural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and periodiz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 1:61–85.
- (1993) 'Revolution or corporatism? Workers and trade unions in post-Mao China',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9:31–61.
- (1995) 'The emerging patterns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China and the rise of two new labor movements', *China Information* 9, 4:36–59.
- (1996a) 'The changing ruling elite and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China', in G Rodan (ed.) *Political oppositions in industrialising Asia*, London: Routledge.
- (1996b) 'Boot camp at the shoe factory', *Washington Post* 3 November.
- and Jonathan Unger (1990) 'Voices from the protest movement, Chongqing, Sichuan',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4:259–79.
- , S Rosen and Jonathan Unger (eds) (1988) *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The Li Yizhe debates*, Armonk, NY: M E Sharpe.
- Chen Erjin (1984) *China: Crossroads Socialism*,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R Munro, London: Verso Editions.
- Chen Ruoxi (1982) *Democracy Wall and the unofficial journal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 Chesneaux, J (1968)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iang, Chen-chang (1990) 'The role of trade unions in mainland

- China', *Issues and Studies* 26, 2:75–98.
- Child, J (1994) *Management in China during the age of refo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ina News Analysis (1968) 'Army rule', CNA 711 (7 June 1968).
- (1969) 'Workers and discipline', CNA 769 (15 July 1969).
- 《中国之春》(China Spring) (1990) 'The Guangdong Workers' movement before and after June 4th', *China Spring* April, 60–62.
- Chung, Chong-wook (1980) *Maoism and development: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in China*, Seoul: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 Davis, D (1988) 'Patrons and clients in Chinese industry', *Modern China* 14, 4:487–97.
- 邓小平 (Deng Xiaoping) (1978) 'Greeting the great task', *Beijing Review* 21, 42:5–8.
- Denitch, B (1981) 'Yugoslav exceptionalism', in J F Triska and C Gati (eds) *Blue-collar workers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Dirlik, A (1997) 'Narrativizing revolution: The Guangzhou Uprising (11–13 December 1927) in workers' perspective', *Modern China* 23, 4:363–97.
- Epstein, I (1949) *Labor problems in Nationalist Chin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 Erbaugh, M S and R K Kraus (1991) 'The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in Fujian and its aftermath', in Jonathan Unger (ed.)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China: Reports from the provinces*, Armonk, NY: M E Sharpe.
- Esherick, J W (1990) 'Xi'an Spring',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4:209–35.
- Fletcher, M D (1974) *Workers and Commissars*, Bellingham, Washington, DC: Western Washington State College, Program in

- East Asian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
- Forster, K (1986) 'The 1976 Ch'ingming Incident in Hangchow', *Issues and Studies* 22, 4: 13–33.
- (1990)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 NY: M E Sharpe.
- (1991) 'The popular protest in Hangzhou', in Jonathan Unger (ed.)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China: Reports from the provinces*, Armonk, NY: M E Sharpe.
- Free Talk (1981) 'Who are the real law breakers?' (Jinjing shei wei fu?), in *October Review* 55, (1981) 20–21.
- Friedman, J R (1949) 'Labor in Nationalist China, 1945–48', in I Epstein, *Labor problems in Nationalist Chin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 Fu Rong (1957) 'My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under the socialist system', *Study (Xuexi)* 24, translated in *Extracts from China Mainland Magazines* 123:12–23.
- Garside, R (1981)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London: André Deutsch.
- Gipouloux, F (1986) *Les cent fleurs à l'usine—Agitation ouvrière et araise du modèle Soviétique en Chine, 1956–1957*, Paris: É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 Gong Xiaowen (1976) 'Deng Xiaoping and the "Twenty Articles"' (邓小平与“二十条”), *Study and Criticism (《学习与批判》)* 4:14–19.
- Gray, J (1994) 'Review of Rafe de Crespigny, "China this century"', *China Quarterly* 140, December: 1157.
- Guangzhou Railway General Headquarters (Guangtie Zongsi) (1968) 'Notice from CCP Central Committee, State Council,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and Central Cultural Revolution Group on dealing further blows to counterrevolutionary economism and speculative, profiteering activities', Guangzhou Railway General

- Headquarters 28 (February 1968), translated in *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 4129:1–6.
- Guangzhou Workers (1968)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movement in some factories in Guangzhou—An investigation report’, *Guangzhou Workers* 34 (28 May 1968), translated in *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 4208:7–16.
- Gunn, A (1991) “‘Tell the world about us’: The student movement in Shenyang, 1989’, in Jonathan Unger (ed.)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China: Reports from the provinces*, Armonk, NY: M E Sharpe.
- Hai Feng (1971) *An accoun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Guangzhou area (Guangzhou diqu wenge licheng shilue)*,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 Halpern, N (1985) ‘Learning from abroad: Chinese views of the East European economic experience, January 1977–June 1981’, *Modern China* 11, 1:77–109.
- Han Minzhu (1990) *Cries for democr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an Zhixiong (1979) ‘Democracy in economic management’, translated in J D Seymour (ed.) (1980) *The Fifth Modernization—China’s human rights movement, 1978–1979*, Stanfordville, NY: Human Rights Publishing Group.
- Haraszti, M (1978) *A worker in a workers’ state*, translated by Michael Wright, original title *Piece-rates*,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 Harper, P (1969) ‘The Party and the unions in Communist China’, *China Quarterly* 37: 84– 119.
- ( 1971a) ‘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management in Communist Chin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3:111–40.
- (1971b) ‘Trade union cultivation of workers for leadership’, in J W Lewis (ed.) *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ssard, J and J Sheehan (1997) 'Enterprise reform and the role of the state: The case of the Capital Iron and Steel Works, Beijing', in A Bugra and B Usdiken (eds) *State, market and organizational form*,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Heilmann, S (1990) *Nanking 1976: Spontane Massenbewegungen im Gefolge der Kulturrevolution*, Bochum: Brockmeyer.
- (1993) 'The social context of mobilization in China: Factions, work units and activists during the 1976 April Fifth Movement', *China Information* 8, 3:1–19.
- Henley, J S and Mee-Kan Nyaw (1987) 'The development of work incentives in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Material versus non-material incentives', in M Warner (ed.) *Management Reforms in China*, London: Frances Pinter.
- Hong, Ng Sek and R D Lansbury (1987) 'The workers' congress in Chinese enterprises', in M Warner (ed.) *Management Reforms in China*, London: Frances Pinter.
- Hong Yung Lee (1978)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ward, P (1991) 'Rice bowls and job security: The urban contract labour system',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5:93–114.
- Howard, R W (1991) 'The student Democracy Movement in Changchun', in Jonathan Unger (ed.)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China: Reports from the provinces*, Armonk, NY: M E Sharpe.
- Huang, Mab and J D Seymour (1980) 'Introduction', in J D Seymour (ed.) *The fifth modernization—China's human rights movement, 1978–1979*, Stanfordville, NY: Human Rights Publishing Group.
- Huang Yongsheng (1967) 'Report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dong', *Guangzhou City Radio* 14 December, translated in *News from Provincial Radio*

Stations 238 21 December: M3–7.

Human Rights Watch—Asia (1994) ‘Report on suppression of independent workers’ organizations in China’,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Asia.

Kaple, D (1994) *Dream of a red factory: The legacy of High Stalinism i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aba, R (1991) *The roots of Solidarity: A political sociology of Poland’s working-class democratiz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ai Ruoyu (1953) ‘Report on the trade union work in China’, in *The Seventh All-China Congress of Trade Union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6a) ‘The current tasks of trade unions in joint state-private enterprises’, *Xinhua News Agency (Beijing)*, 23 November 1956, translated in *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 1422:2–4.

——(1956b) ‘Summing up of national conference of basic-level trade union cadres in joint state—private enterprises’, *Xinhua News Agency (Beijing)*, 29 November 1956), translated in *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 1423:10–11.

——(1957a) ‘Trade union chief on tests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 industry’, *Xinhua News Agency (Beijing)*, 7 March 1957, translated in *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 1487: 22.

——(1957b) ‘How contradictions within the people are handled by the trade unions’, *Workers’ Daily* 9 May 1957, translated in *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 1535:8–12.

Lam, W Wo-lap (1995) *China after Deng Xiaoping*, Singapore: John Wiley and Sons.

Lee, C K (1998) ‘The labour politics of market socialism’, *Modern China* January 24(1): 3– 33.

Lee Lai To (1984) *The structure of the trade union system in China*,

- 1949–1966, Hong Kong: Centre for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1986) *Trade unions in China, 1949 to the Present*,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Lee, P N (1977) ‘The Gang of Four: Radical politics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in S S K Chin (ed.) *The Gang of Four: First essays after the fall*, Hong Kong: Centre for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1987) *Industrial management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1949–198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ijonhufvud, G (1990) *Going against the tide: On dissent and big-character posters in China*, London: Curzon Press.
- Leung Wing-yue (1988) *Smashing the inn rice-pot: Workers and unions in China’s market socialism*, Hong Kong: 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re.
- Lewis, P (1994) *Central Europe since 1945*, London: Longman.
- Li Chun (1957) ‘Why democracy must be broadened in enterprise management’ (《为什么要扩大企业管理的民主》), *Chinese Worker* 6:3–4.
- Li Hua (1987) ‘The democratic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and workers’ awareness of democracy’, *Chinese Economic Studies* 22, 4:69–80.
- Li Lisan (1949) ‘Some points of explanation on the policy of developing production and benefitting both labour and capital’ (《关于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政策的几点说明》),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Chinese labour movement* (《中国职工运动文选》), Beijing: Workers’ Press.
- Liao Gailong (1980) ‘The “1980 reform” programme of China’, reprinted in *The Seventies* 134 1 March 1981, translated in *FBIS* 16 March 1981.
- Lin Lean Lim and G Sziraczki (eds) (1995) *Employment challenges and*

- policy responses: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Beijing: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Area Office Beijing.
- Liu, A P L (1996) *Mass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Liu Guokai (1987)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ranslated and abridged by A Chan, Armonk, NY: M E Sharpe.
- Liu Ningyi (1956) 'Overcome the tendency not to care about the livelihood of workers and staff', *Southern Daily* 25 June.
- Liu Zijiu (1951) 'On the belated introduction of the lesson of democratic reform in factories and mines', *Workers' Daily* 12 September 1951, translated in *Current Background* 123: 1–9.
- Lockett, M (1983) 'Enterprise management—Moves towards democracy?', in S Feuchtwang and A Hussain (eds) *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1985)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a Chinese enterprise: The Beijing General Knitwear Mill, 1966–81*, Oxford: Oxford Centre for Management Studies.
- Lu Min (1979a) 'Gradually do away with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and establish a Paris Commune-style democratic system', *Beijing Spring* 1, translated in J D Seymour (ed.) (1980) *The fifth modernization: China's Human Rights Movement, 1978–1979*, Stanfordville, NY: Human Rights Publishing Group.
- (1979b) 'How to run a factory' (original title: 'Do away with the power of administrative leadership of basic-level organizations in factories, mines and other enterprises'), *Beijing Spring* 2, translated in J D Seymour (ed.) (1980) *The fifth modernization—China's human rights movement, 1978–1979*, Stanfordville, NY: Human Rights Publishing Group.
- Lu Ping (1990) *A moment of truth: 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China's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independent*

- unions, Hong Kong: 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re (also published in Chinese as *The workers have risen* (《工人起来了》)).
- MacFarquhar, R (1960) *The Hundred Flowers*, London: Steven and Sons Ltd.
- (ed.) (1990) *The Politics of China 1949–19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毛泽东思想万岁!》(Long live Mao Zedong Thought) (1969), no publisher.
- Mehnert, K (1969) *Peking and the New Left: At home and abroad*, Berkeley, CA: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eisner, M (1983) ‘The concept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in Chinese Marxist thought’, in V Nee and D Mozingo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89) ‘Marx, Mao and Deng on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history’, in A Dirlik and M Meisner (eds) *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Armonk, NY: M E Sharpe.
- Mok Chiu Yu and J F Harrison (eds) (1990) *Voices from Tiananmen Square: Beijing Spring and the democracy movement*,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 Montias, J M (1981) ‘Observations on strikes, riots and other disturbances’, in J F Triska and C Gati (eds) *Blue-collar workers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Munro, R (1984a) ‘China’s Democracy Movement: A midwinter spring’, *Survey* 28, 2: 70–98.
- (1984b) ‘Introduction’, in Chen Erjin, *China: Crossroads Socialism.*, London: Verso Editions.
- Nathan, A J (1989) ‘Chinese democracy in 1989: Continuity and change’, *Problems of Communism* 38, 5:16–29.

Ni Zhifu (1981) 'Implement the guidelines of the 6th Plenum, give full play to the initiative of the workers as masters of the land and strive to push the economy forward', *Workers' Daily* 13 October 1981, translated in *Survey of World Broadcasts* 6870/BII (3 March 1981), 1–10.

——(1983) 'Report at the opening of the 10th ACFTU Congress', *People's Daily* 19 October 1983.

North China People's Government (1949) 'Decis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factory management committees and factory workers' representative congresses in state- and collective-run industrial enterprises' (《关于在国营、公营工厂企业中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与工厂职工代表会议的决定》), in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Chinese labour movement* (《中国职工运动文选》), Beijing: Workers' Press.

Ong, Shao-erh (1953) *Labor problems in Communist China* (to February 1953), Lackland, TX: Air Force Personnel and Training Research Center, Lackland Air Force Base.

Pateman, C (1970)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eng Qingzhao (1951) 《工人政治课本》 (Workers' political textbook), Beijing: Gongren Chubanshe.

People's Road (Renmin Zhi Lu) (1980) 'On events around the Qin's arrest and our attitude' (《关于何求被捕前后与我们的态度》) in *October Review* 48 (1980) 12– 13.

裴宜理 (Perry, E J) (1993)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Shanghai's strike wave of 1957', *China Quarterly* 137:1–27.

——(1995) 'Labour's battle for political space: the role of worker associ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D S Davis, R Kraus, B

- Naughton and E J Perry (eds)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 Li Xun (1997)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Pravda, A (1981)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activity’, in J F Triska and C Gati (eds) *Blue-collar workers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and B A Ruble (eds) *Trade unions in Communist states*, Boston: Allen and Unwin.
- Questions on the labour movement (1950), 3rd collection, Beijing: Workers’ Press.
- Red Insurrection (《红色暴动》) (1967)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Canton and our policy’, *Red Insurrection* (22 August 1967), translated in *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 4026: 7– 12.
- Richman, B (1969) *Industrial society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 Rosen, S (1982)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Cant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1988) ‘Guangzhou’s Democracy Movement in Cultural Revolution perspective’, *China Quarterly* 101:1–31.
- Rozman, G (1985) *A mirror for socialism*, London: I B Tauris.
- Ruble, B (1981) *Soviet trade unions: Their development in the 1970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ich, T (1984) ‘Workers in the workers’ state: Urban workers in the PRC’, in D S G Goodman (ed.) *Groups and politics in the PRC*, Armonk, NY: M E Sharpe.
- (1990)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eijing People’s Movement’, in Jonathan Unger (ed.)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China: Reports from the provinces*, Armonk, NY: M E Sharpe.
- Sailing Ship (no date) ‘The new awakening of the Chinese working

- class' (《中国工人阶级的新觉醒》), reprinted in *October Review* 51 (1981): 11.
- Schoenhals, M (1997a) '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6–1979', *China Quarterly* 145:87–111.
- (ed.) (1997b)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Not a dinner party*, Armonk, NY: M E Sharpe.
- Sea Spray (《海浪花》) (1980a) 'A new era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共产运动史上的新纪元》), reprinted in *October Review* 60 (1981) 34.
- Sea Spray (1980b) 'Seeing the inevitability of a multi-party system from the Polish independent trade union' (《从波兰独立工会看多党制的不可抗拒性》), reprinted in *October Review* 61 (1982): 20.
- Seventies, The (《七十年代》) (1980) 'China's new era is an era of deep thought' (《中国的新一代是思索的一代》), *The Seventies* June 1980:54–6.
- Seymour, J D (ed.) (1980) *The fifth modernization: China's Human Rights Movement, 1978– 1979*, Stanfordville, NY: Human Rights Publishing Group.
- Sheehan, J (1995) 'Conflict between workers and the party-state in China and the formation of autonomous workers' organizations, 1949–1984',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 (1996) 'Is there another Tiananmen uprising in the offing?',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8, 12:554–6.
- 省无联(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 ((Hunan) Provincial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Rebels Allied Committee) (1968) 《中国向何处去?》, 'Whither China?', translated in *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 4190:1–18.
- Shirk, S L (1981) 'Recent Chinese labour policies and the

-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88:575–93.
- Siu, H F and Z Stern (1983) *Mao's harvest: Yokes from China's new gener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olomon, R (1968) 'Sources of labour discontent in China: The worker-peasant system', *Current Scene* 6, 5:1–26.
- Spring Thunder Warriors (《春雷战士》) (1967) 'Warmly hail the imposition of military control on Canton Railway Sub-bureau', *Spring Thunder Warriors* 19 (25 November 1967), translated in *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 4120:5–6.
- Steel August 1 (钢八一) (1967) 'Report on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facts of the persecution of the August 1 Combat Corps', *Steel August 1* 15 October 1967, translated in *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 4019:1–7.
- Strand, D (1985)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1985), Copenhagen: Centre for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 Sturmthal, A (1964) *Workers' Councils—A study of workplace organization on both sides of the Iron Curta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u Ke (1957) 'The problem of democratic management of state-private enterprises viewed in the light of workers' experience in industrial management', *Workers' Daily* 5 May.
- Theoretical Banner (《理论旗》) (1981) 'Death knell of the rule of the bureaucratic privileged class is tolling' (《官僚特权阶级统治的丧钟》), reprinted in *October Review* 53–4:94–5.
- Triska, J F (1981) 'Workers' assertiveness and Soviet policy choices', in J F Triska and C Gati (eds) *Blue-collar workers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and C Gati (1981) 'Introduction', in J F Triska and C Gati (eds)

- Blue-collar workers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Tung, R L (1982) *Chinese industrial society after Mao*, Lexington, MA: D C Heath and Co.
- Tyson, L D (1981) 'Aggregate economic difficulties and workers' welfare', in J F Triska and C Gati (eds) *Blue-collar workers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Jonathan Unger, J (1991a) 'Whither China? Yang Xiguang, red capitalists and the social turmoil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17, 1:3–37.
- (1991b) 'Introduction', in Jonathan Unger (ed.)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China: Reports from the provinces*, Armonk, NY: M E Sharpe.
- Vogel, E (1969)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 196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alder (华德), A (1978) 'Zhang Chunqiao and Shanghai's January Revolution',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32.
- (1982) 'Some ironies of the Maoist legacy in industry', in M Selden and V Lippit (eds)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in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
- (1986) 《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7) 'Wage reform and the web of factory interests', *China Quarterly* 109:22–41. ——(1989a) 'Factory and manager in an era of reform', *China Quarterly* 118:242–64.
- (1989b)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the Beijing upheaval of 1989', *Problems of Communism* 38, 5:30–40.
- (1991) 'Workers, managers and the state: The reform era and the political crisis of 1989', *China Quarterly* 127:467–92.

- (1996)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factories: Party-state structures and patterns of conflict’, in E J Perry (ed.) *Putting Class in its Place: Worker Identities in East Asi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and Gong Xiaoxia (1993) ‘Workers in the Tiananmen protests: The politics of the Beijing Workers’ Autonomous Federa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9:1–29.
- Wales, N (1945)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New York: John Day.
- Wang Haofeng (1958) ‘Important reform of management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People’s Daily* 26 April 1958, translated in *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 1774:4–13.
- (1960) ‘Consolidate and develop the “Two participations, one reform and triple combination system”, raise the standard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in all respects’, *Red Flag* August: 6–15.
- Wang Ruowang (1987) ‘Some interesting things that took place at the recent election of deputies to the People’s Congresses’, *Pa Shing Semimonthly* 148 16 July, reprinted in *Democracy Wall* 3: no date, Hong Kong.
- 王绍光 (1993) ‘From a pillar of continuity to a force for change: Chinese workers in the movement’, in R V Des Forges, Luo Ning and Wu Yen-bo (eds) *Chinese democracy and the crisis of 1989*,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1995) 《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ng Xiaodong (1993) ‘A review of China’s economic problems: The industrial sector’, in R V Des Forges, Luo Ning and Wu Yen-bo (eds) *Chinese democracy and the crisis of 1989*,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Wang Xizhe (1979a) ‘Strive for the class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 translated in A Chan et al. (eds) (1988) *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The Li Yizhe debates*, 132–56.
- (1979b) ‘Mao Zedong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ranslated in A Chan et al. (eds) (1988) *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The Li Yizhe debates*, 177–260.
- Wang Zhuo and Wen Wuhan (eds) (1992) *An evaluation of Guangdong’s opening and reform (Guangdong gaige kaifang pingshuo)*,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ress.
- Warner, M (1995) *The management of human resources in Chinese industry*, London: Macmillan.
- Warner, S (1991) ‘Shanghai’s response to the deluge’, in Jonathan Unger (ed.)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China: Reports from the provinces*, Armonk, NY: M E Sharpe.
- Wasserstrom, J N and Liu Xinyong (1995) ‘Student associations and mass movements’, in D S Davis, R Kraus, B Naughton and E J Perry (eds)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i Jingsheng (1978) ‘The fifth modernization’, translated in J D Seymour (ed.) (1980) *The Fifth Modernization—China’s Human Rights Movement, 1978–1979*, Stanfordville, NY: Human Rights Publishing Group.
- (1979) ‘Democracy or a new dictatorship?’, translated in G Benton (ed.) (1982) *Wild lilies, poisonous weeds: Dissident voices from People’s China*, London: Pluto Press, 45–50
- Wen Jin (1956) ‘Democracy must serv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民主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Chinese Worker* 16:5–7.
- White, G (1980) ‘The politics of demobilized soldiers from liberation to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82:187–213.
- (1987)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ese industry: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Labour Contract System’, *China Quarterly*

111:365–89.

- White, L T III (1989) *Policie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idor, Claude (ed.) *Documents on the Chinese democratic movement, 1978–1980: Unofficial magazines and wall-posters vol. 2*, joint publication, Paris: É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and Hong Kong: The Observer Publishers.
- Williams, P C (1991) 'Some provincial precursors of popular dissent movements in Beijing', *China Information* 6, 1:1–9.
- Wilson, J L (1986)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A Pravda and B Ruble (eds) *Trade Unions in Communist States*, Boston: Allen and Unwin.
- (1990a) 'Labor policy in China: Reform and retrogression', *Problems of Communism* 39, 5:44–65.
- (1990b) "'The Polish lesson": China and Poland 1980–1990',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23, 3–4:259–79.
- Wu Shouhui and Guo Jinhua (1987) 'Workers' evaluation of and hopes for trade unions', *Chinese Economic Studies* 22, 4:55–68.
- Wylie, R F (1981) 'Shanghai dockers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ssues', in C Howe (ed.) *Shanghai: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n Asian metropol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Xiao Ping (1986)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China's democracy movement',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野草》 (PRC unofficial journal), translated in *Issues and Studies* 22: 155–75.
- Xu Zhizhen (1953) 'Report on the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trade un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eventh All-China Congress of Trade Union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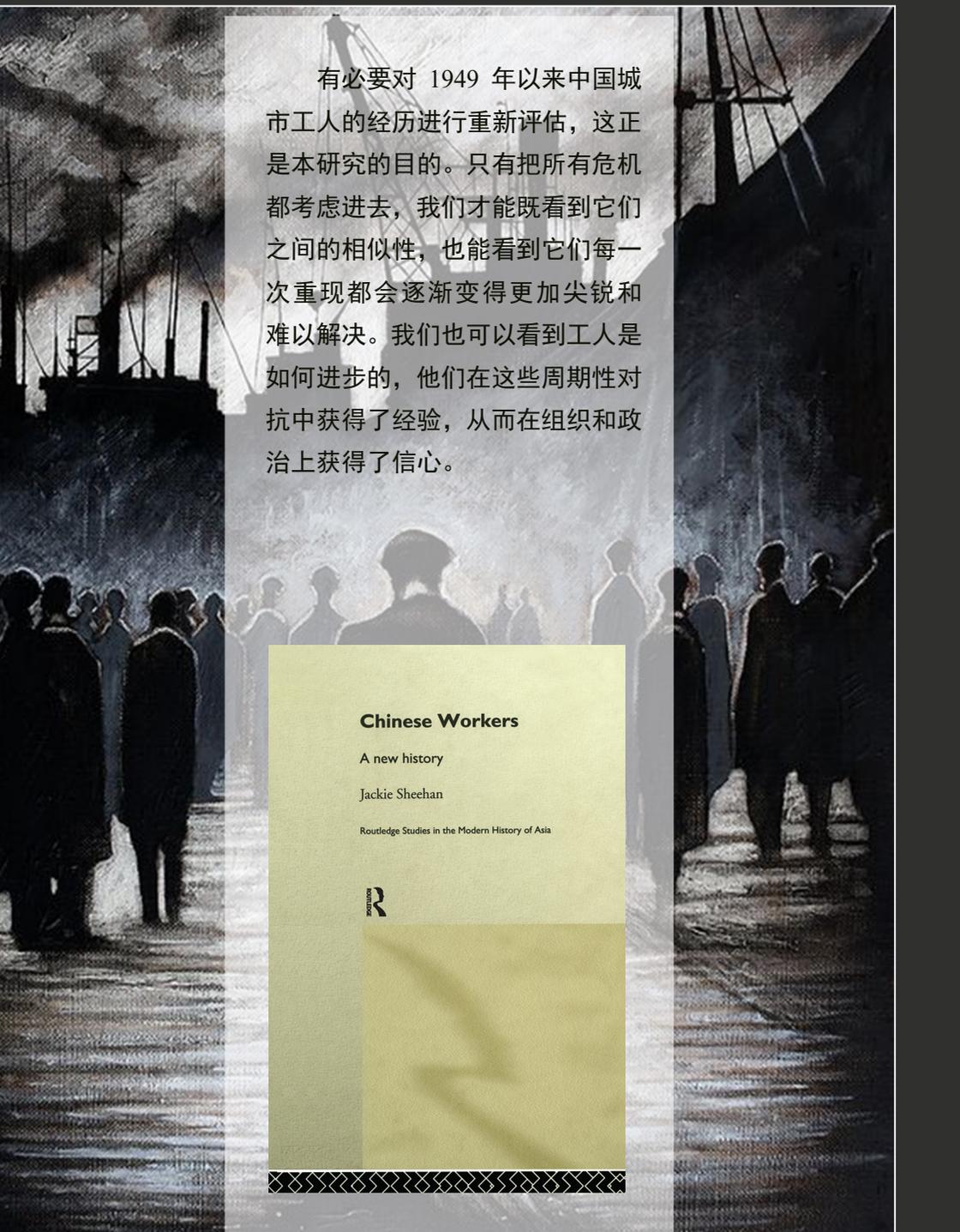
- Yang, M M (1989)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The construction of corporateness in a Chinese socialist factory',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2:31–60.
- Yao Wenyuan (1968) 'The working class must lead in everything'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Red Flag* 2:3–7.
- Yi Han (1956) 'How to understand the Hungarian Incident' (《怎样认识匈牙利事件》), *Chinese Worker* 22:8–9.
- Zai Heng (1957) 'Develop the supervisory role of the workers' congress' (《发挥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 *Chinese Worker* 11:6–7.
- Zhao Minghua and T Nichols (1996) 'Management control of labour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ases from the textile industry', *The China Journal* 36:1–21.
- Zheng Xing (1981) 'The election movement is in the ascendant', in G Benton (ed.) (1982) *Wild lilies, poisonous weeds: Dissident voices from People's China*, London: Pluto Press.
- Zhi Exiang (1979) 'The election for shop-heads', *China Reconstructs* 28, 5:6–8.
- Zhu Xuefan (1948) 'On the labour movement in Guomindang-ruled areas: Report to the 6th All-China Labour Congress', *Xinhua News Agency*, 26 July, reprinted in *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Chinese Labour Movement* (《中国职工运动文选》), Beijing: Workers' Press.
- Zi Chuan (1977a) 'Li Yizhe and me' (Li Yizhe yu wo), *Big Dipper (Beidou)* 1:4–13.
- (1977b) 'Li Yizhe and me' (Li Yizhe yu wo), *Big Dipper (Beidou)* 2:43–51. ——(1977c) 'Li Yizhe and me' (Li Yizhe yu wo), *Big Dipper (Beidou)* 3:33–8.
- (1977d) 'Li Yizhe and me' (Li Yizhe yu wo), *Big Dipper (Beidou)* 4:11–16.
- (1977e) 'Li Yizhe and me' (Li Yizhe yu wo), *Big Dipper (Beidou)*

6:36–41.

——(1977f) ‘Li Yizhe and me’ (Li Yizhe yu wo), *Big Dipper (Beidou)*  
7:25–8, 41.

Zinner, P E (1956) *National Communism and popular revolt in Eastern Europe.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on events in Poland and Hungary, February–November, 195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有必要对 1949 年以来中国城市工人的经历进行重新评估，这正是本研究的目的。只有把所有危机都考虑进去，我们才能既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也能看到它们每一次重现都会逐渐变得更加尖锐和难以解决。我们也可以看到工人是如何进步的，他们在这些周期性对抗中获得了经验，从而在组织和政治上获得了信心。

##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Jackie Sheehan

Routledge Studies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Asia

